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目录学教程

彭斐章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面 向 2 1 世 纪 课 程 教 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目录学教程

彭斐章 主 编
陈传夫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书阐述了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书目、索引、文摘与综述的编制原理、书目情报服务、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国外目录学理论，简介了目录学的分支学科，论述了国内外目录学的发展趋势，着重于培养学生的书目情报意识，提高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及文史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各类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岗位培训教材和工作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录学教程 / 彭斐章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2011.11重印)
ISBN 978-7-04-015344-6

Ⅰ.目… Ⅱ.彭… Ⅲ.目录学-高等学校-教材 Ⅳ.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6148号

策划编辑 徐 挥　　责任编辑 王友富　　封面设计 于 涛　　责任绘图 郝 林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张 颖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开　　本	787×960 1/16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张	19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字　　数	350 000	印　　次	2011年11月第7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22.00元

物 料 号 15344-00

作者简介

彭斐章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第2、3、4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主要著作有：《目录学概论》（主编）、《目录学》、《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科学研究与开发中的信息保障》等。

陈传夫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目录学》、《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等，主要论文有：《开放内容的类型及其知识产权管理》、《中国科学数据公共获取：现状、问题与机制改进的建议》等。

王新才　武汉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梁启超读书生涯》、《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等，主要论文有：《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等。

程焕文　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图书文化导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等。

司　莉　武汉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论文有：《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创新与发展》、《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研究进展》、《我国文献分类计算机化的发展与近期目标研究》等。

柯　平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文献目录学》等，主要论文有：《现代目录学体系中的书目资讯理论》、《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等。

郑建明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教育部

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当代目录学》、《张仲景评传》等。

王锦贵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史简编》、《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等,主要论文有:《20世纪俄国目录学发展特点与中国目录学现实思考》等。

目　　录

前　言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与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古典目录学经郑樵与章学诚等学者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目录学在清代一度被尊为显学。今天，信息资源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录学发展成一门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以解决巨量的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学科，在科学研究、读书治学、信息资源管理、出版发行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录学学科的核心是书目情报的运动规律。

目录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应用价值。自产生以来就被看作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是智慧之学，教人们学会在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这种本领也是网络时代建立现代学习型社会、进行终身学习必备的信息素养。在信息时代，目录学广泛应用于各门具体的学科研究之中，不仅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同时，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拓展和更新。目录学是科学研究的指南。

目录学研究的深化依赖于现代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变革。目录学研究只有科学地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掌握准确的数据和事例，使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结合目录学的特点，大胆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目录学研究的创新。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进行：一是研究辅助手段、工具的借鉴；二是方法移植创新。改进和完善目录学研究方法，是提高目录学科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目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学好这门课，必须在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都下工夫。在掌握好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动手能力。通过大量的实践，提高运用编目、分类、检索、计算机等课程的知识，编制各类型书目、文摘、综述等书目文献的能力和书目咨询工作的能力，为将来从事科研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目录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来自于时代的需要，又服务于时代的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信息环境的变化，目录学进入了数字时代。目录工作实践已发生深刻变革，目录工作的内容、组织与管理体制均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要求目录工作者具备一些新的素

养和技能。这些自然要求目录学教学内容做出相应调整。书目控制、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以及国外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网络信息资源的揭示与报导等内容,都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在以往的教科书中反映得还不够充分,此次我们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

目录学是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之一,也是信息管理、出版发行和档案管理等学科的学习、研究者必备的相关学科知识。为了推动目录学教学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将《目录学教程》列入面向21世纪系列教材之一。《目录学教程》就是为了适应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需要编制的本科生教材。全书共九章。其内容主要包括: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外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文献揭示与组织、书目文献的编纂、书目控制、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和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本书由彭斐章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相关教师组成了编写组,分头执笔编写了有关章节。具体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由彭斐章、陈传夫(武汉大学)执笔;第二章由王新才(武汉大学)执笔;第三章由程焕文(中山大学)执笔;第四章由司莉(武汉大学)执笔;第五章由陈传夫(武汉大学)执笔;第六章由柯平(南开大学)执笔;第七章由彭斐章(武汉大学)执笔;第八章由郑建明(南京大学)执笔;第九章由王锦贵(北京大学)执笔。全书由彭斐章、陈传夫统稿。

在本书编写组织等工作中,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吴慰慈教授、刘兹恒教授、徐挥同志给予大力帮助,责任编辑王友富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参考有关论著。在此,我们谨向在本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有关人士和有关著译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多头执笔,虽经统稿,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同行与读者批评指正。

彭斐章
2004年2月9日

第一章　目录学基础理论

第一节　目录学基本概念

目录学的基本概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书目有关的概念,如书目、国家书目、联合目录、个人著述书目、地方文献书目、推荐书目等。二是与书目情报有关的概念,如书目情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情报意识、书目情报能力等。三是与目录学有关的概念,如目录学、专科目录学、比较目录学等等。要研究和发展目录学,确立目录学的内容和范围,学习和研究目录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目录学的基本概念。

一、什么是书目

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汉书》记载的刘向、刘歆父子等编撰的《别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的书目。

书目属于二次文献范畴。书目编纂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对分散的一次文献(原始文献)所含的知识、信息,进行筛选、压缩、整序,揭示其内容,著录其外形特征,进行科学的编排组织,使之转化为有序的、可以传递的二次文献。书目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文献进行压缩和整序,从而降低原文获取的成本,节省读者查找文献的时间,提高一次文献的传递速度和利用效率,促进科学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

书目是文字和文献出现以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献的大量积累是目录产生的前提。人们需要利用文献,这是因为人类对知识、信息的需要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文献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因此,需要有一种联系文献和读者之间的媒介,来促进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源的合理的和有效的利用,这一媒介就是目录。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目"是指篇卷的名称而言,"录"是关于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校勘经过、书的评价等的简要文字说明,又称叙录或书录。将"目"和"录"合起来就是目录。据《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说明目录二字在我国出现是很早的,只不过

这里所指的是《尚书》一书的目录。我国古代的目录分为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种。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等编撰的《别录》和《七略》,就是“目”与“录”结合的群书目录。

目录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的《别录》;“略”,刘歆的《七略》;“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经籍志”,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志”,王俭的《七志》;“簿”,荀勖的《晋中经簿》;“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毋煚的《古今书录》;“解题”,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记”,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些称谓虽然各不相同,然而都是指的目录。

中国古代书目可分为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家藏书目录、古籍版本目录、宗教目录等多种。今天,书目已成为人们有效控制和传递文献信息的工具,它具有检索、报导和导读等功能。现代书目既有印刷型的,也有非印刷型的,如电子版书目、网络版书目。从广义上看,书目数据库、文摘系统、网络文献指南都是目录的一种形态。而从编制目的和社会职能的角度看,书目主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类型:统计登记性书目、联合目录、地方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推荐书目等。

国家书目是全面登记与报导一个国家近期或往昔出版物的文献总目。它是一个国家全部出版物现状与历史的记录,属于统计登记性书目的一种。通常由国家图书馆或版本图书馆负责编辑出版,具有统计登记全国出版文献的性质。现行国家书目是揭示与报导一个国家近期出版和发行的文献总目,如《中国国家书目(1985)》。回溯性国家书目是记载与反映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出版和发行的文献总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联合目录是揭示和报导若干文献收藏单位的全部或部分藏书的目录。联合目录的特点是集中报导多馆藏书及分布情况,指明文献的收藏处所。一般认为,联合目录始于13世纪的《英格兰图书馆登记册》。1929年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可算是我国图书馆界编制的第一部联合目录。按收录文献类型、内容和范围,联合目录一般可以分为图书联合目录、报刊联合目录,专题联合目录、综合性联合目录,全国联合目录、地区联合目录等类型。我国专题图书联合目录,如《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报刊联合目录,如《(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外国新书联合目录,如《全国西方新书联合通报》。

地方文献书目是全面揭示和报导某一地区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文献的书目。如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瞿宣颖编《中国方志考稿甲集》、萨士武编《台湾史料书目》。地方文献书目的特点是所收文献内容的地方性。一般说,地方文献书目所收录的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凡有关一地的自然、历史、社会的文献均在选收之列。地方文献书目收录文献的种别可分为:

反映一地文献史料的，如《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记载一地人士著作的，如《安徽文献书目》；收录一地出版物的，如《广东文献参考目录·本省刊物(解放前)》。此外还有专题地方文献书目，如《浙江矿藏目录》；方志目录、方志考录，如《浙江方志考》。

个人著述书目是记载作者的著述或兼收他人评价作者及其著述的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渊源于个人著述考或考释学者的著述，例如顾颉刚编撰的《老子考》；还有关于学者著述的书目考，例如梁启超编纂的《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个人著述书目就其收录范围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著述系年书目，或称之为个人著述编年书目。这是按作者所有著述的发表、出版或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起来的书目，便于按著述时间查阅作者著译情况。如果作者著作是多学科的，则也有先按学科再按时间为序编排的。二是个人著述研究书目。这是汇辑作者著述及他人研究作者的著述的文献书目，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的著述，另一部分是关于作者的研究资料。个人著述书目可以反映作者全部著译，包括撰著、创作、编写、翻译、校订等著述译作以及他人研究作者的主要文献的面貌，以便了解与研究作者的学术成就与贡献；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及他与同时代人联系活动的资料，从总体上研究与评价作者；为编辑出版人员编选出版作者全集、选集，提供全面、系统、可靠的文献线索。

推荐书目是针对特定的读者、采用特定的标准选择图书推荐给读者的书目，包括选读书目、导读书目等。如清道光年间，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光绪年间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都是推荐书目的代表。推荐书目的特点是选题有明确的目的，有特定的读者对象，精选适合对象水平的图书，指出阅读方法，书目编排与图书揭示体现导读的精神。

目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完成文献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职能的人类社会活动范畴。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基本外形特征和文献所蕴藏的知识、情报、信息，这是目录的基本社会职能。目录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够全面揭示和报导有关文献的信息。我们所指的目录，是经过加工的一批相关文献，又经过科学的编排和组织，有序化了的、能为读者提供有关文献信息的二次文献。它揭示和报导的文献信息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向读者所揭示和报导的是关于文献的信息。

二、目录工作

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自印刷术发明以后，出版的图书品种增长很快。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出版图书的总量约计 50 万种，平均每一分钟有一种新书问世。当前，可供人类获取的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及系统学院莱曼领导的

小组发现,2002年中,全球由纸张、胶片以及磁、光存储介质所记录的信息生产总量达到5万亿兆字节。如果以馆藏量为1 900万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标准,5万亿兆字节的信息量相当于50万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藏量。与此同时,读者本身能够承受来自外界信息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假如一个人每天读完100页书,那么一年能读平均300页左右中等篇幅的书120本,50年只能读6 000册。这与整个出版总量相比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数字。因此,读者读什么?怎样从无边无际的文献海洋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这就产生了现实的矛盾,即不断增长着的巨大文献量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现象,古今中外的学者都作过比较生动形象的描述。我国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在其所著《古今书录·序》中写道:"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这就形象地说明了人们面对着文献的海洋,要想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是多么不容易。苏联学者C.П.瓦维诺夫对这一对矛盾现象作了生动的比喻,他说,现代人站在喜马拉雅山似的图书馆面前,正像淘金者需要在大量沙砾中寻找金沙一样。这说明人们需要知识,需要在文献海洋中获取自己真正需要的文献,正像淘金者在大量沙砾中采金似的。目录工作就是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着的巨大的文献量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目录工作就是通过查寻、著录、部次、评介、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等全部活动。其目的是将有关的文献信息及时准确地提供给读者,使得每一篇文献都能在最需要它的时间、地点和特定读者手中得到充分利用。揭示、报导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目录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矛盾的一方面是文献数量的迅速发展,文献载体形式的多样化,文献内容的交叉重复,出版印刷语种的繁多,文献的分布异常分散,文献老化速度加快等。矛盾的另一方面是读者对文献的需求既有特定的内容范围,又是多式多样的。目录工作正是随着矛盾双方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它的工作内容、形式以及工作组织和管理的。人们正是在解决不断增长着的巨大文献量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过程中,逐步认识目录工作在整个文献交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的。目录工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索引工作、文摘工作、综述工作、数据库工作、书目参考工作等内容。

三、目录学

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目录学也不例外。目录学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目录工作

实践需要的状况，目录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目录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它是在总结历代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目录学已经由单纯的读书治学之学发展为一门以研究日益增长的庞大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对象的科学。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

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经过了2 000年的进化历程。目录学是在我国丰富的书目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目录学的理论命题。早期只有书目的零碎知识，如在商代，出现了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并“产生了简单的著录文献的目录。”[①]这是胚胎时期。在古希腊，“目录学”这个词萌芽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目录的雏形。自卡利马科斯后，克劳德·加伦、思克斯·冈纳狄等人的著作都是对某一地方或时间中的人物的著述的编目。早期的目录学思想还很简单，就是“图书的抄写”或者是关于图书的传记。

公元前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大型的系统化的书目著作。刘向、刘歆在编制《别录》、《七略》时，创立了“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②]等一系列校书的方法和“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③]的编目方法，但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只是到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中加以总结了。《隋书·经籍志·序》论述了图书文献的起源和社会作用、图书与学术的关系、编目的方法，这是体系化的尝试。12世纪的郑樵在“会通”的历史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对《七略》“编写之次”的研究，总结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类例思想；通过对《七志》亡书志的研究提出了“编次必记亡书”的思想；通过对求书之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唐)“苗发等使江淮搜书”的研究，对史官司马迁、校书官刘向、刘歆父子、虞世南、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的校书经历的考察总结，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思想；通过对《隋书·经籍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的得失总结，提出了“泛释无义”的思想。郑樵通过对前人书目工作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形成《通志·校雠略》[④]这一著作。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目录学由经验科学向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演进的分水岭。

西方17世纪以来，“目录学”的含义转变为“关于书的写作”(Writing about

① 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②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页。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 郑樵：《通志·校雠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books)。但理论体系出现较晚。20世纪以来,西方目录学家将目录学理论综合为列举目录学和评论目录学两个分支。我们所说的目录学,在西方学术界称为Bibliography。不过,该词有几个不同的含义。《美国百科全书》将Bibliography定义为"关于记录出版物的科学或技术,或用来表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特定的产物的名称",即我们所说的书目。作为一门科学,Bibliography是这样一种知识的集合体,这种知识是专用于从各个方面来处理既可视为物质实体,又可视为意识载体的书籍的;作为一种技术,目录学包括文献的确定、组织和揭示的各种方法技术;作为这种技术的特定产物,一部书目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将具有共性的一批图书系统列出的目录。

我国学者对目录学的定义也存在分歧。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索。北大、武大合编由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研究书目工作产生与发展规律的学科。1991年4月,徐有富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一门研究如何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的情报,以满足读者对其特定需要的学问。1995年,黄俊贵在《书目控制的思辨:从世界到中国》一文中提出:"现代目录学正是研究书目控制方法、理论和历史的学科"。1996年,彭斐章在《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中提出:"当代目录学是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第二节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一、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门科学要想一开始就比较精确地规定出它本身的对象和任务是困难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精确确定,不是在这门科学发展的初期,而往往是对这门科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人们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录学研究的水平。对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国内外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

1. 图书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的一门科学。这种论点渊源较早,是国内外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传统看法。这是因为目录学刚刚诞生就带着"图书学"的痕迹。18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将目录学理解为关于古文书学的科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著名目录学家格列弋尔、宾诺、卡苗等都认为目录学是关于综合的图书的学科。19世纪初期,俄罗斯目录学家索必可夫(1765—1818)编辑了一部大型的书目《俄罗斯书目初编》,这是一部包

括从15世纪末到1813年期间用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言出版的全部图书的总汇,共著录图书13 249册。在这部书目的序言里,被誉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的索必可夫提出了他对目录学的见解。他认为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科学,有关图书内的知识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19世纪30年代,波兰以雅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图书学派也将目录学看作是关于图书的科学。19世纪英国目录学家贺恩认为,目录学,简言之,书籍评述之事也,详言之,研究关于书籍的一切知识也。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 关于组成书籍的材料;(2) 关于书中所论述的内容;(3) 关于书籍版本之优劣及其价值;(4) 关于书籍分类的位置。德国著名的目录学家施业捷尔认为,目录学是关于出版物的学问。《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百科全书》(1969—1980年版)中"目录学"词条写道:"目录学就是关于图书的学问。"比利时以奥特列为代表的目录学家提出目录学是文献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认为目录学是文献学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在其所著《目录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目录学与书籍的内容无关,只叙述书籍的形式而已,即书籍的版本与特点、出版地、出版人与出版期、字体与图解、大小与形式、装潢与所有者、分类与收藏等。容肇祖在《中国目录学引论》中写道:"目录学为研究书籍之材料、内容、版本、分类之学也。"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目录学》中写道:"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

上述各家观点,总括起来都是认为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或出版物,只是有的人主张单纯地研究图书的外形特征,有的人则强调在研究图书外形特征的同时,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发,着重研究图书的内容。

2. 目录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主张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目。俄罗斯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认为,目录学是编制和研究出版物的索引、目录、评述的方式方法的一个知识部门。目录学的任务是查明、记载、揭示与鉴定出版物。以施业捷尔为代表的德国目录学派认为,目录学是从图书外形著录图书的目录总汇,是关于图书文献著录的学问。杜定友先生在其所著《校雠新义》中指出:"目录,簿记之学也。"吕绍虞在其所著《普通目录学》中写道:"目录学是研究和评介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并探讨目录索引编制的方式方法的一门科学。"总之,持这派论点的人将目录学局限于研究书目索引编制的方法学和技术学。

3. 图书和目录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认为,当代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荐好书,指导阅读;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

4. 关系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记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目录学是研究认识与揭示图书的规律的科学，认识图书和揭示图书的活动规律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

5.矛盾说

持这派论点的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目录学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就是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1996年12月彭斐章在《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中，结合新的信息环境，进一步发展了“矛盾说”。他认为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图书资料（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研究的对象”。

此外，还有目录事业说，即认为目录事业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图书、目录、读者三者关系说，即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读者关系的一门学问。1990年陈光祚在《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一文中提出了“目录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的观点。除了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之外，还有人否认目录学的客观存在，主张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是校雠学的组成部分，目录不能自成为学，但举校雠足以包举无遗。

上述各派论点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什么是目录学和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目录学研究的水平，表明了人们对目录这一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尽一致。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近年来随着对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各派论点渐趋接近，多数研究者认识到，离开了对目录学规律性的认识，要将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引向深入是不可能的。

显然，否认目录学的客观存在，主张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的观点，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不能反映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众所周知，否认目录学的客观存在，主张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的争论，不是自今天开始。早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章氏遗书·外篇》卷一“信摭”中就写道：“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定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辩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章学诚不承认有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针对这种论点，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指出：“学诚之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之校雠也——校勘学也。”姚名达对章学诚的评论切中问题的实质。从清代章学

诚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提出目录学不能独立成为一门科学,要以校雠学包举之。如果说,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的状况,那是因为晋宋以前,在整理图书时,都要进行广搜异本、校勘文字的工作,然后才将群书分类,撰写叙录,编制书目。因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校雠学与目录学的界限不那么分明,甚至出现过"校雠目录学"的称谓。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知识的不断分化,目录学、版本学与校雠学也逐渐划清了界限,各自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因而分别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当科学发展到今天,目录学已经成为研究书目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一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致用之学。因此,现在提出所谓目录学不能自成为学,而举校雠学包举目录学的论点,既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丰富生动的目录工作实践,也不能概括目录学研究领域里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他们看不到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是传统的学科界限不断地被打破,学科越分越多,越分越细,另一方面是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越来越普遍。因此,目录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当看成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科学事业的空前繁荣的结果。当代目录学在认真研究和总结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使得目录学理论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因此,目录学绝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所能包举无遗的。

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以其自身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反映的内容区别于其他学科,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的特殊规律,从而构成各门不同的独立学科。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规律,但图书和目录不能看作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知道,研究图书一切方面的学科是没有的,但有不少学科是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研究图书的,如图书史、校雠学、版本学、学术史等。开展书目工作必须以认识和熟悉图书(文献)为前提,查寻、鉴别、著录、部次、揭示和报导图书(文献)是目录工作的重要内容,有效地利用图书是目录工作的目的,但不能把图书和出版物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目录是目录工作的成果,研究书目编纂方法是目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它不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将图书、目录,还是将图书和目录同时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都没有指出目录学领域里的特殊矛盾之所在。目录学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它以研究目录学领域的特殊矛盾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

① 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9 页。

特殊矛盾是区别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依据。那么,目录学领域里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呢?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目录学领域特有的矛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文献数量急剧增长,文献类型复杂,文献载体多样,文献所用语种愈来愈多,文献新陈代谢比较频繁,给人们利用文献带来困难;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文献的需求多种多样,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文献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要求书目情报工作者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以满足读者对文献的特定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这个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对矛盾确定了目录学的社会基础,反映了目录学与书目实践的关系,确立了目录学的实践基础。古今中外的目录学,就是在不断总结和研究这一矛盾的规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二、目录学的学科基点与内容范围

目录学研究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探寻学科的基点。目录学的实践证明,以图书、书目这些具体事物作为学科研究基点,或以书目活动、书目实践等作为研究基点,已难以满足信息时代目录学发展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探寻一种新的学科基点。在信息化的今天,目录学的这一基点就是书目情报。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引入我国的。虽然人们对书目情报的认识还不很一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正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有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

书目情报就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以这一概念作为目录学的学科基点,是基于以下考虑的:

第一,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揭示文献信息不仅要采用一系列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揭示文献信息的本质。对文献而言,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对读者而言,所提供的文献信息并非完整的原始文本信息,而是对原始文本信息的重组,这种文本中有必要揭示出来的语义信息,我们称之为文本效用信息即书目情报,它是读者了解文献的关键,在读者与文献之间的对话中起连接、提示、导引等作用,它是一种效用信息,是联系文献与读者的中介。

第二,文献信息交流是指文献信息从发生源到接收端整个过程的活动,是包括文献生产者、接收者、文献信息及其媒介等要素的一个系统。书目情报在这个系统中通过生产和传递文献信息,对文献流进行整序、揭示、评介和报导等一系列控制活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读者服务活动的开展有赖于这个系统的

建立。

一般说来，书目情报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导因于书目情报结构要素而直接作用于书目情报系统的各种活动，对书目情报结构要素中文献的形式特征信息的揭示，形成标准化的书目著录，为读者准确辨认某一特定文献提供条件，而关于文献内容信息的揭示，可为读者选择文献提供取舍的依据。按照科尔舒诺夫的书目情报功能说，在文献与需求者体系中形式的、内容的和价值的三种关系产生的检索、交流和评价三种功能，将文献检索、文献宣传报导、咨询等活动纳入到以书目情报为中心、以书目情报系统为依托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之中。

第三，书目情报概念是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深度。书目情报不仅存在于正式的文献交流系统中，而且出现于书评、图书介绍以及一般的学术研究中。从实践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传统的书目工作必然发展为书目情报工作。

由此可见，书目情报关系着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由于它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认识，从对目录学的深入研究而达到对目录学的整体把握，导致了目录学研究内容的深刻变化，从而成为区别传统目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录学的内容是由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1. 关于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目录学概念、术语及其规范化，目录学的对象、任务、内容范围，目录学的学科性质、发展规律及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2. 关于文献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文献的社会作用、怎样认识和熟悉文献、揭示文献的原则和方法、文献的编排与组织、文献的报导等。

3. 关于书目、索引类型及其编纂法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书目索引类型划分的原则、书目索引种类的系列化、各种类型书目索引的职能、书目编纂法、索引编制法、文摘编制法等。

4. 关于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特点与书目情报服务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和组织、书目情报服务的社会效果、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趋势等。

5. 关于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的意义和内容、书目工作的地区协作、系统协作和全国协作网的建立、书目工作管理体制、书目工作人才管理、书目工作效果反馈的研究等。

6. 关于国内外目录学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国内目录学研究现状、国外目录学发展方向、国内外目录学研究成果评介、著名目录学家的介绍等。

7. 关于中国目录学遗产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对中国目录学遗产继承

的态度、目录学遗产的整理与利用、目录学说主要流派与观点的评论、主要目录学家的研究等。

8. 关于目录学方法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目录学知识数学化、目录学应用新的科学方法的研究、书目计量、书目控制、比较目录学的建立等。

以上是对我国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初步概括。这些研究领域由不同的学科基本原理构成。

第三节 目录学的基本原理

概念和原理是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概念是对原理的抽象和说明，原理来源于书目实践。目录学原理包括哪些？姚名达在《目录学·原理篇》中列出了目录学的定义、目的及功用、目录的种类、目录学与各种科学的关系、目录学与图书馆关系等几个问题。武汉大学编印的《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第一分册·目录学原理》中列举了目录学的对象和内容、任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专科目录学、目录的种类、研究方法几个问题。哈蒙(Robert B.Harmon)认为"目录学本身就是一种原理"，"历史告诉我们，目录学本身是一种古老而又不断变化的原理……不断调节以适应变化的需要"，从这一根据出发，认为目录学的原理有"分析或评论"，"列举或系统"两个方面。目录学实践活动、理论研究活动的各个方面经过方法总结或理论抽象，形成一定的方法和工作规范，这就是目录学原理。目录学原理是分层次的。

概念是对原理的抽象概括，科学的成果往往表现为科学概念。"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在目录学实践与理论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的核心，书目情报生产—传递—利用体系是书目实践的内容。以"书目情报"为起点，构成了目录学原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一、目录学应用原理

(一) 书目情报生产的原理

图书、期刊论文、报告、手稿等一次文献均是信息的载体。信息的传递与利用在科研中变得更加重要。据日本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基金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一个科研人员，在一个课题研究中的时间分布是：查阅文献资料占 50.9%，实验工作占 32.1%，写论文占 7.7%。为了克服正式文献交流的不足，产生了书目情报交流。书目情报是"二次知识"，是对一次知识的浓缩，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原始知识的交流。

书目情报生产(二次知识生产)是书目情报交流过程的开端。如何将原始的一次知识变为传递的二次知识呢？根据书目情报的特点，它就要研究文献和知

识系统等问题。根据我们对原理含义的认识,在"书目情报生产"这一原理下,有许多研究的课题。

1. 关于知识的研究。知识是目录处理的对象。因此,首先要研究知识的属性、特点。关于知识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学科群。目录学研究知识与其他学科目的不同。它研究知识生长、衰老的规律,知识的存储、传递规律,知识的分析与综合规律,知识对知识库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知识的生产—传递—应用的规律,而不是知识生产的本身。

2. 关于文献的研究。文献(指广义的)是知识的记录。文献也是目录学研究的客体的构成部分。现代知识生产的无序状态,导致了社会上文献流的无序性。文献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文献的价值靠科研或实际工作去实现,而文献的使用价值则靠图书馆、书目、情报工作来实现。对文献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学科群,例如,图书馆学研究文献收藏与利用的矛盾,史料学研究文献史料的处理原则与方法,目录学则研究文献的认识、揭示、报导、编排、传递、利用的规律。

3. 关于书目著录研究。《文献与情报工作辞典》(韦尔西希等著,周智佑等译)对书目著录的定义是"只是使用目录学范畴,如作者、标题、出版商等来描述某一文献。"著录是揭示文献的情报信息的主要手段。我国目录学在2 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创立了书目著录的一系列方法。关于书目著录研究的基本问题有基本著录的选择、各著录事项的选择、编目条例的研究、互著、别裁法的研究等等。

4. 关于提要法研究。提要也称为解题,是用简要的文字说明文献内容。这是我国目录学的传统。提要是提供文献客观信息的手段之一。在长期的书目工作实践中,我国目录学形成了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三种提要形式。姚名达认为我国目录学优于西方目录学者,仅解题一宗。近年来提要的工作也有一些成果,编制得法的书目大都有提要。如《国外社会科学论著提要》、《中国文化史要论(图书·人物)》。

5. 关于文摘法研究。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摘述文献的主要内容或某些知识单元,这是书目情报生产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随着书目情报工作由文献向知识内容的转移,文摘的方法显得越来越重要。文摘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文摘的概念、发展、类型、构成文摘的特点、功能与用途,文摘的编制,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类型的文摘,文摘的评价,文摘的语言和文体。

6. 关于书评法研究。书评法是从思想价值、科学与实际意义上评介文献。其目的在于提供启发信息、推荐图书、指导阅读。书评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书评的社会作用、种类、编写方法等。

7. 关于注释法研究。这是对揭示图书的基本著录的补充。对注释研究的主要课题有注释的原则、种类、方法等。

8. 关于索引法研究。索引是一种文档或文献内容的顺序参照表,附有鉴别

和查找这些内容的参照。这些参照有篇目、语词、主题、人名、地名、事件,及其他事物名称,如分子式、生物环系。清代章学诚就主张过要编制索引。1930年,钱亚新编的《索引和索引法》一书系统总结了这一原理。以哈罗德·博科等著的《索引的概念与方法》为例说明有关索引的主要研究课题有:索引的定义、类型、作用、历史,索引的结构、标引步骤与编辑步骤,索引评价与职业化。

9. 关于书目语言研究。书目情报工作是情报检索语言的应用领域之一。目录学着重研究检索语言的成果在书目情报活动过程中的应用。传统目录学理论中分类语言研究得比较成熟。目前这一领域研究课题包括各类语言在目录情报工作的应用研究,以检全率、检准率为中心,研究应用的特点,并进行改造和创制工作。

10. 关于书目编排法研究。编排的目的是为了使无序的文献变成有序的文献,便于文献的集中与分散处理。目前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分类法、主题法、编年法、地域法、字顺法、音序法等。

(二) 书目情报的传递原理

传递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也是书目情报的生命。书目情报是一次知识的传播媒介。一次知识经过书目情报的生产工艺变成了流动的情报,如目录、索引、文摘等。这些情报怎样才能进行有效、快速传递呢? 这就是目录情报传递的原理所要研究的内容。关于这一原理的研究,主要内容有:(1) 传递形式研究。整个情报传递形式大约有无序、有序两种。无序传递是自发的、随机的、散乱的、无秩序的、个别的、低效的,这种传递如随机查到一个书名、作者、文摘等等。有序传递是指将文献中的知识序列化,利用图书馆、书目中心或其他机构来进行传递。(2) 传递特点研究。如定向、多向传递。(3) 传递方法研究。

(三) 书目情报的利用原理

利用人类已取得的知识是书目情报生产、传递的目的。在书目情报的通讯处理系统中,生产—利用是书目情报运动的第一次循环。对书目情报的利用的信息不断传递给目录学原理,目录学原理接到这一反馈信息后调节自身的结构,使生产原理更加成熟。书目情报利用原理研究的主要课题有:

1. 书目检索理论。利用书目工具(书目、索引、文摘等)在有关文献集合中查到自己所要求的那一部分文献。广义的文献检索理论还包括检索语言、检索系统的建立方法等,并有形成一门专门学科的趋势。目录学研究文献检索,主要侧重于文献检索策略和有关检索服务等方面,以检全、检准、快速为目标。文献检索理论主要课题有各类检索工具的特点、职能,检索方式,各类书目工具使用方法,检索效率及其评价。

2. 书目用户研究。书目用户即书目情报的使用者。编制任何书目都要考虑用户的因素。因为对于知识通讯来说,用户的满意程度是评价书目工作的一

个重要因素。对于用户研究的课题有:(1) 用户需要的研究,研究一定时期用户对情报需要的特征;(2) 用户统计研究,通过调查统计研究用户的情报需求规律;(3) 用户检索心理、阅读心理研究;(4) 用户的目录学知识普及教育。

3. 书目评价理论。书目编制完成后进入社会交流渠道,书目的社会效果同系统的预期目标相比较,形成差值,将差值进行反馈,检验并丰富目录学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有一种关于书目评价的理论。对于一部书目,其质量怎样?这是用户关心的问题。我们设想,是否用下列因素作为评价的依据:(1) 选题的意义(现实、学术、美学的);(2) 收录文献的数量与质量;(3) 揭示文献的深、广度;(4) 检索途径;(5) 对读者的启发作用;(6) 经济效益。

二、目录学的发展原理

发展是科学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录学发展原理的目的是将应用原理转换成实物产品,例如书目、索引。我国目录学近几年来有忽视发展研究的趋向。这种介于应用原理和实践之间的方法原理,我们称之为"发展原理"。发展原理的主要研究课题有:

1. 书目情报工作的具体技术,如著录法、提要法、文摘法;
2. 书目情报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如书目部、书目中心建设等;
3. 狭义书目情报服务,如书目参考工作;
4. 书目工作现代化,如书目工作新技术的试验、推广。

三、目录学基础理论原理

对于目录学基础理论原理的范围,目前认识还不一致。根据"书目情报"对理论问题的作用和基本原理在目录学体系中的逻辑顺序,我们将基础理论原理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来研究。

(一) 书目情报的哲学研究

目录学的应用原理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其功用是总结经验。哲学研究则从另一角度,从属性、功能、结构的方面去考察书目情报本身。与应用原理的任务不同,它是一种高层次的指导。

书目情报的本质是传递知识。知识作为认识的源泉之一,具有深刻的认识论价值。书目情报既有一般信息的特征又具有知识的秉性,因此,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探索书目情报的属性、结构、功能与运动规律是很有必要的。

对书目情报的研究离不开对书目研究。书目是目录学研究客体的另一方面。但是,书目不仅仅是目录学的研究范畴,图书馆学、新闻出版事业也研究书目。目录学对书目的研究侧重于认识主体(人)与认识客体(书目情报)之间的本质关系,即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为核心来进行研究。

（二）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 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学科的对象，它是客体的运动规律，科学的全部理论问题都由研究对象来演绎限定。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的研究客体，关于书目情报的运动规律也就构成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但对这一运动规律的认识，国内外却不尽一致，如图书说、目录说、矛盾说等等。

2. 学科性质。划分学科的属性有许多标准。书目事业属于文献信息事业的范畴，但各门分支目录学又与具体的学科相联系，如《化学文献目录学》，如何确定目录学的学科性质，这是一个理论问题。目前，有人认为目录学属于社会科学，也有人认为属于综合科学。

3. 目录学的体系。目录学的体系是目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中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领域。理论体系指的是在某一原则指导下的各种相互联系的理论要素的整体。我国目录学界逐步有人提出建立一门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这个专门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未能深入。中、西目录学核心不同、体系不同，如何寻找中西目录学兼容的道路，建立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目录学体系，应是研究的重点。

4.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知识通讯”为核心本质的学科不止目录学一门，如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些学科由于学科本质的一致，将形成一门概括性的体系范畴。国内有人认为，将形成“文献信息科学”。此外，目录学知识还进行着自身结构的分化。目录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式体系，还不断从相邻学科那里获得研究信息，并引进研究方法。明确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目录学才能在科学体系中更好地确定自己的地位。

5. 目录学发展史研究。对目录学基础理论做纵向考察，以目录学家的思想为主线系统考察历代目录学的理论文献、书目工作发展规律和目录学体系进化的规律。

6. 目录学研究方法。这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录学历史悠久，但目前仍缺少一个研究方法体系。目前除对传统方法进行总结之外，还应引进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如计量方法、控制方法、比较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等。

（三）目录学的社会动力学研究

这一课题主要研究目录学对社会的能动作用和社会环境对目录学的制约作用。目录学的社会学研究范围很广，例如知识生产的研究、社会文献运动的研究、目录学社会功用的研究等等。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谢拉和伊根开始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研究目录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批评传统目录学仅仅局限在目录学功用的范围内，“几乎没有联系社会动力学的整个模式来评论这个过程”。认为传统目录学的狭义的地方主义观点使目录学有可能丧失其存在价值。1951 年，他们提出将“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作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

谢拉从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启发，认为社会是由那些为了共同目标和满足共同需要而在一起工作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相互影响的网"。设备指的是各种社会工具，学术成就就是思想的总和，社会组织则是二者结合为一体的系统。书目是一个社会机关，记载的是人类的知识信息，书目的职能就是浓缩人类发明的记录通讯的那部分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递给社会的不同需要者。俄罗斯目录学家祖博夫通过考察书目结构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知识与书目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书目——一种浓缩的知识系统"的结论。人类对信息的需要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对信息的接收、处理方式的变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对知识开发的历史。但是，信息交流是多渠道的，例如广播、电视。书目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机关，充当记录通讯(graphic communication)的工具。

目录学原理是对历代书目工作的总结，也说明了目录学应当研究什么。随着书目情报工作实践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录学原理会变得更加丰富。由于原理在历史上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原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在目录学原理构成的要素中，基础理论是原理的核心。基础理论对应用原理、方法技术提供认识论上的指导，以探索各种原理所需要的新概念为目标。基础理论研究促使目录学理论体系化，由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

应用原理属于第二层次的水平。它将基础理论提出的任务经过一定的科学程序，转化成可在实践中应用的理论。在应用性、实践性强的目录学领域中，应用原理的研究是重要的，它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基础理论成果表现为学术论文和专著，具有解释书目实践、指导实践和描述未来研究方向的作用。

发展原理是实现前两项原理的目标和手段。它面对实际工作部门，促成理论的物化。

应用原理、发展原理、理论原理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他们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原理以一定的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我们称这个整体为目录学的原理体系。

第四节　目录学的性质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目录学的学科性质

一门科学的属性是由该学科研究对象决定的。当前，关于目录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目录学属于社会科学，第二种意见认为目录学属于综合科学，第三种意见认为目录学属于横断科学。

目录学究竟应当属于什么学科性质呢？目录学是目录工作实践活动的概括

和总结，是反映目录实践活动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社会现象。目录工作实践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现象，目录学就是对人类某一特定社会活动现象的规律性总结。书目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活动，而人是作为书目活动的主体，受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条件所制约。书目活动的外在社会制约性带来了发挥书目情报基本社会职能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目录活动的客观规律、它的现象和本质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概括和总结时，必然受到目录学家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制约，所以说，目录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目录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是，它是处在整个学科体系之中，与周围的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任何一门学科能否顺利发展，是否具有活力，一方面要看它能否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取决于它能否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方法来丰富自己。目录学需要吸收和利用哲学、数学知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来丰富目录学的内容，促进目录学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目录学的学科性质。它并不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去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目录学不是综合科学。

二、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目录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之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我国目录学是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学科，在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与文献紧紧相连，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广大的文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们从事目录学研究。他们将目录学看作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用目录学知识装备自己，已经成为广大科学工作者迫切的愿望。我们都知道，古代学者是非常重视治学之道的，认为治学宜得门径，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指出："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他的学问始于目录学，同时又专门从事目录学研究，并以他自己的渊博学识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

科学研究的需要是推动目录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总是和文献息息相关的。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他开始从事创造性研究活动的时候，在他运用观察、分析、比较和推理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时，首先必须详细地占有文献，必须在前人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探索。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就是从搜集大量文献入手，分析研究文献，到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其中每一步都离不开文献。面对着文献的海洋，科学工作者要通过文献掌握科研课题当前的研究状况、研究历史和前辈们的观点，与此同时，还要预测该课题的

发展趋势。要掌握该课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就需要掌握有关的文献信息。因此，具备目录学基础知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成为目录学家，但是，必须要求他具备起码的目录学知识。不少学有成就的学者，在总结科学研究的经验时，常常提到从书海中探宝，从书林中觅珍的体会，这就说明目录学基础知识对于科学工作者是何等重要。

1. 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由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古代目录学与校勘学、版本学有着紧密联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目录学、校雠学与版本学三者有着血缘关系，这是因为在古代进行图书整理时，大多是从广搜异本，校勘文字开始，然后对群书进行著录、分类，撰写叙录，编成书目。因此，校雠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发展，界限不那么清楚，存在着许多交叉，也曾出现过校雠目录学、版本目录学的称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知识的不断分化，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的繁荣发展，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逐渐划清了界限，各自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因而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校雠学、版本学和目录学在定著篇章，校勘文字，考证版刻源流，鉴别版本优劣方面，是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关系。

2. 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馆是使书目得到广泛利用的渠道之一，同时，也是利用目录学方法分析、鉴别、研究文献的重要阵地。在图书馆工作中，利用目录学方法最广泛，如搜集采访馆藏、宣传图书、指导阅读、解答咨询、为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服务等，都涉及目录学方法。图书馆还设立有书目情报服务部，专门从事书目情报服务活动，广泛利用目录学知识，宣传目录学知识。所以说，图书馆学与目录学有着血缘关系，它们之间在互相利用彼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携手并进。有一种看法，认为图书馆学与目录学是隶属关系，这种看法有待商榷。目录学与图书馆学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研究范围，它们的历史发展各不相同。我国图书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的。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是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学科。目录学基础知识不仅是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而且也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应当是各自独立、相互利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3. 目录学与情报学的关系。科学情报活动获得独立的地位是不久以前的事。科学情报活动是在广泛利用图书馆工作和书目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目工作和科学情报工作都在不断利用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缩微复印技术改变着两个系统的工作面貌，从而使目录学和情报科学的理论研究得到新的发展。目录学与情报科学又有区别。目录学是研究揭示和报导历史上形成为文献形式的知识与人们对于这些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规律的科学。情报科学则以研究使情报交流体系最优化为己任，探索如何协助科学工作者捕捉正在

酝酿中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为读者提供某些来不及形成文献的情报,使得情报保障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相适应。目录学还要研究如何发挥书目情报的教育职能的问题。

目录学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它需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目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着与自身研究客体的需要和研究客体的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目录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随着数学、统计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应用,目录学与这些学科相结合,产生出书目计量学、书目控制论等新的学科分支,丰富和发展了目录学。

第五节 目录学研究发展趋势

一、我国目录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础。

1. 关于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近些年来,目录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开始注意从我国目录学整体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以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我国目录学的体系、我国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将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前书目工作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把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其次,对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所出现的新的学科分支的研究有所注意。例如,利用控制论和系统分析法对书目控制理论的研究,对书目计量学的研究,对比较目录学的研究等。从全国图书馆学会的科学讨论会和1983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交流的学术论文,以及全国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上述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正在引起我国目录学界的兴趣与关注。

2.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我国目录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广大目录学工作者通过各种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发表的对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下列四种:(1) 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研究图书的科学,图书或出版物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人们称这派论点为“图书说”。(2) 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研究书目索引编制方法的科学。因此,目录是目录工作的中心,只有以目录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才能抓住目录工作的关键和本

质。人们称之为“目录说”。(3) 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博大和精微两个方面。从博大方面讲,目录学应以书为纲,讨论书的内容梗概、义理长短及相互关系,讨论作家的成就、流派及师授渊源。所以说,目录学的对象首先是图书。从精微方面说,目录学研究簿录群书的体例,编次各种出版物目录的准则,以及著录款目等,以为后学取法。书刊目录是目录学研究的次要对象。(4) 认为目录学是一门以利用图书为目的来探索记录图书的规律的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记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人们称之为“关系说”。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它为目录学界的学术讨论开创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新风气,对推动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场生动活泼的讨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了拨乱反正,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在中断十年以后,又重新开展起来。专业刊物上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在总结和评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各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矛盾说”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有人主张目录事业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持这种论点的同志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事业及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也有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读者关系的一门学问,图书、目录、读者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人提出,目录学是研究对所有图书文献资料实行目录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尽管大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的定义和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看法,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各派论点渐趋接近,正如吴裕宪在《试论“目录学研究对象”之分歧》中指出的:“应当看到争论的分歧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图书众多和人们对图书特定要求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这一共同认识出发的。也即目录学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是掌握目录工作发生发展运行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目录工作。”总的看来,近年来的研究,已逐步趋向从目录学发展的规律性方面来探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3. 关于我国目录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研究。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书目文献极其丰富,目录学家代不乏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而著称于世。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为了建立与发展现代目录学;建立我国现代目录学新体系,必须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我国广大目录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古为今用的方针,对目录学史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研究。仅据对建国 30 多年来的统计,有关目录学史的总结和研究的论文约 141 篇,占同期全部目录学论文的 22.5%。研究的课

题也比较广泛,有的是对我国目录学起源的探讨;有的是对某一古典书目的评价与分析;也有的是对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与评述等。应当看到,对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和有影响的书目的分析研究,对于继承和发扬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对我国目录学史的总结和研究,显示出以下特点:(1) 比较重视对我国某一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就的研究,力图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对某一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概况及其规律进行探讨。(2) 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所加强。建国以来到60年代,在目录学领域里,对于我国近现代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几乎没有系统的成果,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1980年彭斐章和谢灼华在《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近现代目录学史的发展是一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主义目录学衰亡,资产阶级目录学建立和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西洋目录学传入,影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期,所以,无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还是从目录学的内容上,都应作为我们的研究重点。"文章还建议对一些有贡献的近现代目录学家如梁启超、姚名达等进行重点研究与探讨,确定他们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这些论点与建议得到了目录学界的赞同,近年来,对近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有所重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3) 对目录学家和书目的研究范围比以往扩大了。过去仅集中在对我国古代少数杰出的目录学家和几部有价值的书目的研究方面,这些研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有待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开始注意对一些不被人们重视的目录学家和书目文献进行研究,如对欧阳修、尤袤、黄虞稷、顾广圻、周永年、孙星衍、姚振宗、张元济、阿英等人的目录学实践活动和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丰富了目录学史的内容。这些都是我国近年来目录学史研究中的新变化。(4) 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如来新夏和徐建华主编的《古典目录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高路明著的《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等等。

4. 关于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专科文献目录学是从特定读者群的需要出发,揭示与报导某一专门学科文献状况的学科。开展专科文献目录学研究,是为了适应当代学科划分愈来愈细、读者需要的针对性愈来愈强的特点,是书目情报服务的深入和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在普通目录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文献目录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社会科学文献目录学、自然科学文献目录学、技术科学文献目录学等。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目录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整个目录学研究与我国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与书目工作实践的需要,还很不适应。对

我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总结和研究，与我国目录学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也很不相称。当前，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加强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继承和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重视目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加强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注意对外国目录学的综合研究，开展关于读者文献需求规律与书目情报服务的研究，适应新的信息社会的需要，进行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和管理的探索等，都是摆在目录学工作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二、国外目录学研究

1. 关于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

由于各国的传统和文化教育上的差异，导致了对“目录学”这一专门术语的不同理解，对目录学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美国、英国偏重于目录学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把应用研究作为目录学的主要课题，重点是对书目工作和技术问题的研究。美国目录学的发展受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影响很深。《英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的目录学词条记载说：“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或科学。”《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指出：“Bibliography这个名词用来表示记录出版物的科学、技术，而在用来表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特定产物时，则又称为书目。作为一门科学，目录学是这样一种知识的集合体，这种知识是专用于从各个方面来处理既可仅仅视为物质实体，又可以视为意识载体的书籍的。作为一种技术，Bibliography包括文献的确定、组织和揭示的各种方法技术。作为这种技术的特定产物，一部书目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将具有共性的一批图书系统列出的书单。”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和英国对于目录学的研究侧重于方法和技术方面。由于计算机在书目工作中的应用，机读目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推行，引起了关于目录形式、文献著录格式和方法以及国家书目编制方法和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出现了一大批研究目录的作用、结构、形式等问题的论著。这一时期，美国目录学的理论研究由系统目录学占主导地位发展到系统目录学与分析目录学并重。所谓系统目录学主要是指作为技术的目录学，其直接目的是要把适合于某种目的或某些共性的一批书籍，以某种系统的方法排列起来，加以标识和描述，其典型产物就是一部书目。分析目录学是代表目录学的科学方面，根据书籍的物质特征组织材料，这些物质特征提供关于书史的、尤其是关于版本的历史证据，人们常常希望从书籍自身固有的特征去探知最初的印本书籍的出版情况和印刷术的发明、传播情况。

20世纪70—80年代间在苏联出现了一大批从宏观的角度论述目录学理论问题的专著，例如，科尔舒诺夫的《书目的一般理论问题》(1975)、巴尔苏克的《在图书学体系中的目录学》(1975)、巴尔苏克、科尔舒诺夫合著的《苏联目录学的现

状、问题、前景》(1977)、劳菲尔的《苏联文学书目的理论和方法》(1978)、马涅热娃的《书目的基础》(1982)和《书目情报服务的效果》(1983)、科尔舒诺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1981)等。这些论著明确了苏联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目录学基础理论在目录学中的地位,结束了长时间以来在苏联目录学界存在着的“书目”和“目录学”这两个概念混淆的现象。明确了书目情报是书目的出发点,书目是图书和读者之间的媒介。以书目的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目录学概念的确立,是保证苏联目录学作为科学知识门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2. 关于书目控制理论的研究

“书目控制”一词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伊根和谢拉于1949年在其《书目控制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这一术语很快被人们接受,吸引了广大目录学工作者研究的兴趣,出版了不少论著。从书目控制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的,有1980年韦尔施所写的《书目控制的控制论——文献检索系统的一种理论》。他在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书目控制的概念、控制论与书目控制、书目系统的调节与控制、文献鉴别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美国还在技术对书目控制的作用和影响、国家书目控制、国际书目控制、元数据与数字图书馆书目控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3. 关于书目计量学的研究

目录学知识数学化是目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书目计量学是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引入目录学以后产生的学科分支。这一术语是1969年由英国的普利查德提出的,用以代替“书目统计学”。它是利用统计学方法来计量文献,目的在于定量描述各门学科书目信息的特征、形成过程与形式,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得出规律,以便解决文献的累积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欧美等国对于书目计量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书目计量学研究分为:一是描述文献特征的描述研究;二是考查文献内容之间的关系的引文研究。引文分析是书目计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引用和被引用的现象从纵向上反映出学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从横向上反映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及差别。近年来关于引文的规律、特征、引文分析文献源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目前,书目计量学研究已经与网络计量学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4. 关于目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掌握科学探索的现代方法的成熟程度,是衡量一门科学是否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换句话说,一门科学要跨进现代科学的行列,应当拥有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较长时间里,目录学是在经验描述的基础上发展的。改进和完善目录学研究方法,是提高目录学科学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录学拥有研究文献的一系列特有的方法,如书目著录、鉴别、选择、分类、提要、文摘、编排、辅助索引等等。目录学的研究,较多地采用人文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总结经验

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文献分析法等。近年来，国外在目录学研究方法上注意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如实验法、观察法、分析法、模拟法、系统方法等。例如，俄罗斯学者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推荐书目和主题目录的结构和技术，获得初步进展，从方法论上丰富了目录学的理论思维，这对于整个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读者信息需求的变化与目录学

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的变化是目录学内容变化与学术前进的原动力，离开了读者需求，目录学学术就成为无源之水。所以，我们强调读者的需求是推动数字时代目录学研究的动力。在新的信息环境中，读者信息需求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 由以传统印刷型载体信息为主的需求转向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从物理结构上说，信息可分为视频信息(包括静态的信息如文本信息、图像信息，动态的信息如动画、电视、电影、交互式媒体)、音频信息(包括声音、音乐等)和超视声频信息(包括超声频、超视频信息)。文献信息仅能满足读者的部分需求。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非文献型需求的比例在逐步加大，信息载体的原始个性特征逐渐消失。我们必须探索数字化书目情报服务方式与模式，例如在超文本标记语言环境下，书目系统、索引系统、文摘系统的设计。

2. 由国家、地区性的书目情报需求转向全球信息需求。传统的书目与图书馆服务主要是区域性的服务，例如以本馆收藏为阵地的书目服务，以地区合作为目标的联合目录服务，以揭示与报导一国图书的国家书目服务等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用户的信息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地区，而转变为对全球信息资源的需求。在数字时代，各局域性的书目中心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联网，真正实现了世界书目资源共享。在全球书目资源共享过程中，书目信息的揭示与报导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虚拟图书馆的书目报导，遵循的主要规则不再是书目条例，而是通信协议。因此，我们要研究网络环境下书目文献揭示、传播、利用等新问题。

3. 社会性书目情报需求与离散型个体化书目情报需求两极并存。传统信息资源共享主要依赖图书馆、信息研究所、文献中心等机构。在信息社会，由于技术的推动，读者对作为物理状态的图书馆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作为分布式数据库状态的虚拟图书馆将在满足读者信息需求中发挥巨大作用。21 世纪信息交流的主要特征是其开放性，即信息资源的无限制复制，此外，点对点的信息交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探索新的信息资源共享途径。例如商业化的书目数据库服务针对特定的用户，终端用户通过即时付费直接进入网络系统，书目工作者的中介角色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研究数字时代目录学家

的新任务、网络环境下读者书目查询行为等新课题。

4. 对原始信息的需求逐步转向对数字化信息需求。在数字化环境下，数字化书目情报服务与传统的文献服务会有很大区别，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也会带来读者利用信息资源行为的变化。例如就检索行为看，"提问—比较—查找"的检索方式将逐步转向"浏览—查询—下载"的方式，所以，我们也要研究专题服务、定题服务、咨询服务、辅导服务以及有关的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问题。同时，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将得到继承与发扬，并赋予新的内容。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将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

5. 对文献的需求转向对浓缩的有序化情报信息的需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信息量迅猛增长。据估计，目前世界提供服务的数据库约在 60 亿条记录以上。以每条记录1 000字节计算，仅数据库信息总量就达 5 万亿～10 万亿字节。根据由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建设实施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计划，仅《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将在 3 年内通过与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完成国内和国外各 200 万本图书的建库、互联网资源整合、网络数据库合作链接等工作，使国内公共知识资源数字化比例上升到 80%，国际公共知识资源数字化建设和综合利用比例达到 50%。面对如此浩瀚的信息海洋，读者显然无法迅速、准确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这是信息技术环境提出的挑战。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向读者全面揭示文献的外部信息，从而使读者获得改变自己知识库的启发信息。书目情报虽只是海量信息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但在现代信息系统中，书目情报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导航工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开始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通常称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引发了全球性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这次信息革命将涉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目录学也不例外。在数字时代，我国目录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有效解决数字时代文献信息的揭示、报导与利用问题，是 21 世纪我国目录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第六节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

一、关于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过程

国外主要观点有：

1. 以谢拉(J.H.Shera)为代表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谢拉是世界上著名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家。1927 年获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4 年获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哲学博士学位。一生任过图书馆学院教授、院长等职，

撰写了400多种图书馆学、目录学著作。1952年他在49岁时与伊根(M.Egan)合著了《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书目通讯”(bibliographic 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认为有关知识通讯的理论是目录学的本质。将书目理解为一种通讯的社会机关(Social Instrument)。他的这种社会学的研究,使传统的“记录图书”的理论显得贫乏。因此,他们敏锐地感到应当寻找一个“作为基础的‘母体原理’”。谢拉说:“这样一个原理,在这里因缺少一个精确的描述词,被命名为‘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2. 以布鲁克斯(B.C.Brookes)为代表的“知识基础论”。布鲁克斯曾任英国图书馆协会会长、谢非尔德(Sheffield)大学图书馆馆长,是英国目录学家、情报学家。1973年在谢拉70周岁时,布鲁克斯写下了《谢拉与目录学理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了探求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又研究了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他说:“在这部分里,提出的原理被称作‘社会认识论’……依我看来,这种形式的研究建议,更扩大了范围……记录通讯提供了过程的客观依据。如果记录通讯代替‘书目’是合法的,知识产品代替认识因素是合理的,那么上述定义将严密地构成了谢拉和伊根提出的目录学理论的见解。”布鲁克斯一方面承认谢拉提出的理论正向目录学的正确方向“汇集”,另一方面还是对谢拉和伊根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主张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协调上来探索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知识是书目的本质,因此,要研究情报对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作用的机制。

3. 以米哈依洛夫为代表的科学交流理论。米哈依洛夫从情报、科学交流的角度来探索情报、目录学的共同基础。他认为科学交流系统是在人类社会中提出、传递和取得科学情报这三种过程的总和,将交流定义为个体之间借助于他们共同的符号系统(对人类来说就是口语、手势、文字等等)进行情报交流。他认为科学交流理论是目录学的理论基础。

4. 列宁的目录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说。苏联的学者认为,列宁的目录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说是苏联书目事业和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列宁的目录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书评·〈书林概述〉》和《卡尔·马克思(传略及参考书目)》及先后签发的有关苏维埃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文件、法令、指示等文献中。

1949年以前的中国目录学的主流,基本上是以官方哲学和目录学家个人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所谓主流,主要指体现为书目成果的国家书目、史志目录、官家藏书目录和一些有代表性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如郑樵的《通志·校雠略》、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体现了目录学家本人的“会通”学术思想和“道不离器”的历史哲学思想。

1982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北大、武大合编)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作指导,……坚持了目录工作的科学态度,也为目录学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目录学概论》是我国第一本正式

的目录学教科书,经过三次印刷,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周文骏通过考察图书馆、文献工作、情报工作、书目工作的共同本质,提出了将文献交流理论作为这些学科的共同本质的观点。他在《文献交流引论》这本著作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化。也有人认为关于文献信息的理论是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共同理论基础。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具有共同点:(1)一定的理论基础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2)理论基础不一定产生在目录学之前,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形成,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加深层次。例如,萌芽于公元前5世纪的目录学,在当时并未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才有人提出"需要一种作为基础的'母体原理'"。在中国,殷商时期是目录学的胚胎时期,那个时候只有简单的书目活动萌芽,并无专门的哲学思想指导,直到汉代刘向、刘歆才运用儒家思想作指导。建国以来,我国目录学界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化学说是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随着现代信息等学科的发展,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也随之发展,目录学理论基础的内容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3)目录学理论基础仅仅提供一种认识的方法和原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目录学。例如"社会认识论"只提供社会动力学的原理和原则,并不能代替目录学本身。

二、目录学理论基础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息科学、文化理论是目录学理论基础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体系——目录学理论基础体系。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目录学研究的指导

无论东西方,目录学的产生总是与学术思想连在一起的。目录学研究不能脱离思想史,它要求按知识部门、研究对象、思潮、派别来分类揭示,请各科各派的专家来从事书目实践工作,使书目客观地反映学术思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文献目录学,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各派学术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来做评价。

现代科学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综合化,一是分化。在目录学领域,各类书目编纂知识在18世纪后(中国约在12世纪,以郑樵《通志·校雠略》为代表,而最大规模的编纂活动仍在18、19世纪,即清代中叶),开始经过抽象上升为理论,成为统一的目录学。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使目录学也分化出了众多的边缘学科(如计量书目学、比较目录学)、分支学科(如历史文献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统一的目录学体系。

对立统一(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矛盾分析法为认识目录学领域中的主要矛盾(研究对象)奠定了基础,它贯穿于目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全部领域。

2. 信息理论

书目情报系统是社会交流系统的一部分。1952年，谢拉在《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中，首次提出了书目通讯的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是对书目工作实践本质的抽象。在他看来，书目通讯的范围包括：(1) 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情报交流；(2) 不同学术领域中专家之间进行情报交流；(3) 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教育者、外行人之间进行情报交流。书目通讯涉及科学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人类通讯体系的一个分系统。

书目通讯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学科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图书馆学、档案学、新闻学、出版学、情报学等等。但是，目录学与这些学科的认识客体不同，客体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目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情报体现了信息、知识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书目情报只是一个交流的媒介，这是由情报动态特性决定的。知识、信息都是哲学的研究领域之一，知识也是信息的一个子集。书目情报是人类社会众多的情报类型之一，它用来传递的只是文献记录的那部分知识。一部书目就是一个浓缩的知识系统。

3. 文化学说

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它的作用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目录事业和目录学是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书目是一种文化系统。目录学的产生与文化、学术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古典书目的产生是由于史官记载典籍的需要，文化寓于典籍之中。在国外，"目录学"这一术语的原意是"图书的抄写"。古代目录学家大多数是著名的学者，刘向、刘歆是经学家，卡利马科斯(Callimachos)(约前305—前240)是古希腊学者和著名诗人，后者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编出了《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这部书目包括了卡利马科斯时期所有著名的希腊文献。

中国和古希腊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这种古老文化的环境中诞生的目录学，一开始就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刘向、刘歆编制的《别录》、《七略》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目录学概论》说"由于《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编成，因此，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窥视《七略》概貌，从而见到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中写道："《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对于《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目录学概论》说它"是亚历山大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

从历史文化发展与书目的关系看，书目是一种文化系统。《汉书·艺文志》

(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古典书目面貌。下面我们作一简单分析。

《汉志》的分类体系是6略38种。它们是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学术总是文化中的主要因素。《汉志》的分类体系基本上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学术的内容,涉及哲学、文字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农学、军事学、医学的各个方面,记录了汉代经学的斗争情况,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东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日)金谷治1956年发表了《〈汉书·艺文志〉的意义——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一文,追述《汉志》的哲学意义,通过《汉志》研究了刘向的思想。

《隋志》是我国第二部最古的综合书目。著录隋代见存图书3 127部,36 708卷,又从隋以前旧目录中,在注文内附载了隋代已佚之书1 064部,12 759卷。总现存和亡佚,共4 191部,49 467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反映隋代学术的变迁。《隋志》认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图书的产生是目录产生的基础。典籍是对文化的反映,也是教人如何遵守文化传统的,即用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教人处世“其教有适,其用无穷”。

《隋志》反映了中国中世的学术状况。中国中世的学术文化和欧洲希腊、罗马文化长期中断不同,而是和古代文化紧密相依,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从《隋志》可看出,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企图改造古代文化,使之适应封建文化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异端”学说也在不断发扬,例如谶纬学与无神论的对立。刘向在《七略》中用“人事演进”的考察、用校勘提要的方法来阐明学术史,而《隋志》则着重说明图书的兴衰与学术的关系,并用不同的分类体系来反映。东汉至隋代,除经学外,诸子学说、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都有发展;玄学盛行以来,无神论也在流传,这就是《隋志》提供给我们的学术、文化的轮廓。1980年日本文部省拨款180万日元,进行了一次研究,这个项目称为“中世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以《隋书·经籍志》为中心”。可见日本人也十分重视书目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术发展的顶峰时期,对旧的学术进行了总结。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卷,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 461种,79 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 793种,93 550卷。这些书籍基本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中国古籍,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总目》分经、史、子、集4部44卷。从这个分类体系可以看出,清代史学和自然科学比较发达。《总目》将“易”放在首位,宣传孔子之后从董仲舒到康熙的所谓正统思想。在清代,朴学、史学、

哲学、教育学、文学、自然科学、西学都较发达，而学术上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这就是《总目》提供的文化背景。

《汉志》反映了秦以前的中国学术文化，《隋志》反映了东汉至隋代的中世中国学术，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对中国文化学术进行的一次彻底总结。

在国外，目录学家也十分重视书目文化的关系。谢拉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知识和信仰的总和，由三方面维持着。这三方面是物质设备、学术成就和社会组织。在谢拉看来，书目是这样一个组织——“将二者结合为一体的系统”的一个“社会机关”。书目通讯是整个文化交流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目录学、情报学研究通讯规律的区别就在于，情报学不强调与知识的起源和发展的联系以及这个知识对它同时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目录学，其最大特色就是重视读书指导。黎锦熙指出，目录学之大用，首呈献于读书指导，并认为《七略》就是为帝王作读书指导用的。

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朱天俊认为，与文化科学有着深刻联系的目录学，总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学术土壤上生长起来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教委高教司.目录学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 彭斐章.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1995(2)

3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5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6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8 (英)罗伊·斯托克斯.目录学的功能.徐有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

10 柯平.文献目录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11 彭斐章,贺剑锋,司莉.试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图书馆杂志,2001(5)

12 彭斐章,王心裁.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历程、成就与局限.高校图书馆工作,1999(2)

13 陈铭,郑建明.20世纪9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14 肖希明.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进展.图书情报工作,1994(5)

15 穆军.近十年来我国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图书馆建设,1992(4)

16 贺修铭.20 世纪目录学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比较.图书馆,1994(5)

17 肖希明.论目录学理论体系.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3)

18 朱天俊.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4)

19 程焕文.论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变革.图书与情报,1991(4)

20 蒋永福.从书目控制论走向文献控制论.图书馆,1993(1)

21 肖时占.国外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论坛,1993(1)

22 钱振新.近年来目录学研究动态的回顾与思考.情报资料工作,1993(3)

23 彭斐章,石宝军.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综述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2)

24 柯平.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2)

25 乔好勤,李锦兰.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2001(3)

第二章　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官修书目的产生与发展[①]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战乱频仍，朝代迭兴。而每当朝代更迭之际，图书文献总是遭遇严重损失，所以早在隋代，牛弘就总结了前朝图书文献之“五厄”。通常新朝比较注重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从汉代开始，我国各封建王朝都根据实际情况征集图书文献，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整理。整理的结果就是反映政府收藏的目录，即所谓官修目录。

一、早期官方文献整理

历史上，人类有过多种记事方式，如结绳、契刻及图画等。这些方式后来为文字所取而代之。把文字记录于一定的载体上，就形成文献。在我国，文字萌芽较早，但直到商代后期才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文字。[②]

掌握文字的主要是政府官员与神职人员。据《尚书》、《汉书》等史书记载，在原始社会后期的尧舜时期已设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等五官之职，总领部落内部诸项事务。而据《礼记·王制》，天子设百官，有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计官员 120 人。据《周礼》，各官又层层细分，形成严密的层级官僚制度体系。在所有的政府官员中，史官是主要的文字掌握者。传说中创制了文字的仓颉，据汉代普遍的说法，即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史官制度在周朝变得相当完善，《周礼·春官》之“宗伯”属下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官。史官的主要职责是记载君王或部落首领言行、官府军政大事，以及代拟命令和公文，同时负责对它们的管理。据姚名达从文字学角度的分析，以为史乃“秉笔执简之人”，相当于“现代之书记员”，所以“各种衙门皆有之”。史官秉笔刻简的结果就是“书”。[③]三代及其以前的神职人员统称为巫祝，他们通过祭祀、占卜、祈祷等活动在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通过观测天象、气候，探讨天人间的关系与影

---

① 本章不少内容乃据笔者相关文章或论著改写，或直接引自笔者相关论著，尤其是修订本《目录学》第二章“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彭斐章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130 页，不一一注明。

② 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29 页。

响。其中,占卜的记录载体是甲骨,所以保存到了今天,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甲骨卜辞。

无论是占卜记录还是君王言行、官府大事记录,以及天候观测记录,都属于生活记录型文献,即档案。这些记录是孔子以前文献的主要类型,尤其是大史所记,乃君王言行、国家大事之类,所以其书即以"书"为名而冠以国号。据姚名达统计,上古史书之名称见引于现存古籍者,有《虞书》、《夏书》、《商书》、《殷书》、《周书》、《郑书》、《楚书》等。[①] 史官随时记录君王言行、官府大事,所记内容往往独立,故也有单篇流传者。史官记录也有称"志"者,如《周志》、《史佚之志》、《仲虺之志》、《故志》等。反映古代军事、经济等活动的有《丹书》、《盟书》等。

因此,早期的文献整理体现为官府档案整理,那些被称引的书通常是档案编纂的结果。

二、《别录》与《七略》

直到秦汉之时,图书文献的积累才达到一定的规模,但秦实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对文献进行的是一次毁灭式的整理。而据《汉书·艺文志序》,汉代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图书档案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因见"书缺简脱,礼坏乐崩",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于藏书的地方,"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②] 到汉成帝时,因图书又有所散亡,故在河平三年(前26)"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经过几次收集,一时间"书积如丘山"。[③] 在汉代,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竹简与布帛,而图书的流传则主要靠手抄传写,所以同一种书便会因传抄者而有所不同,而且简帛易烂折,编绳易断乱,所以文献整理就成为势所难免之事。于是汉成帝诏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历时19年而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提要目录《别录》。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在汉宣帝时即因"通达能属文辞"以"名儒俊材"的身份与王褒等人一起并置皇帝左右;在汉元帝时因与外戚、宦官斗争而两次入狱;成帝即位,复进用,更名向,迁光禄大夫,领校群籍。

刘向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诏受《谷梁春秋》,讲论五经于石渠阁,著有《新序》、《说苑》、《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等。刘向校书分这样四步:

---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9～30页。

② 《汉书·艺文志》如淳注引《七略》。

③ 《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

其一，广罗异本，相互校补。如校理《列子》时，所收罗的本子有中书5篇，太常书3篇，太史书4篇，刘向书6篇，杜参书2篇，内外书凡20篇。校除复重，余下8篇成为定本。①

其二，条别篇章，确定书名与篇名卷数或篇数。仍以《列子》为例。《列子》8卷，定本共8篇，即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一曰极知），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一曰达生），说符第八。

其三，校勘脱文脱简，写成定本。《列子》一书，“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晏子》“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②“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③

其四，提要钩玄，撰写叙录。④叙录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其一为上述校雠经过的叙述，其二为作者生平及学术思想的介绍与评述。

叙录的方法并非出自刘向等人校书时首创，而是早在孔子及其弟子整理《诗》《书》等文献时就已经采用了。刘向等人的贡献在于将这种揭示文献内容的方法第一次用于目录，并进而成为后代评价目录质量的一个标准，影响深远。

刘向等人每校完一本书，撰写叙录后，便“录而奏之”。⑤这表明他们校雠整理的结果是要呈送给皇帝看的。这些叙录最初皆附于各书，后“又别集众录”，这样就有了叙录汇编本《别录》，⑥共20卷。《别录》约亡佚于唐末，其佚文残篇有清姚振宗辑本，见《快阁师石山房丛书》。

刘向校书19年，未竟而卒。其后，他的儿子刘歆在汉哀帝的诏命下承继父业，年余而成《七略》。刘歆字子骏，年少时即因通《诗》《书》、能属文得以进见汉成帝，为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与父刘向一道“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而在刘向死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以“卒父前业”。很快他就“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⑦《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部分，共著录图书603家，13 219卷。其中辑略为诸略之总要，实际类分图书的是其他六略。其具体类目如下：

① 姚振宗：《别录佚文》，见《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

② 姚振宗：《别录佚文》，见《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版。

③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小序。

④ 参见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0页。

⑤ 《汉书·艺文志·序》。

⑥ 阮孝绪：《七录序》。

⑦ 《汉书·楚元王传》。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不难发现,在类目次序排列上,《七略》是将儒家经典放在首位的,在诸子略中,也是将儒家置于诸子之首,这显然是与在汉代儒家经典立于学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关的。而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当然也就紧次于六艺。赋兴于汉,故再次列诗赋。总的说来,各类的次序排列显然不是随意的,而是体现了创制者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六艺略中以易而不是诗居首,更体现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分野。当然,在类目设置上,该目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六艺略中前六类为六经,而论语与孝经两类则不是。论语与孝经也许可以从其是孔门语录与汉代治国伦理典则的角度来申辩,而小学附于类尾显然就没有很好的辩解理由,它在分类标准上就与前八者不一样。再如史书附于春秋类,有法家而未收律法文献等等。

总的说来,《七略》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分类目录,所以它就成为一种最好的范式,给整个古典目录起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影响深远。这个范式包括这样几个组成部分:1. 有一个分类体系,2. 有一个总说明,3. 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一般认为小序和总说明即总序在《七略》中合为"辑略"),4. 每书都撰有叙录(解题或提要)。

三、从《中经》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西汉的藏书到了东汉献帝之时遭遇劫难。先是图书缣帛从东都洛阳西迁时遭军人取作帷囊,所收而西者,才只有 70 余车。这些书到两京大乱时则"扫地皆尽"。魏氏代汉后,"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据以编撰成《中经》。这部目录由于亡佚,难以确知其分类。时人对其评价颇高,如中书令虞松即说"而今而后,朱紫别矣"。[①] 据《隋书·经籍志序》,在它之后,晋"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荀勗,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仕魏官至侍中,入晋,任中书监,领秘书监,官至尚书令。《中经新簿》也称《晋中经簿》,是在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起荀勗领秘书监后校理群书,花了约五六年的时间编成的。该目是可以确知的我国第一部采用四部分类法的目录。其类目如下: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诸书;

① 《晋书·郑默传》。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中经新簿》之卷数，《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等著录为 14 卷，而《古今书最》以为 16 卷。《古今书最》称："《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①] 对于 16 卷，余嘉锡以为"盖四部各得四卷，正是因书之多寡分合之以使之匀称"。[②] 但从上目可看出未著录佛书，姚名达以为其"固另有佛经一部"，所以该目实为五部目录。[③] 来新夏以为上引《古今书最》之"书簿"是指目录而言。上引文意谓"十六卷目录除佛经目录二卷已失无法计数外，余十四卷目录是四部目录"。[④] 其说有理。

至于丁部之汲冢书，发现于咸宁五年(279)，发现时《中经新簿》的编撰已接近尾声，遂又予整理。因此汲冢书之附在丁部后，应是整理后附于《中经新簿》上呈的结果。

该目在体例上"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⑤] 乔好勤以为"把言解释为对书名及其内容的简单介绍可能更接近于实际"。[⑥]

《中经新簿》编成后不久即有惠怀之乱，洛阳为北方少数民族匈奴刘聪所攻陷，"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初又有所收集，"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⑦] 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他在晋穆帝永和年间任著作郎时将所收集到的图书与荀勖所编目录进行对照。在荀勖《中经新簿》的分类中，与甲乙丙丁相对应的类名为经子史集。而李充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删正"这一秩序，"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⑧]"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⑨] 这一改动影响深远，"秘阁以为永

---

① 《广弘明集》卷三。

② 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第 136 页。

③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71 页。

④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12 页。

⑤ 《隋书·经籍志·序》。

⑥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4 页。

⑦ 《隋书·经籍志·序》。

⑧ 阮孝绪：《七录·序》。

⑨ 《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

制”,[①]“自尔因循,无所变革”。[②]

此后,朝代更替,聚散频仍。文献在更替之际虽不断受厄,而目录却在新朝不断有所编制。这一时期所编目录基本上是四部目录。据《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和《唐书·经籍志》,计有:

1. 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

2. 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3卷(《隋志》),《唐志》作《晋义熙以来杂集目录》,丘深之撰。

3.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谢灵运撰(《隋志序》)。

4. 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4卷,王俭撰(《隋志》)。《古今书最》作《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唐志》作《元徽元年书目四卷》。

5. 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据《七录·序》,当是王亮、谢朏撰。

6. 梁天监四年书目4卷,丘宾卿撰(《唐志》)。

7. 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4卷,殷钧撰(《隋志》)。

8. 梁东宫四部目录4卷,刘遵撰(《隋志》)。

9.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4卷,刘孝标撰(《隋志》)。《古今书最》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七录·序》称“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似本目乃在《天监四年目》基础上重编而成,并别出数术类图书。余嘉锡则以为两目实为一目。[③]

10. 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4卷(《隋志》),《唐志》作《陈天嘉四部书目四卷》。

11. 陈德教殿四部目录4卷(《隋志》)。

12. 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2卷(《隋志》)。此目为四部中之经史二部。

隋统一全国后,注重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次年编成《开皇四年四部目录》4卷。几年之后又编有《开皇八年四部目录》4卷及《隋开皇二十年书目》4卷等目。

隋炀帝喜聚图书,即位后曾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并分成上中下三品,各以不同卷轴相区别,“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

① 《晋书·李充传》。

② 《隋书·经籍志·序》。李充所撰,各书皆未著名。来新夏以为即《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在东晋任大著作郎编目的时间在晋穆帝以后的若干年,上距晋元帝(317—323)时已有20余年。所以称《晋元帝书目》者,因编目所据为元帝时所“鸠集”的图书。依据是《古今书最》称“《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而《隋书·经籍志·序》称“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117页)

③ 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94~95页。

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东都观文殿的藏书在唐初由水路运往长安时在砥柱遇事,“多被漂没”,只有不足十分之一二的部分幸存了下来。[①]隋西京嘉则殿也藏有约37万卷图书。大业初年,秘书监柳䛒受命对这些图书进行了整理,除其重复后得正御本图书37 000余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当是这时编成。该目早已失传,但它是《隋书·经籍志》的底本之一。而后者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

四、《群书四部录》及其他唐代官目

唐代是一个承平相对要长得多的朝代。早在唐贞观年间,令狐德棻、魏征相继为秘书监,即奏请购募遗书,并奏引学士校定,一时间“群书大备”。[②]但唐初没有编制书目,直到开元年间才有《群书四部录》的编制。

开元三年(715),唐玄宗因见宫中藏书皆是太宗、高宗时旧藏,且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因而要求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予以“整比”。于是褚无量在东都乾元殿广采天下异本,大加搜写。开元七年“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廓观之,无不骇其广。”[③]马怀素于开元五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秘书监整理西京秘书省图书。不过在半年余的时间里并未有所绪别。次年六月马怀素卒后,褚无量向玄宗推荐元行冲总领其事。元行冲名儋,以字行。高宗时进士,累官太常少卿,弘文馆学士。元行冲于开元七年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并组织了一个由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直、王湾、刘仲丘等人组成的庞大校书班子。其中“煚、钦总缉部分,践猷、惬治经,述、钦治史,煚、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④]到开元九年(721)编成《群书四部录》200卷。该书收罗宏富,著录图书多达2 655部,48 169卷。[⑤]该目多取现成,如分类多因《隋书·经籍志》。据《唐书·经籍志·序》,开元《群书四部录》之分类与《隋志》相比,只除经部纬改为图纬,并另增经解、训诂二类,史部改簿录为略录外,余皆相同。

该目编成后受到曾参与其事的学者毋煚的批评。他说:“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以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以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

---

① 《隋书·经籍志·序》。

② 《旧唐书·经籍志·序》。

③ 《旧唐书·经籍志·序》。

④ 《新唐书·儒学中》。

⑤ 此数目出自《玉海》卷五二引《会要》。《新唐书·艺文志》序称开元著录图书53 915,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有28 469卷,共多达82 384卷。

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①]虽然该目存在诸多问题，但一来收罗宏富，二来在目录方法上运用了小序及叙录等方法，所以在古代四分目录中仍是不多见的。

玄宗朝还编有其他一些简单登记型目录，如《开元四库书目》14 卷、天宝间所编之《见在库书目》、集贤学士韦述所编之《集贤书目》1 卷等。《见在库书目》共著录图书达54 642卷，据《唐会要》，到天宝十四年又续写了16 843卷，总计达71 485卷。由于安史之乱，这些图书差不多亡散一尽。此后唐肃宗、唐代宗屡诏购募，至德宗时有所鸠集，遂从秘书少监陈京之请编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著录图书 2 万余卷。至文宗时“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四库搜访图书目》1 卷或编于此时。到文宗开成初年，积累四部书至56 476卷。随后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尺简无存”。[②]

五、《崇文总目》及其他两宋官目

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有了较快的发展，图书迅速增多。不过，宋初只有图书万余卷，削平诸国并收其图籍后又下诏购求散亡，三馆之书方有所增益。三馆，即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宋太宗时建崇文院，合三馆为一，并“徙三馆之书以实之”，且另建秘阁，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入藏之。宋真宗也置有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等藏书处所。从宋开国到宋真宗朝，先后有《乾德史馆新定书目》4 卷、《太平兴国搜访书目》、《紫微楼书目》、《皇朝秘阁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景德太清楼书目》等目录的编制。[③]

但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皇宫发生一次大火，延烧至崇文院和秘阁。很多书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灰烬。到宋仁宗景祐初，因新建崇文院，遂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又命王尧臣、欧阳修等仿唐开元故事，整理著录三馆秘阁图籍，历 7 年而于庆历元年(1041)撰成《崇文总目》66 卷，叙录 1 卷，著录图书30 669卷。《崇文总目》分 4 部 45 类，经部 9 类，比《群书四部录》少图纬、训诂、经解类；史部 13 类，删起居注、旧事、谱系 3 类，增实录、氏族、岁时 3 类；子部 20 类，增类书、算术、艺术、卜筮、占书、道书、释书 7 类；集部 3 类，删楚辞，创文史 1 类。[④]与以往目录不同的是，子部道释 2 类不再只是有目无书，而是有目有书，极具意义。

《崇文总目》各部类之下皆有小序，各书之下皆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

---

① 《古今书录·序》。

② 《旧唐书·经籍志·序》。

③ 参见：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183 页；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98～199 页。

④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204 页。

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至宋徽宗勤于搜访补辑，设补全校正之官总理募工缮写之事。一时藏书大盛，置诸宣和殿、太清楼及秘阁等处。政和七年（1117）又诏孙觌等整理撰次，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增补著录图书25 254卷，更名《秘书总目》。由于只做了增补，故南宋以后诸书称引该书时仍作《崇文总目》。

经靖康之难，徽宗时积累起来的图书荡然无存。到宋高宗偏安江南，搜访遗阙，馆阁编辑，始日渐丰富。至孝宗淳熙五年（1178）诏陈骙等编制书目，遂仿《崇文总目》而制《中兴馆阁书目》70 卷，著录图书44 486卷。至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秘书丞张攀等又续撰 30 卷，成《中兴馆阁续书目》，著录图书14 943卷。

六、《文渊阁书目》与《新定内阁藏书目录》

元立国时间不长，又四处用兵，虽搜掠了不少图书文献，但却未予整理，所以也没有编制目录。至正二年（1342）曾诏王士点、商企翁撰《秘书监志》11 卷，其中卷六卷七按在库书、先次送库书、后次发下书、续发下书登记各有若干部若干册。在库书下分经、史、子、集以及道书、医书、方书、类书、小学、志书、阴阳书、农书、兵书、释书、法帖各类。但因不著录书名卷册，所以它不是书目，而更像是一份财产清册。

明自太祖攻克建康（今南京），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灭元后大将军徐达尽收其奎章崇文秘书图籍，及太常法服、祭器、仪象、版籍，归于南京。洪武初年继承元制设秘书监丞等职，掌管皇家图书文献。洪武十三年（1380）改归翰林院掌管。[①]明成祖朱棣改都北京，“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贮于左顺门北廊。[②]后在北京亦建文渊阁，收贮明列祖列宗御制文集及四部图书。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大学士杨士奇等逐一点勘，编成《文渊阁书目》。

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所编《文渊阁书目》，清编《四库全书》时厘定为 4 卷。[③]该目将所著录图书7 297种（一说7 256种）按千字文编号排序，从天字至往字，凡 20 号，共 50 厨。各字或一厨，或数厨，统一类或数类不等。这部目录于著录项目多所简略，“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厨，若干厨为一号而已”。[④]更无小序、提要。但被认为是官修目录采用千字文排序之始，影响所及，以至后来的一些私藏目录如《脉望馆书目》、《汲古阁

① 《明史·艺文志·序》。
② 《明史·艺文志·序》。
③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著录作 14 卷。鲍廷博以家塾旧藏本校官本，析为 20 卷。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

藏书目》皆采此法。

实际上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间修《大宋天宫宝藏》时，即曾用千字文为道藏编号。据《云笈七签序》，《大宋天宫宝藏》"起《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得四百六十六字"。当藏书达到一定数量时，编号以确定图书收藏位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宋真宗时首用千字文为道藏编号。这种千字文排序法随后在档案管理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旧题曾巩之《隆平集》卷十四说："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江西转运使，为立千文架阁法，以岁月为次，严其遗去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至今不易。"① 湛即周湛，架阁用于收储文书。文书多且杂，散乱放置极难查找且易丢失，为人所窃亦难发现。只有确定其存放位置才能避免难找易失之病。元沿用宋架阁制度，明代后湖黄册库亦以千字文为册架编号。这样《文渊阁书目》采用千字文编号分厨不属意外。

在分类上，该目共分 39 类，首御制、实录，次六经、性理、经济，次史家，次子家，次诗文集，次类书、韵书、姓氏、法帖、图画，次政、刑兵、法、算术、阴阳、医方、农圃，次道书、佛书，而以古今地志终焉。有人以为此乃自创分类体系，实则内阁当时对取自南京的图书只作了简单的登记处理，此目也"不过内阁之簿帐"，② 并非有意开创新法。但首列御制却表明了明代皇权之重超迈前代，虽然首列御制之举始于宋王应麟(所编《玉海》先圣文，后艺文)，但因出自官目，遂多仿效，开此后书目多首列御制之恶例。

明代官修书目多简陋，多为一卷二卷之作。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中书舍人张萱等奉中堂谕校理内阁藏书，撰有《新定内阁藏书目录》8 卷。该目在分类上受《文渊阁书目》的影响，分所收图书为 18 部。第一卷包括圣制、典制 2 部；第二卷包括经、史、子 3 部；第三卷包括集 1 部；第四卷包括总集、类书、金石、图经 4 部；第五卷包括乐律、字学、理学、奏疏 4 部；第六卷包括传记、技艺 2 部；第七卷和第八卷分别包括志乘和杂部各 1 部。且对登录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书之完阙"，并间或加有解题。

七、《四库全书总目》

元明之时官修目录多简陋。清代在目录编纂上则显得极其隆重，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四库馆，先后集一时名流如纪昀、戴震、邵晋涵等 360 人修书，至四十六年撰成《四库全书总目》初稿，五十四年《四库全书》修成，《总目》也写定付梓。

《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无论是在图书分类上，还是在小序与提要撰写上都

---

① 参见：王金玉著：《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3～97 页。

② 钱大昕《跋文渊阁书目》，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之特征。在分类上，该目共4部44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

史：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记、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上、下、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上、下、杂说上、中、下、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上、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上、下、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总目》对传统类目有继承，有调整。如合诏令（史）、奏议（集）为诏令奏议；合名、墨、纵横入杂家。还增设了一些新的细类，如史部增设史评，收《史通》等著作，增设政书类收《通典》等著作，增设纪事本末收《通鉴纪事本末》等著作。在类目排序上，也有所思考，如儒、兵、法之后即为农，为医，因为农、医皆“民命之所关”。[①]对于这些增设调整，《总目》在凡例、总序、小序乃至提要按语中都有所论述。总之，“《总目》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今书目分类的成就”。[②]

《总目》在体例上还创存目例。即有收入《四库全书》应刊、应抄各书之提要；有不能收入《四库全书》而只能存其目之书之提要，这些提要附于各类之末。

《总目》首有《凡例》20则，为本目编纂之宗旨与原则。次于经史子集4部部首各冠总序，44类之首亦各有小序。再次于各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和所据版本，每书之下皆有提要。缪荃孙《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序》说：“考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宗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称：“就其大体而言，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

鉴于《总目》部头过大，又另编《简明目录》20卷，精简总序、小序和存目。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还诏令于敏中整理昭仁殿天禄琳琅所藏，撰成《天禄琳琅书目》10卷，收书429部。以刻书朝代宋、金、元、明为次，朝代之下再分经史子集。卷一宋版经，卷二宋版史子，卷三宋版集，共宋版71种，附录

---

①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2～264页。

②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

金版史1种;卷四为影宋抄,20种;卷五元版经史,卷六元版子集,共元版86种;卷七明版经,卷八明版史,卷九明版子,卷十明版集,共明版251种。收录之书,如一书而有两种刻版且均精审者,仿尤袤《遂初堂书目》例,两刻并存;一版而有两印且均精妙者,则一并登录。每种书均有简赅之解题,著明其锓刻之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并一一考证其时代爵里,论述其授受源流。

嘉庆二年乾隆又命彭元瑞等依《天禄琳琅书目》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共著录宋、辽、金、元、明版书663部。

第二节 史志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

班固以前的史书,没有为图书文献设立专门的篇章。到他撰写《汉书》的时候,以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所以据《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删其要以备篇籍"。[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官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永平中奉诏修史,至建初中历20余年撰成《汉书》,分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汉书·艺文志》是十志之一。《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因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所以要注意两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首先是"辑略"问题。一般认为辑略在《七略》中是包括总序和各类小序的一个特殊类,而《汉志》将小序分入到了各类。其次是叙录问题。《汉志》因史志篇幅所限,删叙录为注释,变得更加简明扼要,灵活多变。再次是出入增省问题。《汉志》虽保留了《七略》的分类,但在具体图书归类上,有出入和增省等做法,体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所谓出入,就是调整图书的类目归属,从某一类调出而入另一类。省就是删除。另外还有增,乃《七略》所无而为自己所新增入。

显然,班固在删《七略》之要时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因将目录收存于史书,开创了一个新的书目类型,即史志目录。由于史书独特的性质,原目录即使业已失传,却因史书之历代妥善保管而其大要得以留传下来。

《汉书》之后,史书大盛,但皆未设艺文志,直到唐修《隋书》始设经籍志,成为第二部史志目录,也是第一部采用四部法的史志目录。

《隋书·经籍志》之修缘于贞观间修成的《隋史》等五代史无志。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2)诏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志,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书成。其中《隋书·经籍志》是根据柳䛒《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并参考阮孝绪《七录》的分类体系编成的。编者有魏征、李延寿、敬播等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大抵

① 《汉书·艺文志·序》。

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剪棘之实。撰人可考者凡三人。"该目利用隋代遗书14 466部，89 666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相核对，删去重复，按经、史、子、集四部 40 类，著录存书3 127部，36 708卷，佚书1 064部，12 759卷。后附佛、道二录。该目的贡献首先是在分类上，它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而且在四部目录的发展史上，它是首先采用经史子集而不是甲乙丙丁作类名的目录。它的二级类目也因善于继承前此各目，而成为后代四部目录增删改订的基础。其次，该目除了继承《汉书·艺文志》采用的大小序及书目注释方法外，还注释时间或注明书之存亡残缺。如称"宋有"、"梁有"或"梁亡"，并以夹注，附入亡佚书目。这样，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载六朝时图书变动情况，显示了它在书目方法上的新特点。[①]

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张昭远等受诏修撰《唐书》，4 年后书成，新任宰相刘煦奏上。因别于欧阳修所撰《唐书》，故称《旧唐书》。整部《旧唐书》的编撰只用了 4 年时间，因而不少内容往往袭取成书。如《经籍志》二卷便完全是取毋煚《古今书录》删略而成。其所删除者为原书的大小序和叙录。其理由如下："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另外，由于完全袭用《古今书录》，所以该目于开元以后新出现的图书未能收入，所谓"今之杀青，亦所不取"。这样该目便成为一部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但纪部帙而已"的目录。[②]

二、《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

北宋仁宗时重修《唐书》，欧阳修仍据《古今书录》而成《新唐书·艺文志》4卷。《新唐志》对《古今书录》的分类不像《旧唐志》那样差不多一仍其旧，而是有所改动，如并霸史、伪史于霸史等。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是，《新唐志》增加了《旧唐志》所未录的唐人著作27 127卷(一说28 469卷)，并在著录上创著录与不著录例。著录者，见著录于所据之书目；不著录者，新增补之著作，未见著录于所据书目也。此目之前，史志目录多反映一代之收藏。至此目，始兼及一代之著述。而这种著录一代著述的做法，也为补史艺文志工作提供了方法基础。

宋代除修《唐书》外，还注重国史即当代史的修撰，且于每种国史皆撰艺文志，开当代史史志目录之先。计有吕夷简等撰《三朝国史艺文志》(宋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撰《两朝国史艺文志》(仁宗、英宗)、李焘等撰《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四部。这些艺文志于每类皆有小序，每书皆有解题，当是据宋所修官目如《咸平馆阁书目》、《崇文总目》、《秘书总目》及《中兴馆阁书目》等编成。在著录上，《三朝志》、《两朝志》及《四朝志》等三

①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7 页。
② 《旧唐书·经籍志·序》。

目皆不重复著录，而仅录前目所未有者。只《中兴志》因出南渡以后，所以重复著录。

宋国史艺文志的编纂为元修宋史艺文志创造了极便利的条件。因而脱脱纂修《宋史·艺文志》时重要的一步工作便是简单地删四志之重复，使之“合为一志”。[①]这种删除重复最简单的做法便是以《中兴志》为蓝本，增以《三朝志》、《两朝志》及《四朝志》三志。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序称：“《中兴志》分类，本之此目，其书名卷帙，《宋志》多与此合，间有参差，不及百一。”但脱脱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还仿《新唐志》例以“未著录”方式增加著录了宋宁宗以后新刊行的图书。同时该目也像两《唐志》一样删小序与叙录，连注释也很少，成为又一部没有小序的史志目录。不过，该目著录图书多达9 819部，119 972卷，是人们了解宋以前文献状况的重要工具。但因编纂时间短（自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至五年十月，前后不足3年），编者学识不足，错误极多。或著录重复，或分类欠妥，或一书误入两类，或错记书名，不一而足。故《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

三、《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

自班固始，艺文志一般见于断代史书。郑樵主张会通，反对断代史的做法，但对史书撰修艺文则十分欣赏。所以，他在《通志》中特撰艺文一略，通录古今图书。

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的做法是与他的“通记古今图书”、“详明类例”、“泛释无义”等主张相一致的。所以在《艺文略》中，郑樵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百家422种。这一图书分类体系不仅结构谨严、详分至三级类目，而且其大类十二，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把以前分类中的诸多子目提到与经、史、诸子、文相并列的位置，并改集部为文类，是突破“秘阁以为永制”的四分法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尝试。由于主张“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所以《艺文略》各类皆无类序，但如遇到需要说明之处，郑樵便写以按语。《艺文略》中按语多达10余篇。由于主张泛释无义，各书也无叙录，只于有疑晦之书则加注释。所谓“于疑晦者则释之，于无疑晦者则以类举”。[②]因此，可以说《艺文略》是郑樵目录学主张的一次有效实践。

《文献通考·经籍考》是另一部通录古今图书的史志目录。该目考订綦详，引证丰富。编者马端临为南宋宰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从至元二十二年至大德十一年(1285—1307)，马端临广搜博览，勤加纂集而成《文献通考》348卷，共24门，《经籍考》位列第十九，共76卷，分4部55子目。“所录先以四代史

---

① 《宋史·艺文志·序》。

② 《通志·校雠略》。

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这种于所著录图书之下汇集相关文献的方式称"辑录体"。据乔好勤考证，该法始于南宋时高似孙所撰《史略》。[1]但据高似孙自序，其书前后只用了27天即告撰成，繁复与误录在所难免，因而影响不大。而《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于材料选取多所用功，所辑录不仅把《汉志》、《隋志》、宋四部国史艺文志等史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官私目录中各部类前的叙文和诸书之下的解题，全部录置于《经籍考》有关类下和书下，还大量辑录宋人著作中对一书的评价，涉及作者几十人，著作几十种。[2]而且体例所在，影响到后此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诸作。

四、《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

明修《元史》时未设艺文或经籍志。不过万历间修国史，焦竑领衔撰有《国史经籍志》。受郑樵影响，焦竑于四部下设48类，再于各类下设308子目，以求如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又受明官修目的影响，四部之前设制书类。这里所谓"国史"，乃国朝即明朝之史。因此，《国史》如《汉书》、《隋书》等诸史书一样为断代史，照理其艺文志或经籍志当收录一代藏书，焦竑在《国史志》序中也一再说"纪当代现存之书"或"余经目者"，而实际上却非如此。据乔好勤研究，该目于著录上有古今并录例、录其见存例和择要著录例三例，[3]标准颇不一致。究其原因，在于《国史志》不像前此断代史志多有官修目可作凭据，因为像明官修《文渊阁书目》仅是藏书的清册，著录简略，多无卷数、著者，分类上亦非四部成法。且所录藏书至万历时多已散佚，无从查考。而如《新唐志》未著录例那样专录一代著述，也因事出仓促，政府措施不力，而难以于当代著述收藏上有所成效，亦属不可能。所以焦竑不得已采用了通史的做法，效法郑樵《通志·艺文略》，通记古今著述。[4]但因为著录标准不一，《国史志》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的严厉指责，讥其"丛钞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以为"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

到清修《明史》，于艺文志亦无官目可据。修撰者黄虞稷在未进入明史馆时已着手有明一代著述的收集，撰《千顷堂书目》。其所著录以明人著述为主，每类之末附南宋、辽、金、元人之著作。所以当他纂修《明史·艺文志》时便采用了纪有明一代著述为主的方式。其初稿与《千顷堂书目》基本相同，并以《千顷堂书目》

---

①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

② 李万健著：《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③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252页。

④ 王国强著：《明代目录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8页。

之名行世。此稿先遭删去每类所附之宋辽金元四朝著作,再遭删去“其幽僻不传与无卷帙氏里可考者”。[1]当张廷玉主持《明史》修纂时,于这两次所删并无特别意见,遂略作改动而成《艺文志》。这样该志就成为专录有明一代著述之志。

但正是由于《明史·艺文志》未收宋辽金元著述,导致一些学者展开了补史艺文志工作;也由于《明史·艺文志》专收一代著述,给补志指明了范围。补志工作最初围绕辽金元三代展开,随后补及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五代,再后则对已有艺文志作补注。今按时代条列有关补史艺文志主要著作如下,以见补史志之风盛行之大概: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6 卷;
《汉书艺文志条理》8 卷;
刘光贲《前汉书艺文志注》1 卷;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1 卷;
侯　康《补后汉艺文志》4 卷;
顾櫰三《补后汉艺文志》10 卷;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4 卷;
曾　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志 1 卷考 10 卷;
侯　康《补三国艺文志》4 卷;
陶宪曾《补侯康三国艺文志补》;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4 卷;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4 卷;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6 卷;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4 卷,补遗 1 卷,附录 1 卷,刊误 1 卷;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4 卷;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4 卷;
徐　崇《补南北史艺文志》3 卷;
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1 卷;
陈鸿儒等《补南齐书经籍志》;
陈　述《补南齐书艺文志》4 卷;
李正奋《补后魏艺文志》;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13 卷;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52 卷;
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2 卷;
徐　炯《补五代史记艺文考》3 卷;

① 杭世骏:《黄氏书录序》,见《道古堂文集》卷六。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倪　灿《宋史艺文志补》1卷，卢文弨校补；
王仁俊《西夏艺文志》；
厉　鹗《辽史拾补·补经籍志》1卷；
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补经籍志》1卷；
缪荃孙《辽艺文志》1卷；
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
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
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1卷；
郑文焯《金史补艺文志》1卷；
孙德谦《金史艺文略》；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4卷；
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
倪　灿《补辽金元艺文志》1卷，卢文弨校补；
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1卷。

由于补史志学者的辛勤努力，我国古代散佚失纪之文献有了书目记录。合有关正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即形成我国古代文献之总目录。

第三节　私人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私人目录大致上可分三种类型，一是私人藏书目录，一是个人所编之目录，一是个人著述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大约起源于汉魏。当译经僧记录下自己所译诸经时，个人译述目录也就产生了。在佛经目录中根据译人排序的做法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据《晋书·曹志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编有个人著述目录。由于个人著述目录仅记个人著述，通常为簿账式，且多缺乏记载，故此处从略。

一、孔子及其文献整理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不同的衙门职掌不同的记录，私门无著述文字。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王室的地位日趋衰微，而地方诸侯的势力则日渐强大。各诸侯国为了维护壮大自己的利益，称王称霸，纷纷起而变法，一时间“礼坏乐崩”。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学在官府的局面也被打破，私学大量兴办，百家争鸣，“游学者日众”[①]，从而培养了大批民间知识分子。这种情形导致了学术的快速发展与文献的突出增长，文献需求也在此时相对凸显出来。

① 《韩非子·五蠹》。

私学兴于孔子。孔子一生广收门徒,“有教无类”,从学者多达3 000之众,其中学有成就者70余人。孔子对文献十分注重,并在讲学及周游列国时派人或亲自搜求文献。《史通·六家》称“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称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以说孔子是我国史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墨子是继孔子之后在手工业者中传播文化者。在《墨子·非命》中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征以先王之书”,并屡引“先王之书”《距年》、《吕刑》等。至战国时齐桓公(田午)于稷下立学宫,先后有慎到、田骈、淳于髡、邹衍、宋钘、尹文、环渊、荀况等学者宗师前往讲学,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至齐宣王时达“数百千人”,[1]蔚为一时之盛。

但孔子之时,官府收藏的主要是档案记录。这些记录有些经过整理,成为人们称引的图书,但也有大量未经整理者。经过春秋时期的动荡,这些记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而且由于讲学的缘故,也需要有教本以体现其“拨乱世反之正”[3]的目的。因此,孔子不仅收藏文献,还最终选择了整理现有文献的方式。经由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等的不断努力,整理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艺(至汉被尊为六经)。据范文澜研究,孔子整理六经遵循了下列三个原则:

其一,述而不作。[4]孔子编订六经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先王之陈迹”,皆档案文献,故述而无所作。朱熹《论语集注》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

其二,“不语怪、力、乱、神”[5],尽量删去档案中关于怪异、勇力、悖乱与鬼神等内容。

其三,认为“攻乎异端,斯害也矣”[6],故反对研究异端邪说,反映在文献编纂整理上,就是尽量不收那些含有异端观点的材料。

对不同的档案材料,孔子及其弟子采用了不同的编排方法。《书》按朝代次序,《春秋》按年月时序,《周易》按事物产生发展的次序排序不同的卦,而《诗》则先按体裁分南、风、雅、颂等类,类下进一步按地理方位等细分,雅、颂甚至细分到了篇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形成了一个有二级标题乃至三级标题的目录。而且还为《诗》、《书》撰写了“序”,有小序,介绍一篇诗、文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以及大

---

① 《史记·田齐世家》。
② 《论语·八佾》。
③ 《史记·孔子世家》。
④ 《论语·述而》。
⑤ 《论语·述而》。
⑥ 《论语·为政》。

序,为诸篇之总纲。

孔子整理文献的原则与方法尤其是《诗》、《书》之序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七志》、《七录》、《七林》与《古今书录》

自三国魏以降,官方在整理文献时一般都编制四部简要目录。而一些私人编者大约出于对这种苟简做法的不满,绍述《七略》传统,编制了像《七志》、《七录》等学术性书目。

《七志》40卷,王俭撰。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今属山东),南朝宋齐间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刘宋时为驸马,历任秘书丞等职。后辅佐齐高帝即位,任侍中、尚书令、中书监等职。据《隋书·经籍志·序》,王俭任宋秘书丞时编制了《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4卷。这显然是一部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目录,因而他"又别撰《七志》"。据《南齐书·王俭传》,《七志》是依《七略》之例。据《七录序》,《七志》是依《别录》之体。这表明《七志》主要继承了《别录》与《七略》传统。这种继承首先表现在命名与分类上。王俭之时,四部分类已经流行开来,而他却仍坚持七分,并且鉴于《七略》名为七分而实为六分还特增图谱一类,成为名实一致的七分体系。《隋志》记其各类云:"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可以看出其类名只是对《七略》类名作了些改动,而未有实质性的变动。这些改动有的比较恰当,如六艺之改为经典,即反映了汉以来儒家典籍备受尊崇的事实;有的改动扩大了原类的范围,如诗赋之改为文翰;另有些改动则受到了非议,如兵书之改为军书,数术之改为阴阳,方技之改为术艺。阮孝绪说:"阴阳有所偏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① 正是由于因循《七略》,所以王俭仍以史书附入经典志,而不是如同时期那样另立大类。这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阮孝绪即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② 另外,《七志》将道佛书附见于后。算上此二者,即"合九条",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九类。

其次表现在叙录与小序等方法的运用上。《七志》仿《七略》"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③,这九篇"条例",应当就是九大类之类序。从这句话也可推知《七略》之辑略的内容。另外,《七志》"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虽然不像《七略》那样

---

① 《七录·序》。

② 《七录·序》。

③ 《隋书·经籍志·序》。

讨论作者之意,但在一味求简的风气下,这样做也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新创的不讨论图书内容而介绍作者的提要被后世称为“传录体”提要。

值得一提的是,《七志》也称《今书七志》。这意味着在著录上,该目还收录当代图书。

王俭一生无论在宋在齐都十分显要,利用官方藏书十分方便,门生故旧各居要职,也当给了他不少的帮助。相形之下,略晚于他的阮孝绪则作为一个“处士”(未仕或不仕之士子),主要凭一己之力编成了这一时期另一部重要的学术性书目——《七录》,更加难能可贵。

阮孝绪,字士宗,河南尉氏人。主要生活于梁际。阮孝绪以一己之力,凭读书见闻,总集众家,撰成《七录》12 卷,著录图书6 288种,44 526卷。其序称:“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这里的官目当是《古今书最》所列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该目共著录图书23 106卷。两相比较,《七录》所著录多出近一倍,这可见阮孝绪用功之勤。

《七录》在分类上采用七分法,但与《七略》及《七志》相较,在立类上颇有改易。《七录》之分类如下:

内篇

经典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纪传录: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子兵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家;

文集录:楚辞、别集、总集、杂文;

术技录:天文、谶纬、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杂艺;

外篇

佛法录: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

仙道录:经戒、服饵、房中、符图。

其改易首先表现在史部的独立上。其次合诸子与兵书为子兵录。再次,以为“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分散著录于各书,而不立图谱类。另外,佛道图书不再作为附录,而是作为外篇。而且《七录》子目详备,有内篇 5 录 46 子目加外篇 2 录 9 子目,共 55 子目。这些子目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学术思想概貌,并对《隋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录·序》称其“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联系到该目多达12卷,表明该目应撰有简要的提要。但由于该目是一部主要据有关目录而不是原书编成的目录,所以错误在所难免,《隋志序》即称其“割析辞义,浅薄不经”。从下文所引《许善心传》,参之《隋书·经籍志》于《七录》多所采录,《七录》还当有类序。

七分体系的目录至隋代还有许善心所撰《七林》。许善心于开皇十七年(597)除秘书丞，整理秘藏图籍。《隋书·许善心传》说："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这段记载说明，无论《七志》、《七录》还是《七林》，都同祖《七略》，皆大致或实分为七类，有冠于篇首之类序，并有明作者之意或介绍作者的提要文字。

毋煚《古今书录》也是一部私人目录，其编撰多少与王俭编《七志》及许善心编《七林》有些类似。只是毋煚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官目《群书四部录》的不满。在《古今书录序》中，毋煚首先指出了《群书四部录》的五大缺点(见前文)，然后"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遂成《古今书录》40卷。显然，《古今书录》是在对《群书四部录》进行补充、修订和简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该目分4部45家(经录12家，史录13家，子录17家，集录3家)，共著录图书3 060部，51 852卷。《旧唐志》序称："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指。"这表明该目准自《汉志》，乃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注释之目录。不过，该目既有40卷之多，则其注释可能相对要详细一些。

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

造纸术在东汉有了重大改进。纸作为书写载体逐渐普及开来。到东晋末年，桓玄称帝后下令凡需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最终凭制作方便、书写容易等其他载体难以比拟的优势确立了其地位。纸的应用造就了大量的藏书家。从前引《七录·序》所说"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可以看出，六朝私人藏书家很多，而且不少还编有书目。但这些书目都没有留传下来。至隋唐更是藏书家辈出。像隋之崔廓、许善心、陆爽、柳䛒、张珺等人，唐之魏征、李元裕、李元嘉、王琳、元行冲、李范、吴兢、韦述、杜暹、萧颖士、苏弁、蒋乂、柳公绰、田弘正、王涯、韦处厚等，皆富藏书。有些人收藏之富甚至可与秘府相媲美。他们是否编有书目多不得而知，因为缺乏相关记载。史有记载的是吴兢《西斋书目》1卷、蒋彧《新集目录》(或称《蒋彧书目》)及杜信《东斋集籍》。据《玉海·艺文》，《西斋书目》的分类甚至多达57部。惜乎未能流传下来。

至宋则雕版印刷普及开来，从而使图书文献得以更广、更快地传播。藏书家因而层出不穷，据统计其中藏书万卷以上者多达214人，而这只占到宋藏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著名者有叶梦得、魏了翁、赵宗绰、陈振孙、赵汝愚、王钦臣、周密、方崧卿、田伟、宋敏求、李淑、雍子仪、尤袤、刘季孙、王介卿等。[1]宋代

① 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藏书家有60余家编有书目,如李淑《邯郸图书志》10卷、吴秘《家藏书目》、田镐《田氏书目》、叶梦得《叶石林书目》、董逌《广川藏书志》等,流传下来的只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尤袤《遂初堂书目》。

晁公武,字子止,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人。因世居汴京昭德坊,人称昭德先生。出生于藏书世家。靖康末年入蜀避乱。南宋高宗绍兴中中进士,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获赠其全部藏书50箧。历官监察御史,知恭州、荣州、合州,迁四川安抚制置使,兴元府知府、成都知府。乾道七年(1172)入京,以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除临安府少尹,官至吏部侍郎。《郡斋读书志》始编于他知荣州之时,序称:"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传于今者有衢刻本20卷、袁州本4卷两种。分4部42类,经10,史13,子16,集3。全书有总序,叙历代撰目经过,分类沿革。每部有总论,列所属各类,并述各部学术源流、派别,评论得失。小序则放在每个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中。各书皆有提要,对作者简历、各书要旨、学术源流、不同学说、篇章次序等均有所论列,偏重考订。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藏目录,衢刻20卷本共著录图书1 937部,24 500卷,对于研究南宋以前文献发展状况、学术发展源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遂初堂书目》是尤袤的藏书目录。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极富收藏。遂初堂是他主要的藏书处所。《遂初堂书目》1卷编于尤袤晚年。该目在分类上未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不过其实际44个类目则仍具四分法之实。于经部,他设有9类,并孝经入论语;又将子部孟子并入经部论语;设经总类。史部18类,并岁时入农家,新设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史学五项,并仿新唐志设故事类。子部12类,并墨、名、法、纵横入杂家,仿七略合天文、历仪、阴阳、五行、卜筮、形势为数术家,取消《崇文总目》之道书类而设谱录类。集部5类,不设楚辞而设文史类,又设章奏和乐曲二类。这些做法有些取法自当时官目或史志目,但也有些为尤氏所首创。

《遂初堂书目》的最大贡献不在分类,而在其版本著录。该目常一书而兼记数本。其所记版本,按时代分有所谓旧监本、旧杭本及新杭本;按刻书地域分有杭本、越本、江西本、湖北本、池州本、吉州本等;按刻书机构分,有监本、家刻本、官刻本等;按版刻行款分,有川大字本、川小字本等;按国别分有宋本、高丽本等。记版本的类有经总、正史、杂史等。其传世本有元刻《说郛》本,《常州先哲遗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①

刻板盛行于宋世,《郡斋读书志》即偶记版本。至《遂初堂书目》,省略小序与

①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9~220页。

提要，专记版本，可以说开版本目录之先。

在现存宋私藏目录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最为晚出，而著录最为丰富。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尝仕于莆，得以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藏，累至51 180卷。于是仿《郡斋读书志》而作《直斋书录解题》。该目原有56卷，已亡。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该目共著录图书3 096种，51 180卷，只比《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之和少8 000余卷。现行本直接分为53个类目，不标经史子集之名，而实以四部次序为先后。在53类中，仅类目有分合、增创、复立的语孟、小学、起居注、时令、农家、阴阳家、音乐、诗集、章奏9类立有小序，皆为不得不有所说明的类目，其无新意可陈的各类则不写小序。该目于著录各书皆撰有提要，于作者、卷帙、学术源流、得书经过、古书款式、版本等多有记述或考订。正是由于其著录的丰富与独特的解题，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

四、元明清私藏目录概述

元由于国祚不永且社会动荡，万卷以上私人藏书家只有70余人，很多藏书是通过战争搜掠而得。有文献可据的私家藏书目录只有9家，且无一保存下来。[①]其中著名者如松江庄肃编有书目，以甲乙分十门；吴郡陆氏有藏书目录；鄞县袁桷有《袁氏旧书目》和《袁氏新书目》。

至明私人藏书盛行，万卷以上藏书家多达231人。[②]而"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秦、晋、蜀、赵诸藩王皆富藏书；"周藩之竹居，宁藩之郁仪，家藏与天府埒"，[③]宁藩宁献王朱权有《宁献王书目》1卷，其藏书直到其七世孙朱谋玮（字郁仪）时遭火所焚；周藩周定王有《周府书目》4册，其后裔朱睦㮮文行卓异，有万卷堂，其子朱勤美（即竹居）编有《西亭中尉万卷堂书目》16卷。

明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有四明范氏天一阁，历四五百年而保存至今，编有《四明范氏书目》2卷。开州晁瑮有宝文堂，编有分类书目。赵用贤、赵琦美父子喜藏书，编有《赵定宇书目》1册、《脉望馆书目》。虞山钱谦益有绛云楼，因得刘凤厞载阁、钱允治悬罄室、杨仪七桧山房及赵用贤、赵琦美父子脉望馆诸家藏书，"几埒内府"，比之叶文庄公叶盛、西亭王孙朱睦㮮尤"或过之"，[④]编有《绛云楼书目》4卷。钱谦益族裔钱曾亦富藏书，藏书楼有也是园、述古堂，编《也是园藏书

---

① 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② 据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第168～187页"明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统计。

③ 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见《有学集》卷二十六。

④ 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

目》10卷、《述古堂书目》4卷、《读书敏求记》4卷。其余通经学古之士，致力典籍搜罗而知名者，会稽有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闽峤之地则有谢氏小草斋、徐氏红雨楼、陈氏世善堂，南中有焦氏抱瓮轩、黄氏千顷斋，吴兴有茅氏白华楼、沈氏玩易楼，吴中有文氏辛夷馆、袁氏昌安堂、叶氏菉竹堂、华氏之真赏斋、李氏之得月楼、赵氏之小宛堂，"各据坛坫，卓荦一方"①。这些藏书楼基本上都编有目录，如叶盛《菉竹堂书目》6卷、钮纬《世学楼藏书目录》、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2卷、焦竑《焦氏藏书目》、谢肇淛《小草斋书目》、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14卷、陈第《世善堂书目》2卷、徐𤊹《红雨楼家藏书目》4卷、李鹗翀《得月楼书目》1卷、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6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32卷。据统计，明代有明确文献著录或记及之私家藏书目录、藏书题跋，共计有167种。其中又确知刻印本或抄本流传世者为49种。②

来新夏将明私藏目录概括为按四分法类目略有增减的目录和打破四分法顺序的目录两类。按四分法类目略有增减者来新夏列举了高儒《百川书志》20卷、徐𤊹《红雨楼书目》4卷、朱睦㮮《万卷堂书目》、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14卷等。打破四分顺序的目录则有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3卷、陈第《世善堂书目》2卷、赵用贤《赵定宇书目》和赵琦美《脉望馆书目》。③前一类书目恪守传统，而后一类目录的出现则实际上受到了明代官修目录的影响。《文渊阁书目》首列御制、开列39类、按千字文编号的做法，以及《内阁藏书目录》废除小类，分圣制、典制等18部的做法，为许多书目所仿效。尤其是那些仓促编成的书目或只意在备寻检之目，通常都只约略分为若干类。如陆深《江东藏书目录》分制书等14类、《宝文堂书目》分御制等33类、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分部18、《玩易楼书目》分部12、《赵定宇书目》分部29、《绛云楼书目》设73类、《脉望馆书目》按千字文编号排序、茅元仪《九学十部目》分部10、丁雄飞《古今书目》分部12等，皆不脱《文渊阁书目》之牢笼。一些按四部分类的书目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文渊阁书目》的影响，如《菉竹堂书目》6卷，首卷曰制，中经史子集各一卷，末卷后录；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姚氏《赖古堂书目》首列制书，次分经史子集；《澹生堂藏书目》于史部首列国朝，细分御制、敕纂等12小类等。

真正未受官修目及四部分类影响的书目是李开先所撰《李中麓书目》1卷。其所著《闲居集·藏书万卷楼记》云"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七略》，分而藏之"，显见所用分类乃七分体系。但该目未广流传，影响不大。

明代书目多为题录性书目，少有提要，或加注释。提要书目有高儒《百川书

---

① (日本)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

② 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③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4～251页。

志》20卷，另《红雨楼书目》虽为题录性书目，然徐氏另撰有题跋，写所得所读所见，后结集刊行。注释书目有《宝文堂书目》、《红雨楼书目》、《千顷堂书目》等。因而明代私目于作者之旨实无多所探讨。但明代私目在分类上的特色还是很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郑樵详明类例学说的影响，当然也与图书数量相关。明代承平日久，藏书家多家藏数万卷。图书一多，涉及领域自广。而有是一书，自当立是一类。所以像收藏宏富的绛云楼即分所收图书为73类，而明以前官私目录子目相合亦少有超过55目者。《百川书志》二级类目达93类，《澹生堂藏书目》则达243目。不过，这样做虽说类目较细，但在设置上却有很大的随意性。

至清，藏书家之多超迈前代。确有文献记载收藏万卷以上之藏书家多达543人。[①]此谨录日本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一段文字，以见一斑：

> 康雍乾嘉，流泽益衍，浙东西有静惕、潜采、云在、道古、小山、振绮、瓶花、开万、寿松、知不足、拜经、向山、蝶隐、汉唐、文瑞，吴会有朴学、红豆、桂宦、小玲珑、来雨、陶庐、滋兰、稽瑞、爱日，河北则有沽水、梧门、万卷、笥河、宝苏、南涧，卿云轮囷，芸签缥带，足以与绛云、延令、传是、士礼掩前后之藏相发明。而冯空居、卢抱经、钱潜揅、段经韵、孙平津、阮揅经、顾思适诸君，得因以校勘异同，裨补经术，然后天下知校勘之果足以继往开来，然后知藏书之与骨董果两途也。

这段文字不仅记载了清初中期私家藏书楼之兴盛，还表明了这一时期藏书家并不纯粹为了藏书而藏书。图书的重要作用是供使用，或者说只有在使用中图书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此际冯舒、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孙星衍、阮元、顾千里等人的校书研究活动表明，这时的藏书不再是收藏起来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供校勘研究用的资源。大约从明末开始，藏书家不再以数量相夸示，而是以质量相标榜。且鉴于绛云楼等书藏毁灭无存，众多绝版图书因此失传，藏书家因此多相互流通，校刻印行，以广流传。因注重质量，藏书家佞宋佞元，并为之另编目录。明之《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专设内府版书、宋版书、元版书等类实启后此之端。明末清初，钱曾于《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之外，另撰《读书敏求记》4卷，专记其所收藏宋元精椠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之评论。受本目影响，产生了众多的善本书目录和题跋记等撰述。尤其是黄丕烈和顾千里的校勘跋记，影响极大。黄丕烈一生校刻图书极多，且勤于题识，所编《百宋一廛书录》，仅收所藏宋版书题跋120篇；后潘祖荫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6卷，收题跋之书319种；李文椅补录1卷，收28种；缪荃孙辑为《荛圃藏书题识》10卷，补遗1卷，附《荛圃刻书题识》1卷，

---

① 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收622种，王大隆补辑为《荛圃藏书题识续录》4卷，再续录3卷，分收117和74种。顾千里一生为人校刻了大量图书，多作有题跋，散见于诸书。民国间王大隆辑成《思适斋书跋》4卷，补遗1卷，共收191种图书题跋；后蒋祖诒辑、邹百耐增辑有《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1卷，收104种。

另受《读书敏求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读书记等提要型目录盛行一时，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等。

第四节 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专科目录的产生

从可能性来看，专科目录的产生当早于综合性目录。早期学掌于官，“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①]。各官为了方便管理，将所职掌之文献编成目录，即可看作是专科目录。因缺乏文献记载，我们今天只能推测历史上可能编有这样的目录，至于实际编撰了与否，只能寄望于考古发掘。

据《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小序，汉朝初年张良、韩信曾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定著的35家应是文献定本汇编，因为事关军事谋略，所以吕后兄弟谋反时曾“盗取之”。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从“犹未能备”一语来看，《兵录》也当是文献汇编本。无论是汉初定著的35家兵书，还是汉武帝时的《兵录》，如果单独开列一份目录，即成为兵书专科目录。

虽然汉时兵书文献汇编是否编有目录难以确知，但晋时为诗文总集另撰目录的情形却是确实存在的。如《文章流别志》就是晋挚虞所编纂的《文章流别集》41卷之目录。也有不汇编文献而单独编目的。如荀勖所撰《文章叙录》，[②]便是当时作家们“新集之叙录”。其他文学专题目录还有东晋末顾恺之撰《晋文章纪》，刘宋时傅亮撰《续文章志》2卷，宋明帝刘彧在藩时撰《晋江左文章志》3卷，丘渊之撰《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3卷，齐梁间沈约撰《宋世文章志》2卷，等等。这些目录的出现无疑与当时文集兴盛相关。鉴于文集的大量出现，当时四部目录特辟丁类集部，《七志》《七录》也辟有文翰志与文集录。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4类，如果把此处之别集裁篇别出，即相当于上述之文章家集叙目录。

实际上，专科目录与七分或四部目录的关系正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两汉

---

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

② 《隋志》著录为《杂撰文章家集叙》10卷，《新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叙》5卷，《世说新语》注引或作《文章叙》，或作《新集叙》。

及两汉以后出现的很多专科目录都可看作是七分目录或四部目录中的某一或某几大类或小类裁篇别出的结果。北魏卢昶之《甲乙新录》、陈承香殿之《五经史记目录》2卷、唐李肇之《经史释题》、宋杨九龄之《经史书目》7卷、佚名之《经史目录》3卷等，为两部类之目录；刘宋裴松之之《史目》、唐杨松珍之《史目》3卷、宋人续补杨目之《历代史目》15卷、唐殷仲茂之《十三代史目》1卷、宋人杜镐补续殷目之《十九代史目》2卷、宋高似孙之《史略》等为史部目录；高似孙还撰有《经略》、《子略》、《集略》、《纬略》、《诗略》、《骚略》、《剡略》等目，各记1门；东汉郑玄之《三礼目录》收礼类图籍；齐时陆澄之《地理书》、梁任昉据陆书所增补之《地记》等，为地理目录之滥觞；梁祖暅之《术数书目录》，收术数图书。当然有些专题可能比七分及四部类目要细一些，显得更为专门。如刘宋虞龢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镇书定目》各6卷、《羊欣书目》1卷、《钟张书目》1卷、梁傅昭《法书目录》、殷钧受诏所编之西省法书品目、隋姚最之《法书录》、唐朱景玄《书品目录》、褚遂良《右军书目》、宋《宣和书谱》等为书法文献目录；齐高帝时诏命撰《名画集》348卷，当有目录，梁武帝太清初撰有《图画目录》，唐窦蒙之《齐梁画目录》，宋《宣和画谱》等，为图画目录；至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10卷，赵明诚撰《金石录》30卷，郑樵撰《集古时系录》10卷、《集古地系录》11卷，洪适撰《隶释》27卷、《隶续》21卷，陈思撰《宝刻丛编》20卷，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4卷，佚名撰《宝刻类编》8卷等，为金石目录。

二、佛经的翻译传播与《汉录》

佛道目录也可看作是专科目录或特种目录。由于一般目录皆不收道释图书，故长时间里道释目录单独发展，自成体系。

佛教约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土，至桓帝时，佛经也由外国僧人带来并与时人合作译成汉文。当时洛阳是佛教传播中心，佛徒们多到此宣道。如著名的安息国太子安世高，立志修道，放弃王位，周游列国，于建和二年(148)抵洛阳，并在此后20多年里翻译了45部经典。不久，大月支国的支娄迦谶也来到洛阳，致力于大乘经的翻译。月支后裔支谦备通六国语，后迁居吴国，30余年间译经36部。姚名达以为像安世高、支谦分别出经45部与36部，其“数亦非少寡，其必有一纸帐单以为备查之用，实系事所必趋”，只是“岁久录亡”而已。[①]参时人注重立言，谓不朽事业在于著述，且曹植有手作目录，则佛家高产译经僧有自译录不足为奇。

由于来华译经僧日多，佛经数量大为增长，至三国时已有汉僧利用这些译经设讲，如朱士行曾于魏时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不过这时佛经毕竟草草，故往

---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27页。

往有意义解说不通之处。为了寻求一种更完善的原本,他于甘露五年(260)到于阗求经,获《放光般若经》。他派弟子带回经文,自己却留在了那里。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所载,朱士行著有《汉录》1卷。不过,由于僧祐《出三藏记集》未录,故真伪难辨。而由当时情形来看,朱士行有著《汉录》的条件。首先,从译经僧安世高等来华(佛经传入可能更早一些)至此已100多年,译经迭出;第二,在佛教传入中土时,我国已出现了像《七略》等体例精严的目录;第三,朱士行本身设坛开讲,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①]而《汉录》详记译人译地译年月日,它出于朱士行是可信的。

三、《综理众经目录》与《出三藏记集》

《汉录》之后,竺法护有《众经目》,聂道真有《众经录目》,承个人著述目录之绪。至晋惠帝时支敏度撰有《经论都录》及《经论别录》各1卷,为通录古今之作。另外还有《古录》、《旧录》、《别录》等制作,至今皆佚。

现今已佚然据有关记载可知其大概的佛经目录是东晋时释道安所撰《综理众经目录》1卷。道安,本姓卫,人称印手菩萨。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道安12岁出家为僧,后赴邺都拜著名高僧佛图澄为师,深受赏识。晋宁康元年(373)为避战乱,率众弟子至襄阳,创立坛溪寺。宁康二年,道安60岁时撰成《综理众经目录》。据僧祐的整理,安录分为经论录第一、古异经录第二、失译经录第三、凉土失译经录第四、关中失译经录第五、疑经录第六、注经及杂志录第七等七个部分。梁启超以为"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②]姚名达则称这部目录"其注意点惟在'铨品译才,标列岁月'"。[③]"铨品译才"表明了道安对翻译和翻译者的重视,而以之施于目录,实使佛录成为有别于古典目录提要的一种新的评价方式。因此,安录奠定了佛经目录的基础,而道安"诚无愧为佛录开山之祖矣"。[④]

道安录一出,僧众均相当看重。但安录简略,"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因此,至梁天监年间释僧祐对之"悉更删整,标点卷部",[⑤]遂成《出三藏记集》15卷。两录前后相距约150年。僧祐,本

---

①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②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页。

③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3页。

④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5页。

⑤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生于建业(今江苏南京)。14岁出家南京定林寺,20岁受具足戒。鉴于南北朝时译经散乱、真伪莫辨等情形,僧祐效法道安于齐末撰成《出三藏记集》初稿,后不断增补,成今天所传之15卷本。僧祐不仅整理安录为前述7篇,又新增5篇: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新集抄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更重要之处还在于“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撰缘记1卷,介绍佛经和译经之原始;铨名录4卷,对历代所出经之名目不以经之内容分类,而以时代撰人为序;总经序7卷,汇总各经之前序及后记,共收120篇;述列传3卷,为译经者之传记,前二卷述外国22人,后一卷述中国10人。自序称“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

四、《大隋众经录目》等佛经目录

基本上,佛经目录由个人译述目录始,而后众经录由此衍生出按时代收录个人译经一系;又因为佛经在流传中土的过程中,形成了译、注、阙、疑伪等不同的情形,所以据此而形成的佛录形式分类法,影响也相当大。

到《众经别录》始出现按经律论三藏并结合佛经形式特点进行分类的做法。《众经别录》,作者不详,时代可能为刘宋道安之后,僧祐之前。见载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姚名达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该录应共有两个部分,《别录》只是其中之一,另一部分为《经论都录》,即《旧录》。两部分合而为一则成整体,分开则依时代为次者为《都录》,依大小乘经律论等体裁而分者,谓之《别录》。《别录》2卷10篇如下: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阙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这种分类与以往的分类很不一样,它以译经内容为主,且辅之以形式。

僧祐之后,宝唱《梁世众经目录》4卷也采用类似内容与形式的杂糅分类,并更为详细。尔后北朝李廓《众经录》、法上《齐世众经录目》、唐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均以这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大小乘经律论类目粗具。

真正将佛经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类的目录是《大隋众经录目》。该目共7卷,释法经等修撰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著录佛经2 257部,5 310卷。其《经录上表》云:“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引按:此字当为窜入,或其后遗一“录”字)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

姚名达将其分类体系图示如下(图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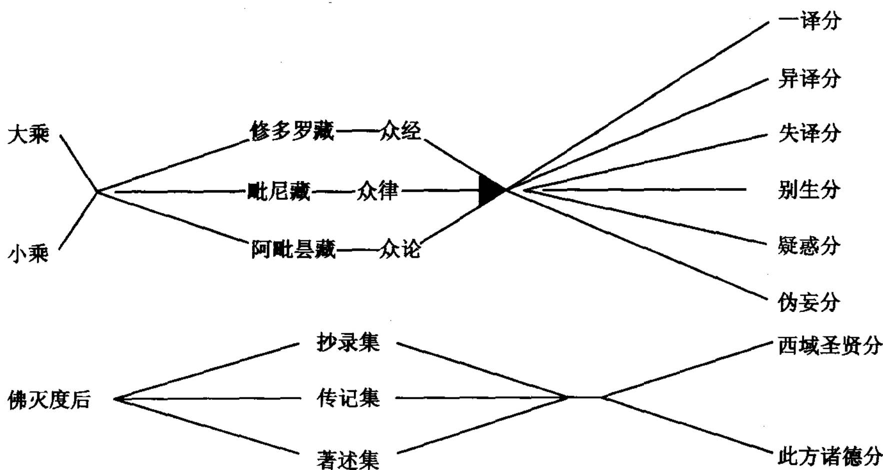


图 2-1　佛经分类体系

这一分类体系极为严密,"奠定了日后千余年佛典目录的分类基础"。[2]

隋代著名的佛典目录还有翻经学士费长房开皇十七年(597)撰成的《历代三宝记》15 卷,分帝年(即自周至隋佛教事迹与出经年表)、代录(各朝代译经记录)和入藏录三个部分。入藏录是隋现存佛经的分类目录,著录隋经、律、论三藏,不收杂著。经律论三藏又各分大小乘,再分有译、失译。

至唐,释道宣于唐高宗龙朔四年即麟德元年(664)正月于西明寺撰成《大唐内典录》10 卷。该目在分类上"总会群作,以类区分,合成一部,开为十例,依条显列,无相夺伦"。[3]其十例乃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全仿祐录及费录之代录,按代记人,汇其所译撰,依次顺列,最为详尽);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第二(概依本经,单复次列,述译人存亡时代,并分别大小乘经律论,及西梵贤圣集传);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第三(分大小二乘,显单重两译。录现存之书,凡 800 部,3 361卷);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第四(随部摄举,简取通道。举大部而摄小经,撮本根而舍枝叶。乃佛经之要目也);历代众经有目缺本录第五(目的在备搜访);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第七(谓别生诸经,曲顺时俗,未通广本,但接初心,一四句颂,不可轻削故也);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第八(目的在别真伪);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第九(述经录源流);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第十(记译经感应故事)。

---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258 页。

② 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59 页。

③ 《大唐内典录》卷一。

经律论三藏分类体系在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别录”之“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里区分得最为详细。智升是西京长安崇福寺高僧。他在开元十八年(730)撰成《开元释教录》20卷,著录176人所出佛经2 278部,7 046卷。该目“开为总别”,即首先区分为总录和别录。总录总括群经。别录则区分为七,即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阙录,疑惑再详录及伪邪乱本录。在有译有本录下先分菩萨三藏录(大乘)、声闻三藏录(小乘)与圣贤传记录三类。大小乘之下又各区分出经、律、论三藏。大乘为菩萨契经藏(经)、菩萨调伏藏(律)与菩萨对法藏(论);小乘为声闻契经藏、声闻调伏藏与声闻对法藏。各类之下再分细目,如菩萨契经藏下分大乘经单重合译与大乘经单译。大乘经单重合译下又分般若经新旧译、宝积经新旧译、大集经新旧译、华严经新旧译、涅槃经新旧译、五大部外诸重译经。类目细分最多达到六级,可见其精细。有译无本录分类与之大致相同。升录之“入藏录”部分也分为大乘入藏录:经、律、论;小乘入藏录:经、律、论;圣贤集。这一分类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藏经,“悉准此入藏录之成法”,故姚名达盛赞之为“至高无上”。①

不难发现,佛录形式分类法的影响相当大。道安录之后,僧祐录、道宣录均采用此法。即如智升录,也如前述分成7类,这7类总体来看仍是形式类,尽管其前两类下采用了内容分类。总的说来,在佛经目录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后制作的目录善于吸收前此目录分类的优点。一些优秀的佛经目录总是混一或综合前此诸目,从而形成综合性的优秀佛录。②

五、《三洞经书目录》等道藏目录

相对来说,道经目录则远不如佛经目录兴盛。姚名达甚至说道教及其目录学乃“事有无甚可记而又不得不记者”③。道教虽本道家,但其思想却融合了古代巫术、神仙及阴阳学说,而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而兴起的,一方面其产生受到了佛教的启示,另一方面它又在与佛教的对抗中发展。到南北朝时,道教图书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于是葛洪著《抱朴子·遐览篇》,“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该篇首述其师郑隐得见异书之经过,次则列举异书之名目及其卷数。该篇虽非目录,但首列道经,次列诸符,道经则经、图、记、录、法等混列,诸符则区分大小,而但列大符。因此,姚名达称之为道经目录之“大辂之椎轮也”④。

真正意义上的道经目录始创于刘宋时道士陆修静。据陈国符《道藏源流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75~283页。

② 王析著:《论佛典目录的走向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论丛》,1993试刊号。

③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97页。

④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98页。

考》,陆氏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奉诏整理道经,到泰始七年撰定《三洞经书目录》。该目据道经内容分诸书为洞真、洞玄、洞神三大部。共收传世道经1 910卷,未见道经 138 卷。

其后孟法师有《玉纬七部经书目》。七部乃三洞四辅之合称。四辅是太清部、太平部、太玄部和正一部,其中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正一总辅以上六部,故名。据《文苑英华》卷八二二,梁时孟安排著《道教义枢》10 卷,又区分各洞各为十二部,乃一本文,二神符,三玉诀,四灵图,五谱录,六戒律,七威仪,八方法,九众术,十记传,十一赞颂,十二章表。这种三洞四辅十二部的分类体系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初王钦若奉诏撰《宝文统录》时所采用,故该书又称《三洞四辅部经目录》。

与佛经目录有所不同的是,佛经目录通常注重个人翻译或通录古今,很少编藏经目录,一些佛录即使编有入藏录,也往往是总目录中的一个部分。而道经目录则多依藏书为基础。道藏修辑始于陆修静,隋炀帝时曾命道士撰《道经目录》4卷,至唐初有《玄都观一切经目录》之修撰,然多伪妄。玄宗开元时经搜访辑成经目《三洞琼纲》,收书5 700卷,[①]天宝七年(748)诏令传写流布。后经唐末五代之乱,经籍亡逸。宋初,太宗勤加搜访,得道经7 000余卷,命徐铉整理,去复重后得3 737卷,编成《道藏目录》。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尽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遂命王钦若总领整理,至大中祥符九年撰成篇目上献,赐名《宝文统录》,凡收书4 359卷,与徐铉目相比,增 620 余卷。宋真宗同时又在大中祥符五年以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以余杭道经为基础,续取苏州、越州、台州,以及续得福建等州之旧道藏经书,共得经书4 565卷,按三洞四辅分类,采用千字文编号,于天禧三年(1019)缮写七部,称《大宋天宫宝藏》,从而奠定了后来道藏的编纂体制。后至宋徽宗崇宁(1102—1106)中重加校补,增至5 387卷,称《崇宁重校道藏》。政和(1111—1118)中补充搜访,增至5 481卷,于福州闽县雕版印行,称《政和万寿道藏》,成为以后道藏修撰的蓝本。

明于道藏上有从成祖永乐中至英宗正统九年所整理出之《正统道藏》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诏撰之《万历续道藏》。《正统道藏》末收《道藏经目录》4 卷,附《续道藏经目录》。其他还有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4 卷等。

六、《录鬼簿》等戏曲专目

元明时期经史等专目不彰,而戏曲、医药等目多显。

戏曲是兴盛于元代的文学体裁。元至顺元年(1330)钟嗣成撰《录鬼簿》2卷,记录杂剧作家 110 人,后增至 152 人,分七类:1. 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

---

① 元《至元石刻》。一说 3 744 卷,一说 7 300 卷。

世者(录31人,多只列名、字或官、号,少数有简略小传);2.方今名公(录10人,略述名、字、官、号);3.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录56人,有小传,并录其传奇作品);4.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录19人,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并录其作品);5.已死才人不相知者(录11人,有小传,部分人有作品简记);6.方今才人相知者(录21人,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7.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录4人,有极简之概述),共涉及作品458种。因此,实际上只有第三、四、六类在作者之下著录了所著作品。尤其是第四类为每人作《凌波曲》,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提要。由于据作者分类,自然形成一种在作者之下汇录所作的著录方式,即以人类书。然此以人类书与郑樵所论有所不同。郑樵所主张在于以人类于书,而《录鬼簿》之做法则在于以作者类录著作。当然这种做法又与现代分类法之以人类书理论有所不同。现代的做法是特为某些人立类。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寓居杭州,主要生活于元初中期(1279—1360)。《录鬼簿》所记录的时代是中国戏曲事业最为繁盛的时代,故该书实际上成为元代戏曲散曲的初步总结,后世欲知元戏曲散曲者,无不从此问津。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又据之重为增补,成《录鬼簿续录》,记元明戏曲家71人及其作品78种。

明初宁献王朱权雅好戏曲,撰有《太和正音谱》2卷,所附《群英所编杂剧》首列"元五百三十五",次列"国朝三十三本",次列"古今无名杂剧一百一十本",又有"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共收杂剧689种。朱权是明太祖第十六子,雅好藏书。此目主要以元明杂剧作家为纲著录所编杂剧,但仅记剧名,无小传及提要。

收录南戏者有徐渭《南词叙录》1卷,所附剧目为关于南戏最早之专目。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浙江山阴人。该附目分上宋元旧篇和下本朝篇,上篇著录65种,只录剧名,不注作者,下篇著录48种,剧名下有简略说明,或注记作者。

《曲品》2卷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传奇作家评传和作品目录,乃受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及谢赫《画品》影响而作。作者吕天成,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浙江余姚人。该目上卷为作家专论,下卷为作品品评。共记戏曲作家90人,散曲作家25人,作品192种。

至明末又有祁彪佳撰《远山堂曲品》(今存残本)和《远山堂剧品》,分录传奇466种和杂剧242种。至清有黄文旸撰《曲海》20卷,收录自元至清戏曲1 013种。另编有简目。

七、《古今书刻》、《汲古阁诸刻题跋》与《汲古阁珍藏秘本目录》

《古今书刻》2卷,周弘祖撰。周弘祖,湖广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此目按地区记载各地刻书情况。上编记中央政府及各直省共16个地区、

176个部门所刊古籍2 306种，下编记各直省所存石刻。该目可视为出版目录，它所保存的版刻资料为考求版刻源流及图书存佚提供了方便。①

《汲古阁诸刻题跋》是一部刻书家刻书提要目录。编撰者为明代著名刻书家毛晋、毛扆父子。毛晋，初名风苞，字子晋，别号潜在，常熟人。毛扆，字斧季，毛晋第五子。毛晋一生注重收藏，前后聚书84 000卷，并镂版刊行重要图书达200余种。毛晋每刻书，皆善加校勘，亲撰题跋，考记作者情况、版本流传及图书内容。他将这些题跋汇编成册，遂有《诸刻题跋》及《续诸刻题跋》各1卷。但收录并不全。鉴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后人多踵事汇辑。如清郑德懋辑有《汲古阁校刻书目》1卷、《补遗》1卷、《刻板存亡考》1卷；近人陶湘辑有《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1卷；今人潘景郑收罗最全，所辑《汲古阁书跋》汇录毛晋题跋249篇，并附毛扆跋文21篇。

毛氏收藏极多且精。入清，因经济状况，毛扆打算将所藏善本出售，遂编《汲古阁珍藏秘本目录》。该目收宋元刻本、抄校本共400余种，按四部分类，各著书名、本数。该目不同于一般目录之处在于在各书之下标有售价。因此，它既是私家藏书善本目录，也是售书目录。

八、《两浙古今著作考》、《蜀中著作记》与《关右经籍考》等

祁彪佳之父祁承㸁万历四十六年(1618)辑有《两浙古今著作考》46卷，见著于《千顷堂书目》。明清鼎革后深藏密锁，历三百余年而始重见人间，1952年为黄裳访得。黄裳跋称："此书所著两浙著述至富，而尤详于绍兴一府。体例甚严，大抵明以前人著述略备，而尤加意于朱明一朝撰述，中多秘册，有未见于诸家簿录者，往往存其原序。"②

反映一地著作的目录还有曹学佺《蜀中著作记》10卷，乃所撰《蜀中广记·著作记》之单行本。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今福建闽侯)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此目分经、史、子、内典、地理志、集等六类，仿《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著录蜀中人士及宦游于蜀者之著述。

至清同类书目有邢澍撰《关右经籍考》11卷、吴骞《海宁经籍志备考》1卷等。

九、《医藏书目》与《阅藏知津》

殷仲春为明季良医，藏书万卷，曾访书江西宁国，得读抄朱纯宇等所藏医书，归后将所见所藏编成《医藏书目》，按佛教名目，分无上函、正法函等20函，著录医书590余种。所以以佛教名目命名，是因为医乃度救众生之生命，佛乃度众生

---

①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页。

② 黄裳著：《来燕榭书跋(上)》，《读书》，1998年第4期。

之心灵，故自序称“取诸如来法藏，权立其名，以济度群生也”。

明末清初有高僧智旭历20年广搜博阅而撰《阅藏知津》44卷，分经、律、论、杂四藏。序称：“终不敢剖判虚空，但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姚名达以为该目有五大优点：一为别立杂藏，使杂者得有所归，杂藏之设始于北齐释法上《齐世众经目录》，而此后各录皆不设此类；二为变更部次，以华严为首；三为分出密部，使显、密不致混淆；四为合单本重本于一处，使一经不分散数处；五为以符号判别书之优劣缓急，使读者得依照选读。[①]

十、《经义考》、《小学考》与《读易别录》

《经义考》达297卷，古今罕见。编者朱彝尊以一人之力历时5年编成。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喜聚书，著述宏富。《经义考》作于朱彝尊晚年。该目仿僧祐《综理众经目录》总经序、明朱睦㮮《经序录》汇录经序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博采众家之体例，分30门，首列书名，次叙撰人及注疏者姓名与卷数，附注存佚缺未见，下列原书序跋、相关介绍论说及论说者传记文字，按时代先后排列，并以按语方式附以己见。限于闻见，该书疏漏错误在所难免。乾隆中，沈廷芳撰《续经义考》，后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再后钱东垣撰《补经义考》，或续或补，共同构成经学研究之重要参考工具。而影响所及，有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周中孚《子书考》等，日本亦有丹波元胤等撰《中国医籍考》80卷。

《小学考》的编撰起因于朱氏《经义考》于小学一门仅录《尔雅》2卷。编者谢启昆，协编者陈鳣与胡虔。谢启昆，字蕴山，号苏潭，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小学考》50卷，体例悉仿《经义考》。分类上首列敕撰，次训诂、文字、声韵、音义。搜罗广博，评论允当。

全祖望对《经义考》中易类图书“不审旧史之例”很是不满，以为谢启昆将传义章句之书概予收取而列之于易类，实无当于经，因为这些书多属图纬之末流，于是撰《读易别录》，列图纬于编首，余分13类，间亦有《经义考》所失载者，开辑录一书相关著述为目录之先河，成为《雅学考》、《许学考》、《老子考》、《红楼梦书录》等书目编撰的前驱。[②]

十一、《勿庵历算书记》、《方舆书目》与《古今方舆书目》

清代还为一些新兴起或兴盛的学科门类编有专目，如天文学、数学，有清初梅文鼎撰《勿庵历算书记》1卷。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宣州）

---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93页。

②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人。《四库全书总目》称该目“乃合其已刊未刊之书,各疏其论撰之意。凡推步测验之书六十二种,算术之书二十六种”,其中前者已刊17种,后者已刊16种。该目“虽亦目录解题之类,而诸家之源流得失,一一标其指要,使本末厘然,实数家之总汇也。”[1]因所著录图书全是梅文鼎自编、自刻,故该目实际上也可看作是梅文鼎个人著述书目。

地理书,见著于《四库总目》者581部,为数不少。清康熙时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撰《方舆书目》,分若干部,博采广征,上自禹贡,下至明季,记载无遗。今人潘景郑对该目有独到评论。乾隆时顾栋高始撰《古今方舆书目》,载古今考释方舆颇详细,收集方志资料也较全面。

十二、其他

明代出现了像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书目》、焦竑《老子翼·采摭书目》1卷、《庄子翼·采摭书目》1卷等引用书目。至清有朱彝尊《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1卷、汪师韩撰《文选李注引群书目录》等。

另外,于古书辨伪则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1卷。于丛书有顾修《汇刻书目初编》10册,该书初乃以丛书名为纲,随手摘录各丛书子目,排列无定序,收书亦仅261种。后不断有人据之重编、增补,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特各种目录篇》所述,至1930年刘声木编《三续补汇刻书目》15卷,共有各类增、续、补《汇刻书目》13种。

第五节 导读目录的产生与发展[2]

一、导读的起源

导读作为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在中国产生很早。最初它基本上是一种教育制度的产物。古代学统于官,只有国子和部分庶民才能接受教育,吏师对他们的指导无疑就是导读产生之初始。孔子时代,学术走向民间,孔夫子即注重因材施教并同时指导其弟子们的读书活动。关于这,《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如: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

①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一》。

② 参见:王心裁著:《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导读目录》,《图书情报知识》,1998年第4期。

学礼。闻斯二者。”①

又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

又如：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③

又如：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④

向弟子们推荐读物，并告之怎样理解读物，孔夫子之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导读的教育属性。导读源于教育，不过，很快就为目录所利用，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即图书与蕴涵于其中的知识或学术。刘向为图书作叙录，就向皇帝推荐何书可观，何书可常置左右。目录一产生就具有导读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在古代，导读并不是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因为古代文献聚散频仍，编目者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文献整理上，导读的任务主要交给了教育。孔子之前，官方指定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虽说因材施教，但也有内容规定，《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秦汉之际学术与政治进一步结合，至汉无论官教、私教，都紧密围绕立于学之经。儒家经典在汉代有五，到了宋代则确立为十三。基本上，教育先有一个读书范围的指定，然后由教师告知书义及如何理解其义。

读书范围的指定能使受教育者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尤其是科举时代，这种范围的指定显得更为重要。科举开始于隋代，直到1905年才被废止，在长达1 30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唐代取士，多因隋之旧。《新唐书·选举志》对面临考试的诸生的年龄和读物作了极为明确的规定：“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左氏春秋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

① 《论语·季氏》。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八佾》。
④ 《论语·为政》。

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算经》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在宋代,《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七部兵书即所谓《武经七书》是武举考生的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策试的重要内容。

教育之导读总的来说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指定具体读物;其二,指定阅读次序;其三,说明读法;其四,指明读者对象。

无论是儒家的十三经,还是兵家的七经,都意味着一种读书范围的指定。这与目录毕竟还有所差别。从敦煌发现的伯2 171号卷子上移录下来的被称为"唐末士子读书目"的,则被认为是一份推荐书目。该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史记》等23种图书,第二和第三部分则分别解释了什么叫做"九经"和"三史"。第一部分不仅标列书名,还著录著者及注者等,如《千字文》即乃"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该目开列了像《文场秀》、《兔园策》等书,则其读书对象显为欲求取功名的考生。而从该目的一些错误来看(如王弼所注乃《周易》而非《周礼》,《切韵》的作者乃陆法言而非六法言,《急就章》为史游撰而非中献撰,另,以《毛诗》、《孝经》、《论语》为孔子作也显然欠妥等),则其编者必非名儒耆宿,而似是村塾先生。这份书单可以称之为推荐目录,但却不能称为导读目录,因为它只是指明了应读何书,而没有解答书以何本为善及如何读等问题。

目录出现后,导读逐渐与之结合。目录之能用于导读在于以下几点:首先,目录收录一定范围的图书;其次,目录用叙录等方法揭示图书内容、版本情况及学术源流,可以"览录而知旨"。基于这两点,任何目录便都具有一定的导读作用。后来一些目录编者通过在目录中指定善本和读书先后等方式使得导读全面为目录所利用,而使导读目录成为教育学者和目录学者共同关心的对象。

二、导读与禁读

在图书出现后,一旦冲突发生,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就会主动禁读。

禁读是导读的对立面。它是文化冲突的典型体现,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另外,民族问题等也容易导致禁读。较早的文献销禁活动见于《孟子》一书。《孟子·万章下》记载北宫锜问爵禄之制,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里所"去"之"籍",大概属于档案文献,所以"去"而未禁。到秦孝公时,商鞅以为:"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

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1]由于有这种认识,所以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2]随后,秦始皇开始大规模焚书坑儒,其“挟书律”至汉惠帝时才被废止。此后,禁读如剥茧抽丝,绵延不绝。如北魏禁谶纬,陈禁佛道,隋禁谶纬,唐玄宗禁阴阳术数,唐武宗废佛,元忽必烈屡禁天文、图谶、阴阳伪书,伯颜请禁戏文、杂剧、评话,明太祖禁演杂剧,明成祖禁词曲,明英宗禁《剪灯新话》等小说,崇祯禁《水浒传》,清禁民族问题书籍、淫词小说,国民党禁进步书刊等,举不胜举。西晋司马炎泰始四年颁行的《泰始律》并明确规定对那些私自收藏天文、图谶之书的,判以徒刑。此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清律例》等都有禁书或禁书范围的规定。

禁读主要是官方的行为,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导读除了有官方的介入外,还颇多个人的活动。

三、《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

最早的导读目录要算《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以下或省称《转读录》),乃唐释道宣所编《大唐内典录》中的一篇。在梁启超看来,它是“道宣《录》中最有价值之创作”,因为“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而道宣此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名之十部,皆该摄省略焉;《涅槃经》则举昙无谶译之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则举罗什译之三十卷本;《大集经》则举昙无谶译前三十卷本及耶舍译后三十卷本……,诸如此类”。由于指定善本,所以梁启超说它“裨益于读者实不少”。[3]

佛教从汉末传入中土,首先是在洛阳、江淮流域等地流传,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和南方。老庄与佛教般若思想,一空一无,有共通之处,清谈家们常引之以助玄谈。佛教流布日广且日益深入人心。佛经也陆续翻译了不少。随着译经数量的增多而开始了佛录的编制。至唐以前,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共有佛录46部。它们或专记个人所译,或专录译经,或专录藏经,或通录古今,基本上只是佛经在中土流传的反映。

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僧侣不劳而获,逃避租赋,建塔耗资,且背离父母,抛妻弃子,不敬王者,这些问题引起了儒家的高度重视。而在北朝,“因为佛教教团的社会势力日益强大”,“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进行废佛,

---

① 《商君书·去强》。

② 《韩非子·和氏》。

③ 梁启超著:《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24页。

通过国家权力镇压了佛教教团”。[①]在思想领域，关于神灭不灭、报应论等一直是论争的主战场，生活于南朝齐梁间的范缜即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

基本上，在唐以前，佛教总的来说是在争生存，至禅宗、三论宗、天台宗等出现后，佛教逐渐形成了其中国特色，至唐而“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②]到这个时候，佛经导读目录的出现才真正显示出其指导阅读的意义。早期佛经的翻译和义解僧对佛经的讲解是一种教育意义上的导读，是让人们知晓、信仰以争生存之举。道宣在翻译诸经的基础上选择善本，使导读与目录结合了起来，导读目录也就成为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晶。

四、《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随着佛教与中国人关系的越来越深，作为中国精神生活主体的儒家之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唐宪宗时韩愈就因谏阻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在韩愈看来，佛教是夷狄之教，是与儒家之道相对的，所以他“原道”。至宋代，像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对佛教展开了研究，他们在批判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从而形成了援佛入儒的宋代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影响极大，元代的程端礼即主张用朱熹的思想教育青少年。他撰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省称《日程》)，主张青少年读书应分启蒙、小学、成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读书范围和次序如下：

八岁以前(未入学前)读《性理字训》；

八岁(入学)至十五岁按顺序读下列各书：小学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中庸》正文，《孝经》刊误，《易》正文、《书》正文、《诗》正文、《仪礼》并《礼记》正文、《周礼》正文、《春秋》三传正文；

15岁至此20岁按顺序读下列各书：《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抄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抄读)、本经、《周易》(抄读)、《尚书》(抄读)、《诗》(抄读)、《礼记》(抄读)、《春秋》(抄读)。

除此之外，《日程》还相当注重读书方法的指导，其纲领即是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及其读书法等。不同的是，朱子的读书法只有“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六条，而程端礼以之为纲，修定了具体的“节目”。比如《诗》之抄读法，乃“先抄《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抄《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抄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抄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抄朱子

① 镰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② 镰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抄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辨》，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抄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抄。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抄每篇之末。……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其所附抄，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①]读什么、抄什么，抄读先后，说得具体明确，真可谓不厌其烦。

与道宣的《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相比，程端礼的《日程》由于更进一步强调读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导读目录，当然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则它也是儒学的，及一般书院所用的课程系统。在元代，《日程》便被国子监"颁示群邑校官，为学者式"。[②]

五、《读书次第》

此后，直至清代，人们才充分认识到目录学之读书治学门径的作用。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学术状况紧密相关。清初，由于学者对王阳明心学的反动以及文字狱等实际原因，考据之学勃兴。考据之学不仅在对经学义理依据的考证上硕果累累，并由此而全面总结了前代学术。这一时期，由于全面整理的需要，文献需求是相当突出的。《四库全书总目》编写时，四库馆臣于每日午后，"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③]文献的考据整理也使学者们深感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目录学作为读书治学门径也只有在这种文化全面总结时期才会被突出地察觉。

但是，人们把目录学作为读书治学门径主要是出于目录有对文献的网罗控制和对学术源流的阐述考辨等作用。人们主要是从收藏和学术总结的角度编制目录，而很少考虑实际阅读的需要。清初考虑实际阅读的需要而编制的导读目录是由李颙口授、其门人李士瑸手录的《读书次第》。在李颙看来，读书应讲究次第，即当先读《小学》，因为《小学》一书乃朱熹"汇古今嘉言善行，以为后生作圣之基也"；尔后读经、读史、读文；有余力的话，子书、地理书等也当一读。[④]《读书次第》是李颙针对李士瑸的儿子而口授的，也就是说其读者对象是童蒙后生。李士瑸认为，该目"由《小学》渐入大学，自经传徐及文史，步步有正鹄，书书有论断"，

① 程端礼著，姜汉椿校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第 43 页。按：该版误程端礼作程瑞礼。

② 《元史·儒学传二》。

③ 王钟翰著：《清史杂考》，转引自冯天瑜著：《东方的黎明》，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141 页。

④ 李颙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八，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实为“自童蒙以至大人”的“入圣之正门,为学之上路”。[①]像这样的目录在历史上应该还有很多,因为教师总是时刻在对学生加以指导,只是很少有像李士瑸这样的有心人,所以它们一般很少能够流传下来,或者即使流传了下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读书次第》能够流传下来且有相当的影响是因为李颙乃清初理学名士,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其著作不多,而该目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思想,所以随《二曲集》保存至今天。

六、《经籍举要》与《书目答问》

目录的导读作用是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期被突出地放大的。

1847年,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选取诸生急需精读的书籍,略述其内容的得失,指示读法,比较简陋。经史子集以外,复分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古诗文词、场屋应试六项”。[②]可以看出,它不同于一般目录的地方在于它有选择地收录图书,并指示读法;而且其所分之约束身心等六项是一种教育类目,与一般的目录分类也有明显的区别。

1875年,张之洞编撰了《书目答问》。他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时,就编了《书目答问》作答。它分经史子集丛五类(另有两个附录),“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抄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各类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皆前辈通人考求论定者)。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③]

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是在四川学政任内,同时编写的还有《輶轩语》一书,它告诫诸生立身行世之道,讨论治学方法和科举时文及有关程式,因此两书互为表里。清代的学政是主管各地教育的官,因而像龙启瑞的《经籍举要》一样,《书目答问》和《輶轩语》都表明了其儒学教育正统观念,他们都利用目录来达成这一目的。这也体现了导读目录是教育与目录的结合。

到龙启瑞编《经籍举要》时,《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皆已签订;到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时,洋人用枪炮敲开中国大门已30多年。

---

① 李士瑸著:《读书次第·识言》,见:李颙著:《二曲集》卷八。

② 吕绍虞著:《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195页。

③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对于西方文明，一直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同文馆的开办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这种对立更形激烈。有顽固的一派，如倭仁、徐桐等人，极诋西方文明，提倡义理之学，企图用封建名教纲常去挽大厦之将倾。洋务派则致力实业，以为西人可用者器，得其器而用之即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本土文明为体，则是变不得的。由此而直接导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这派人物有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张之洞则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将。

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时，洋务运动正蓬勃开展，太平天国起义已被镇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变成师夷之长技以制民）。他深切感到人才的重要。基本上，张之洞为官一生有两大政绩，其一是在湖北办洋务，其二是在各地主要是在湖北举办教育。张之洞每到一地做官均在当地开办书院或学堂，如1869年武昌经心书院，1874年成都尊经书院，1882年太原令德堂书院，1887年广州广雅书院，这些"皆课通经学古之学"[①]；1886年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两湖书院，1891年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3年湖北自强学堂，1896年南京储才学堂、江南陆军学堂，1897年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则属新式或中西合璧式学堂。在培养人才问题上，张之洞认为科举不足法，因为从事举业者于"帖括之外无所知"，所以他力图改变学风，主张生童应多读经邦济世之书。他在湖北所办自强学堂更试图将学生培养成"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且"不尚空谈，务求实用"的新型人才。不过，在1875年前张之洞思想还没有如他后期那般成熟，但我们仍可发现他的人才观是以重实用为主。所以《书目答问》中无用、空疏之书皆不收，并认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他力图变通教育，培养有用人才，重振中学雄风，直至后期撰《劝学篇》而系统形成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

七、近现代导读书目

此后，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改良主义者鼓吹改官制、办学校、立议会、订宪法、筑路开矿、发展工农商业。梁启超更感到西方文献的重要，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②]，并认为"译书实本原之本原"[③]。在这样一种想法下，他在1896年10月编撰出版了《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表》有正表3卷，著录鸦片战争后所译西书352种；附表1卷，著录通商以

① 《抱冰堂弟子记》，第4页。转引自：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② 梁启超著：《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3页。

③ 梁启超著：《变法通议·论译书》，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6页。

前西人译著各书86种，近译未印各书88种，中国人所著书119种；并附有《读西学书法》1卷。梁启超对正表著录的352种图书中的252种加有圈识。[①]这些加有圈识的书，或者是他看过的，或者比较重要，故以圈识突出其重要性。总的说来，正表著录的书，可以一读的约略有300种。梁启超以为："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②]

康有为则认为中国通西文的人少，通日文的人多，而"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那么，借用日本人的成果，就好像"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③]所以他在1897年编撰了《日本书目志》。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又实地而广泛地接触到了东洋文献。据研究，1902—1911年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④]1902年，他在日本出版了《新民丛报》，介绍日本图书的《东籍月旦》就刊载于其上。《东籍月旦》致力于告知读东书者"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⑤]

梁启超一生十分注重利用目录来宣传其政治思想，开启民智。戊戌前后，他广泛评介东西图书；1920年欧游归来后，对国学的信心大增，在推介国学上，他同样利用目录，先是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编撰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同时还在清华讲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基本上，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导读目录最辉煌的时期，各种思想、思潮或运动都充分利用目录来做宣传武器。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不仅办了《读书杂志》(1921)和《国学季刊》(1923)，还编制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一时之间，仿效者如云。

进步思想也利用目录。1920年8月，毛泽东创办于湖南的文化书社经销宣传马克思主义书刊，印有许多书目，寄给读者，影响很大。同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理论刊物《共产党》第一号刊载了《列宁著作一览表》。1924年，冰冰编撰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刊载于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24期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经典导读目录。如此等等。

各方面导读目录之导读功能的发挥在于以下几点：1. 指定范围；2. 指定善本；3. 指示读法，或单独编读书法，或于提要中指示图书之间的联系，指示读书

---

① 《西学书目表》先由《时务报》馆出版，质学会旋于光绪丙申冬十月(1896年11月)据之重校出版。此处统计数据即据此。另，参见：王心裁著：《梁启超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5页。

②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③ 康有为著：《日本书目志自序》，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页。

④ 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⑤ 梁启超著：《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3页。

缓急先后;4.编撰图书提要或简要说明。

从道宣之《转读录》到清末文化冲突期之各种导读目录的出现,可以看出导读目录明显不同于教育之导读与一般之目录。教育之导读主要是在教学中实现的,一般之目录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导读,而首先在于对文献的整理,至于其实际可用于读书治学则是目录功能多样化的体现。姚名达说,"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非复古义矣",[①]即明确指出现代目录之解题主要是用于指导阅读,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对图书著者、内容等作学术考辨。

第六节　近现代书目工作

一、西学书目

西学图书剧增,使书目分类体系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西学早在明末即随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从明万历至清乾隆近200年间,传教士及其与中国学者著译之书,"大纲可分为宗教及科学两类",具体来讲,"宗教书中有论道理及讲修成之书,有辩护、释难、解惑之书,有圣人行实及圣教经文等书。科学书中,有天算、地舆、水学、哲理、小学、形下学等等",[②]种类"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③]从《四库全书总目》为西书编写的提要来看,《总目》编者至少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如熊三拔《表度说》提要称:"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闻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不过西洋教士在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等方面的著述被轻松地套入了子部天文算法类,其著作内容也往往被硬性地与中国古代著作类比,如以《乾坤体义》与《周髀算经》相比,结果得出了西法皆出于《周髀》的结论,显示出一种我即文化之邦,一切皆出于我的思想。[④]

乾隆时禁教,关闭国门。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封闭的大门为列强用枪炮轰开,清政府一直被动挨打,种种失败与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西方工业文明,并开始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这一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为西方取胜全仗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展洋务运动。尤其是在咸同之际,清政府中央机构开始关注西方文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同治元年(1862)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同治皇帝依议钦准。

---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02页。

②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

③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第9页。

④ 王析著:《类书立类思想与类书衰亡原因初探》,《图书情报知识》,1992年第3期。

次年又在上海开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同文馆成立。同治七年(1868)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正式开馆，专译有裨制造之书，翻译者有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及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以兵制、兵学图书为多，达33种。且自同治十年(1871)正式印行译书后每年都有数种或十数种译书问世。据徐惟则《东西学书录》，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翻译馆共译出西书126种。傅兰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离馆，那时他已与有关人士合译西书达77种。[①]

第二阶段，由于甲午之战北洋水师败绩，洋务运动随之破产。有识之士如康有为认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以为"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②]。梁启超的名言是，"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③]。基本上，从林则徐、魏源，经郑观应等到康梁，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要变法就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译书。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已有译刊机构近20处。但这些译作总体来说科技书多，其中又以兵书为多，社会科学的书籍翻译则太少，内容亦零乱不成系统。梁启超说："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医学类为多，……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④]总之，戊戌变法前后，对西方图书的重视、翻译和宣传是一个普遍现象。

第三阶段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在此以前有少数留学生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如朱执信，但影响不大；在此以后，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⑤]。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⑥]，最终由毛泽东等人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尤其第二阶段，是人们最为关注西书也是西书增长最快的时期，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维新人士编有许多西书目录，如：

1896年，梁启超《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

1897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

　　　　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

---

① 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② 康有为著：《日本书目志自序》，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页。

③ 梁启超著：《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3页。

④ 梁启超著：《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3页。

⑤ 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⑥ 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1898 年,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

丁福保《算学书目提要》;

1899 年,《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

徐惟则《东西学书录》;

1901 年,傅兰雅、王树善《农务要书简明目录》;

1902 年,梁启超《东籍月旦》;

顾燮光《东西学书录》增订本;

1903 年,沈兆炜《新学书目提要》;

1904 年,顾燮光《译书经眼录》。

除了这些专收西书的目录外,还有一些中西合璧之作,如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黄庆澄《普通学书目录》,杨复等《浙江藏书楼书目》等。

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撰《西学书目表》4 卷、札记 1 卷,书前附《读西学书法》1 卷,共收有关西学图书达 644 种,其正表部分,著录鸦片战争以后所译西书 352 种,附录通商以前西人译著 85 种,近译未印西书 88 种,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的书籍 119 种。仅从西学图书数量来看,不难发现鸦片战争前后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西学图书尽管早在明末就有翻译,但那时毕竟数量少,《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轻松地套入经史子集之中。而随着西译图书的增多,随着人们对声光化电等西方科学技术的逐步了解,人们越来越感到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不适用。一些人开始尝试采用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梁启超即把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教、杂四类,并在《西学书目表》中实际采用了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是对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一次强有力冲击。

二、公共图书馆藏书目录

清末,特别是 20 世纪初,由于风气渐开,兴教育、办图书馆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且越往后越演变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在这个潮流之先,是戊戌变法时期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该学堂并入官书局与译书局之后,开始购置中外书籍,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公元 1902 年 1 月),“续兴大学,乃设藏书楼,调取江、浙、鄂、赣、湘等省官书局各种书籍,并购入中西新旧书籍藏之”[①]。这是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图书馆之始。而至这年年底,杭州藏书楼成立,次年改为省立浙江藏书楼。

光绪二十六年(1900),绍兴徐树兰议办古越藏书楼,二十九年(1903)告成,

①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略》,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52 页。

“凡庋古今及域外之书，总七万余千卷，图器悉具”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安徽何熙年等约集同志开办皖省藏书楼。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议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等均应设图书室或藏书楼。三十年(1904)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②。

1904年3月，我国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建，这是我国最早以图书馆而不是藏书楼命名的图书馆之一。1905年10月，从日本采购图书归来，同时新馆竣工，对外开放。

1904年8月湖北省图书馆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巡抚端方设立。

此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成立，形成声势颇大之图书馆运动。计有1904年福建图书馆，1906年黑龙江图书馆，1907年江南图书馆、天津直隶省图书馆，1908年奉天省城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河南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云南图书博物馆、陕西图书馆，1909年京师图书馆，1910年甘肃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1911年广西图书馆等。③

开近代图书馆编目之先的有1904年徐树兰编《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卷首1卷。该目前十卷为学部，有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四书学、孝经学、尔雅学、群经总义学、性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天文算学、黄老哲学、释迦哲学、墨翟哲学、中外各派哲学、名学、法学、纵横学、考据学、小学、文学上(别集)、文学下(总集)等24类；后十卷为政部，有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语录、金石、掌故、典礼、乐律、舆地、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美术、稗史等24类，共48类，类下子目则达332个之多。古越藏书楼的宗旨在于存古与开新，平等对待古今中外书籍。其目于中外学术也基本做到了平等立类。且作为兼收中西图书的目录，首次采用学政2部48类332子目的分类体系，一方面反映了晚清学术中外并行的概貌，另一方面对传统分类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影响很大。

其他公共图书馆一般编有书目，不过建馆之初，编目从简。由于各馆一般以收藏中国古典图书为多，所以多仍经史子集之旧。而随着图书馆各项业务活动的逐步展开，编目部成为图书馆的一个常设部门，编制卡片目录、书本式目录等各种形式及分类目录、书名目录、作者目录等各种类型的目录，目录编制遂无可挽回地朝向取便检稽的路向发展。

---

① 张謇著:《古越藏书楼记》，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页。

② 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页。

③ 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页。

三、20世纪书目工作[①]

20世纪中国书目工作实践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

(一) 书目方法和各类型书目大发展

西方目录学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目录学的目的不同。中国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思想的精髓则在于方便地获取图书。由于目的不同,中西目录学所采用的方法也就各异。为达到辨考学术源流的目的,中国目录学重分类,重小序,重提要;而为了方便地获取图书,西方目录学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导致了书目方法的大发展。

各类型书目的发展是西方目录学思想与方法引进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目录以分类目录为主,多以书名为标目,这是由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自孔子以来即主张"述而不作",且刘向等人整理文献时,书名通常容易确定,而作者则往往难以考订,选择书名为标目在所难免。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强调人的价值和独创精神,且书名一般较长,书名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通常在前,故不以书名而以作者或责任者为标目。[②]这样就在分类目录之外有了作者目录。在西方,从著译者或责任者入手查找文献是一个极其方便的获取文献的途径。

为了方便地获取关于某一主题的文献,西方在分类目录、作者目录等之外创立了主题目录。分类目录从类入手查找文献,而一个问题或主题属于哪一类有时不易确定,但表示问题或主题的词语在排序法中的位置却是确定的,按照一定的排序法形成的主题目录,其方便查寻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字顺排序所形成的目录实际上就是文献索引。索引种类繁多,从反映被检索对象的事项和内容来看,可分为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20年代以来,这两种类型的索引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29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成立了索引检字组,1930年在洪业组织领导下,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索引编纂的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索引编纂以及索引研究一时蔚成风气,形成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索引运动。[③]

为了方便获取不同地方的文献,西方发展了联合目录。联合目录在我国虽然早在明代就有了萌芽,但中国古代官私藏书秘不示人的现实无疑极其严重地

---

① 参见:彭斐章、王心裁著:《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历程、成就与局限》,《高校图书馆工作》,1999年第2期。

② 陈曙著:《主要款目比较之研究——兼论东西方不同文化之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1期。

③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8页。

阻碍了它的发展。联合目录在我国的真正出现应该说是受到了西方目录学的影响。联合目录这一形式在20年代传入我国后,很快就在北平图书馆协会的主持下得到了开展。而后,在50年代和80年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为了方便地查找全国所出版的全部文献,西方发展了国家书目。国家书目在我国产生极早,我国古代的官修书目,多可视作国家书目。而且宋代目录学家郑樵还提出了通录古今所有文献的著录原则。但中国的国家书目多是回溯性国家书目,而现行国家书目则创立于西方。美国的《累积图书索引》(*The Cumulative Book Index*)月刊创刊于1898年,有季度、全年和五年累积本。俄罗斯的《图书年鉴》创刊于1907年,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在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还制定了相当严格的缴送本制度,为国家书目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在1955年也确立了出版物缴送本制度。

西方编制联合目录及国家书目,往往是由某一图书馆负责,一馆集中编制并向各馆发行目录卡片,就形成了集中编目。美国在1850年就提出了由书目中心编制目录的思想,①英国的集中编目工作开始于1872年。现在,英、美已然合作编制并发售记录英、美图书的MARC磁带,而德、法、意等国也编制和发售类似的MARC磁带,将集中编目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我国的集中编目中心是北图的统一编目部,上海图书馆也从1976年开始集中编目,向上海地区发行铅印卡片。

集中编目卡片对图书馆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旧有的目录卡片要做局部的或全新的修改,一是图书和目录卡片一般不能同时到馆。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美国曾在1958—1960年间一度试行"原始编目"(CIS),即在图书出版前先行编目,但由于经费的原因而告吹,后又试行"在版编目"(CIP),其办法是出版商将新书校样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由该馆进行编目,编目成果寄还出版商后印于图书的版权页上。②

图书在版编目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从60年代起即开始译介这一做法。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对其出版的部分图书进行在版编目试验,1987年6月,成立了图书在版编目工作领导小组,各种形式的图书在版编目试验工作由北京地区逐步扩大至其他各省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书目工作标准化的推行

书目工作标准化在西方最初是从书目著录开始的。1908年,英美两国的图书馆协会为了解决两国图书著录方法的一致性问题,共同研制出了《著者和书名款目适用的英美编目条例》。而在欧洲大陆,同年由普鲁士图书馆正式颁布了

① 彭鹏著:《国外联合目录的回顾与展望》,《北图通讯》,1978年第1期。

② 阎立中著:《关于目录工作现代化的几处问题》,《图书馆工作》,1978年第3期。

《普鲁士规则》。由此形成了图书著录之“英美”与“普鲁士”两大体系。1947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立,其第 46 技术委员会(ISO/TC46)在书目工作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该组织与国际图联(IFLA)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 1974 年正式出版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为各国图书馆目录和各种书目提供统一的文献著录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ISO/TC46 还陆续通过了 ISO 214—1976《文献工作——出版物的文摘和文献工作》、ISO 690—1975《文献工作—题录—主要的和补充的著录项目》等有关书目工作的国际标准。

ISO/TC46 制定的标准正在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我国在 1979 年 12 月成立了与该组织相对应的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至今已颁布了 GB2901—82《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3—85《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GB3792.7—87《古籍著录规则》、GB12451—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等多项国家标准。

在图书分类上,1973 年我国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至今已修订出版了第 4 版。1981 年 10 月 7 日,国家标准局在所转发的《全国分类法、主题法检索体系标准化会议纪要》中,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作为全国图书分类标准进行试用,同时还将《汉语主题词表》(1975 年初版)作为主题法的基础在全国组织试用,以便进一步完善,从而推荐为国家标准。

书目工作标准化是整个图书情报工作标准化的基础,是实现文献工作自动化的前提,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在书目工作标准化方面的成就是极其显著的。

第七节　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①]

一、古代目录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郑樵以前对目录学的探讨不系统,散见于各书目之序等论述中。总的来看,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 对文献作用的认识

孔子以前藏于官府之文献皆为档案记录。这些记录事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所以保管严密。尤其是图法,关系到国家版图税收和治理,是一个国家权利的证明与保证。三代之时,一些面临亡国的史官往往执其图法以谏君王。《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后

① 参见:王心裁著:《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图书情报工作》,1999 年第 4 期。

乃出奔如商;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孔子时代,周王朝开始失去其维系诸侯的地位,私人讲学兴起,官守文献也失散开来,学术走向民间,诸子百家蜂起,纷纷著书立说,以求售于君王。总体来看,"先秦学术从较早的儒家孔子直到晚世战国的法家,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这四科学术,始终是贯穿先秦各派学术的共同主题和基本内容。因而中国学术自先秦以后即一直具有极其浓重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①]私人著述者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思考,表达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文献(思维创造型文献)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不再仅仅是国家权利的证明与保证,而开始表现出一种与政治的紧密联系。由于学术是文献的主要内容,所以学术的兴衰影响到文献地位的变化。根据文献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文献分为三类: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文献,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文献,三是除前二者之外的其他文献。第一种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成为金科玉律,供民众遵从。第二种文献是民间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它与第一种文献形成互补或对立,地位不很稳定。一般说来,只有这两种文献是古代官方极其注意的。第三种文献是文献的普通组成部分。汉武帝时,儒家文献成为第一种文献,取得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被尊为经典。在六艺地位确立之初,人们对其作用的论述是有所保留的。而经书的地位巩固以后,人们的论述就有所不一样了。那些进行过文献整理与书目编纂的人们,认为文献尤其是经典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这种认识也是这一时期目录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序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种看法基本上还算平和,至阮孝绪《七录序》则说:"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隋志序》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毋煚《古今书录序》说:"夫经籍也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

(二)对书目分类的探讨

人类分类思想起源很早,而对书目分类的探讨则与文献的发展与整理编目活动相关。《七略》将天下图书分为6略38种,对于各类的立类与排序是按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如六艺略,时六艺已确立为经典,故排在前面。诸子、诗赋之类,乃意识形态领域非重要之文献,故排于后。诸子中儒家"于道为最高"[②],所以排

①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② 《汉志》儒家类小序。

于第一。兵书注重谋略，所以兵书略也以兵权谋列第一。在立类上则考虑了图书多寡等实际情况，如史书少，遂附于春秋类。

其后四部分类出现，由于史书日繁，所以单独立类，且渐取代诸子而排于第二。当其时有王俭《七志》效仿《七略》，仍以史书附春秋，遂遭到了阮孝绪的批评。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还探讨了类名及类目的分立改并等问题。

（三）对书目方法与书目作用的探讨

刘向刘歆校书，撰成《别录》、《七略》，“剖判条流，各有其部”[①]，并以小序探讨学术源流，以叙录绍明作者之意。此后官府编制书目时往往删小序，略叙录，多不能有所探讨发明，形成一种“苟简”的倾向，受到了《隋书·经籍志》作者的批评。如对于《中经新簿》，《隋志·序》称“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介绍李充所作时，亦称“但以甲乙为次”，并称随后的目录编制“自尔因循，无所变革”，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即使那些做了不少学术性工作的书目，《隋志·序》也对其质量提出了批评。王俭《七志》“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但《隋志·序》对其“不述作者之意”甚是不满。《七志》各大类皆作有“条例”，但“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阮孝绪《七录》“分部题目”倒是“颇有次序”，但却“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总之，自刘向刘歆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②]正是出于对书目质量的看重，所以《隋志》作者“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而撰小序 55 篇。作者很是自负地称这 55 篇“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③]。

对于分类及叙录等方法，另一位书目编者毋煚也极为看重。他在《古今书录序》中说：“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这一表述实际上已指出了文献增长与读者需求是目录产生发展的动力。又说：“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这是对书目分类作用的探讨。又说：“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这一充满感情、文采斐然的表述表明，目录应当探究作者之“旨”，应当探析部目之“词”。而要做到这一点，舍小序、叙录而外别无他法。

① 《隋志》目录类序。

② 《隋志》目录类序。

③ 《隋书·经籍志·序》。

可以说唐代通过对诸目与刘向刘歆范式的比较,得出了目录必须"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必须有"录",且"录"须达"旨",不能"文义浅近",否则就不能"辨其流别"的目录学思想。这一思想直启郑樵。

二、郑樵的目录学思想

郑樵是对目录学作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郑樵注重会通,其目录学会通思想是其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所做出的一个理论总结,也是与他的史学会通思想相一致的。郑樵在所著《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据《宋史》记载,郑樵字渔仲,兴化郡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所以他年轻时读书极多,并对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辩。他在《献皇帝书》中写道:"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正是这种博大的志向和广泛的知识面,使他得以形成其会通古今的思想。

郑樵生活于两宋之际。宋初中期的基本承平局面为各种学术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展现机会。但宋朝崇文黜武,游牧民族在西北的窥视使之隐患重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王朝的隐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急剧,积重难返。终于不幸而发生靖康之变,徽钦二帝为金人掳之而北,高宗偏安江南。作为一个学者,郑樵对国事的关注表现为对历史的兴趣,而历史是无所不包的。所以他一旦"得召对",即向皇帝痛陈"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表明他对断代史作法的不满,高宗亦有"相见恨晚"之叹。他所作《通志》即是一部通史,会通是其精神所在。

这种会通思想,"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绘出各种事物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基于这种会通思想,也基于对从刘向到《崇文总目》以来书目发展过程的认识,郑樵对目录学便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主张通记古今图书,不仅记书,而且记图;不仅记有,而且记亡,要做到广古今而无遗。正因为主张通记古今有无存佚,郑樵还提出了即类以求、旁类以求等求书八道。全面的文献收录与详明的类例相配合,"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郑樵认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一个严谨、详明的类例之下通记古今有无之图书,这样,学术源流自现。因此是否要作注释或提要就要视情况而定了。有不应释者,如《唐实录》十八部就不应释云"唐人撰";有应释者,如《隋志》于霸史一类,因其"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释或不释,不可执一概而论,"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而"泛释无义"。郑樵还首次探讨了著录问题。这是由于《新唐志》在著录上

先标著者,次列图书,这种做法可突出著者的地位。但由于《新唐志》省略了著作方式,就易导致混淆,如管辰作《管辂传》3卷,如省著作方式就成《管辰管辂传》3卷。所以应当“以人类书”,即当以书名为标目,“人则于书之下注姓名耳”。[①]郑樵并编写了《艺文略》,将其目录学思想付诸实践,创立了一个十二类百家432种的书目分类体系,广收古今图书。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为所著录图书作注是史志目录传统,乃出于各志长短配合之需要而删叙录为小注。郑樵《通志》为通史之作,故只言注释。其二,郑樵的书目分类较之《七略》书目分类又有所不同。由于通记古今有无之书,在考虑整体图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书目分类,与图书分类及学术分类的结合更加紧密。可以说郑樵之所为已使书目分类向图书分类迈进了一步。

郑樵的“通记”“类例”“以人类书”“泛释无义”论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纂理论,这个理论直接为他的目录应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观服务。他认为目录对于文献“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所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自《七略》而后,目录反映学术源流的方式由类例、小序和叙录逐渐演变。类例是一直保持着的,其演变是由六分、七分等而基本定型为四分。小序时遭删除。至于叙录,则一删为注,再变为传录,再省至无。郑樵像他的前人一样,无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前人如《隋志》编者魏征、《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编者毋煚只看到了变省之不足,郑樵则另创新说,认为在通记古今有无之书的前提下,只要类例详明,学术源流亦可清楚地得到反映。

三、胡应麟和祁承㸁的目录学思想

明代目录学思想上承郑樵、下启章学诚,体现出继往开来的特征。明代对目录学有所论述的学者有胡应麟和祁承㸁。胡应麟受郑樵影响颇深,其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经籍会通》4卷中,而从这一书名就可见郑樵会通思想对胡氏的影响。《经籍会通》卷二甚至以为郑樵《校雠略》“皆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之”。《经籍会通》重在探讨图书文献与书目发展源流,其间总结书目分类从七分演为四部之大势,讨论官私史目之作用与编撰得失,多有创见。胡应麟总结分类之演变着眼于文献演变之实际,在他看来,图书之多寡是立类必须考虑的,而学术发展卷帙盛衰也是七分发展为四部的主因。古今书籍有盛有衰,“秦汉军书最盛,故刘王特列兵家。而术数方技,条流繁衍,至析为二。梁世稍减,因以兵子同条,术数共贯。唐宋以后益微,遂皆统于子矣。”因此立类当考虑卷帙多寡,四部卷数

---

① 以上有许多句子直接用《通志·校雠略》语,不一一注明。以下所引该书语亦不加注,特此说明。

相当,“乃得为体”。而对于郑樵《通志·艺文略》之设艺术等类,胡应麟认为不妥。他说:“今艺术等书,仅数百卷,亦为一类,可乎?”文献发展随“时代”而“盛衰”,有“制作”之“繁简”,这样,“分门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还,始定于一。”①

而在探讨书目之得失时,胡应麟显然认同于《七略》范式,对小序与提要之美赡与详明表示欣赏。如说《隋志》“类次可观,论辩多美”,又以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四部分门,实因旧史。而支流派别,条理井然。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百代坟籍,烨如指掌”。同时他又受郑樵的影响,认为书目应当收罗古今,且当兼记亡书。他说“《旧唐》之只录本朝,大为疏略。《新书》间增所缺,颇自精详”,“郑氏《艺文》一略,该括其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而《艺文略》的缺点是“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而《经籍考》“倘更及当时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题,稍存故实,则庶几尽善矣”。②

胡应麟的很多论述往往针对郑樵。郑樵是主张通记古今、详明类例的,而胡氏认为郑樵往往自蹈其失。郑樵从通史的角度出发对班固《汉书·艺文志》多所讥刺,胡应麟则对班固大为称赏,如所著《九流绪论》说:“任宏所录兵书凡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凡兵书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旧,独出《司马法》入礼类。郑渔仲大讥之。余读《汉志》及此,未尝不绝叹孟坚之卓识,而惜渔仲之妄讥也。”胡应麟还以为郑樵不喜班固著述多讥刺的原因在于郑樵有“成心”,所以他说:“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巨,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③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都表明郑樵是对胡应麟目录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而尤其是对郑樵的批评,我们可以在清章学诚的论述中发现相似的观点,虽然章氏著作未提及胡氏,但“胡章二公,见仁见智,各自成一家之言。以章氏之博洽,以《少室山房笔丛》和单行本《经籍会通》之流行,要说章氏未曾研读,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则章氏的见解,或许有得于胡氏的评论。”④

另一学者祁承㸁有关书目得失之探讨与胡应麟的论述相似,系隐括胡氏观点并有所增益而成。所著《澹生堂藏书约》关于鉴书有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与别品类之分别,其中尤以辨真伪与别品类 2 条可明显看出祁氏对胡氏之继承与发展。于辨真伪条祁氏甚至说“辩哉胡元瑞之言乎”。别品类一些语句明显出自《经籍会通》,如说“惟班氏规模《七略》,刘昫沿袭《隋书》,《新唐》校益《旧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库,《隋志》简编,虽多散佚,而类次可观”等。但祁氏扩大了讨论范围,有些地方见解也有所不同,如对于郑樵的看法,祁氏说:“郑

---

① 《经籍会通》卷二。

② 《经籍会通》卷一。

③ 《经籍会通》卷二。

④ 王国强著:《明代目录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4 页。

氏《通志》,概征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无所发明。”前一句隐括自胡氏,而后一句包含了祁氏对郑樵删《崇文总目》叙录的不满。同胡应麟一样,祁承爜推崇的是马端临“条贯灿然,始末毕具”,“编摩采辑”,“撮其指意”的做法。甚至说:“余每遇嗜书之癖发不可遏,即取《通考》翻阅一过,亦觉快然。庶几所谓过屠门而大嚼者乎!”

祁承爜对书目分类以圣制列于大类之首颇为不满,说:“王伯厚以圣文冠经籍,陆文裕仿之,而焦氏亦首列制书。余以国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圣,仍以六经冠之群书,而特以文由圣翰、事关昭代者,每列于各类之首,则既不失四部之体,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见也。”祁氏之见凡六,除上述圣制,还有欲别宋儒之书为理学类、别一代之礼乐而附之史、别纂训为一类而附于小学之后、别书记为一类而附于文集之后、别杂纂与类书另附四部之后诸见。这些见解有己见,亦有参考胡应麟者,如别杂纂与类书另附四部之后,与胡氏“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的看法[①]相似。

在祁氏看来,类目的增减变化是必然的,而类目的设置即不必尽同,“总而言之,书有定例,而见不尽同,且亦有无取于同者”[②]。因此,可以“因”四部之定例,应做到“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也可“益”,即增加类目。“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这是说不当于四部之外另开新法,而是斟酌于四部,在四部之内,有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等“类无可入”,及“书有独裁”者,则当益立新类。[③]在所编《澹生堂藏书目》中,祁氏所益之类有五,即约史、理学、代言经筵、丛书、余集等类。其中约史、丛书与余集乃首创。在姚名达看来,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丛书”类之设,以为“于分类学之功勋最巨”。[④]

祁氏对后世目录学影响綦深的理论主要是“通”与“互”,即所谓别裁与互著,见之于所著《庚申整书略例》。他说:“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在他看来,存在着:1. 一书原有单行本而后来仅见于文集者;2. 文集中所收著述与文集体例不相类者;3. 各书自成卷帙而又未另行别刻者;4. 集中所收书久已不行,苟非为之标识其目,则无从考其书者等情形。而若遇此等情形,则应为之“分载”,“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内,以便简阅”。[⑤]这就是“通”,即章学诚所谓“别裁”。

“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祁承爜说:“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

① 《九流绪论》下。胡氏还将这一看法付之行动。他在评陆深《江东藏书目录》时说陆目“惟类书另录最当,与余《山房书目》同”可证。

② 《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

③ 《庚申整书略例》。

④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5页。

⑤ 《庚申整书略例》。

以一时之著述,而倏尔谈经,倏而论政;有以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①因此遂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即一书见著于两类或几类,也就是章学诚所谓“互著”。互著别裁方法由祁承㸁首次明确提出,虽然互著法早在像《七略》、《史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目录中已有尝试,但却无理论表述。因此,姚名达说:“此古人所不识,石破天惊,允推承㸁为分类学之一大发明家。”②

四、孙从添的目录学思想

清初有孙从添著《藏书纪要》1卷,分一购求、二鉴别、三抄录、四校雠、五装订、六编目、七收藏、八曝书等八则,系统总结了古代藏书编目理论。欲藏书必先购求、抄录,必须注意版本的鉴别与校雠,装订亦当“护帙有道”,而其中“编目最难”。孙从添以为必须编撰4种目录,方“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其一为“大总目录”,即藏书之总目;二为“宋元刻本抄本目录”,即所藏之精华目;三为“分类书柜目录一部”,为供插架查检催讨用目录;四为“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之书,在外装订之书、抄补批阅之书,各另立一目”,即临时目录。从明末开始,一些藏书家如钱曾往往编有总目录和善本目录,孙氏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善为总结。但他又以为还当编分类书柜目和书房架上书籍目,就显得有些过繁,一般私藏家恐难做到。

对于著录项目与书目体例,孙氏十分注重,论述极详,可以说首次对著录事项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如对于大总目录,他说:

> 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晰,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板、元板、明板、时刻、宋元抄、旧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有套无套。一种门类写完后,存白页,以备增写新得之书。编成一部,末后记书若干部共若干册总数于后,以便查阅有无,将来即为流传之本。其分年代,不能全定,因得书先后不一,就其现在而录之可也。释道二氏之经典、语录附于后,写清装成藏于家。

对于宋元刻本抄本目录,他说:

> 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

① 《庚申整书略例》。

②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3页。

图章、姓名，有缺无缺，校与未校。元板亦然，另贮一柜，照式行款写之。柜用封锁，不许擅开。精抄、旧抄、宋元人抄本、秘本书目，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何人抄本，记跋、图章、姓名，有缺无缺，不借本，印宋抄本，有板无板。校过者书某人校本，或底本、临本。录成一册。虽目录亦不可轻放，恐人借观遗失。

对于分类书柜目录，他说：

先将书柜分编字号，柜内分三隔，柜门背左实贴书单三张，分上中下，各照柜隔写书目本数于上，以便查取。右门背贴书数目，亦分三张上下中，另写一长条于旁，记书总数目。而所编之书目，照柜字号，亦分写上中下三隔。先写经部某字号柜内上隔某一部若干卷，某人作，某板，共几册，上隔共书若干部，共若干本。二三隔照写。一柜则结总数。都写完，则写大总结数于末行后页。如有人取阅借抄，即填明书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阅。一月一查。取讨原书，即入原柜，销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还，当使催归原柜，不致遗失。

孙氏于编目，注重收藏与版本，所以书名卷数而外，总目录于著作方式，抄刻时代，宋元抄刻目于收藏跋记、图章、姓名、完缺、校否等等，都要求著明；而总目录每门之后存空白页便于随时登录新进之书，宋元抄刻目连目录都要求收藏谨严，表明了对收藏的注重；分类书柜目录本身就是供插架催讨之用。至于是否撰写提要、小序，虽于编大总目录下提到"或照《经籍考》"，但显然孙氏并未多所措意。明代书目于著录项目颇为随意，官目如《文渊阁书目》往往不标著者，影响所及，各目多苟简。孙氏对于著录项目的强调显然与这种情形有一定的关系。

孙氏从藏书的角度探讨编目，所以于书目是否讨论作者之旨与学术源流等问题也就未予论说。而至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总目》，一反明代苟简之风，力返《别录》《七略》范式，使目录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章学诚则是从理论上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第一人。

五、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历主北方各书院讲席。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实斋文集》等。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总结的时代，考据之学使人们埋首故纸堆中，探寻义理的基础——文字和文献，并由此而对前代学术进行了全面总结。章学诚的《校雠通义》3卷就是一部从目录文献入手探寻目录学义理的会通之作。其开篇即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目录校雠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部次条别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如果对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不能贯通明白，

就难以胜任。所以历代从事目录工作"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十不一焉"。章学诚关于书目当部次条别、辨考学术源流的论述与郑樵关于书目当明类例、究本末、探源流沿袭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所以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也。"

以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与郑樵相比,可以说他们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或概括是有所不同的。郑樵之时,《七略》已经失传,叙录经过一删再变再省,已与《七略》范式大为不同,《崇文总目》尽管继承了《七略》传统,但因其编者之粗疏,不足与此,更使郑樵发现了其中的缺憾,再加上郑樵所著虽名为"通"志,实意在专门,体例的限制也使他编《艺文略》时必然无法一一著说,所以他反对于"每书之下必著说"的做法,并从而形成了他的类例通记以人类书泛释无义的书目编纂理论和由类例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而章学诚之时,《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使《七略》范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章学诚尽管在四库开馆之初限于科第未能入馆,但他于乾隆四十年(1775)进京,四十一年官国子监典籍,而在乾隆四十六年《总目》初稿写成。这之前两年,他开始写《校雠通义》,因乾隆四十六年遇盗河南,尽失生平著述,遂重写,于乾隆五十三年彻底修正。章学诚与邵晋涵交谊最深,而邵氏为四库纂修官负责史部。这些情形表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应该对他撰写《校雠通义》产生了影响。章学诚自己对学术源流的认识也使他看到了从周官官守体系到《七略》书目分类体系的演变,以为"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①,并认为《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自符体系",所以他"宗刘"。在他看来,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②,如仅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③。古人编目校雠之旨在于"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④。正因为如此,所以章学诚对郑樵删《崇文总目》叙录的做法十分不满,以为这样做"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⑤。郑樵以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而章学诚则以为学术及其源流需要辨章和考镜。所以他"补郑"。"宗刘"与"补郑"作为《校雠通

① 《校雠通义·原道一之一》。

② 《校雠通义·原道一之三》。

③ 《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

④ 《校雠通义·原道一之三》。

⑤ 郑樵删《崇文总目》叙录之说出于朱彝尊之揣度,而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特辨以为非关郑氏。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65 页。虽然如此,郑樵之"泛释无义"论与《艺文略》各类基本皆无小序、各书皆无提要的做法,亦足使章氏此论非诬。

义》的两个篇题明确表明了章学诚对待刘向刘歆和郑樵的态度,也表明了他对书目编纂体例的认识,即认为书目不仅应当通过甲乙部次辨章流别,更应当通过小序叙录等方式折衷六艺,宣明大道。

章学诚除了强调类例、注重小序与叙录外,还特著《互著》篇与《别裁》篇,作为解决对类例间学术相互联系现象的一种方法。关于互著,他说:

> 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检稽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关于别裁,他说:

> 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对互著与别裁方法的总结始自祁承㸁。祁氏《澹生堂藏书约》等书清乾隆时有知不足斋刻本,章氏当读及。因此,他的互著别裁之论可能受到祁氏通互论的启发。而且如前所述,他关于郑樵的一些看法也可能受到胡应麟的影响。但章氏绝非无所发明。章学诚与胡应麟的区别在于,胡氏意在考察经籍之发展变化,从而探讨经籍分类的演变与目录优劣,而章氏则意在探讨校雠或目录之学,并通过对郑樵类例说的肯定与对其书目删叙录做法的批判来表明他对书目编纂体例与功能的看法。章学诚与祁承㸁的区别在于,祁氏的通互论只是一种简单的书目方法,而章氏则从辨考学术源流的角度,纳互著别裁于其整个目录学理论之中。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体现出了一种系统性与完善性,可以说是在郑樵、胡应麟、祁承㸁诸学者目录学思想基础上的深入与完善。

而从以上所述我们也可发现,从刘向刘歆以后到章学诚时代的目录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所以姚名达说中国目录学"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1]。这个时代精神主要是指目录应辨考学术源流的精神。整个书目编制存在三种体例:一是有类例,也有小序和提要,如章学诚甚至还强调互著和别裁;二是只重类例,可以无小序和提要,如郑樵;三是有类例,有小序,可以无提要。而"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9页。

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家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取便检查者异也”①。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之精华，自唐领悟、宋郑樵归纳、清章学诚阐发后，即为广大学者所认同。

六、近代目录学思想

近代目录学思想主要沿着两条线演变。

（一）由导读目录而沿推荐文献、传播思想之路演变

清末众多导读目录的出现是颇值玩味的，它是文化冲突的典型产物。每当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必然会发生冲突，虽然最终的结果一般是倾向于融合，但在冲突期，各种文化必然力求发展自己，介绍自己，否则就有消亡的危险。佛教文化是与中华本土文化相当的文化，就其终极目标——人类的解脱——来说，甚至高于儒家，因此它最终引起了官方及儒家的重视并被吸收而与中华本土文化融成一体。但它自身毕竟是独立的，所以除了采用一般的方式宣讲经义外，同时又用目录来反映其庞大的经藏，并由于佛经本身译者众多等实际情况，所以从北朝两位武帝废佛，到隋唐得以重振佛风后，道宣及时编撰了《转读录》指定善本，使导读与目录得到了初步的结合。此后伊斯兰教、景教等经典传入较少，并实际没有太大的影响；游牧文化的入主中原又由于其文化的缺乏最终仍不得不以儒家思想为正宗，所以中华本土农业文化基本上平稳地发展着。直到一种强大的文化来激荡时，人们才猛地惊醒，一则羡其强大，亟欲学之，出现了如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理论；一则惧其强大，难存我族，出现了如顽固派之礼教观，保存国粹之国学等说教，各种思想纷纷出笼。而要传播其思想，教育而外，目录就是最好的工具了，目录本身就具有控制文献、辨考学术的功能，用它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实际上只需略作变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急剧冲突期，目录充分利用导读的方式，使得其导读功能被突出放大，从而成为文化冲突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使目录学也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折点。

（二）由公共图书馆藏书目录而沿方便检索之路演变

如前所述，随着图书馆各项业务活动的逐步展开，编目部成为图书馆的一个常设部门，编制卡片目录、书本式目录等各种形式及分类目录、书名目录、作者目录等各种类型的目录，目录编制遂无可挽回地朝向取便检稽的路向发展。

无论是哪一路向，读者无疑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1925 年，梁启超在《佛家

① 刘纪泽著：《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 1934 年版。转引自彭斐章等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4 页。

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①这可以看作是近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能的一个最好总结。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期,其时间并不很长,其理论也不系统,但却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宋)郑樵.通志·校雠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七.上海:中华书局,1936

7 杜定友.校雠新义.上海:上海书店,1991

8 汪国垣.目录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9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

1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12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14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16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17 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18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19 钱亚新.略论章学诚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1962(3)

20 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1963(4)

21 彭鹏.国外联合目录的回顾与展望.北图通讯,1978(1)

22 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3)

23 阎立中.关于目录工作现代化的几处问题.图书馆工作,1978(3)

①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十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4页。

24 彭斐章,谢灼华.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1)

25 倪晓健.刘向、刘歆和《别录》、《七略》.图书情报知识,1980(1)

26 谢灼华.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四川图书馆学报,1980(3)

27 钱亚新.章学诚对郑樵批判精神的发扬.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2(1)

28 乔好勤.略论1911—1949年我国目录学.云南图书馆,1982(1)

29 王余光.论推荐书目.图书馆学研究,1983(1)

30 谢俊贵.清代社会与目录学的关系.赣图通讯,1983(3)

31 谢德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新起点.学术月刊,1983(10)

32 谢德雄.隋唐五代目录学理论的系统化.图书馆杂志,1984(1)

33 石蔓.论当代目录学理论之危机.图书馆学研究,1985(6)

34 王艺.明代的书目编纂传统.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2)

35 王国强.汉代目录学新论.图书与情报,1991(2)

36 陈传夫.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晋图学刊,1991(3)

37 王国强.中国古典目录学新论.图书与情报,1992(1)

38 陈曙.主要款目比较之研究——兼论东西方不同文化之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1)

39 王心裁.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导读目录.图书情报知识,1998(4)

40 彭斐章,王心裁.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历程、成就与局限.高校图书馆工作,1999(2)

41 王心裁.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图书情报工作,1999(4)

第三章　西方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西方目录学概念

西文的“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是希腊文“biblion”(意为图书)和“graphien”(意为撰写)的合成词,原意为“图书之撰写”(the writing of books)。[①]而希腊文“目录学家”(Bibliographos)的原意为“手稿之抄写者”(a copyist of manuscripts)。[②]

西文的“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喜剧诗人》(*The Greek Comic Poets*)著述中。[③]其后,在后古典希腊著者的著述之中曾多次使用“目录学”一词,其中,以公元3世纪的哲学家来阿铁斯(Diogenes Laertius)的《哲人言行录》(*De Philosophorum visits*)对“目录学”一词的使用最为著名。来阿铁斯将“目录学”一词用作“书籍之撰写或者抄写”(the writing or coping of books)的意义,这种用法被当时的世界所接受。其后,各种西方辞典与百科全书基本上都沿用“目录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原意为“书籍之撰写”的解释,并将“目录学家”(Bibliographer)解释为“书籍之撰写者,抄写者”(a writer of books; a transcriber)。[④]这种意义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时才发生改变,其时在法国“目录学”的意义从“图书之撰写”变成了“关于图书之撰写”(the writing about books)。这个新的意义不久就被整个法国接受,其后德国、英国等国家也接受了此义。[⑤]19世纪以后,随着“目录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目录学”一词的含义基本上是指书籍及其著者、印刷、出版、版本等的历史与系统描述。[⑥]

---

① Brown Charles Barrett. The Contribution of Greek to English.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42.29、78

② Blum Rudolf. Bibliographia: An Inquiry into Its Definition and Designation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0.12

③ Schneider George. Einführung in die Bibliographie. Leipzig: Hiersemann, 1936.1

④ Linder LeRoy Harold. The Rise of Current Complete National Bibliography. New York: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59.9～10

⑤ Blum Rudolf. Bibliographia: An Inquiry into Its Definition and Designation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0.12

⑥ Linder LeRoy Harold. The Rise of Current Complete National Bibliography. New York: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59.10

今天,在西方没有统一的"目录学"定义,贝朗格(Terry Belanger)曾言: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目录学"这个术语就会有不同的定义,在图书收藏家看来,"目录学"是"图书之研究",而"目录学家"则是研究图书的人。但是,目录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语。目录学具有太多的一般性定义,并且藏书家、学者和图书馆员经常过于不加区别地使用目录学这个词,所以,目录学一词缺乏精确性。因此,目录学经常被一些形容词来修饰,例如: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系统目录学(Systematic Bibliography)、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校雠目录学(Critical Bibliography)、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①]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目录学家谭瑟勒(G. Thomas Tanselle)所言:"目录学中的一切,包括目录学的定义,似乎都会引起争议。"[②]"目录学"受其名称所累,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在于"目录学"这个词现在不再能在其词源的基础上精确地定义,[③]现在的问题是,在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目录学"定义和各定义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因为目录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还是一个相关的学科群,这个学科群中的其他学科一般也使用目录学这个术语。[④]

在西方,许多人经常无法区分"书目"(a bibliography)与"目录学"(bibliography),并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实践中,"目录学"这个词与各种图书目录、其他形式的印刷文献目录,以及其他记录格式的列举文献具有广泛的联系。但是,自20世纪以后,目录学已经从过去仅仅是版本学家、印刷历史学家的专有领域和几个应用科学的分支学科分化发展出了许多个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目录学是广阔而有生气的,差不多影响到了每个知识领域。[⑤]

西方学者认为,目录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目录学是人类精神的专门记录,在这种意义上目录学是"人文的";在完整地揭示著者的一种著作在其全部著作中的地位、一个著者在所有著者中的地位和一个著者的著作在所有其他人的著作中的地位上,目录学是极其精确的、系统的和分析的,在这种意义上,目录学是

---

① Belanger Terry.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In: Book Collecting: An Modern Guide. Edited By Jean Peters. New York: Bowker, 1977.99

② Tanselle G Thomas. The State of Bibliography Today.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9(73)

③ Atkinson Ross. An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to the Definition of Bibliography.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1980(33)

④ Tanselle G. Thomas. Bibliography as a Science.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1974(27)

⑤ Harmon Robert B.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Metuche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89.2

“科学的”。[①]

同时,目录学还具有普遍的和全面的意义。如同一张撑开的大伞,目录学覆盖着各种功能和活动。在这张大伞之下,有业余活动者和专业人员、学者与技工、业余爱好者和唯利是图的书商,更有版本学家、索引学家和编辑者,历史学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编目员、参考馆员和行政管理人员。[②]

西方学者认为,在知识的发展中,目录学不是一种主要的力量,而是一种次要的和辅助的力量,因为它主要是支持和鼓励创新活动,而不产生新的知识。从支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讲,目录学必须为很多大师服务,而不是漫无目的。[③]

第二节 西方目录学体系

西方目录学源远流长,到 20 世纪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目录学学科体系。除了不断增加一些新的领域以外,这个学科体系在 20 世纪中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一般来说,西方目录学主要有两个分支学科,即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Bibliography)和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Enumerative or Systematic Bibliography)。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是研究作为物体的图书、图书生产的细节、制作方法对文本的影响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学问。作为传递文献的科学,分析目录学还研究印刷者和书商的历史,研究纸和图书装帧的描述,以及研究从作者的手稿到书籍印刷出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文本变化。[④]与分析目录学形成对照的是,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则是研究按照一定的系统化规则编排图书或者其他文献的学问。[⑤]过去,西方目录学主要集中研究图书材料,但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目录学则研究各种载体的文献。

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有三个主要分支学科: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和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是研究印刷文本与作者构想的文本关系的学问。实质上,版本目录学是通过不同的印次和版本来研究和比较文

① Weber David C. Bibliographical Blessings.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7(61)

② Harlow Neal R. The Well-Tempered Bibliographer.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6(50)

③ Harlow Neal R. The Well-Tempered Bibliographer.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6(50)

④ Belanger Terry.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In: Book Collecting: An Modern Guide. Edited by Jean Peters. New York: Bowker, 1977.99～100

⑤ Clapp Verner W. Bibliography.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83(3)

本及其传递的学问，它与校雠学(Textual Criticism)是同义的。历史目录学或者文献目录学(Historical or Material Bibliography)主要是研究图书的历史和生产图书的人物、机构和机器的历史，其研究范围涉及从技术史到工艺史的一切与图书所反映的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社会史实有官的广泛领域。这种类型的目录学研究还包括图书的生产、装帧、造纸术、插图和出版。与上述两个分支学科紧密相关的是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描述目录学是详细研究图书的形式特征和描述图书的学问，包括有关作者、题名、日期、印刷出版地点和格式、页码、插图、装帧的情况以及其他的形式细节。作为描述目录学研究对象的每一本图书或其他资料都从属于该种图书和该种图书的其他著作的一个完备的形式描述。该描述包括，并且通常涉及一个作者、插图者、出版者、出版时期或地点的完备著录。[①] 也就是说，在描述目录学中，每一个描述性款目所著录的不只是一本书的形式特征，而是一种图书(包括手稿和各种版本等)的全部形式特征。

作为更为普通和实用的分支学科，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Enumerative or Systematic Bibliography)试图按照系统的编排方法鉴别和描述那些适用于特定目的或者具有其他共同特征的图书、其他资料，或者图书和其他资料。[②] 列举式目录有许多种类，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时间界限是其特征之一。很多书目都是定期发行，并且将其书目限定为近期的出版物，例如，《累积图书索引》(*The Cumulative Book Index*)和《美国图书出版记录》(*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都是定期的新书书目。另一种是回溯性目录，萨宾(Joseph Sabin)编撰的《美国史料书目：有关美国的图书字典》即是一例。列举式目录还可以是综合性的，或者是专题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累积图书索引》(*The Cumulative Book Index*)试图收录所有的英文出版物而不论其出版地，而美国图书馆协会自 1905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书评期刊《图书目录》(*Booklist*)则只评价可能会引起图书馆兴趣的图书。列举式目录可以有提要，也可以没有提要，但是提要通常能提高书目的利用率。

总的来看，西方目录学的体系结构大致如下：[③]

1. 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Bibliography)

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以文献的"物质存在"为研究对象(physical entities or material objects)，其研究目的是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包括如下三个分支学科：

---

① Young Heartsill, et al.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72

② Clapp Verner W. Bibliography.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83(3)

③ Harmon Robert B.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Metuchen, NY: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89.6

(1)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

(2)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

(3)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2. 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Enumerative or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以文献的"精神存在"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目的是将有关的图书或其他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一个有用的逻辑系列。列举目录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包括:

(1)著者书目(Author Bibliographies);

(2)书目之书目(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

(3)藏书目录(Catalogs);

(4)文献指南(Guides to the Literature);

(5)国家书目(National Bibliography);

(6)选择书目(Selective or Elective Bibliography);

(7)专题书目(Subject Bibliography);

(8)贸易书目(Trade Bibliography);

(9)世界书目(Universal Bibliography)。

第三节　西方目录学历史

虽然西方目录学起于古代,但是它现在仍然是一个襁褓中的强健婴儿,因为比较而言,西方目录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四个世纪以前,格斯纳(Conrad Gesner)创立了目录学,18 世纪迪伯尔(François De Bure)编撰出版《目录学导论》(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时才将这个学科命名为目录学。在目录学的整个历史发展中,目录学一直是一门灵活而稳固的学科,它一直能够适应变化着的需求。[①]

一、古代西方目录学

西方的图书编目起源于古代。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在亚述尼尼微(Nineveh)的塞纳彻瑞布(Sennacherib)图书馆就已经有了泥版文书(Clay Tablets)目录。[②]因此,追溯目录学研究的起源,人们能够在古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编撰中发现目

---

① Harmon Robert B.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Metuchen, NY: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89.16

② Chakraborti Mukunda Lal. Bibliograph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rev.. Calcutta: World Press, 1975.4

录学的胚胎。另一个例证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图书馆,该图书馆在古代世界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希腊文献。亚历山大图书馆奉埃及国王托勒密(Ptolemy Philadelphus)的命令至少编撰过两部图书馆目录,一部是悲剧目录,另一部是喜剧目录。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们是最早的目录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编撰目录。可以肯定的是,藏书建设和图书馆目录编制,这两项具有目录学本质功能的工作在亚历山大时代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艺术。①

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os,约前305—前240)在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曾编撰过一部题为《皮纳克斯》(*Pinakes*,又名《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的解题目录,该目录收录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较重要的著作,共分120个主题。有的图书馆学家认为卡利马科斯是西方的第一位目录学家。另一位著名的希腊人盖伦(Galen),公元2世纪的一名医生,曾编撰过自己的个人著作目录。盖伦著述丰富,其个人著述目录《图书之图书》(*De Libris Propriis Liber*)是一部分类目录,将其著作分成了评论、伦理学、语法等17类。②

在目录学的发展初期,目录与传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多数的传记都附有著者的著作目录。虽然现在无法确定这些个人著述目录是怎样从传记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传记编者的主要编撰对象,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拉丁文《圣经》(*Vulgate Bible*,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通俗本的译者圣·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和马塞的神学家和神父格纳第斯(Gennadius of Marseilles)曾编撰过题名相同的单行本传记目录《论名人》(*De viris illustribus*)。圣·哲罗姆曾言其著作命名为《论基督教著者》(*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则更为准确。其后出现了大量的传记目录(Bio-bibliography)。第一部附录非传记书目的图书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学者比德副主教(the Venerable Bede)于公元731年编撰的《英国基督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Britain*)。③

二、中世纪西方目录学

在中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提出了记录馆藏图书的需求。目前所知的现存的中世纪图书馆的各种目录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在中世纪,还有一些专门记录现存图书的目录,例如:方济各会修道士(Franciscan monks)在14世纪时编撰的题为《英国圣公会图书登记册》(*Registrum Librorum Angliciae*)的目录就是一部收录英国180多个修道院所藏手稿的目录。大约在1410年前后,本尼狄克特

① Gaselee Sir Stephen. The Aims of Bibliography. The Library, 1932,13(3)

②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1

③ Harmon Robert B.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Metuchen, NY: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89.17

修道士波士顿(John Boston)个人单独编撰了一部题为《基督教手稿目录》(*Catalogus Scriptorium Ecclesias*)的目录。该目录共著录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约180个教堂的藏书。波士顿按照教堂的名称顺序著录了大约700个作者的著述,并在作者撰写的《圣经》图书之下标明了收藏该图书的各教堂名称。尽管现在的目录学家通常是用数字代码来表示图书的收藏处所,且波士顿的《基督教手稿目录》现在看来还很不完善,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基督教手稿目录》是第一部联合目录。①

以上所述均为目录(Catalog)而非书目(Bibliography)。在西方目录学中,目录与书目的区别在于,书目所收录的文献不必局限于某个藏书、图书馆,或者某些图书馆,书目可以限定为某个主题、某个特定的时期、某个特定著者的著作或有关某个特定著者的著作、或者上述情形兼而有之等等,但是,书目所列举和描述的著作应该较好地反映许多国家所有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的第一批真正的书目是斯蓬英男修道院院长(abbot of Sponheim)特里森(Johann Tritheim, 1462—1516)在15世纪末编撰的书目。特里森编撰了一部大型的基督教著者书目,题名为《基督教教士之著述》(*Liber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s*),该书目由阿美巴克(Johann Amerbach)于1494年在巴塞尔(Basle)出版。②在这部书目中,特里森收录了大约7 000部图书,全部图书按著者的历史时代顺序编排,上起亚历山大主教(Alexander, Bishop of Cappodocia)下至特里森本人。他还在该书目后附了一个按照著者的教名字顺编排的著者字顺索引。③次年(1495),特里森的第二部书目《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Catalogus Illustrium Virorum Germaniae*)在美茵兹(Mainz)弗里堡出版社(the press of Peter von Frieberg)出版。该书目收录了德国300多位最著名的著者的2 000多种著作,全部著作也是按照著者的历史时代顺序进行编排。④特里森是第一个真正的具有目录学思想的学者,西方学者认为特里森是当之无愧的"目录学之父"(the Father of Bibliography)。⑤

---

① Besterman Theodore.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2nd ed..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6

②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2

③ Besterman Theodore.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2nd ed..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8

④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2

⑤ Besterman Theodore.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2nd ed..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10

三、近代西方目录学

随着15世纪中期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图书的生产开始激增,用书目方法记录和控制激增文献的需求亦与日俱增。尽管如此,西方近代目录学的重大发展还是在西方印刷术发明近一个世纪之后。1545年瑞士裔德国医生、作家和博物学家格斯纳(Conrad Gesner, 1516—1566)出版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录学著作《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在《世界书目》中,格斯纳著录了大约12 000部拉丁文、希腊文和西伯来文的写本书和印本书。所有款目均按照著者的姓名字顺编排,著录项目包括题名、写作与出版日期、出版地、出版商,以及图书的内容说明或内容摘录。为了编撰《世界书目》,格斯纳走访了许多图书馆,并获得了大量的书商目录及其出版的著作,其中包括特里森的传记目录。[①] 或许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德国学者认为格斯纳才是真正的"目录学之父"(the Father of Bibliography)。[②]

1548年编年史历史学家和最早的英语剧作家贝尔(John Bale)编撰了第一部国家书目《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名人著作目录》(*Illustrium Majoris Brittaniae Scriptorum hoc est Angliae, Cambriae ac Scotiae Summarium*),该书目实际上是一部专门记录一个国家的著者图书目录。[③] 这部传记书目按照英语作者的姓名字顺编排,其编撰目的是为了使过去一直受到查禁或者已部分毁坏的修道院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源幸免湮没。如同格斯纳一样,贝尔也走访了许多图书馆,在无法查阅某些图书时,贝尔则通过与学者的通信联系来了解图书的情况。

15世纪中期,德国人发明的西方印刷术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随着印刷图书的急剧增长,德国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和莱比锡(Leipzig)迅速发展成为德国和外国的图书贸易中心,因而德国出现了由书商编撰的图书贸易书目和图书目录。随着这些城市的季节性图书交易会的建立,起初是书商,后来是市政府,出版了大量的真正的图书贸易书目。

到18世纪时,目录学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书目分类表的数量迅速增长,各种各样的学者都在探讨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许多图书馆开始印刷其馆藏目录,其中最著名的是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目录》(1710)、英国《牛

---

① Malclè L N. Bibliography. Translated by Theodore Christian Hines. Metuchen, NJ: Scarecrow Reprint, 1973.19~22

② Schneider George. 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273

③ Besterman Theodore.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2nd ed..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22~23

津大学图书馆目录》(1738)和《皇家图书馆目录》(*The Bibliothèque Royale*, 1743)。

紧跟德国目录学发展步伐的是法国,尤其是在18世纪德国的图书交易会停止以后。其中,较重要的法国书目之一是布鲁内(J. C. Brunet)编撰的《书商与业余爱好者图书手册》(*Manual du Libraire et de L'Amateur de Livres*)。该书目初版于1810年,其后曾多次增补扩充。布鲁内按著者的姓名字顺编排款目,并附有一个主题索引。布鲁内为每种著作都编写了详细的提要,其中包括有关书页的编码、行款的数量、收藏家的签名等技术信息,以及有关版本和售价的说明。[①]第一部书目之书目是图书馆目录之目录。拉贝(Philippe Labbè)的《藏书目录之书目》(*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1671)即是一个好的例证。彼得佐特(Julius Petzholdt)于1866年出版了他编撰的《藏书目录之书目》(*Bibliotheca Bibliographica*),该书目的完整性、精确性和可靠性至今仍然是该书目所收录图书的权威著录。

进入19世纪后,目录学已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工具。有关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著作开始探讨列举书目、校雠书目、历史书目和选择目录等问题。此外,还创办了一些目录学期刊。

目录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19世纪末出现了目录学学会。一般来说,这些目录学学会是专业学者或对收集有关图书的信息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的社团组织。一些目录学学会倡导文献研究、图书制作艺术、图书保存或收集图书,另一些目录学学会则支持有关图书的历史研究,并发行此方面的研究论文或会报。目录学学会的会员包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员、教师、古旧书商和收藏家。[②]最早的目录学学会是1892年创办的伦坟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美国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创办于1904年,其前身为1899年创办的芝加哥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cago)。[③]但是,在美国最有学术性的目录学学会是弗吉利亚大学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该学会于1947年由20世纪最伟大的目录学家鲍威尔斯创办,会员遍布世界,是世界分析目录学的领袖。这些目录学组织为其会员在目录学学科内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途径。

---

①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 5~6

② Mudge John Cook. Bibliography Societies.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78,(3)

③ Mudge Isadore Gillbert. Bibliograph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15. 18~21

四、现代西方目录学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目录学研究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19世纪的目录学家,例如,曾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4卷本目录学著作《累积书目》(*Repertorium Bibliographicum*)的黑英(Ludwig Hain)、担任剑桥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的布拉德肖(Henry Bradshaw, 1831—1886)、90多岁时还先后在博德雷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和英国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从事摇篮版古书(incunabula)编目的普鲁克特(Robert Proctor)以及许多的其他目录学家,他们奠定了考镜图书形式与描述图书的基础。但是,进入20世纪后,在上述目录学家的影响下,许多目录学家开始从事图书生产全过程的研究,而不再简单地编撰目录。于是产生了一个基本信念:目录学家通过这种调查研究能够澄清从作者的手稿到印刷图书的过程中有关文本传递的特定文献问题。[1]

这种"新目录学"也就是现在的分析目录学或者校雠目录学。20世纪初,"新目录学"在英国最为兴盛,著名的目录学家格雷戈爵士(Sir Walter Wilson Greg)、盖斯理爵士(Sir Stephen Gaselee)、波拉德(Alfred William Pollard)、麦克罗(Ronald Brunlees McKerrow)等撰写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麦克罗编撰的专供文学学生使用的教材《目录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初版于1927年,该著是考察伊丽莎白时代印刷材料与印刷方法的使用情况,并将此二者与从作者的手稿到印刷图书的文本传递,以及与在后来的版本中出现的变化联系起来的第一部全面的著作。[2]大约在20世纪中期,由于1949年鲍威尔斯的《书目描述原理》(*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的出版和由此引发的许多研究成果的问世,分析目录学或者校雠目录学的研究中心和主要活动从英国转到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出版了许多新的目录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出版的加斯克尔(Philip Gaskell)所著的《新目录学概论》(*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20世纪中期,在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领域也产生了数部重要的著作,例如鲁宾逊(Anthony M. L. Robinson)的《系统目录学》(*Systematic Bibliography*)到1979年时已经出版了第4版。而1984年出版的克鲁麦尔(Donald W. Krummel)的《书目:其目的与方法》(*Bibliographies: Their Aims and Methods*)则进一步拓宽了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的研究领域。

---

①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8

② Padwick Eric William.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12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析目录学的杰出代表是谭瑟勒(G. Thomas Tanselle)。谭瑟勒认为分析目录学不仅是一门辅助学科，而且通过提供有关印刷和出版实践的统计证据，其本身就充满了趣味。谭瑟勒告诫分析目录学家：应该建立目录学研究与一切有关印刷、出版和图书贸易历史的专业团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发展这种关系。谭瑟勒断言：通过更为严密的学科建设，分析目录学必定会不断成长壮大。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西方目录学研究中，由于分析目录学的日益兴盛和列举目录学的相对式微，分析目录学与列举目录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分析目录学与列举目录学何者为第一位的问题，在目录学家中一直存在着争议。例如贝茨(Marcia J. Bates)认为：列举目录学之所以被轻视，并不是因为列举目录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平凡的活动，而是因为列举目录学一直极不发达。②布赖尔(Jackson R. Bryer)则认为：列举目录学的价值超过了分析目录学，因为如果列举目录学的最终成果编撰精良的话，这些列举目录就会更加实用。他指出使用列举目录的读者可能比使用描述目录或者版本目录的读者更为广泛。③

第四节　列举目录学

所谓“列举”(Enumerative)和“系统”(Systematic)是指目录学家使用的技术方法和他们创造的手段。列举目录学这个词的基本意义是指按字母顺序或历史年代顺序编排目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款目是按照某个特定的目的进行系统编排的，例如按照某个主题选择图书而编制的主题目录。通常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只要求编制简要款目，这些款目只需要足以识别图书和使用户能够判断图书重要性的书目信息。

15世纪60年代，当摇篮本图书出现题名和印刷日期时，由于社会的需要，德国出版商开始为书商和全德国图书贸易编撰书目。一般说来，列举目录学始于德国出版商的第一部商业图书目录出版之时。在16世纪末以前，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还出现了国家书目。1545年格斯纳(Conrad Gesner, 1516—1566)编撰的《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正式出版，这是编撰世界书目的最早尝试。大约在17世纪中期，一个名叫圣－查尔斯(Louis de Saint-Charles)的法国书商通过增加评论性注释改进了德国书业书目的模式，这种方法被安东尼奥

① Tanselle G Thomas. The State of Bibliography Today.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9(73)

② Bates Marcia J. Rigorous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RQ, 1976(16)

③ Bryer Jackson R. From Second-Class Citizenship to Respectability: The Odyssey of an Enumerative Bibliography. Literary Resaerch Newsletter, 1978(3)

(Nicolas Antonio)编撰的《西班牙书目》(*Bibliotheca Hispana*)所仿效。英格兰于1668年创刊的《定期目录》(*Term Catalogues*)是第一部成功定期发行的图书目录。但是,专题书目在西方的发展很慢。

18世纪初期,印刷型的公共图书馆目录和私立图书馆目录数量甚多,出现了注释型的评论性书目和书评,第一部评论性书目和书评期刊是《专家期刊》(*The Journal des Savants*, 1665—1790)。18世纪在耶稣会会士(the Jesuits)和本尼狄克特教士(the Benedictines)产生了最早的专业学者——目录学家,在1763—1793年间出版的图书馆馆长迪伯尔(FranÇ ois DeBure)编撰的《目录学导论》(*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是第一部实用目录学著作。《目录学导论》是第一个使用具有西方近代意义的"目录学"(Bibliography)术语的著作,它标志着目录学事业的诞生。[1]

一、总目或世界书目

在列举目录学的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是总目或世界书目(General or Universal Bibliographies)。虽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编撰一部包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各个学科的所有出版物的总书目或世界书目一直是学者们和目录学家们的梦想,但是真正理想的总书目或世界书目现在仍然是一个梦想,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书目。

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撰的总目

(1) 现行印刷卡片图书目录。194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出版发行167卷本《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图书目录(截止到1942年7月31日)》(*A Catalog of Books Represented b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Issued to July* 31, 1942),其后又相继于1942年开始出版42卷本《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图书目录补编(1942年8月1日—1947年12月31日)》(*Supplement*: *Cards Issued August* 1, 1942—*December* 31, 1947),于1953年开始出版24卷本《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著者目录(1948—1952)》(*Library of Congress Author Catalog*: *A Cumulative List of Works Represented b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1948—1952)。1958年开始出版的28卷本《全国联合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累积著者目录及美国其他图书馆图书目录(1953—1957)》(*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A Cumulative Author List Representing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and Titles Reported by Other American Libraries*, 1953—1957)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著者目录(1948—1952)》续编,其后又陆续出版了多

① Schneider George. 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5, 277

个续编本《全国联合目录》,其中包括:1962 年出版的 28 卷本续编(1958—1962),1973 年出版的 119 卷本续编(1963—1967),1978 年出版的 135 卷本续编(1973—1977)。自 1978 年至 1982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按年度出版该目录的续编,包括:1978 年本(16 卷)、1979 年本(16 卷)、1980 年本(18 卷)、1981 年本(15 卷)、1982 年本(21 卷)。从 1983 年起,美国国会图书馆停止出版该目录的印刷本,改出缩微胶卷本。由于文献收录量大、编目精良、书目著录完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撰的现行印刷卡片图书目录一直是图书馆的珍贵财产,深受各种读者和图书馆员欢迎,是提供著者书目、书目信息查核、历史注释和图书收藏处所等的优秀资源。

(2) 累积印刷卡片图书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出版过三部累积印刷卡片图书目录:一是 1968—1981 年出版的 754 卷本《全国联合目录(1956 年以前印本图书):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累积著者目录及美国其他图书馆图书目录》(*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Pre-1956 Imprints: A Cumulative Author List Representing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and Titles Reported by Other American Libraries*),其中 687—754 卷是 686 卷的附录。二是 1969—1971 年出版的 152 卷总累积本《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国联合著者目录(1942—1962)》(*Library of Congress and National Union Author Lists*, 1942—1962: *A Master Cumulation*),该目录包含上述《全国联合目录(1956 年以前印本图书)》的全部内容。三是 1970—1972 年出版的 125 卷本《全国联合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卡片累积著者目录及美国其他图书馆图书目录(1956—1967)》(*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1956—1967: *A Cumulative Author List Representing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and Titles Reported by Other American Libraries*)。

从 1983 年起,美国国会图书馆停止出版纸本《全国联合目录》(*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采用缩微胶卷形式出版。缩微胶卷版《全国联合目录》采用了登记目录与索引分离的方式编排,改变了以前美国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的登记目录与索引一体的编排方式。其索引包括:人名索引、题名索引、美国国会图书馆连续出版物索引、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索引。每年出版有年度索引累积本。但是,缩微胶卷版《国家联合目录》在使用上比印刷本更为费时耗力。

(3)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自 1955 年开始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主题目录》(*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Books: Subjects*),该目录收录美国国会图书馆 1950 年以后收藏的图书,起初为 5 年累积本,包括:1950—1954 年 20 卷累积本(1955 年)、1955—1959 年 22 卷累积本(1960 年)、1960—1964 年 25 卷累积本(1965 年)、1965—1969 年 42 卷累积本(1970 年)、1970—1974 年 100 卷累积本(1975 年)。在 1975—1982 年间则出版年度本。自 1983 年起该目录与《全国联合目录》合并,改出缩微胶卷本。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1953—1973年间还出版了5年累积本《美国国会图书馆电影和幻灯片目录》(*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Motion Pictures and Filmstrips*),包括:1953—1957年累积本、1958—1962年累积本、1963—1967年累积本、1968—1972年累积本,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音乐和录音带目录》(*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Music and Phonorecords*, 1953—1972)等目录及其续编。

2. 英国图书馆编撰的总目

英国国家图书馆成立于1973年,名为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英国图书馆成立以后于1979—1987年出版了350卷本《英国图书馆印本图书总目(截止到1975年)》(*The British Library General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to* 1975),该目录收录了1975年以前采购并在1976年以后编目的所有图书,并有三个附录,另有两个单行本索引:《次主题标目索引》(*Subheadings Index*)和《题名索引》(*Title Index*),其款目按照单一的著者姓名字顺编排,主款目有交叉参照,大的学科领域或者复杂的学科领域,如《伊索寓言》、《圣经》还特别编有次主题索引。

20世纪70年代《英国博物院现代图书主题索引》(*The British Museum Subject Index of Modern Books*)的出版结束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没有主题目录的历史,该目录收录了1971—1975年英国博物院收藏的现代图书。其后,英国图书馆又于1987年出版了75卷本《1975—1985年英国图书馆主题总目》(*The British Library General Subject Catalogue* 1975—1985)。该书目在文献著录上采用《英美编目条例》(AACR2),在文献编排上则采用《保留上下文标引系统》(*Preserved Context Index System*, PRECIS),按照标目的主题词字顺进行编排。《保留上下文标引系统》是英国图书馆书目服务部编制的一种计算机轮排索引系统,之前已在《英国国家书目》(*The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中使用。

3.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撰的总目

法国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自1900年起开始出版《著者图书总目》(*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ers Imprimés: Auteurs*),到1981年时已经出版了231卷。该目录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全部款目按照著者的姓名字顺编排,但是不收录匿名著者的图书、期刊和合著者的图书。每卷目录收录的图书均截止到该卷目录的出版日期,因此,前后出版的目录在收录范围有所不同:开始出版的各卷目录收录的是1900前后出版的著者姓名排列在字母表前列的图书,后来出版的各卷目录则收录的是1915年以后出版的著者姓名排列在字母表中列和后列的图书。从189卷开始则没有收录1959年以后出版的图书。自1972—1978年出版《著者,合著者,匿名著者图书总目》(*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ers Imprimés: Auteurs, Collectivités·Auteurs, Anonymes*, 1960—1969)以后,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始出版5年累积本《著者图书总目》补编,以收录合著者和

匿名著者的著作。

二、国家书目与贸易目录

1. 美国的现行国家书目与贸易目录

美国的现行国家书目与贸易目录(National and Trade Bibliography)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出版商贸易目录年刊》(*Publishers' Trade List Annual*)。《出版商贸易目录年刊》创刊于1873年,该刊按照出版商的名称字顺编排书目,是按出版商查找图书的重要书目。为了编制《出版商贸易目录年刊》的索引,美国于1948年创办了《在版图书:出版商贸易目录年刊著者-题名-连续出版物索引》(*Books in Print: An Author-Title-Series Index to the Publishers' Trade List Annual*)年刊。二是1876年创刊的《美国图书出版记录》月刊(*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三是《每周记录》(*Weekly Record*)。1972年美国创办了第一个官方图书贸易书目《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自1974年起《出版商周刊》将其原有的专门著录新书的"每周记录"(*Weekly Record*)栏目改成《每周记录》周刊单独出版,其后,《每周记录》发展成为《美国图书出版记录》的基础。四是《累积图书索引:世界英语图书目录》(*Cumulative Book Index: A World List of Book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累积图书索引》自1898年起开始出版发行,因为其每种图书均有按字顺编排的著者款目、题名款目和主题款目,且收录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版的英语图书,所以它比《每周记录》更方便使用。五是自1966年开始出版的《新书预告》(*Forthcoming Books*)。

2. 美国的回溯性国家书目与贸易书目

美国的回溯性国家书目与贸易书目主要有以下四部,这四部书目构成了一个连续不间断的体系,系统地反映了自1639年印刷机传入美国以后美国的文献状况。

第一部是埃文斯编《美国书目》(收录1639—1800年的美国出版物)。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家埃文斯(Charles Evans)曾花费30多年的时间编撰14卷本(1903—1967年出版)《美国书目》(*American Bibliography: A Chronological Dictionary of All Books,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Genesis of Printing in* 1639 *Down to and Including the Year* 1800),该书目收录了美国最早期的出版物,包括图书、小册子和期刊,并按照出版日期的时间顺序编排,每卷附有著者索引、分类主题索引和印刷商与出版商索引。但是,埃文斯直到1935年去世时只编到了1799年出版的以字母M为开头标目的图书。其后,希普顿(Clifford Kenyon Shipton)从1799年出版的以字母N为开头标目的图书开始续编,一直编完了1800年的出版物。布里斯托(Roger P. Bristol)在完成了《美国书目》第14卷的编撰工作以后,先后

完成了《美国书目》的另外两个补编：一是1970年出版的《埃文斯美国书目补编》(*Supplement to Charles Evans' American Bibliography*)，该卷是以前各卷书目的累积著者-题名索引，包括笔名、团体著者、政府机构和报纸与年鉴的全体编者。二是1971年出版的《埃文斯美国书目补编索引》(*Index to Supplement to Charles Evans' American Bibliography*)。

与埃文斯编《美国书目》相关的是，1970年出版的希普顿(Clifford Kenyon Shipton)和穆尼(James E. Mooney)编撰的2卷本《美国书目文献编号索引(截止到1800年)》(*National Index of Imprints Through* 1800: *The Short-Title Evans*)，该索引是埃文斯和布里斯托所编索引的合编修订本。希普顿和穆尼将埃文斯已经编号的39 000种文献和新增加的1 000种文献进行了重新编号，并按照字顺目录编排，著录项目包括：已知的著者姓名、著者生卒年、文献编号、出版地、印刷商和出版商、出版日期、页码编号、埃文斯编号和该文献在《早期美国出版物》(*Early American Imprints*)缩微胶片中的页码位置，并列有收藏缩微胶片的图书馆名单。

第二部是肖和肖美克编《美国书目：选购书目初编》(收录1800—1820年的美国出版物)。1958年，肖(Ralph R. Shaw)和肖美克(Richard H. Shoemaker)编撰了22卷本(1958—1966年出版)《美国书目：选购书目初编》(*American Bibliography*: *A Preliminary Checklist*)。该书目是埃文斯《美国书目》的续编，收录文献的时间范围为1800—1820年。虽然《美国书目：选购书目初编》的出版实现了埃文斯曾计划完成而没有完成的编目工作，但是，编目不精，颇有舛误。

第三部是鲁尔贝奇编《美国史料书目》(收录1820—1861年的美国出版物)。鲁尔贝奇(Orville Augustus Roorbach)编《美国史料书目》(*Bibliotheca Americana*, 1820—1861)出版于1852—1861年，共分1820—1852年、1852—1855年、1855—1858年和1858—1861年4卷，其中后3卷的质量不如第1卷。鲁尔贝奇本人是一位书商，他编撰此目录的目的亦主要是供书商使用，虽然此目录在文献著录上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但是该书目是美国目前惟一的一部有关1820—1861年美国出版物的总目。

与鲁尔贝奇编《美国史料书目》收录文献范围相同的是肖美克等编撰的《美国图书选购书目》。肖美克曾计划在《美国书目：选购书目初编》的基础上续编1820—1875年的美国出版物书目，但是在1970年逝世之前他只完成了1820—1829年的文献编目工作，即1964—1971年出版的10卷本《美国选购书目(1820—1829)》(*A Checklist of American Imprints for* 1820—1829)。其后，其他的目录学家分别完成了收录1830—1839年美国出版物的多部《美国选购书目》续编。

第四部是凯利编《美国目录》(收录1861—1871年的美国出版物)。凯利

(James Kelly)编《美国目录》(*American Catalogue of Book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January* 1861 *to January* 1871)共 2 卷,出版于 1866—1871 年。凯利编撰《美国目录》时正值美国国内战争时期,作为一名年轻的爱尔兰人,凯利为了完成续编鲁尔贝奇编《美国历史书目》的心愿困难重重,因而其著录亦颇为不精。尽管如此,凯利编《美国目录》仍然不失为记录 1861—1871 年美国出版物的最佳总目。

1880 年开始出版的《美国图书目录》(*American Catalogue of Books*, 1876—1910)是美国的第一部综合性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1911 年,《美国图书目录》被其竞争对手威尔逊公司(H. W. Wilson Company)自 1898 年开始出版的《美国在版图书目录》(*United States Catalog*: *Books in Print*, 1899—1928)替代。1898 年,威尔逊公司在出版《美国在版图书目录》的同时还定期出版《累积图书索引》(*The Cumulative Book Index*),作为《美国在版图书目录》的增刊。《美国在版图书目录》于 1928 年停刊,并被《累积图书索引》所替代。《累积图书索引》收录全世界的英语出版物,是一部世界英语图书目录。

3. 英国的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

英国的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主要有以下三部:其一,《英国国家书目》(*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英国国家书目》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根据呈缴本自 1950 年开始编撰的国家书目。该书目的正文是按照《杜威十进分类》编撰的主题目录,附录有按字顺编排的著者索引、题名索引和主题索引。该书目按月出版,并有年度累积本和 5 年累积本。其二,《英国在版图书》(*British Book in Print*: *the Reference Catalogue of Current Literature*)。《英国在版图书》创刊于 1874 年,原名《现行文献参考目录》(*Reference Catalogue of Current Literature*),始由怀塔克(Joseph Whitaker)出版发行,自 1965 年以后改用现名。该刊比《英国国家书目》更为著名。其三,《怀塔克累积图书目录》(*Whitaker's Cumulative Book List*)。该目录是怀塔克出版社在《书商》(*The Bookseller*)杂志的书目记录基础上自 1924 年开始出版的定期目录,是英国的一部重要的图书贸易书目。

4. 法国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

法国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自 1972 年开始出版的《法国图书书目》(*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Biblio*),其前身是自 1934 年开始出版发行的《图书》(*Biblio*)杂志。该书目包括分类目录、题名目录和著者目录三个部分,按月出版发行,其年度累积本为《图书目录年刊》(*Les Livers de L'Année-Biblio*)。二是法国的回溯性国家书目《法国书目》(*Bibliographies de la France*),该书目收录了 1811—1971 年的法国出版物。

目前介绍世界各国的国家书目和贸易书目的著作主要有如下两部:1986 年出版的贝尔(Barbara L. Bell)编《现行国家书目解题指南》(*An Annotated Guide*

to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和1987年出版的戈门(G. E. Gorman)与米尔斯(J. J. Mills)编《第三世界现行国家书目指南》(*Guide to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the Third World*)。

总的来看,列举目录学在历史上只是图书印刷商与图书购买者联系的纽带,但是现在已经以各种方式用于推动知识界的发展。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认为列举目录学是分析目录学"继父与其前妻所生的穷女儿"(the poor step-sister of analytical bibliography)。列举目录学家也一直都承认:与列举目录学相比,其他目录学分支学科具有更为复杂的技术性。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列举目录学一直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并将越来越获得广泛的认可。

列举目录学的功用在于将大量的繁杂的文献有序化。列举书目具有鉴别和考证文献,确定文献的出版地、收藏地和购买地,帮助选购和选读文献三个基本功能,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书目控制(bibliographical control)。最佳的书目控制(bibliographical control)是指每一种图书、每一种文献、每一篇论文甚至每一个书面思想的存在状态与位置的完整记录。书目控制像著述的起源一样古老,但是要实现书目控制这个乌托邦式理想现在还很遥远。

第五节　分析目录学

列举目录学强调确认文献和确定文献的处所,而分析目录学则强调对文献的性质与目的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其中包括作为物体的图书,以及图书生产的细节和制作方法对文本的影响。所以,英国目录学家格里格爵士(Sir Walter W. Greg)认为目录学是传递文献的科学,并一直称其为分析目录学。①

但是,在目录学研究的发展中,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在概念上将分析工作与校雠工作分开,因为文献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发现事实的文献分析过程,其后才是解释这些事实的校雠过程,而后一个过程则是校雠目录学与分析目录学相区别的领域。但是在实践中,对有关事实的分析与考据校雠常常是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的。

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析目录学相对比较新,分析目录学的许多活动一直集中在探索有关分析目录学的理论、揭示其分析程序、检验其假设和发展其应用领域。虽然分析目录学现在仍然在成长和发展,但是其专深的知识传播得还不太广泛。分析目录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其最大的发展是在

---

① Belanger Terry.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In: Book Collecting, A Modern Guide. Edited by Jean Peters. New York: Bowker, 1977. 99

20 世纪。在 20 世纪初期,分析目录学的大多数活动大都集中在莎士比亚著作文本的研究上,尤其是探讨所谓的四开本的性质与权威,及其与最初的对开印本的关系。波拉德(Alfred William Pollard)、麦克罗(Ronald Brunlees McKerrow)和格雷戈爵士(Sir Walter Wilson Greg)三位杰出学者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发起了这场以研究莎士比亚著作文本为中心的分析目录学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所有的人都对目录学产生了兴趣。

在继承英国文物学家、图书馆馆长布拉德肖(Henry Bradshaw)和摇篮本学家、图书馆馆长普鲁克特(Robert Proctor)的书目工作的基础上,格雷戈、麦克罗和波拉德创立了现在所谓的分析目录学。从此,分析目录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例如:利用分析目录学的方法证实了佩威尔(Pavier)四开本的真实性,发现 1934 年版的卡特(John Carter)和波拉特(Graham Pollard)的著作是怀斯(Thomas J. Wise)的伪作。此外,在 20 世纪后期,通过利用分析目录学的方法还揭露了霍夫曼(Mark Hofmann)作伪的摩门教历史文献。分析目录学在善本图书的整理编辑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鲍威尔斯(Fredson Bowers)编辑的德克尔(Dekker)戏剧集。此外,分析目录学还完成了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例如欣门(Charlton Hinman)有关莎士比亚对开本的研究,以及鲍威尔斯、格斯克尔(Philip gaskell)和谭瑟勒(G. Thomas Tanselle)的大量著作。

在上述目录学家以及其他目录学家的工作影响下,有关文本的校雠分析与描述的书目学术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利用这种方法,分析目录学家查考传递同种文本的图书的外在形式及其一切关联,以准确地鉴别文献、确定文献的归属、判断著者与读者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在分析目录学家看来,所谓的图书还包括古抄本、小册子、散页短文、单面印刷品、招贴画等。

虽然每当发现手稿和诸如长条校样之类的中间印刷品时,分析目录学研究也对其进行研究,但是分析目录学基本上只研究与印本书相关的问题,在本质上与手稿研究无关。印本书与手稿的重要区别在于:手稿文本可能不是图书的定本,但是印刷文本是标准化的、整理过的、保藏的产品。实际上,当文字材料以印刷方式出现的时候它已经过了整理。所以,以印刷方式出版的文本被看作是成品的传播,但是在还不具备生产复制本技能的时候,文本易于产生异文的变化,或者如果有人愿意的话,还可以脱离作者的本意在文本中掺杂讹误。通常作者对文本的修改变化都会在其后的印刷品中,因此,分析目录学家发现:热衷于稿本,只收集最初的版本而忽视同时收集其他的印本是徒劳无益的。

与分析目录学相似的一个有趣学科是手稿学(Codicology)。手稿学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的一个拓展研究领域,是研究在历史过程中作为文化产品的手稿的科学。手稿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杜撰的一个新词语,20 世纪后

期才被看作是一门可行的学科。总的来看,手稿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相似,两者都以首先在《圣经》研究和校雠学中发展起来的技术方法为基础,两者都可以将其下位学科分为历史(手稿学/目录学)、版本(手稿学/目录学)和描述(手稿学/目录学)。虽然两者都是根据抄本与原稿的关系来鉴别稿本,但是,手稿学缺乏与分析目录学相同的以版本思想为基础的概念词汇或等级层次。

一、描述目录学

描述目录学的主要功能是对文献进行精确的形式描述。其研究的问题包括:图书形成的方法、铅字与纸张的类型、插图与图书结合的方法、图书装订的方法与装订材料、文献的主要形式特征。像版本目录学家一样,描述目录学家必须具备扎实的技术史知识,以便精确和简洁地描述图书的外形特征。分析目录提供文献的完整形式描述,使读者能够了解各种版本的异同和辨别某种版本中的重要异文。描述目录学家关注的只是文本,并以版权页数据和书名页为研究重点。描述目录学家主要研究的是提供区分不同版本(用同一套活字印刷的复本)、形态(通过诸如印刷错误的校正和旧活字的更换等细微变化,即所谓的异文,来确认一个印次内的复本)、发行量(一个版本每次发行的复本)以及在出版前后分别产生的各种形态和版本的证据。分析目录学家通常采用标准化的校勘方法和校勘程式结构来编制描述款目。虽然摄影术和复制术正在取代抄录方法,但是分析目录学家还是在广泛地使用类似摹写的书名页抄写方法。

描述目录学在书目方法上强调完整、精确、细致地著录文献,并相应地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著录规则。虽然这些著录规则与现在通行的文献著录规则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它在分析目录学界一直十分流行,并被广泛应用。以下是描述目录的一个简明、完整的标准款目例子:①

a) 82. 1755

b) THE |WAY of the World: |A| COMEDY. |Written by Mr. CONGREVE. | [3-line motto from Horace and ack.]|EDINGBURGE: |Printed for G. HAMILTON and J. BALFOUR. |[Partial rule]|
M, DDC, LV.

c) *Collation*: 12°. A^4 B-N^4 01, 53 leaves, pp1-3 4-7 8 9 10-11 12-1-4 105 106, $ 1 signed

---

① Lyles Albert M, Dobson John. The John C. Hodges Collection of William Congreve i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Library: A Bibliographical Catalog. Knoxville, T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Libraries, 1970. 53

HT] THE |WAY OF THE WORLD.

d) *Contents*: A1: title (verso blank). A2: dedicatory epistle (cap^2). A4^v: prologue (cap^2).

B1^v: dramatis personae (with cast). B2: HT with text (cap^3). 01: epilogue (cap^2).

AT] THE WAY OF THE WORLD

CM] A4^v Some C1^v Mira. [Mira] E 4^v Milla. G4^v the I 4^v confident, L4^v re olv'd M4^v Sir

e) *Type*: text (C2): 39 11., 131(139) ×70mm., 66R

f) *Note*: The edition follows the scene divisions of the 1710 works. The second portion of Scene Ⅲ, Act Ⅱ, is missnumbered. Scene Ⅳ, but Scene Ⅳ is properly numbered. No press figures. Bound in blue cloth.

g) PR3364. W3 1755

上述著录项目包括:a)在该目录中的流水编号,b)实际书名页的抄录,c)利用专门设计的表示开本等事项的符号进行的稽核项或形式描述,d)按先后顺序记录的图书内容,e)标明使用的活字字面,f)列举包括各种变化在内的其他重要信息,g)美国国会图书馆索书号。

二、版本目录学

版本目录学的主要作用是研究印刷本与作者构想文本之间的关系。手稿的笔迹通常很难辨认,排字工偶然会排错字母,校对人员有时也没有校对出这些错误。许多文献的手稿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现在能够了解作者意图的通常只有印本书,尤其是大约在1800年期间的印本书。版本目录学家的基本工作就是提供著者所撰著作的最精确文本。自然,版本目录学家需要具备广博的文献学知识和印刷与出版知识。

在另一种意义上讲,版本目录学是分析目录学的原理在文本校释中的应用。这一点与校雠学(Textual Criticism)的一切实际用途是一致的,在编辑工作之中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版本目录学的基本假定是:文本主要是通过在印刷中窜入异文而在传递的过程中无意地发生了改变,而排除未经认可的变化则能够编辑比任何异文更接近作者原文的文本。由此而产生的校点本通常是现存版本的编纂整理本,这种校点本只是一个假定的原文本模型。

三、历史目录学

一般地说,历史目录学主要是研究图书史和生产图书的人、机构和机器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历史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从技术史到工艺史的一切与图

书所反映的文化与社会有关的领域。在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目录学在本质上要考证永无休止的大量历史文献的形式证据。历史目录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图书的生产制作方法、影响图书制作的观念与力量等等。

为了揭示图书的历史,历史目录学对各种文字记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种查证研究有时会受到文献不足的阻碍。另一方面,历史目录学的一些发现,例如各种版本的年代或者某种印刷方法的使用等,会立刻和实际地应用于更大问题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历史目录学为分析目录学的武器库提供了新的武器。

四、分析目录学技术的发展

20世纪后期以来,分析目录学的技术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分析目录学的技术、方法和参考服务显然已经大异于格雷戈、麦克罗和波拉德等分析目录学先驱者所处的时代。通过使用欣门校对机(the Hinman Collator)、文顿校对机(the Vinton Collating Machine)、罗斯门的休斯顿编辑桌和编辑架(Rothman's Houston Editing Desk and Editing Frame)等专门用于版本比较的机器,光学已经应用于版本研究。现在,机器文本校对技术和数字扫描技术已经能够同时对多个版本的文本进行自动校对。

由于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分析目录学技术方法日新月异,例如:利用计算机排版技术进行历史文献的编排,利用计算机自动编制列举目录,利用计算机检测异文的细小变化,利用单相交照相技术进行文献材料的检测,在不拆散图书的情况下利用X光技术检测图书的结构,利用紫外光检测被覆盖的画和被擦去的文本,利用光谱学研究油墨颜料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已经被分析目录学家广泛地用于纸张鉴别、文献制作方法、文献材料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McKerrow Ronald B.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2　Malclès L N. Bibliography. Translated by Theodore Christian Hines. New York: The Scarecrow Press, 1961

3　Krummel D W. Bibliographies: Their Aims and Methods.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Ltd., 1984

4　Gaskell Philip.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5　Stokes Roy B. The Function of Bibliography. 2nd ed.. Aldershot, Eng: Gower, Ltd.,1982

6 Harmon Robert B.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Simplified Approach. Revised ed.. Metuchen, NJ: The Scarecrow Press, 1989

7 Robinson A M Lewin.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Work of Compilation. Cape Town: JUTA & Co., Ltd., 1966

8 Binns Norman 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2nd ed.. London: Association of Assistant Librarians, 1962

9 Williamson Derek.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Hamden, CT: Archon Books & Clive Bingley, 1967

10 Maxwell J C, Greg W W.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11 Greg W W. The Editorial Problem in Shakespeare: A Survey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ext. 3rd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4

12 Bowers Fredson. 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49

13 Bowers Fredson Thayer.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14 Tanselle G Thomas. 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y Editing.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0

15 Tanselle G Thomas. Selected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9

16 Tanselle G Thomas. Textual Criticism Since Greg: A Chronicle 1950—1985.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17 Williams William Proctor, Abbott Graig 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2nd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9

18 Pearce M J. A Workbook of Analytical &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0

19 Thorpe James.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San Marino, C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20 Rayward W Boy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Selected Essays of Paul Otlet. Amsterdam: Elsevier, 1990

21 Taylor Archer. 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 New Brunswick, NJ: The Scarecrow Press, 1955

第四章　文献揭示与组织

第一节　文献揭示

一、文献揭示基础

(一) 文献揭示的作用

文献揭示，就是运用各种方法将文献的外部特征信息和内容信息揭示出来，报导给用户，以便用户能够迅速地获取有关文献的信息，为他们准确地选择所需的情报提供条件。

面对当今急剧增长着的文献信息的海洋，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单凭个人力量浏览自己专业领域的所有原始文献，这也是其精力与时间所不及的。为了解决文献飞速增长给读者获得所需信息带来的困难，科学地将文献有关特征的信息揭示出来，及时传递给读者，是文献揭示的基本任务。其作用主要有：

1. 全面描述文献。文献揭示需要对文献的各种属性包括主要内容、形式特征、物质形态等进行分析并加以记录，提供文献外部特征及一些浓缩性的信息，使用户能快捷地识别所描述的对象，节省用户的时间与精力。这是文献揭示的主要作用。

2. 准确定位文献。文献揭示能够提供描述对象的位置信息(既可以是传统文献的收藏与排架信息，也可以是电子文献的网址等)，用户可以据此借阅或查询所需信息。

3. 提供选择的依据。根据文献揭示所提供的描述信息，如题名、主题、作者、版本、类型、主要内容以及评价信息等，用户能够对所描述的信息对象作出取舍，从而选择合适的信息。

(二) 文献揭示的前提

书目、索引、文摘与综述的编制，书目数据库、专题数据库及学科导航库的创建以及书目情报服务活动的开展，必须以认识和熟悉文献为基础，它是科学揭示和有效报导文献的前提，是保证书目工作质量的关键。

阅读是最为有效的认识和熟悉文献的方法。通过精读抓住文献中有创见、最新颖的精髓，通过广泛浏览来积累关于文献的知识。作为书目情报工作者，还要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来认识和熟悉文献，获取有关文献的知识。

1. 依据文献的基本特征来认识和熟悉文献

文献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在一些著录规则与标准中，描述信息资源的类型不同，所列出的基本事项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的著录内容为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版本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丛编项、附注项、标准编号及获得方式项等八个著录项目。而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中则包括15个元素，即：题名、主题或关键词、描述、语种、来源、关联、覆盖范围、创建者、出版者、其他责任者、权限、日期、类型、标识、格式。这些项目是我们认识文献和揭示文献所依据的信息源。

对于传统文献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基本特征来熟悉与认识文献：

(1) 文献题名：即标题，反映文献内容最重要的特征。就图书而言，书名是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认识一部书的起点。在一般情况下，书名最集中地反映一部图书的研究对象和所属学科的性质。有时，单凭书名很难判断一书的性质及所属学科类别，还应当注意了解与书名相关的资料。其他书名信息是用来表达图书的内容范围、揭示图书的体裁、编辑方式及体例等，或说明图书的读者对象、专门用途等。

(2) 责任者：责任者是对作品付出劳动的、对作品内容的直接负责者，也是与另一图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文献创作方式，责任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著者、编者、翻译者、注释者、整理者、主编者、编著者等，还包括法律、标准、规章、条例的编写者或制定者、提出者、起草者、批准者等。作品的创作形式及写作年代也是了解其价值的根据之一。

(3) 出版、发行项：出版、发行项用以记载一书的出版情况，是与其他图书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出版年或发行年是一书内容新与旧的标志之一。不同的图书对出版年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图书恰好因其是古本而更增加了它的价值。图书版次是图书内容修订或增补的标识。图书的印数是一书的通俗性和现实性以及社会影响的标志。

(4) 目次：以篇、章、节、目说明书的内容与体例，是介绍全书结构的大纲，是了解图书内容结构及其体例的纲要。浏览一书的目次，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该书的内容概要。

(5) 提要：提要又称解题，它简明扼要地阐明书的内容，介绍作者生平事迹，评价图书的价值。提要有助于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读者对象。

(6) 前言、后记、序跋：作者通过前言叙述编著一书的宗旨及缘由。序跋是作者本人或他人介绍有关本书的写作目的、过程及对著作的评介。后记是前言或序文的补充。图书的序跋、前言及后记是认识和熟悉图书的门径。读者阅读新书，总是先浏览序跋文字。一篇好的序文应当说明图书的主旨、主要内容、读者对象、专门用途、写作背景及流传经过。有的序文则简述作者生平事迹，如系

再版，则说明增补修订情况。有的序言和跋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因此，序跋文是读者认识和熟悉图书的向导，读者应先读序跋文。

对于网络文献而言，题名屏幕上反映了其内容及其他信息。可采用元数据方式对网络文献进行描述。以都柏林核心集为例，其题名：通常由创作者或出版者赋予，例：<META NAME ="DC. Title"CONTENT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作者或创作者：是对所创建资源的知识内容负主要责任的个人或机构，例：<META NAME="DC. Creator"CONTENT="武汉大学图书馆">；主题与关键词：是表达资源主题概念的非受控词及受控标识；资源类型：表达资源的种类如主页、技术报告、小说等；格式：资源的数据格式，用于注明需要什么硬件及软件来显示和执行这一资源；标识：用来惟一标识资源的字串或数字，网络文献的惟一标识号即 URL 和 URN；描述：是指对资源内容的文本描述，包括文摘或内容的描述，进一步揭示了网络文献的内容与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某个网站的资源类型、Web 页的标题、创建者、主题、关键词以及内容摘要等信息。

2. 通过阅读书目文献来认识和熟悉文献

目录是了解图书和熟悉其学科内容的重要工具，熟悉书目，就可以在文献的海洋中挑选出自己真正所需的文献，是治学与科研的门径。我国著名学者陈垣把目录看成是一本账簿，打开账簿，前人的著作可以一目了然。经常翻阅目录，可以扩大视野，还可充分把握前人科研的成果。梁启超在《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中说："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浏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睹其原书，亦可知梗概。"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书目可以指点学术源流，选读古今图书。网络环境下，书目数据库、学科导航库、资源指引库等网上电子目录，同样起到科研与治学门径的作用。

3. 利用书评资料认识和熟悉文献

阅读书评资料，花较少的时间就可获取大量有关对文献的认识。通过阅读叙述性书评，有助于了解文献的基本内容；阅读评介性书评，有助于了解优秀文献的科学价值。叙述性与评介性兼顾的书评，可以使我们既能了解图书的基本内容，又能了解文献的科学价值及其特点。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读书网或电子图书网站、网上的书评刊物、专业杂志中的书评专栏、报纸中的书评、书评数据库以及网上书店书评栏目了解书评信息。

4. 通过了解读者的反馈信息来熟悉文献

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调查、访谈调查、E-mail 调查、主题调查、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读者的反馈信息，可以获得有关文献的知识及社会影响的资料，可以从

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文献。

（三）文献揭示的基本原则

文献揭示一般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正确处理好揭示文献外形特征和内容特征之间的关系，注重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

文献外形特征主要包括题名、著者、出版者、价格、年代、开本、封面、版式设计、参考文献、文种、来源（刊载处所）、作者所属的机构与组织。文献的内容特征主要有：(1) 作品所属学科、作品论述的年代；(2) 论述的事物及事物的种类和特征；(3) 事物的组成部分及形态结构；(4) 事物构成的物质、因素、成分、结构；(5) 事物的过程、现象和状态、性质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6) 该事物对其他事物的作用、影响及用途；(7) 事物与相关事物的关系（如研究角度、目的、手段、应用工艺设备）以及其他因素（如地点、时间、评价、条件）。

文献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揭示文献时，必须处理好文献外形特征和内容特征的关系。文献外形特征的揭示为读者准确辨认某一特定文献提供条件，而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则能够为读者提供文献取舍的依据。文献的内容特征决定文献的存在价值，文献的形式特征决定文献的存在方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文献内容特征的揭示。早在西汉时期，刘向整理图书就把撰写学术水平较高的叙录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文献内容特征的揭示。文献揭示应当把揭示文献的基本特征和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当前要以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为主，还应当向深化发展。

2．正确处理好揭示文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重视揭示文献内容之间的联系

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高度综合与分化。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使得学者、专家对文献需求的针对性越来越强。这样，书目情报服务由提供整本书、整个篇章的知识和信息，向提供书刊中的知识单元转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同一个对象、同一个课题，或者一门学科研究多个对象，跨学科的边缘性科研课题越来越多。因此，文献的揭示要注意文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注重文献记载的所有知识单元；要注意揭示文献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传统文献，要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对于网络文献，要采用超文本链接方式揭示资源之间的联系，使文献揭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3．注意揭示文献间的联系，重视揭示其变化情况及社会影响

现代文献的发展表现为数量剧增、老化加快、载体多样、语种繁多、分布分散、重复严重、内容变化频繁等特点。因此，文献揭示应当重视文献的变化情况，

使读者获得有关文献的全面信息。特别是对于网络文献,还要注意处理好其定位不稳的问题。

(四) 文献揭示的深化

一方面,随着各学科日趋交叉、复杂以及读者对文献需求的专深与准确,文献揭示的方法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为文献揭示的深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文献揭示的深化成为可能。由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及超文本技术在信息检索与组织的广泛应用,每篇文献除了提供篇名、著者、主题词、分类号等检索点以外,还应提供文摘,甚至全文中的每个词都要成为检索词,从化学反应式等文献的内部特征到文献的语种、出版社、出版期等外部特征都可以成为检索单元;网络信息检索不仅要能提供文本检索,还要能够提供声音、图像、图表等非文本检索。这样,就必须揭示这方面的特征,提供检索标识。另外,还应建立功能强大的检索系统,为用户多途径检索、提高检索效率提供便利。

二、文献揭示的基本方法

(一) 文献著录法。著录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文献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分析、选择、记录的方法与过程,它是通过著录事项(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附注项等)来实现的。著录是确认某一文献的基本依据,也为获得文献提供了检索的初步途径。著录是揭示文献基本特征的重要方法,目的是为了揭示和报导有关文献的基本特征,为读者提供确认某一特定文献的信息。它也是文献揭示最简明、最基本的方法。

(二) 文献提要法。提要又称解题,我国最早称之为叙录。它是简明扼要地解释文献题意、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思想以及揭示文献内容与评价学术得失的方法。提要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与学术渊源;也方便读者熟悉、鉴别、选择与利用文献,获得读书的门径。它被广泛应用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宣传,书目编制与文献编目、古籍整理、读书治学与科学研究中。

(三) 文献摘要法。摘要是对文献的内容所做的简略而准确的描述,它是用简要准确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文字摘述文献主要内容的方法。文摘的用途在于向读者报导最新科学文献,深入揭示文献内容。查阅文摘,可以节约阅读时间,避免阅读无关紧要的原文;可引导读者选择文献,确定原文与查找课题的相关程度;还可克服语言时空障碍,了解多种文字文献的内容精粹。文摘是揭示文献内容、传递有关文献情报的重要方式。

(四) 文献索引法。索引是把一种或多种书刊文献里的事项或知识单元,如字、词、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篇名等)与主题等,按照有利于寻检的方式加以编排,注明出处,并能提供文献资料线索的一种文献揭示的方法。它通常不提供

信息或知识内容本身,只提供一种指示系统,使读者能够准确地找出文献或信息集合中的特定信息,起着“向导”或“指路人”的作用。按揭示的对象又可分为报刊论文索引、书籍索引(包括专书、群书或书后索引)、年鉴索引、类书索引、百科全书索引以及专利号索引、标准号索引、分子式索引等。

(五)文献评价法。文献评价是对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介绍与评论的方法。评论学术论著,就具有学术评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为揭示文献内容的重要方法,文献评价对于了解、认识、熟悉文献来讲是必要的情报源。同时,也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不可缺少的工具。文献评价常常是评中有介、介中有评。它既可推荐优秀图书、论文,也可抨击粗劣出版物,在辅导阅读、推动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以及促进学术交流与提高等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文献注释法。我国目录学界很重视利用书目注释来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注释有时以脚注形式出现,补充说明书名、著者或版本以及篇目的内容。书目注释是文献揭示最灵活的辅助方法之一。

(七)文献综述法。综述是在对某一特定学科或专题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关于某学科或某专题的具有报导性(概述性、评价性)和资料性的科学文献。它对相关的文献群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出该学科或该主题的研究现状、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综述的显著特点在于,它通过对相关的文献群进行分析研究,逻辑推导出原始文献中并未直接表达出来的信息,因此,综述是文献揭示的深化,可节省科学工作者或专业工作者的阅读时间,帮助他们系统了解一批相关文献的内容,获取大量文献信息,有助于他们捕捉科研课题。又由于综述中包括某一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趋势与展望,所以也常常被领导部门用作决策的参考。

第二节 文献著录

一、文献著录的要求

文献著录,也称目录著录、书目著录,是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通过对文献的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进行客观描述的过程,目的在于准确地揭示和反映文献,它是文献信息服务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揭示文献最基本、最简明的方法。

为了迅速准确地为读者提供辨认某一特定文献的有关信息,著录文献时应遵循如下要求:

1. 著录事项的完备性。为了迅速而又准确地满足读者对文献各式各样的需求,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文献的基本特征。著录的完备性,主要表现在选择

著录事项要完备,以便为读者提供充分辨识文献的条件,使文献揭示向广度发展,反映文献内容之间的联系。

2. 著录数据的准确性。著录工作直接关系到书目数据的质量,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特别是计算机编目条件下,由计算机识别与储存编目数据,只有准确地进行著录,编目数据才能得到有效利用。数据录入过程中,多一个字符或少一个字符,多一个空格或少一个空格,全角或半角状态的选用,都会造成检索误差。因此,著录事项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图书文献的外形特征和内容特征,应严格按照文献著录规则与相关标准来著录,确保著录数据的准确性。从而为读者准确辨认文献,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3. 著录内容的客观性。对主要著录项目的描述,严格按在编文献规定信息源上(著录对象)的文字如实著录。这些主要著录项指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版本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发行项和丛编项等。

4. 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实现文献著录标准化是实现文献著录国际化、网络化、自动化的必要条件,它对推动和促进世界各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有着特殊的作用,是提高检索效率和开展国际文献交流、实现资源共享的基础,也是实现国际书目控制的条件,有助于推进集中编目与合作编目。文献著录依赖于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支持,文献著录的依据是著录的规则与标准,它们是对文献实体描述的著录项目、著录项目排列顺序、著录项目使用的标识符号所作的规定。因此,在文献著录的过程中要以标准为基础。为实现著录的标准化,必须制定统一的、标准化的著录规则,走全国标准化和国际标准化的道路。

二、客观著录与规范控制

目前,我国图书馆界仍然存在的"重著录、轻标目"的现象。一方面,书目资源加工数量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数据的不一致、不统一现象比较严重,难以实现书目信息的交流与共享。随着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的发展,只有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才能为信息的可获取性提供实质性保障。因此,书目数据库建设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课题,对于标目的规范成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内容之一。

现代图书馆完整的编目流程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著录(描述),二是规范控制。著录是对文献的客观描述,规范控制的对象是书目款目中的标目。规范控制(Authority Control),又称权威控制,是为确保标目在检索款目及书目系统的惟一性和稳定性,而建立、维护、使用规范款目和规范文档的工作过程。它是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范控制的内容包括:(1) 编制规范数据款目,并用统一标目(规范款目)编制书目款目;(2) 将规范款目、参照款目和说明款目按照一定原则组织成规范表

或规范文档;(3) 将规范文档和书目文档依某种形式连接起来,形成规范书目系统;(4) 规范文档和书目文档的维护和评估。规范控制的目的主要表现在确保标目的正确性、一致性、关联性和稳定性。

三、网络文献的著录

对于网络文献的著录问题,目前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采用 MARC 与文献著录规则来描述网络文献。许多图书馆界人士主张以 MARC 格式来描述网络信息资源。提出的理由是:(1) 标准的信息交换格式;(2) 适用不同的描述层次;(3) 弹性的呈现格式;(4) 多种检索点;(5) 完整的书目描述;(6) 能够将不同的资源整合在一个目录中,便于读者从一个目录检索不同的信息资源;(7) 图书馆有义务对网络资源进行编目,以便读者到图书馆中检索、利用网络资源。(8) 能最好地与现有书目数据库兼容等。

由于网络资源形式(格式的多样化、易变性、易于复制性)、检索方式及使用环境的描述需要,注定了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揭示有不同于传统文献之处,有必要对 MARC 格式进行修改与完善。其修改主要在以下两方面:第一,采用5--字段。为了提高对网络资源格式的标识能力并满足用户的检索需求,采用5--字段记录网络信息资源的格式。如用 500、520 字段分别记录一般附注和摘要附注,用 516 字段反映计算机文件类型或数据注释等,而 538 字段是用于指定所需的特定程序或程序的类型等。第二,采用 856 字段。这是网络信息资源编目所特有的字段——“电子定位与存取”字段,专门用于记载网络信息资源定位与存取方式。它是连接因特网资源与图书馆 OPAC 书目的一座桥梁。

第二种观点主张采用元数据来描述网络文献,以元数据 Metadata 方式揭示网络信息资源,就是利用 Metadata 标准描述网上一次信息的特征,对其内容进行压缩,使网上一次信息进入二次信息,实现对网上一次信息的控制,在逻辑上序化和优化网络信息资源。元数据通常被定义为数据之数据,它包含用于描述信息对象的内容和位置的数据元素集。元数据究其本义和功能,就是描述文献信息资源的著录数据,也可说是电子目录。

利用 MARC 和文献著录规则方式与利用元数据方式对网上资源进行揭示,两者各有其优缺点,不能相互取代,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将会共存。

第三节　书目提要

一、书目提要的内容与作用

提要是一种简明扼要地解释文献题意、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思想以及揭示

文献内容和评价学术得失的方法。在我国古代称之为“解题”、“叙录”、“志”、“考”等,现在也称“内容提要”、“内容简介”、“摘要”等。撰写提要是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目录”一词中,最早时,“目”是指篇卷的名称,而“录”就是关于一书的内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迹、校勘经过、评价等简要文字的说明,又称叙录或书录。它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揭示图书概貌。提要在我国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章学诚强调没有叙录的书目,不过是“甲乙簿注”,无法“讨论流别”,难于“辨章学术”。

提要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尚无定论,不同类型或宗旨不同的提要,内容有所侧重。杨薇在《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一文中将提要著作内容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1) 书名、卷数、撰者;(2) 作者简介;(3) 著述缘起;(4) 书名解释;(5) 内容介绍;(6) 学术源流;(7) 优劣得失;(8) 版本情况。提要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作者简介、内容介绍、学术源流、优劣得失。通过介绍作者生平事迹主要是学术生涯及其主要学术著作,概括总结图书内容,介绍撰写体例以及对同类书籍的比较,辨别学术源流。

我国历史学家、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陈垣编著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解题部分基本上包括:(1) 诸家目录所记载的异名、略名。(2) 作者小传(着重在学术思想方面)。(3) 历代诸家目录所记录的卷数有何出入,辨别哪些是残本,哪些是善本等。(4) 本书共有多少种版本,各种版本的优劣及其递嬗关系。(5) 本书之主旨、内容和体制。(6) 本书之特色(或得失)。(7) 本书在学术上的利用,说明后人所写的书中,有哪些是模仿此书体例的,有哪些是引用了此书中的材料,也说明本书中有些什么材料,适合作某项科学研究者采用等。(8) 前人著录订误等若干部分。并将第(5)至(8)单独列出专门叙述,很好地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

提要通过整理书籍,揭示图书内容,能够起到记录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反映一代或历代的学术状况的作用。正是有书目提要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才使得目录学在整个时代学术领域和研究结构中成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如《20 世纪影响世界的百部西方名著提要》一书,精选 100 部对人类有巨大影响的名著,通过提要的方式来向读者进行介绍。这 100 部名著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物理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所有提要均由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撰写,提要内容大致包括:作者生平及著述与学术或艺术成长历程、内容提要及简析与作品主要影响等方面。该书以其精美的译笔、酣畅的叙述、严密的逻辑与简明扼要的文字,为读者准确诠释学科领域的代表作,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领略人类文明的成果。

应当承认,当前还存在不重视提要的现象,认为计算机编目提供了众多的检索点,主题词和分类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献的内容特征,全文检索功能强

大,撰写提要则费时费力。而我们认为:描述文献外部特征的著录事项并不能完全揭示文献的内容特点,但主题词不够具体,分类号不够直观,不易被读者识别,全文检索"噪音"太大,对文献内容的检索才是读者的检索实质。忽视提要,就不能向读者提供足够的、准确判断文献内容的依据。读者只有对某文献的内容进行判断,才知道该文献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目前,一些外文网络文献的著录中,采用提要描述其内容,为用户提供检索与判断的依据。书目提要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更有必要发扬光大。

二、提要的主要体例

提要在我国渊源较早,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国古代以目录有无解题和解题撰写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书目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录学家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写道:"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又说:"其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日本目录学家小见山寿海在《书志学》一书中说:"解题是一书一书的记载,比较的详细。也就是每种图书的品题解说。"又说:"解题即品题,即解说,即介绍,即批评或评价。""书目有解题与无解题,到底不可同日而语。"提要确实成为揭示文献内容的重要方法。我国古代提要主要有以下三种体例:

1. 叙录体提要

编写叙录的方法始于孔子及其弟子。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一般认为,《诗》、《书》之序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其中介绍诗、文的写作背景和意图者,为小序。叙录体导源于所谓"言其作意"简单叙述作品主题旨意的书序。西汉时刘向、刘歆整理校勘宫廷藏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遂成《别录》。刘向在整理图书和编纂书目过程中,给所校的每一部书撰写叙录,阐明校雠经过,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辨别图书真伪,评价图书得失。《别录》首开叙录体提要之滥觞,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种叙录体提要,为揭示文献内容提供了一个范例。其编写体例,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写道:"叙录之体,源于书序,刘向所作书录,体例略同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其谋篇行文,皆有法度。"叙录体提要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审定和鉴别图书的版本,说明校雠经过;(2) 评价作者生平及其学术思想;(3) 评价图书的内容。

2. 传录体提要

传录体提要是王俭在编《七志》时所用的体例。据《隋书·经籍志·序》说:《七志》"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介绍作者生平,力图让人们通过了解作者,去了解文献内容及考证文献。这种传录体提要,是刘向之叙录体提要中"推论其生平"的扩展,独立形成我国古代传录体提要体例。

3. 辑录体提要

它基本上是引用成文,广泛辑录与一书有关的资料如序、跋、题记、历代目录的叙录、注释、列传中的叙述文字等于书名之下,成为提要,供研究参考之用。这种体例的提要以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它不但辑录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资料,而且还辑录了汉、隋、唐、宋等朝的艺文志、经籍志中各种书目的序、跋等文字,以及史书列传、各种文集内的有关资料。朱彝尊的《经义考》、章学诚的《史籍考》等皆仿其例,形成了我国古代书目提要的一种特殊体例。这类提要虽很少编者个人见解,但辑录各家关于某一图书的评说,资料丰富,对研究文献的源流得失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代的书目提要主要有:(1) 推荐性提要:是揭示文献的内容要点,向特定的读者群推荐的带有评介性质的提要,它强调发挥提要的教育职能。(2) 叙述性提要:主要揭示文献中心思想和主要特点。(3) 考证性提要:以鉴定文献为目的,简要考证文献的作者、内容、版本及存佚源流;其资料丰富、考证充分,对于判定文献的流传、真伪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三、书目提要撰写的方法

黄俊贵、罗健雄在《新编图书馆目录》一书中将其编写方式归纳为五种:(1) 简介法。客观地有重点地介绍著作的主要内容、作者、版本等,向读者提供有关著作的概貌。(2) 提示法。对著作内容的研究对象、论述命题或某一问题中的现象,提出疑问,以促进读者思考、探索,引起读者学习、研究的兴趣。(3) 评述法。对著作内容进行评论,指出优劣,以指导读者阅读。(4) 引述法。通过直接引入革命领袖、知名人士、学者等对著作或作者的评论,扩大著作的社会影响,加深读者对著作的印象。(5) 综合评介法。对著作内容兼有介绍和评论,综合运用提要编写的各种方法。

柯平在《文献目录学》一书中提出六种提要撰写的方法:(1) 比较归纳法:将此书与彼书进行比较,得出结论。(2) 列举章节法:将本书章节一一列举或加以说明。(3) 重点突出法:突出评价或介绍本书的某一方面(书中内容、作者生平、某一学术流派风格、写作特点、版本特征等)。(4) 评介结合法:评价图书和介绍图书相结合,或先评后介,或先介后评,或介夹评。(5) 摘录转引法:在提要中通过摘录书中的警语妙句或转引名家的评论,概括本书内容,说明本书价值。(6) 参考改造法:即参考本书的现成提要(出版提要、新书介绍等),结合书目类型及读者需要加以改造。

要根据图书学科性质、书目类型、读者对象等因素,选择适当的方法撰写提要。

四、提要撰写的基本要求

1. 评介客观

提要以客观介绍文献为主，如没有把握，对文献只作介绍，不作评述。对文献的介绍应准确、客观，如实地评价、忠实地反映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 注重简明

提要是对文献内容进行简介或评述，不宜冗长、隐晦奥涩。撰写提要的目的是为了给未接触过该图书的人对此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提要的语言要简明扼要，精练隽永，生动活泼。

3. 重点突出

撰写提要时，要重点把握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内容，包括书名含义、作书要旨、中心思想、内容梗概、学术成就、艺术特色、价值、地位和影响等。二是作者，包括生卒名贯、生平事迹、思想观点、学术见识、创作风格、治学方法和学术地位等。三是版本，包括图书异同和真伪等。要善于用概括性的语言突出文献的主题思想、重要论点及主要特色，而不必面面俱到。

总之，撰写提要必须找出重点，抓住要素，提纲挈领，简短易懂。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从阅读原始文献的序跋、前言、后记及目次入手，必要时也需要翻阅原著。编写提要还要注意结合文献的性质与特点，力求准确，切忌冗长、空洞、夸张、跑题。

第四节　书　　评

一、书评的概念与作用

(一) 书评的含义

书评，简言之，就是对图书的评论，是关于图书的思想内容、价值特色、写作技巧、社会影响等方面所作的评述性文章。书评是揭示文献内容与价值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工作对象应该是图书的整体性能(包括内在的与外在的)，并以内在整体性能为主。段维在《书评本体论》一文中提出：所谓内在的整体性能包括整体思想内容、表达形式、逻辑结构等方面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是否和谐；所谓外在整体性能是指图书整体装帧设计、印制、用料等及相互间的谐调性。我们赞同黄建铭《书评的本质与信息功能》中对于书评的定义：是以科学的观点，对图书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有见地的剖析评论，分析图书的优劣对错，评议图书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影响力，并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揭示报导各种文献信息载体的方法和文体。

书评较之以宣传、促销为目的的图书广告而言,强调以客观的评析为主;相对于对图书的内容提要来说,它注重于对图书内容的深刻揭示与分析;书评也区别于专业的学术论文,专业学术论文是将图书作为提供问题的材料,研究与评论某一人物、某一件事或某一主题,而不需要对该书作全面的介绍与总的评论;书评也不同于读书心得,读书心得是从阅读的角度出发,就某一观点、事件、人物等所引起的联想,记录从中获得的启示和裨益。书评较之心得更为客观、系统,是全面评价图书的整体性能的优劣得失。

(二) 书评的职能

书评以有助于促进对原作的理解和有助于确立原作在专门史上的学术地位,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书评的主要职能有:

1. 通报职能。书评具有通报被评书相关信息及书评者对被评书的价值判断信息的职能,这是书评最基本的职能。对于作者、出版者来说,书评向他们通报其所著(出)图书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评价和看法;对于读者和图书发行者来说,书评向他们通报书界的动态及书评者对书的价值评判。书评所通报的信息量的多寡,是衡量书评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2. 鉴定职能。评论是书评的灵魂与主体。它涉及著作的各个方面,如:图书内容是否充实,论述是否充分,观点是否明晰,论证是否透彻和深刻,是否有新的见地和突破等。书评就是要评出其优劣与得失,《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指出,书评的根本功能在于鉴别作品的高低、优劣、真伪,向读者作出公正、客观的鉴定。首先是不要轻视和小看书评。其次,写好书评并不容易。我们呼吁,为向读者负责起见,书评应当讲真话,讲实话,好则要讲出好的理由,不足要说出不足在何处。提倡书评的争鸣和讨论性。应当唤回真诚与良知,停止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叫卖,书评不是广告,书评也应当打假。只有这样,才会有优秀的书评,才能树立良好的学风,才能改变精品"藏在深闺人未识"或者平庸作品泛滥的现象。书评作者以其准确的、求实的、客观的评论,架起了读者通向书籍的桥梁,成为沟通作者与读者的纽带。

3. 激励职能。书评的激励职能是与鉴定职能紧密相连的。它是指书评对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等所起的刺激、鼓励作用。书评作者在认真阅读图书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撰写书评。写书评的目的,是为了扬善揭短,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便读者阅读和审辨。优者表彰、鼓励,可以鞭策作者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劣者批评,可以帮助作者发现书中错误与不足,促其改进,书评具有激励与监督的职能。

4. 导读职能。在浩瀚的书海当中,如何鉴别图书,书评作者就要发挥书评信息导向职能。从读者的阅读过程来看,最先引起读者对图书的关注,则是书评通报职能,能使读者先入为主;使读者产生购买欲望的则是书评的激励职能在起

作用;而鉴定职能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起阅读指导作用。

二、书评的类型

不同的划分标准,产生不同的书评类型。

按被评图书的专深程度与书评的读者范围区分,可划分为大众书评与学术书评。具体来讲,大众书评是为大众阅读的文艺及各种知识性、普及性读物所写的书评,被评图书涉及读者面广、读者量大。如文学、史学、传记、科普读物,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各门类的普及读物等,是为专业以外的普通读者所写的书评。这类书评大多发表在报纸的书评专栏中或散见于副刊、专刊上,乃至于一些大众性的期刊杂志上,特别是面向广大读者的读书杂志或书评期刊上。及时关注反映时尚的书籍是大众书评的特色之一,如被影视剧炒作的书籍。

学术书评是相对于大众书评而言的,又被称为"专业书评",是指对专业性强的专著,由同行专家为本行业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所写的书评。这类书评一般发表在专业性强的学术刊物上,篇幅往往较长。学术书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目的在于提高学术水平,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它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学科规范和这些规范背后的学术道德、学术良知以及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

蒋原伦在《书评——当代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一文中提出要为学术书评划定一个大概的范围,应当关注的条件有:第一,学术书评的对象是以在思想、学术、艺术、科技等领域里进行严肃的探索为目的的书籍;第二,学术书评的内容是对所评书籍的一切探索和所取得的成果作出相应的反应和合理的评价,并给以定位;第三,学术书评的作者是相对而言的专家,对所评书籍涉及的领域(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领域)应有一定的发言权。

按书评作者对所评图书持有的基本态度与倾向,可分为推荐性书评、批评性书评与分析性书评三种类型。推荐性书评作者认为所评图书有重大的正面的价值,对其充分肯定与褒扬并积极向读者推荐。批评性书评对所评图书持批判、批评或否定的态度,指出其严重错误与不良影响。而分析性书评是书评作者认为被评图书具有值得基本肯定的价值,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分析,冷静评述,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信息的海量增长以及网上读者的巨大需求,以涵盖面广、时效性强的网上书评作为书评的一种新类型,已深受读者欢迎,书评的信息职能也得以强化。目前有些公司通过网络提供图书评介信息,如美国的 AMAZON 在网上提供 170 万余种图书,大多数图书附有书评,并且可以由网上用户参与书评,能够进行书评的网上查阅与撰写,实现了书评信息共享。目前互联网

上活跃着数以万计的业余书评家,他们在一些著名网上书店、读书网站专家网和读者网等发表书评、交换看法和建议。书评家通过表格来完成书评,涉及的内容包括情节、主要人物、主题、框架、结构等。网站根据每篇书评的读者数量来给评论者定级,分值越高,表示该书评家得到读者越高的信任。

当前,图书馆开展对网络文献的评论是深化与拓展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措施之一。图书馆等文献机构可以在其网站主页上,以定题网评、新闻讨论组、咨询方式以及离线方式等网评的发布方式来开展网评工作,介绍与评论网络版的专业文献、数据库、相关专业网站等。从书评到网评,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开展的读者服务与参考咨询的一种新的业务形式,应当受到重视。

三、书评的撰写

(一) 书评的写作要求

书评是现代文化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萧乾在其《书评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书评家应是一个聪明的怀疑者;好的书评要用极简练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保持独立书评的关键是:持论客观,不捧不骂;书评要有棱角,切忌温暾之谈……

一篇好的书评应当做到:新、深、真、准、活。所谓“新”,就是要有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法;所谓“深”,就是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所谓“真”,就是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所谓“准”,是指准确,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所谓“活”,是指语言文字生动活泼,富有艺术魅力。蔡美彪在《学术性书评的要求》一文中提出学术性书评写作的三条要求:第一,必须对所评论的书作过深入的研究,从头到尾,反复阅读;第二,本人对所评书的研究对象也作过一定的研究,或至少有所涉猎;第三,应该熟悉同一领域的其他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样才能对所评书的成就和不足加以客观的评论。书评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学术书评,它是讨论学术的一种方式,是学人之间对话的一种便捷手段,它不仅应该准确地传达所评图书的信息,而且要提出评论者本人的见解。

只有真实地反映图书内容,深刻地评析图书的内涵,艺术地鉴赏图书特色,从而客观、公正、科学、准确评论图书,才能把握书评的写作精髓。

(二) 书评的写作程序

1. 选择图书。可在下列范围中选择所评图书:(1) 最值得推荐给一般读者阅读的图书;(2) 挑选本专业或较为熟悉的图书,或自己感受最深的图书;(3) 挑选读者面广以及影响大的图书;(4) 挑选有严重缺点或错误的图书;(5) 新出版的图书等。

2. 阅读。阅读是书评写作的基础和前提。首先是要认真阅读所评之书,其次是要广泛阅读与所评对象论题相关的有关著作。还要作详实的笔记,包括全书的

摘要以及章节和段落的摘要，以及重要段落的改写，全书主要论点的摘录等。

3. 查阅被评图书的有关资料。查阅资料包括：(1) 有关作者的背景材料；(2) 被评图书的有关材料，阅读同类书，并与同类书进行比较；(3) 查明该书是否已作过书评，为书评撰写确立新的角度；(4) 了解读者对被评图书的反馈意见；(5)了解被评图书的出版与发行情况。

4. 列出写作提纲。

5. 撰写书评初稿。

6. 修改定稿。

（三）书评写作应注意的问题

1. 书评写作应以为被评图书的准确定位为前提

书评一般由介绍与评论两部分组成，以评为主，介绍为辅，重点介绍图书的主要成就、重要的论点论据等，在深入研究被评图书的基础上，从图书与时代的大环境、图书与文化的大前提出发，比较被评图书与同类图书关系，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阐明原著的学科价值及成败得失，确立其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准确地为所评图书定位。

2. 书评写作要以实事求是为条件

书评写作的前提是阅读，对所读之书，认真思考，有所见解，观察体味该书的与众不同之处、独树一帜之处，评述其特点、创见、开拓性、原创性。通过评论，评出原书的本来面目，特别是评出原著的本质、精髓与核心，以至挖掘出原著作者的思想、灵魂，评出图书之得失，扬善揭短，以帮助读者阅读和审辨，正确认识作者，全面理解原著。因此，书评作者必须秉公直书，客观公正。

3. 书评以对被评图书的全面分析与价值判断为归宿

书评是评论文，要对被评图书作各方面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并提出批评见解，萧乾在其毕业论文《书评研究》中称其为“批评格”，并将之分为十个成分：书名或标题恰当与否；形式及文笔；内容适宜性；全书组织；对读者的适宜性；同类著作之比较考察；引据他人的评语；评者由书中所得的启示；主要功过概述；献意或展望。至今仍对书评创作与研究具有影响和启示。总之，我们在写作书评时，要判断作者对于资料的掌握是否恰当，是否使用新资料；作者论证部分是否充分、妥当，论点是否言之有理以及与学术界相关问题的关系等；作者是否注入新的研究视野；所评图书推荐读者对象是否合适等。

学术著作的撰写，是学术研究的结果。评论这些学术著作，则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表现方式。优秀的书评文章不仅是对原作的阐释与评价，而且是对原作的一种丰富与提高、超越与创造。书评是揭示与报导文献的有效方式之一，应当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

第五节 综　述

一、综述的含义与作用

(一) 综述的含义

数字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反映其成果的各种载体与类型的文献不断涌现,信息的海量增长与网络技术、超文本技术与数据库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应用,一方面给用户利用信息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为用户挑选、甄别和使用信息造成困难。能够对原始文献进行分析、综合、提炼,进而编写出全面反映某学科或领域及专题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与走向,对原始文献进行深度揭示的情报表述——综述,以其信息量大、综合性强、揭示度深、覆盖面广,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及其他用户的重视与欢迎。

郭星寿在其《社会科学文献学》一书中指出:“所谓文献综述,是指以某一课题为范围,从一定时期和一定数量的科学文献中选取可供读者参考利用的情报资料,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而写成的具有报导性(概述性、简介性)和资料性的文章、专题报告和论著等的情报产品”。《目录学(修订版)》将综述定义为:“对某一时期特定学科或专题的一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综合、概述性的科学文献”。尽管人们对于综述的定义表述目前还不尽一致,但考察上述两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均揭示了综述的主要目的和功用就是为了使读者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全面了解,而围绕某一课题对大量相关的文献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提出的是反映其动态和进展的一种概述性成果。

(二) 综述的特点

综述的主要特点是:

1. 综合性。综述要求对选题的有关原始文献进行高度综合(归纳、浓缩、概括),这是综述的本质特征。综述属于三次文献,它是作者在广泛与深入研读有关选题的大量文献资料后,对其分析与整理,概括出选题的研究进展,是一种集科学研究与情报研究于一体的研究成果。

2. 客观性。综述的价值与生命体现在它的客观性,其所叙述与提炼的理论、方法、观点、数据等,均取自并且要忠实于原始文献。为此,综述者必须首先审查原始文献的真实性,其次还要准确理解原始文献。要客观对待和真实反映学术观点与学科、技术发展现状。

3. 浓缩性。综述在表述过程中,一般将各种原始文献中的相关部分进行集中与归纳,以凝练的文字表达深刻的观点,提供经过优化组合后的信息。通过浓缩,将有关选题的进展情况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地呈现给读者。

4. 预测性。综述是以现有科学文献为基础，采用多种方法，以发展的观点进行总结与梳理。在揭示某一学科(或领域)的进展的同时，指出其发展趋势。阅读综述，能够掌握学科或某一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与走向。

另外，综述还具有新颖性的特点，概括与反映围绕选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等。

(三) 综述的作用

1. 最新信息的深度揭示作用

索引、文摘与综述作为揭示文献的方式之一，各有特点。索引提供文献的线索，但不揭示文献内容。文摘揭示个别文献的内容，对同类文献不作比较，缺乏系统性。综述以其全面、综合、系统及客观为特点外，还具有对信息的深度揭示作用。它以与选题相关的众多原始文献为基础，对一定时期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全面、系统地概括与总结，从文献中梳理出学科、专题或某一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是对文献内容的浓缩与提炼、优化与重组，从综合与比较的角度，为用户提供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动态信息。

2. 科学研究的指引作用

综述具有系统全面揭示某学科或技术研究的历史、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导引作用。如果将综述文献涉及的学科或专题按其年代顺序汇总排列，就是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专题研究全貌的缩影和动态的写照。有助于科研人员系统掌握学科或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水平，预测发展的趋势。还能够节省科研人员大量的翻阅原始文献的时间，在科研选题、技术方案的确定、主攻方向乃至科研的整个过程中起到指引作用。

另外，综述文献还可作为科技查新的引导工具。其作用主要在于：(1) 有助于迅速理清关系，提供可比性。综述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某领域或专题的动态演变过程，其时间顺序清晰，有助于较快地建立相关性判断。(2) 有助于及时掌握研究的动态与水平。综述文献提供的较深的知识背景与较权威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全面、历史地看待某项研究的创新状况。综述还可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的途径。

3. 系统学习的书目作用

综述是对原始文献的内容分析与综合之后，重新组织与整理而成的三次文献，文中涉及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原始文献，作为参考文献附在文后，用户可以凭借它进行回溯检索。通过阅读综述及所附的参考文献，能够快捷地了解与特定专题相关的参考资料，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学术信息，有助于用户进行系统学习，及时更新知识，从而不断提高学识。

4. 决策管理的参考作用

制定某项决策与规划时，需要全面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获取其各方

面的信息。通过比较、分析与借鉴这些信息,制订出合理的、可行的规划与决策。综述汇集了某领域、某行业、某地区的进展性、趋势性的综合信息,成为决策与参考的依据。

二、综述的类型

综述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按其用途与读者的对象,可分为: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的综述,为教学与科研提供的学术性综述,为普通读者提供的科普性综述;按综述的对象与文献来源,可分为会议综述、动态性综述、统计性综述等;根据研究人员对原始文献的内容、原作者思想观点揭示的深浅程度与写作方式,可将综述分为描述性综述和分析性综述。

下面,重点介绍描述性综述、分析性综述和会议综述。

(一) 描述性综述

描述性综述,也可称之为概要性综述、文摘性综述等。综述作者从具有共同主题或专题的大量文献中,选取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原始文献所探讨的问题以浓缩的、系统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忠实地描述原始文献作者的观点及其创造性的内容,重点在于述,对于内容不作分析与评价,是述而不评。如柯平的《关于美国图书馆事业研究文献综述》就是一篇典型的描述性综述。该文以文献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对近期我国学者关于美国图书馆事业研究的文献进行综合论述,分别从美国的图书馆事业的现状与发展研究、美国各类型图书馆的分析与介绍、图书馆事业的专题研究、图书馆交流成果等四个专题,为我们全面系统地提供了近期美国图书馆事业研究的文献状况和主要观点。

(二) 分析性综述

分析性综述,又称评述性综述。编写者除了全面总结所综述学科或专题的进展外,还对于研究课题或专题及研究文献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提出自己的观点,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水平与发展趋势等。采用既述又评、述评结合的方法。相比描述性综述,分析性述评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陈铭、郑建明的《20世纪9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综述》一文即为一篇评述性综述。该文从目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录学方法研究、目录学分支学科研究、目录学史研究、书目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六个方面总结与评述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目录学研究的全貌,分析了目录学发展的不足,提出了新世纪目录学分化与综合、整体化与科学化的趋势。

(三) 会议综述

学术研讨会作为开展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作为总结与报道会议情况的会议综述就成为综述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它是对学术会议概况、讨论的主题以及会议中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争论加以逻辑归纳、

高度概括而写成的综述,是学术讨论会的综合报道。何朝晖、朱强撰写的《直面挑战 开创未来——“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就是对1998年10月25—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一篇会议综述。该文围绕“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讨论的主题,从六个方面综述会议内容,探讨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使命和地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三、综述的撰写

(一) 综述的撰写格式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一书中提出撰写综述应涉及下面四个方面的内容:(1) 提出问题。简要说明所要综述的问题和其重要意义。(2) 发展概述。按时间顺序,追溯某一课题的历史发展,包括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情况,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变化与影响因素。(3) 最新动态。对各国情况、各流派、各观点、各方法等进行横向对比,同类比较,反映差异。(4) 发展方向。概述某一课题今后发展的各种预测、各种观点、各种建议。另外,还要指明撰写综述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过程等。这样,通过对相关文献群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出该学科或该主题的研究现状、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般来说,一篇完整的综述应由标题、摘要、正文与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目前,综述的撰写格式尚无定论,但总结与分析众多的综述文章,大都采用以下的写作格式:

1. 标题。标题是对综述主要内容与主题的集中表述,一般的文献综述在标题中冠有“综述”、“动态”、“概述”、“研究进展”、“现状与前景”等字样。读者通过标题就能明确文章的性质。

2. 摘要。是对该综述内容的简介。

3. 引言。主要阐述撰写本篇综述的原因、目的、意义、写作方法、综述涉及的时间范围、综述的主题内容等等。引言应力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4. 正文。正文是综述的主体,是综述者对收集的原始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比较之后,阐明的有关主题的现状、发展方向与综述作者自己的评析观点(指分析性综述)。正文没有固定的写作格式,一般采用列小标题的方式列举要综述的问题,小标题即为关于论题的小议题。标题下面列举有关该议题的各家学说、各派观点等。

5. 结语。在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6. 参考文献。按照引用的先后顺序排列,采用对应法即标注引文与正文中具体的引用文献处对应地编码排列。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便于读者查对原文和进一步研究。

（二）综述的撰写程序

1. 选题。选题是综述写作的起点。要在深入思考、反复研究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立综述的选题。在选题时要注意：一是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二是选题应有针对性，选择那些属于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或科研与决策中亟待解决、又具有较大价值的问题，还要选择应当引起关注而尚未得到重视的问题；三是选题要有可行性，既要考虑原始文献的可获得情况，又要考虑综述者对于学科领域或专业的了解情况；四是所选题目要有明显的时空界限。

2. 检索原始文献。在确定综述写作的题目与主题后，要围绕题目检索与选题有关的文献。首先要确定文献源，其次要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包括传统的书目、文摘、索引和机读型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搜索引擎等工具）查找与选题有关的各类文献，还要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鉴别，注意从文献的可靠性、权威性、先进性与适用性等方面进行筛选。

3. 整理、分析与研究文献。综述文献的编写过程，是对原生文献不断浓缩加工、优化组合的过程。综述者对原生文献群不断深化研究、综合考察、对比分析，寻找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一，对检索到的原生文献普遍浏览、熟悉，初步了解文献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进行浓缩加工，分门别类地进行摘录（包括主要观点、主要论据、主要结论等）。第二，在浓缩加工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组合，对浓缩加工后的资料进行再研究，比较、分类、分析、归纳，使之形成系统的、有序的科学资料。

4. 拟定提纲。拟定提纲是理清思路，构建结构的过程。根据文献收集整理与浓缩加工的结果，拟定写作提纲，为撰写初稿构筑简明合理的框架。

5. 写作初稿。围绕所撰写综述的主题和结构，将已浓缩加工的资料纳入到各标题和段落之中。读者能够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地了解到所论专题的演变过程、主要学派、代表人物与代表作、主要观点及各种观点的关系、研究热点与重点、有待突破的空白点或难点、发展趋势和走向等等。

6. 编列参考文献。引用或参考大量原始文献是综述的特点之一。要根据国家标准局 1987 年颁布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的要求编列参考文献。

7. 修改定稿。初稿完成后应反复修改。需要审定的内容有：结构是否合理与完整，逻辑是否严谨，内容安排是否恰当，主要论点是否论之有据，是否忠实原文，译文是否准确等。

（三）组织材料的主要方法

撰写综述的方法称之为“综述方法”，它是研究人员针对某一特定课题或专题，在大量占有相关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各级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文中反映的各家不同思想、观点、方法进行综合整理、归纳分析、概括提炼，最终形成

能反映该课题或专题研究水平和发展动态的阶段性的回顾总结、现状描述或未来预测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科学合理地组织材料是撰写综述的关键环节，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组织材料：

1. 列举法。又称汇集法：摘录同一概念、观点、理论、认识的不同论述，将其集中在一起，归纳成若干条目。一般有学术观点列举、方法学列举、地域性列举等；

2. 阶段法。是按历史沿革分段叙述，可将某个专题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归纳成几个发展阶段；

3. 重叠法。当不同作者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只是深度不同，范围不一，并无本质区别时，不用对其一一列举，经过分析与归纳后，将其合并成相对集中的论述；

4. 层次法。是将综述内容按其内在的规律分设若干个层次，每个层次可设置分级标题，各层次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5. 分析法。将综述内容归纳成几点进行重点分析或将要分析的问题归纳成表格，逐表分析等；

6. 综合法。是综合采用上述方法来表述综述的内容。

组织材料时，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互有交叉。

(四) 综述的写作要求

1. 全面搜集与选题相关的文献是综述撰写的基础。一般来说，一篇综述与文献在篇幅上的比例为：1:30～1:100 之间，即一篇综述类文献的产生需用 30 篇以上的原始文献，也有的达到 1:150，有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综述部分已达到 1:300 以上。具体多少比例合适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但是，控制的原生文献(与综述主题相关的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大部或全部文献群)越多，综述的覆盖面就越宽，综述的价值就越大。要确保引用资料的全面翔实与数据的真实可靠，做到基本没有遗漏。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能否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原创性与可靠性的文献，直接决定着综述的质量和水平。

2. 扎实的文献分析与研究是综述撰写的关键。文献综述是作者在阅读有关大量文献资料后，对其进行分析整理、综合加工而成的学术文章，分析与研究文献是编写综述的关键程序。目前一些综述文章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综合的观点不够准确，对原文缺乏正确理解；二是缺乏对原始文献的归纳性，有些只是观点的堆砌与原话拼凑；三是缺乏特色性和创造性，表现为简单罗列一些并不全面的观点，缺乏汇总与综合，停留在浅层次的分析和综合上，未进行横向对比，未能梳理成纵向的发展轨迹，也没有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归根到底，是综述作者缺乏对文献全面、准确的分析与研究功底。对众多资料的高度概括与提炼是综述的本质特征，扎实的文献分析与研究工作是综述编写的重要环节。

3. 良好的专业素质与写作能力是综述撰写的保证。综述作者必须对本专

业领域现状及前沿有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最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能够敏锐发现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在筛选原始文献时，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以批判性的鉴别力、扬弃力来评价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使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发现新问题，寻求解决途径，提出独到见解。另外，较高的文献分析能力以及深入浅出、清晰易懂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是综述撰写者必备素质之一。

（五）综述写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 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综述是再生文献，其研究对象是一群原生文献，要控制的原生文献跨度过小，覆盖面过窄，就会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2. 要注意选择、提炼引用文献具有代表性、可靠性的观点。力求把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具有指导和借鉴价值的观点客观、真实地提炼出来，深入把握住所要综述论题的各个方面、发展脉络及趋势等。

3. 引用文献要忠实原文。

4. 不能混淆文献中的观点和作者个人的思想。综述的重点是分析、评价已经存在的学术观点和问题，并在“发展趋势”和“改进建议与措施”中，提出作者个人的思想观点。两者要严格区分，不能混淆。

5. 参考文献不能省略。对被引用原文或原义的原始文献，必须在所撰文章之后列出。

（六）撰写综述的要求

综述文献是一种对学术研究要求很高的创造性劳动，也是一项值得从事的、需要深思熟虑的工作。我国的《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一刊对撰写综述性论文的作者提出以下约定和要求：

1. 概念界定。本刊所说的综述是：对某一学科、学科分支或领域特定时期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全面、系统概括和总结的学术论文。

2. 学科范围。综述必须有明确的学科范围，并以准确的题名表达出来。题名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全概偏”。

3. 时间范围。文章应明确反映所综述学科发展的时间区间。一般有两种情况：(1) 在本综述之前已有人作过一篇或几篇综述，并且这些综述已能基本概括和总结当时该学科领域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除必要的补漏外，本综述应以前人综述为起点，着重总结以后的学科进展情况；(2) 在本综述之前尚无人对此领域进行过综述，或者说虽有综述但不足以概括当时进展，则本综述应对该学科领域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概括与总结。

4. 空间范围。综述内容应是全世界的进展情况，引证不应受文种限制。

5. 专业水平要求。综述者最好是从事本专业的科技工作并有所建树的专家。

6. 参考文献质量。参考文献是综述水平和价值的重要标志，因而必须保证

参考文献的质量。这种质量表现在三个方面:(1) 准确性。每条参考文献数据准确无误,著录格式见本刊征稿简则。(2) 完整性。综述引证文献应包括反映本学科特定时区内每一重要进步的全部文献;对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复性、验证性研究文献也应反映。(3) 原始性。这是对综述作者对自己所引证文献的熟知程度的要求:所引文献原文都为综述作者亲自阅读过;本刊认可少量的来源于检索刊物二次文献(摘要)进入参考文献表(应予说明);不允许将别人论文后的“参考文献”条目直接抄入自己的综述参考文献中。本刊有权要求综述作者提供其所列参考文献的任一文献原文。

7. 篇幅。鉴于综述的功能和学报的特点,我刊对综述的篇幅(包括参考文献数量)原则上不加限制,但一般以 1.5 万字以内为宜。

第六节　文献组织

文献经过书目加工后形成的各种款目,被收入到各种书目索引中,并不是随便堆砌的,而是要按照科学的方法使之有序化,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严密的整体,揭示出一批相关的文献特征,以便读者进行选择。

文献的数量浩如烟海,其内容非常复杂,包含着各式各样的因素,读者又是根据各自特定的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利用文献的,因此,文献的编排组织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检索效果。在进行文献的编排与组织时,必须考虑以下原则:(1) 文献外形和内容的基本特征,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标志;(2) 读者利用文献时习惯采用的检索途径;(3) 读者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一般来说,文献采取下列方式进行编排与组织。

一、分类法

它是按照文献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与其他显著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组织与揭示文献的一种方法。这种编排法的特点是:能够将同一学科内容的文献集中在一起,使学科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文献排在相近的位置,以便系统地揭示文献的本质属性和内容上的相互联系,在一定范围内系统地反映该学科的文献状况,以满足用户“族性检索”的需要,便于读者综观全局,触类旁通。

当前,人们利用文献比较集中,大多是需要有关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门课题的文献,所以,按照学科范围检索文献是一种主要的检索途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文献需求的专指度越来越高,用户难以掌握分类编排法,单凭线性体系的分类编排法,不能全面体现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加上新的学科和知识不断涌现,传统的文献分类法很难跟上形势的发展,必须与现代技术如超文本链接技术等相结合,向易用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二、主题法

它是将文献中论述事物对象的主题，用规范化的术语标引出来，然后按照主题的字顺编排文献的方法。能够把同一主题的文献加以集中，以适应用户“特性检索”的需要，主题编排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主题法是以自然语言或受控语言直接表达概念，能够做到灵活和准确；

(2) 主题法能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分散在各个学科中的文献集中在一起，适应读者对文献检索的综合性需要；

(3) 主题之间是互相独立的，又是按主题字顺编排的，显示出字顺检索的直观性和按课题检索的特性检索功能。主题编排法能够克服体系分类编排法的某些不足。但是，主题法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将具有共同学科属性的文献分散了。

三、时序法

它是按照文献的形成、出版的时间为标识来组织文献的方法。这种编排方法能够反映文献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联系社会和时代背景，更有利于了解文献的价值。按时序编排的学科书目，就是该学科的史册。个人著述编年书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以及时间性较强的文献，多采用这种文献组织方法。

四、地序法

它是以文献中所论述的国家、地区或其他地理特征为标识编排组织文献的方法。这种编排法能够以地区为中心集中全部文献，适宜于组织地方性特点比较强的文献，如地方志、农业文献、地理文献等。

五、字顺法

它是以文献的著者、书名、篇名等外形特征的字顺为标识来组织文献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字顺排列法多用于辅助性的编排。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比较复杂，字顺编排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 形序法：以汉字形体结构的某些共同点为标识来编排组织文献的方法。如部首法是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按照偏旁、部首归类的一种排检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将形体结构复杂而又很不规则的汉字归并在一定数量的部首之内，符合汉字结构的特点和人们的检索习惯。但是，部首的位置不固定，时左时右，时上时下，不易掌握。以笔画法(按汉字书写笔画多少为排列顺序)、笔顺法(按笔形顺序确定汉字排列先后)来说，由于人们书写习惯不同，汉字的笔顺又不严格，因此，这种方法很难统一。

(2) 号码法:是将汉字的笔形变成数目字,再将每一个汉字所取笔形连成号码,以号码顺序排列汉字的方法。号码的位置固定,检索方便。常用的有四角号码法、起笔笔形号码法、中国字庋撷法等。

(3) 音序法:主要是按照文献的名称、著者字音顺序进行编排。当前比较通行的是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编排法比较简便,符合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方法,各有所长,应当按照书目所收文献的状况和书目编制的专门用途,来确定哪一种排序法作为主要的,哪几种作为辅助的,使之形成取长补短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六、网络信息资源组织方法

1. 搜索引擎组织方式

搜索引擎组织网络信息主要采用主题树和数据库两种方式,也有称使用语词组织知识和使用分类法组织知识。所谓主题树组织方式,就是将信息资源按照某种事先确定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逐层加以组织,用户通过浏览的方式层层遍历,直到找到所需的信息线索,再通过信息线索链接到相应的网络信息资源。现有的提供目录分类式(或称主题指南、列表浏览)查询功能的搜索引擎就采用这种方法组织信息。而数据库组织方式,就是将所有已获得的网络信息资源以固定的记录格式存储,用户通过关键词及其组配查询,就可找到所需要的信息线索(即相关站点链接),并通过信息线索直接链接到相应的网络信息资源。

2. 专题指引库组织方式

它是根据特定的目标,选定信息资源的学科领域,对有关的网站网页进行搜索和收集,加以鉴定核实,并进行合理组织,使之能够提供检索、浏览和链接的信息集合。与搜索引擎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属于专题性和学科专业性的,系统性和易用性强。虚拟图书馆对网络资源组织是优越于搜索引擎的关键环节,它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需要,将 Internet 上与之有关的各种资源线索,包括与该学科或领域有关的研究机构、实验室、电子书籍、学术期刊、会议论坛、专家学者等的 URLs(即统一资源地址,包括 Http、Gopher、Ftp、Usenet 等),系统地组织起来,存放于某一网页,供用户浏览或者检索。用户在访问某一学科的虚拟图书馆的网页时,通过激活相关的超链接,就可以浏览到大量相关资料。

专题指引库的组织方式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分类方式,包括学科分类与资料类型分类,第二种为数据库方式。有的图书馆在组织学科网络信息时,既采用分类组织,又采用了数据库方式,以增强导航库的功能。

3. 热门站点链接或相关站点推荐

这是因特网上被广泛使用的、最简单、直接的信息组织与开发利用模式。

4.传统文献分类法的应用

以文献分类法为工具,从学科角度揭示网络信息,成为组织网上学术性知识内容的主要应用模式。陈树年在《文献分类学》一书提出文献分类法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的优势:① 文献分类法几乎都是综合性分类法,涵盖人类知识的各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通用性,对于科学、学术信息的组织更有独特的能力;② 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和运用既有成熟的理论与技术支持,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严格的词汇控制和完善的语义网络,有助于对网络信息的筛选和组织;③ 文献分类法是一个完整的知识分类体系,类目之间严密的逻辑关系,全面揭示了知识的内在联系,非常适合于浏览和对主题进行分类控制;④ 文献分类法有着长期的使用历史,并在各种文献数据库中广泛应用,有着深厚的用户基础;⑤ 文献分类法正在向电子化和分类主题一体化方向发展,更适合于对网络信息的组织。

传统文献分类法在网络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① 用于联机浏览检索;② 用于非文本信息的组织;③ 用于超文本系统的管理;④ 作为网络信息组织的通用工具;⑤ 促进分类主题一体化。据调查,目前有24家网站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DDC)建立网络信息分类检索系统。其特点是:收入的资源大多经过精心选择,浏览框架的内容更加详尽,扩大类下说明,并对类目体系深度进行控制等。这些,为我国文献分类法运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5.主题法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中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① 关键词法的应用。目前由搜索引擎软件自动建立的网络信息资源索引数据库所支持的就是关键词检索。关键词法具有标引速度快,成本低,不依赖专职标引人员,可由作者或机器自动标引,不存在人为性或滞后性,能及时应用最新的提法以及最新词汇等优点。但其致命缺点就是检准率太低。人们提出网络信息检索应导入受控语言机制,使用后控词表即"标引不控制+检索控制"模式。② 主题词表的应用。少数搜索引擎中提供主题词检索方式,在用户界面上,可直接浏览主题词表,从中选择主题词,作为搜索引擎的检索提问。用户可以在检索界面中修改检索提问,也可返回到主题词表界面重新选择主题词。其共同的特征是:词表内超文本导航。③ 标题词表的应用。通过标题词表规范用户的检索表达式,在得出检索结果的同时,还可以提供相关词作为用户进一步检索的线索,用户可自由进行扩检和缩检,从而提高检索效率。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　彭斐章.书目情报服务需求与服务组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　郭星寿.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4 柯平. 文献目录学.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5 徐召勋. 书评学概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6 吴平. 书评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1996

7 司莉.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揭示及其优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3

8 黄俊贵. 规范控制概说. 高校图书馆工作,1999(3)

9 曾海燕. 建立文献数据库规范控制的探讨.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7(1)

10 白玉钧. 综述类文献编写方法刍议. 情报杂志,1992(4)

11 黄孟黎. 综述——极具价值的三次文献. 图书情报工作,1998(4)

12 龚莹. 试论综述的情报作用及撰写方法. 图书馆学刊,2001(3)

13 杨晓茹. 关于综述性文献开发利用的思考. 图书馆建设,2001(3)

14 张森康,郭芸生,耿志国. 叙述性综述的策划与写法. http://www.37c.com.cn/literature/analecta/data/syyxjxzz/200000/zj037.html

第五章　书目文献编纂法

第一节　书目编纂法

一、书目编纂的理论基础

书目是将相关文献按照一定的次序组织而成的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属于二次文献的范围。书目编纂是二次文献编纂的一种,须遵循二次文献编纂的一般原则。书目的类型多,功能也各不相同,因此,研究编制方法和规则时应注意各自的特点。例如,国家书目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国家图书总目录,也是编制其他书目的基础,在选书范围上强调"全",在编制方法上强调标准著录和详细著录,在编目规则的应用上要求著录到详细级次。而推荐书目则强调所选文献的前沿性、代表性,甚至考虑所推荐图书的价格因素,以及是否容易获得等因素。在编目规则的应用上强调内容提要,特别是对所推荐图书的内容揭示与评论,而阅读方法同样是推荐书目所强调的。

尽管各类书目在编制方法上要求不同,但书目编纂过程中仍然应坚持这样一些指导原则:

(1) 充分地揭示文献的信息。文献信息包括:标题、作者、版本、提要、研究过程和结果、学术源流等;

(2) 对文献信息进行整序。我国习惯于用分类体系,集中了同学科文献,但分散了同一主题的文献,这不利于开展自然科学的研究;

(3) 对文献的价值进行学术评论,这是与西方的明显区别。西方的书目不对文献内容进行评论;我国的书目则强调对图书的评论,评论范围包括:科学内容、思想性、对读者是否有启迪等各方面;

(4) 信息转换。包括不同方面,如:文种的转换、标题的转换(可用注释等方法);

(5) 要用一定的格式标准。采用国际通用的书目语言(如:分类体系、主题法)、书目格式(尤其是机读目录),要符合人类共同的心理习惯。要符合国际书目控制的标准。

书目编纂的对象是文献。文献的品种、数量、内容、形式的变化,读者利用图书文献的目的和要求不同,决定着书目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书目都是

以特定的编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其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社会职能的。

书目编纂的整个过程就是综合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交替使用的过程,表现为综合—分析—综合的关系。编纂一部大型书目大体上要经过准备、分析、综合、结束四个基本阶段,下面分阶段进行叙述。

二、制定书目编制方案

制定书目编制方案是书目编纂的准备阶段要进行的关键性工作。书目的编制方案是书目编纂过程中的规范性文件。

书目编纂方案的内容包括:书目选题现实性和可行性的论证,重点是叙述书目的基本任务,从哪些方面来揭示文献的信息,书目的读者对象和专门途径。书目的社会效益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目的读者对象和专门用途,也就是说,要解决书目是为什么人而编和为什么目的而编的问题。确定书目的专门用途很重要,要明确书目是为辅助科学研究工作,指导自学,进行宣传活动而编呢,还是为提高专业素养而编。与此同时,要明确书目中所提供的书目情报可能对哪些读者有用。

在书目编纂方案中还必须明确规定书目的类型特点。书目的类型特点(即属于科学通报书目、回溯性综合书目、专题书目,还是推荐书目等)对决定书目收录文献的范围非常重要。如果编制的是推荐书目,那么,它应紧密结合推荐书目的特点来决定文献的收录标准。推荐书目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选择性。这就决定必须针对特定的读者群,选择内容最优秀的、最基本的、容易获得的、又是最好版本的文献,提供给读者,帮助读者决定读书的方向和重点,也就是帮助读者解决一个读什么的问题。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引导性。这就要求书目编者能针对读者的水平和需要,对选择的文献进行阅读指导,按照循序渐进的规律,引导读者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哪些该精读?哪些该一般浏览?总的说是指导读者怎样读书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评介性,即对推荐书目所选择的文献,从思想内容、科学价值、艺术特点、版本特征进行评介,给读者指出应当掌握什么内容。如系编制主题书目,那么,在文献收录上是以某一特定范围内所必需的文献为特点,提供给读者广泛、全面、系统完整的书目信息;在专题书目的学科或课题的性质上,是以专为特征。既然是专题书目,读者对象是某学科的专家、学者,就有必要收录与该主题有关的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文献资料。

书目编纂方案中还应当明确规定书目收录文献资料的标准,收录文献撰写提要的性质和揭示内容的其他方式(如文献、注释、综述等),收录文献的编排组织方式、辅助索引、查询文献的来源等。方案中还要指明完成工作的期限、编者、校对者。

如何科学制定书目编制方案呢?

1. 首先必须选择合适的书目主题

正确选择书目的主题是编制书目的重要步骤。选题必须考虑下列原则:第一,要有现实性和社会意义,应当选择那些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符合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展需要,为加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迫切需要又最有影响的题材。第二,要注意选择具有经济价值和实用性的选题。第三,要考虑承担书目编纂单位的特色和可能性,以及该单位所服务的读者的需求。例如,承担书目编纂任务的单位是图书馆,那么,图书馆的专业特点对决定书目选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型综合性图书馆考虑选择与政治、国际国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联系的、广泛的和综合性的题材,以及图书馆的长远书目建设需要的题材,例如,编制反映图书馆的全部或者某些学科门类藏书状况的书目。省级图书馆或地市级图书馆则优先编制反映地方特点的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服务的地方文献书目。自然科学和专业图书馆选择那些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中尖端和关键性的课题,或者是影响面比较广的科学普及和新技术推广方面的课题,这样的选题适应科学工作者的需要,深受读者欢迎,使用率也比较高。

2. 对选题的实质进行研究

初步确定选题以后,紧接着是对书目选题进行研究。首先,编纂者应当弄清书目主题的实质。为了掌握书目主题的实质,编者有必要学习与主题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与主题相关的学科领域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有关问题的学术争论资料、科学讨论会的文献、最新教科书等。弄清书目主题的实质还有一层意思,即明确该书目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编呢?还是侧重从反映问题的现状来编呢?抑或是着重从理论叙述方面来编呢?明确这些问题,对于确定书目收录文献的范围关系极大。其次是调查该课题的书目保障情况,即掌握有关该选题已编和拟编书目的状况,这一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掌握这方面的情报,不仅仅为编者提供别人已经积累的书目编纂经验,而且也为了解决书目编纂的合理性和避免书目编纂工作中的重复现象。当书目选题经过认真研究并且最后确定之后,编者就开始进行书目编纂方案的拟定工作。书目编纂方案是保证书目编纂质量的基本文件,特别是在书目有集体编者来编纂的情况下,书目编纂方案是编辑组方法步调一致、组织工作合理的重要保证。

3. 对所涉及选题的文献进行初步了解

在确定和研究书目的主题和拟订书目编纂方案的同时,书目编者就要进行查寻和搜集文献的工作,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是最大可能地按照选材原则全面搜集文献,因为文献是编制书目的基础。怎样从浩瀚的文献海洋中迅速、准确、没有重大遗漏地查寻出所编书目主题的有关文献资料呢?这种有目的的查寻和搜集资料的方法,一般来说,首先要正确地确定文献源的范围和查寻搜集文献的

方法。文献源按性质可分为两组:其一是二次文献或者书目文献(包括现行和回溯性书目、书内和文章内的文献书目、图书馆目录、索引、文摘等),其次是文献(首先是原始文献、连续出版物、工具书、史料集、文件汇编等)。在进行第一个步骤时,要了解针对所编书目的主题已编制过哪些书目、索引或文摘等书目文献、或者拟编哪些书目、索引或文摘,那么,我们就应当借助于三次文献,即书目之书目(有人称之为书目指南)。书目之书目是将各种类型的书目文献汇辑起来而编成的一种书目总录,是以揭示和报导所有书目文献信息为职能的一种书目类型。我国编制书目指南最早的有清末周星贻编纂的《目录考》,现已佚失。1920年周贞亮、李之鼎合编的《书目举要》,收录历代公私藏书目277种,上起西汉刘向、刘歆《别录》和《七略》,下迄清代末年的私人藏书目录。1928年邵瑞彭、阎树善等编《书目长编》(附补遗补校),该书目指南收录各种书目1 300余种,分为储藏类、史乘类、征存类、评论类四大类,每类下分若干小类,每一款目下注明卷数、编者、版本、所依据的书名等。1923年项士元仿效谢启昆的《小学考》和朱彝尊的《经义考》的体例编辑了《中国书目考》,收录历代书目500多部。1955年梁子涵编的《中国历代书目总录》,收录以中文现存书目为主,总计古今书目1 666种。1958年冯秉文编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汇辑了全国各图书馆解放初至1957年底所编书目索引(包括正在编辑或计划编辑的在内)共计2 409种。以上是几种书目之书目的简介。

书目之书目作为情报源,本身也是一种文献,当读者需要了解和查寻的时候,也起着检索作用,只不过它所提供的不是直接的有关文献的状况,而是与该问题有关的书目文献的信息。也就是说,书目之书目向读者提供的是中介的指南,即告诉读者需要查寻的某一课题有哪些书目、索引、文摘等书目文献可供利用。它在文献交流系统中起着“纽带之纽带”的作用,是查寻和利用书目文献最可靠和最有价值的文献源,也是书目编者开展书目编纂工作最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工具。

在查寻文献过程中,确定书目情报源是非常重要的。书目情报源分明确编制书目主题的基本情报源和补充书目情报源两种。例如,编制一部回溯性的某一专科的书目,其基本书目情报源就是《全国总书目》或专科科学通报书目;编制以普及教育、自学、宣传为目的的推荐书目,就有目的地选择大众书目情报机关刊物作为基本书目情报源,如《图书评论》、《读者文摘》等;而图书馆目录、《全国新书目》等就成为补充书目情报源。

定期和连续出版物现行书目情报源,是在编制逆时间顺序的书目时查寻最新资料而用的。

确定书目情报源以后,就以书目、索引、文摘等书目文献为线索,从庞大的文献中检索出与所编书目主题有关的和有价值的文献,并且要求检索工作做到迅

速、及时、准确和没有重大遗漏。只有借助书目文献,才有可能全面掌握那些本馆、本地区图书馆甚至国内各大型图书馆没有入藏的文献线索,然后,通过馆际互借、国际间的互借以及复制等方式,将文献收集完备。

三、制作书目款目

制作书目款目是书目编纂的分析阶段的主要工作。从著录角度看,书目是由一系列相关款目组成的。款目是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描述的结果,也可以称做书目单元。

制作书目款目,必须对拟收录的文献进行一般书目分析、书目著录、编纂提要或文摘、进行标引和抽主题词等工作。这一阶段是书目编制的分析阶段。书目编制的分析阶段实质上是对原始文献中的情报进行凝聚的过程,其目的是为进入书目编制的综合阶段准备材料。怎样才能编制好书目款目呢?

1. 编制款目之前须对拟收录的文献进行书目分析。即对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进程中,书目编纂者首先要全面地了解文献的形式和内容。我们都知道,文献的名称并不能准确地、充分地概括表达其所含的知识信息量。因此,在认识文献的外形特征的同时,必须对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以便明确文献中包含有哪些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知识信息量。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掌握知识信息,准确地表达文献的内容,正确抓住文献论述的重点和新的观点。对文献进行书目分析的方法有:直接熟悉书名项、出版项、出版提要、目次、前言或者序、跋、附录、注释,在必要的情况下,选读文献的部分正文。此外,还可通过另外一组书目情报源(如其他作者的批评性文章、书评、读后感、学术争论的资料、参考资料、早期出版的书目资料等)来弄清楚文献作者的原则立场,文献的基本的和伴随的主题,文献的逻辑结构,社会作用,文献的类型、体裁、风格特征,文献的专门用途和读者对象,印刷装潢质量,以及文献的检索标志。善于迅速地、深刻地、全面地进行文献的书目分析,是书目情报工作者最重要的专业素质。

2. 书目著录。书目著录是揭示文献外形特征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进行书目著录时,首先要确定著录的主要标目。我国一向以书名为主要标目。同时要选取其他著录项目,要求著录项目完备,著录格式统一,最好利用国内或国际统一标准著录格式,以利于资源共享,并且方便检索。

3. 编写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我国古代目录学家一向注重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对文献内容进行揭示,形成了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三种书目提要形式。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指出,我国古代目录学"其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可见书目提要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清代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古代书目提要的三种体例熔于一炉,择善而从,达到了古代书目提要的最

高水平。

现代书目提要按照其社会职能分为叙述性和推荐性内容提要两种。叙述性内容提要主要实现书目的交流和检索的职能。当文献的名称不够全面或不能准确地表达文献内容,需要补充关于作者的某些事实性情报,以及需要对文献的形式、内容、风格、作用等方面给予补充时,采用叙述性内容提要。总之,叙述性内容提要是文献书目著录的补充。这种提要的编写非常简明扼要,不对文献进行展开式的叙述。它广泛地运用于综合性书目、普通书目和科学通报书目中。推荐性内容提要主要实现书目的评价职能。它从某一特定读者群的需要、文化教育水平、年龄等特点出发,对文献进行鉴定与评介,宣传推荐优秀书刊,实现书目的教育职能。推荐性内容提要在组织读者系统地和有目的地阅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内容提要除了按照社会职能划分以外,还可以按照对文献的评述方式来划分,分为普通的、分析的、分组的内容提要。普通的内容提要——对文献包含的各种知识信息给予评述,最主要的是对文献的社会作用、文献的思想和事实性内容的评述。分析的内容提要——仅仅揭示文献内容的某一个部分,或者强调评述文献的某一章、某一节、某一段的论述。分组的内容提要——对同一出版形式、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的内容相近的著作,给予概括性的评述,既可以节约篇幅,又可以避免重复。

自然,以上是以社会职能和评述方式为标志,对内容提要进行区分,但是,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交叉,例如,同一书的内容提要既可以是普通的,又可以是推荐性的。

撰写内容提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不少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撰写得好的内容提要必须是言简事具,也就是要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将原作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例如,北京图书馆为了向大中学生推荐阅读中国古代著述,于1953年编纂了《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在这部推荐书目中,《诗经》一书的提要是这样写的:"《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尤其是其中的国风是距今2 000多年前的民间歌谣。不但文学上价值很高,史料价值亦很高,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书籍。"又如:"《营造法式》,宋李诫著。约十一世纪的作品。中国现存第一部讲建筑学的书,书中对木工、石作以及彩绘各制,均有详细记录,并附有图解,颜色、尺寸均极明晰。"这些提要的最大特点是言简事具,首先就指出被介绍的著作是一部讲什么内容的书,甚至有的著作的内容提要就只指出是叙述什么内容的书。例如:"《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约第五世纪的作品。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具体讲农业技术的书。"

撰写提要既要注意对文献内容的介绍,又要重视对文献的评论,比较好的内

容提要是将介绍和评论结合起来，这对于推荐性的内容提要更为必要。例如：《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中《史记》一书的内容提要写道："《史记》，汉司马迁(纪元前一四五——纪元前八六年)著。司马迁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这部'一百三十篇'巨著，记录了当时有关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传说，反映了中国初期封建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上的纪传体。由于它的描写生动，辞藻瑰丽，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二千多年来，它在中国史学上和文学上都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文献内容性质不同，类型不同，以及读者对象的差异，撰写内容提要切忌千篇一律，提而不要。轻视提要的作用，不重视充分运用提要揭示文献内容的倾向，是不对的。是不是选入书目中的文献都要编写内容提要，什么样的文献应当有内容提要，什么样的书可以不写内容提要，不能一概而论，应当针对具体文献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以上分析的各个工序凝聚到统一的完整的书目款目之中。书目款目是书目记录的结果。书目记录是将书目著录、提要、文摘、分类标引等记载，形成书目款目。所以说，编制书目记录意味着整个书目的编纂分析阶段向综合阶段的过渡。

四、书目款目的选择与编排

书目编纂的综合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已经进行过分析工序的结果凝聚成书目的结构。书目编纂的综合阶段包括三个基本工序：文献选择，书目款目的编排与组织，编制辅助索引。

1. 书目款目的选择

文献选择——是书目编纂综合阶段的重要工序，是决定书目编纂质量和社会效用的关键之一。因为文献资料的浩瀚复杂与书目编制的目的、读者对象、质量要求、篇幅限制等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文献选择就显得特别重要。文献选择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书目的质量。书目的读者对象和专门用途，都是通过书目中文献的收录范围和选择标准体现出来的。文献选择的水平是在广泛的文献基础上进行精选。任何书目都不可能全收无遗，即使是登记性的国家书目，也并非有书必录。该收的文献没有收，就会不完整，不系统；而不该收的文献选录了，毫无选择，是书目成为见书必录的账簿，也会降低书目的质量。

怎样进行文献选择呢？

第一，要对收集的文献进行认真地分析、查重，并按照书目的读者对象和专门用途，以及书目编纂方案中所拟定的文献收录标准，筛选那些与预定的读者对象和专门用途不相符合的文献。

第二，要将有关该主体的最新、最优秀的文献作为重点优先选出来。对于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中的有关文献要注意选取；要从书目

收录文献的时间范围、文献的语种、读者兴趣爱好和特殊需要来考虑文献的收取。

第三,编制社会科学方面题材的书目,在文献的选择上要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收录与主题有关的各不同学派和观点的文献,应当注意收录有争论和某些观点不够成熟但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注意收录理论性较强的文献,同时也要收录典型经验总结方面的文献,做到虚实结合。

第四,书目中文献的选择不应受空间的限制,不能局限于馆藏;不应受文献类型的限制,主要从文献内容出发,不论是图书、论文,甚至是与主题有关的章节内容或独立的知识单元,都可以采用分析著录方式,裁篇别出,予以反映。

因此,文献质量上的筛选是保证书目编纂质量的关键。

2. 书目款目的组织

书目款目的编排与组织是指对经过精心选择的文献进行编排与组织,使之有序化,并形成逻辑严整的体系,确定书目所收文献之间的联系,以便读者能迅速、准确地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

书目中文献的编排和组织的方法多种多样,选择哪一种编排方式,取决于书目编制的目的、专门用途、读者对象,以及书目文献的性质与内容。

书目中文献的编排和组织一般分为两大类:一般书目中文献的编排采用分类编排法、主题编排法、编年编排法、字顺编排法、地域编排法等;推荐书目中收录文献的编排可以采用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或者按照文献内容的深浅程度及由简到繁的顺序编排。推荐书目中文献编排的逻辑顺序,要有助于发挥书目的教育职能,推荐书目中文献编排的逻辑顺序,要有助于读者循序渐进地研究问题。选定的编排顺序,必须在推荐书目的前言中加以说明。

分类编排法一般利用现有的综合的或专科的分类表。但是,应当根据书目中所收文献的实际,对采用的分类表进行调整。采用分类编排法时,也可以辅之以主题法,即类目下的细分可以按标题编排。

主题编排法是按照反映书目选题的主要内容的标题来集中文献,内容比较广泛的标题之下再析分子标题。如果书目主题比较窄,读者通过主题编排和组织的方法可以较快地检索到所需文献。如果内容涉及多主题的文献,势必要分散反映到不同的主题之下,增大了书目的篇幅。主题是按照字顺排列的,如将内容相近的文献的书目记录分割开来,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逻辑顺序,削弱了书目指导阅读的作用。

采用编年、地域、字顺等编排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检索具体文献,但不可能按照文献内容的学科属性集中。

总之,任何一种编排方式都不可能回答读者向本书目提出的所有问题。文

献的编排和组织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从查寻文献阶段的初步编排开始一直到编排结束,中间要不断进行调整。同时,文献编排也不是孤立的工序,通过文献的编排组织可以发现选材的不足,还可纠正文献著录上的缺点。

五、书目整体设计与辅助索引

一部书目为什么要编制辅助索引呢?编制辅助索引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方便读者,提供多种检索途径,充分发挥书目的作用,帮助读者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文献信息。因为读者的需要是各式各样的,不可想象,采用一种编排方式就能满足读者的多种多样的检索要求。读者检索文献的习惯和掌握文献的程度不一,常常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查寻所需要的文献。二是书目正文采用任何一种编排组织方式都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给文献检索带来的缺陷只有靠编制辅助索引来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辅助索引是书目正文编排组织方式在逻辑上的继续,是书目编纂综合阶段不可缺少的内容。

辅助索引可以从各个不同途径来检索必需的文献,以扩大书目的利用。辅助索引的种类多样,一部书目要编制哪些辅助索引,取决于书目正文编排组织方式,书目的专门用途和读者对象。辅助索引的每一标目下指出文献的出处或正文的页码。

书目编纂从此就进入到结束阶段。结束一部书目的编纂工作,还需要编制必要的资料,如目次、序言、附录等。

目次就是按照书目编纂体例和文献编排组织的顺序,列出文献的类目、标题,并指明其在书目中的页码顺序,是读者了解书目内容及其体例的纲要。目次分为简列和详列。简列只列类目名称,详列除列出类目名称外,还要详细列出书目中每件文献的标题,以便读者更好地利用书目。一部书目采用哪些目次为好,应以书目文献的特点和方便读者查找为准,一般来说,大型书目多采用详列目次的方式。

序言又称前言、引言、编例、例言、叙记、编辑说明、凡例等。序言是书目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帮助读者了解和利用书目,是任何一部书目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提纲挈领地阐明书目选题的意义、书目的性质、读者对象、书目收录文献的内容范围和时限、文献的编排组织方式以及辅助索引使用法等。它是对一部书目编纂大纲的文字说明。

辅助资料除了辅助索引之外,还可根据书目的性质及特定需要,收入一些读者需要参考的资料,如编纂书目的引用文献目录、书目中所利用的出版物、机构名称的简称或全称对照表等。

最后,书目在付印之前应经过严格的审校。并给书目以准确、简明、新颖的标题,辅之以与书目主题内容相适应的美观大方的装帧设计,使整个书目的内容

和形式统一。

第二节 文摘编纂法

一、文摘的特点与类型

国家标准《文摘编写规则》(GB6447—86)将文摘定义为“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价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文摘是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摘述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原始数据、向读者报导最新研究成果、传递文献的情报信息和查寻文献线索的一种工具。如社科领域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摘》,自然科学领域的《中国药学文摘》,大众读物领域的《读者》等。在书目工作实践中,文摘有三种含义:其一是就文献体裁而言。指根据对原文的全面了解,引用原文中的语句,简明扼要而不加评论地摘述原文献的实质性内容,并附有详细的书目著录的文献摘要。其二是指文摘刊物。检索性的文摘刊物把大量的、分散的、不同形式的文献集中起来,按文献的某些特征如著者、篇名、学科分类、主题等组成系统有序的体系,成为查找和了解原文的工具。其三是指编制文摘和文摘刊物的工作。

作为一种检索工具的文摘,与书目提要和篇目索引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点。文摘的特点是:

(1) 替代性。文摘是对原文的一种替代。同原文相比,文摘的字数压缩了,但原文的内容不变,写作风格不变。文摘含有原文中较大的文献信息量。

(2) 模拟性。文摘可以看成是原文的一种情报模型。对该模型的基本要求是完全相符性,可用语义相符性评价;与模拟对象的不变性,可用语义相当性评价。如实地反映文献内容中的事实、概念、数据、原因、过程、时间等要素,是对文摘的基本要求。

(3) 转换性。包括语种的转换,表达方式的转换,等等。

(4) 客观性。文摘一般不对原文的内容进行评论。

(5) 兼有报导和检索两种功能。

与书目等二次文献相比较,文摘的这些特点体现得更明显。书目提要的报导对象多为图书,在基本著录项目中,特别强调版本的揭示。书目的提要实质上是图书内容的评介,在对图书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撮其旨要,综述概括,评论其得失,并指导读者阅读,甚至有些书目提要还要对图书版本、文字、史实进行详细认真的考证,提出书目编者个人的意见。与书目提要相比,文摘只是文献内容的高度浓缩,是文献内容的准确、客观的表述,文摘编者不加任何主观的解释和评论。篇目索引的报导对象则主要是期刊或文集中的论文,只揭示篇名、作者和论文出

处,仅在个别标题不明确的地方稍加注释或说明。而文摘是书目提要和篇目索引的综合和发展。文摘所报导的既有图书,又有论文;既有基本著录项目,又有文献内容的介绍。与篇目索引相比,它比较深入广泛地涉及了文献的内容,含有更多的信息量,不但有指向、示址功能,更主要的是具有揭示报导的功能。文摘与索引的结合是密切的,不仅文摘后常常附有索引,正文中也常常有相当数量的不带摘要的题录款目。书目、索引、文摘三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文摘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型。

1. 文摘对原文信息的压缩程度划分为:报导性文摘 、指示性文摘和报导-指示性文摘三种。报导性文摘是"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文摘,也称简介"。它概述摘录原文主要信息。包括研究对象、工作目的、主要结果、研究方法、性质、主要参数等,注重定量描述。通常用于对学术论文等原创性文献的报导。报导性文摘全面真实地反映文献内容的创造性部分,含有较大情报量,可使部分读者免于查阅原文献的一种文摘形式。其文摘内容包括原文献讨论的范围和目的,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有关的数据和图表,甚至包括参考书目和插图数量等,也就是比较全面地报导了原文献中的一切有情报价值的事项和数据。正如国际标准《文献工作——出版物的文摘和文献工作》中指出的:"应表达文件中包括尽可能多的定量的或定性的信息。"指示性文摘只简单介绍文献内容的梗概,注重定性描述。通常用于书目、研究手册、纯理论性文章、研究报导、预研和阶段性报告的报导。指示性文摘与报导性文摘是相对而言的。往往在一部文摘杂志中,既有报导性文摘条目,又有指示性文摘条目。甚至在一个条目中,二者也兼而有之,即所谓报导-指示性文摘。报导指示性文摘则是指"以报导性文摘的形式表述一次文献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部分,而以指示性文摘的形式表述其余部分的文摘。"

2. 从编撰目的和职能来看,大体可分为普及性文摘和情报性文摘两种。普及性文摘是摘述报刊文章或书籍片断,为向广大读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编辑出版的文摘报刊。如《新华文摘》、《青年文摘》、《文摘报》、《文摘周报》等。这类文摘特别讲求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其内容多为文章摘要、片断,甚至是全文转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不是图书情报部门所指的文摘。图书情报工作中用以传递情报和检索文献线索的文摘,可称之为情报性文摘。情报性文摘是选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和科学论文,经过高度浓缩后,按目录格式组织排列,向科学研究者提供情报信息和检索途径的一种检索工具。如美国的《医学文摘》,我国的《冶金文摘》、《海洋文摘》等。这类文摘内容专深,强调科学情报价值,仅供科学研究人员和图书情报工作者参考使用。这类文摘才是我们所讲的实质意义上的文摘。情报性文摘,据其对原文献的压缩程度,可以划分为报导性文摘和指示性文摘两种。根据文献编者又可分为作者文摘和专职文摘员文摘。

作者文摘(author's abstracts)是由一次文献的作者自己撰写的文摘。文摘员文摘(abstractor's abstracts)是由一次文献作者以外的人员编写的文摘。

3. 依照文摘的文字表达形式划分为文章式文摘(文学、社科领域)、电报式文摘(文字简短、精练)、关键词因果文摘(又称逻辑文摘)。关键词因果文摘主要包括两个要素:关键词和因果关系。关键词分为三类。涉及研究对象及其属性的,列入内因组,涉及设备、条件、添加剂的,列入外因组,结果或结论则列入结果组,然后用简短文字说明三类之间的因果关系。

4. 根据文摘刊登的地方可分为同址文摘和非同址文摘。

5. 根据文摘的出版形式可分为单卷式文摘和期刊式文摘。目前图书情报界利用的大量科学情报文摘大都是以连续出版物的形式出版发行的。

文摘除了具有一般检索工具的功能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殊功能,所以它在对迅速增长的文献进行书目控制、获取文献的书目情报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 了解各学科文献情况,把握各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2. 确定文献与读者需求的相关性,提高文献检索的检准率。

3. 直接获取文献的情报信息,避免不必要地阅读全文。

文摘是报导文献信息,检索文献线索的重要工具。文摘工作是图书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书目工作的组成部分。

有报导图书专著的文摘,但更多更主要的是报导和检索科学论文的文摘。所以文摘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科学杂志的产生和发展为条件的。有人曾对近200多年来期刊的增长指数和文摘的增长指数作过分析,发现二者增长速度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

最早的带有文摘的印刷型杂志是1655年创刊的法国《科学家杂志》和英国的《皇家学会哲学汇刊》。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论文大量涌现,杂志也就越来越多。到1830年已经有300余种。要得到或亲自翻阅这些期刊中的论文已颇感不便,就在此时,人们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文摘杂志诞生了,这就是德国的《药学总览》,后来改名《化学总览》,这就是著名的德国《化学文摘》的前身。此后,一些工业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各种文摘杂志接踵出现。1857年比利时创办《矿业世界综述》;1874年俄国创办《医学简述》;1884年美国创办了以文摘卡片形式出版发行的《工程索引》。同一时期,法国创刊的《法国化学会志》(1858)、英国创刊的《染色者和颜料师协会会刊》(1884)等一系列杂志中都附有文摘专栏。20世纪初,文摘杂志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1907年美国创办了《化学文摘》,该刊后来兼并了德国的《化学文摘》;以后又创办了《生物学文摘》(1926)等。英国出版了《物理文摘》和《电工文摘》(1898年创刊,1903年改为现名)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面向研究任务的文摘杂志,

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创办的《核科学文摘》(1948)等。从个别杂志看,愈加专业化;从整体来看,逐步体系化。文摘编制机构和文摘类型越来越多,文摘编制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摘工作的组织、联合和协调工作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逐步克服了文摘发展中的失控现象,并于 1949 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科学文摘工作会议。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文摘工作又有新的发展。一是各国文摘杂志逐步形成了文摘报导体系。如法国的《文摘通报》、苏联的《文摘杂志》、日本的《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我国的检索刊物等。二是文摘的年报导量迅速增加。如《化学文摘》每年平均增长 8%至 10%,《生物学文摘》年报导 14 万篇,引自 8 000 多种杂志。三是文摘工作逐步实现标准化。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9 年通过了 ISO5122—1979《文摘工作——连续出版物中的文摘页》、1976 年通过了 ISO214—1976《文献工作——出版物的文摘和文献工作》。四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文摘编制工作。目前许多有影响的文摘刊物都有机读版或网络版文摘数据出售。五是文摘工作联合会组织的出现。如美国曾于 1958 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文摘索引工作联合会(NFSAIS),1968 年成立了美国情报工业协会。国际文献工作者联合会在加强国际文摘工作协作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并于 1969 年出版了《世界文摘服务》一书。六是文摘报导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取得垄断地位。许多文摘刊物几乎囊括了本专业的主要出版物,例如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简称 CA),创刊于 1907 年,由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CAS)编辑出版。CA 涉及学科领域广、收集文献类型全、提供检索途径多、部卷也非常庞大。在化学化工领域,它是非常权威的工具书。CA 报导了世界上 150 多个国家、56 种文字出版的 16 000 种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资料汇编、技术报告、新书及视听资料,还报导 30 个国家和 2 个国际组织的专利文献。收录的文献占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量的 98%,年报导文献量 50 万条。CA 以收录化学化工文献为主,还收录生物、医学、药学、轻工、冶金、天体、物理等内容。

我国书目提要产生很早,但文摘的出现颇晚。我国文摘期刊的编辑工作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从 1956 年起,有四种生物科学方面的文摘创刊,科学出版社定期出版。从 1956 年起,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组织领导下,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文摘工作。起初主要是翻译苏联的文摘杂志,如《机械制造文摘》、《冶金文摘》等,约 20 余种,占苏联文摘的 1/2。同时铁道科学院也从美、英、德、日等国的文摘中,选译编辑了《铁道文摘》。1961 年以后,由翻译逐步向自编过渡。为了及时反映我国科研成果,提供参考,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机械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等。至 1966 年逐步形成了包括文摘和篇目索引的检索刊物体系,约 137 种、年报导量 75 万余条(文摘 35 万条,篇目索引 40 万条)。“文

革”期间大部分检索刊物停刊。1971 年到 1979 年，部分刊物开始恢复出版。1977 年开始整顿并加强管理，到 1983 年底，全国各类检索刊物为 159 种，年报导量达 95 万条。其中，国内检索刊物 33 种 19 万条(文摘类 13 种)；国外科技文献检索刊物 101 种 76 万条(文摘类 67 种)；专利文献检索刊物 25 种 10 万条。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和图书馆、出版发行系统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文摘刊物。

但是，我国文摘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文摘报导的学科覆盖率还不高，论文缺漏或重复时常发生，检索途径单一，标准化自动化程度较低。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文摘报导体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如何提高文摘编写质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文摘款目与摘要短文

文摘款目是构成文摘的最基本的单元，是文摘传递文献信息特征的基本因素。款目的构成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基本著录事项和文献摘要。

1. 文摘基本著录事项

基本著录事项包括：文献标题、文献作者(含副著者)、出版项(包括论文出处)、文种等。

基本著录事项所揭示的是文献的外部特征，虽然尚未深入文献的具体内容，但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提供了认识文献的标识，决定该文献是否与需求相符，是否有必要继续查阅摘要和全文。特别是文献的标题，一般都比较集中、概括地反映了文献论述的主题。所以，把文献标题作为识别和选择文献的依据，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如果遇到一些文献标题未能准确表达文献的主题内容时，可以通过对正文的分析研究，在标题后用括号加注说明。作者和出版项也能从侧面反映文献的所属学科、文献的质量、深度和学术参考价值，因此，对文献检索也是相当重要的。

基本著录事项要求做到完整、统一、准确，这是提高文摘质量的重要保证。但是不同类型的文摘刊物或不同类型文献的文摘款目的要求不同，其著录项目有所增加或省略。例如，美国《化学文摘》中，期刊论文的著录项目有：(1) 文摘号；(2) 文献标题；(3) 作者姓名；(4) 著者工作单位(用括号括起)；(5) 期刊名称(用国际标准“ISO883—1974”简化)；(6) 出版年月；(7) 期刊卷期；(8) 起讫页码；(9) 文种等。该刊专利文献的著录事项有：(1) 文摘号；(2) 专利标题；(3) 发明人姓名；(4) 专利号；(5) 专利分类号；(6) 专利公布或出版日期；(7) 专利申请号；(8) 专利申请日期；(9) 页数。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的著录项目更为复杂：(1) 分类号；(2) 文摘号；(3) 文献标题；(4) 连载号；(5) 分篇号；(6) 收藏载体形态；(7) 文献性质代号；(8) 文种；(9) 重复登载号；(10) 非日文文献原篇名；(11) 著者姓名；(12) 资料编号；(13) 期刊或资料简称；(14) 国别代号；

(15) 卷期号;(16) 页数;(17) 出版年月等。

2. 文献摘要

这是构成文摘款目的主体,是文摘工具的主要部分。文摘款目的摘要是如实地、不作任何评述地报导原文献的主题内容,向读者传递真实可靠的文献情报信息的一种短文。这一短文也叫"文摘"。为了避免同作为一种完整的检索工具的"文摘"相混淆,此处用"摘要"一词。文摘的大部分功能是通过摘要短文来体现的。

摘要短文内容的构成与书目提要不同,大致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 研究主题。每篇论文都有一个中心主题,这是读者首先关心的。论文主题一般可以通过题目来识别,但也有的只有通过正文才能识别的。一般在论文的引言或结论部分也可以找到。围绕主题所要阐明的是研究目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所达到的程度。

(2) 课题内容。社会科学文摘主要介绍课题论证的条件、方法、主要论点和论据;科技论文则主要介绍基本原理、方法、范围、可靠性等,同本课题原来的水平、产量、规模、性能等方面的比较,以及采用了什么新的实验方法和新的设备等。

(3) 研究结果。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如调查或论证结果、测量或计算结果、实验或观察分析结果等。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数据的。但不管是理论或数据,都应该准确可靠,能够付之于实践或供进一步研究引证。

(4) 结论。结论与结果有时是相连的,甚至是统一的,特别是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是这样。但有时又是不同的。结果是研究工作后果的直接现象,而结论是经过了对结果的归纳综合,是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结果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结论才是根本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5) 附属材料。文献所附的参考材料是整个文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包括辅助索引、插图、表格、参考文献,人名、地名、机构缩略代码表、对照表等。文摘应该揭示这些内容,一般置于文摘短文最后,供读者了解和查考。

三、文摘选题与文献搜集

1. 文摘的选题和工作组织

文摘大部分都是以文摘刊物的形式连续出版发行的,一般都延续数十数百年,这当然是不存在选题问题。但每一个国家的文摘刊物体系的内容,都是随时代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和更新的。也就是说,在文摘刊物体系中,会有陈旧过时的主题分册被淘汰,也会不断增添新的学科分册。新的学科主题分册的增加就是一个选题问题。它要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前景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对当代各学科文献量及其增长趋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才能作出正

确的决定。譬如我国的《中国环境科学文摘》、《管理科学文摘》都是近年来新增的主题分册。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中的《环境公害篇》(1974 年创刊)、《能量篇》(1979 年创刊)、《生命科学篇》(1981 年创刊)也是适应近年来崛起的环境科学、能源研究、生物工程而创办的。单卷式文摘编制的选题原则和方法同书目是一样的,不过偏重于新学科、新课题、新文献的揭示报导。

各种文摘都有着特定的编辑目的和读者对象,因而也就有着特定的编撰体例和编排方法,这一切都应该事先经过周密的研究、认真的思考确定下来。一方面制定出总的工作计划,同时要编写出各项工作条例和准则,以便以后文摘员有章可循,照章办事。文摘工作的组织管理是文摘编撰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因素,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环节。

2. 文献的搜集和选择

文献搜集与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有:

(1) 与用户的学科领域是否密切相关。特别是某学科的某一领域。

(2) 是否是该领域的原始稿件。非原始稿件一般不收录,但某些原文本身是与文摘一起发表或某些会议论文本身即是以文摘形式发表的,也可适当考虑收录。

(3) 是否是专业领域中的重要文献。

(4) 对研究报告而言,要收录此类研究的终结报告。成果可以以论文、专利、会议论文、学术报告等形式发表,其中,学术报告可分为初步报告(即实验报告)、中间报告和终结报告,编写文摘时,一般把终结报告做成报导性文摘,而对前两者做成指示性文摘。

(5) 是否发表于有关的规定的刊物上。学术性的文摘杂志后一般均附有它所收录的刊物的一览表。

对以下各类文献,原则上不予收录:

(1) 非原始文献,包括二次文献。

(2) 对相关用户意义不大的文献。

(3) 内容一般,没有长久的保留价值的文献,如科普文献。

(4) 对非正式的报告,一般不作报导性文摘,如建议报告。

(5) 发表于一般性的或水准较低的刊物上的文章。

(6) 发表于文摘杂志所规定的刊物以外的文献。

(7) 有关评论性文献。

(8) 对图书一般不作文摘,对综述性文献也不作文摘。

通过订购、交换、借阅等方法搜集到较为齐全的文献资料,是开展文摘编撰工作的基本保证。如何从众多的文献中选择有摘要报导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也是相当复杂的重要一环。

文献选择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要考虑读者利用的可能性。要从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出发,选择那些对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选择的标准视读者对象和文摘刊物篇幅多少、文摘报导量的要求来确定。不宜过紧和过松。过紧,就有可能漏掉有用的文献,使漏检率增高;过松,容易收录信息量较少的文献,降低文摘刊物的质量,使冗余文献增加,提高误检率。

一种文摘刊物的选择标准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这样才能保证文摘刊物的科学水准不致发生波动,不至于由此而失去一部分读者。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文摘员从事专门的文摘选择工作,是保证文摘选择标准统一的可靠方法。制定一个详细的选择条例,是提高文献选择质量的保证。

四、文摘款目制作

文摘款目的基本著录要根据各文摘编撰机构所规定的项目和格式进行。我国的 GB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是文摘著录的基本标准。文摘著录的基本要求是:完整、统一、准确。一般采用以下著录格式:

1. 整本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⑱分类号
⑰顺序号 ①中文题名②=外文题名③〔文献类型,文种〕④/主要责任者;⑤其他责任者. -⑥版本⑦/与版本有关的责任者. -⑧文献特殊细节. -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⑩总页码. -⑪(丛编). -⑫附注. -⑬文献标准编号
⑭提要。⑮图×表×参×⑯(文摘员)
⑳主题词 **⑲ 索取号**

2. 析出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⑱分类号
⑰顺序号 ①中文题名②=外文题名③〔文献类型,文种〕④ / 主要责任者;⑤其他责任者⑥//整本文献题名⑦/与整本文献有关的责任者. -⑧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⑨所在页码. -⑩附注. -⑬文献标准编号
⑭提要。⑮图×表×参×⑯(文摘员)
⑳主题词 **⑲ 索取号**

3. 期刊论文格式如下:

⑱分类号
⑰顺序号　①中文题名②=外文题名③〔刊,文种〕④/著者⑥//刊名(国别或地名).-⑧年,卷(期).-⑨所在页码
⑭提要。⑮图×表×参×⑯(文摘员)
⑳主题词　**⑲ 索取号**

4. 专著格式如下:

⑱分类号
⑰顺序号　①中文书名②=外文书名　卷(册、编)次;卷(册编)的书名③〔著,文种〕④/著者或编者.-⑥版本⑦/与版本有关的责任者.-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⑩总页码;开本.-⑪(丛书项).-⑫附注项.-⑬文献标准书号
⑭提要。⑮图×表×参×⑯(文摘员)
⑳主题词　**索取号**

在文摘著录中应注意:

(1) 分类号宜采用《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进行标引,主题采用《汉语主题词表》进行标引。

(2) 顺序号即流水号,其方法是:①两位数字表示年号,用五位数字表示全年流水号,如 9800202;②用两位数字表示年号,两位数字表示期号,四位数字表示期流水号,如 98020800;③由分册代号、年份和流水号组成,分册代号可用两个拉丁字母表示,年份用两位数字,分册顺序号用五位数字,如《地震学文摘》分册顺序号 DX7900048。

(3) 原文作者三名以下者全部列出,三名以上者不必全部列出,用…表示,且一律写原文,不音译。

(4) 如原文附有其他文种的摘要时,应在文种一项加以说明,如[英文;摘要:德文]。

(5) 期刊论文、汇编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专利、技术标准、产品样本等的著录均按《检索期刊著录规则》。

(6) 国外文摘著录格式不一,特别是社科文摘过于简略,应采用标准著录。

文摘的报导功能是靠文摘短文来完成的。一部文摘的质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款目中摘要短文的编写质量。所以,摘要短文的编写是文摘编制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为了保证文摘质量,一般文摘编制机构都规定有成文的

“文摘法”,也就是说,有着固定的编写程序和编写格式。

摘要短文的编写步骤是:

1.文献分析

准确的高质量的摘要短文来自对原文文献的全面认真的分析。文献分析是编写摘要的前提,也是第一步重要的工作。首先要快速通读文献,然后对文献的内容作语义分析,找出文献中具有情报价值的要素,作为摘要编写的材料。目前国内外一些大的文摘编制机构都采用组面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组面分析法就是从文献论述的主题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将文献划分成若干面,分别进行分析,删除无用和次要的部分,筛选出能明确表达主题的事实和概念。王熹《怎样编写科技文摘》一书把这些要素归纳为下述十个方面:

(1) 物件——结构体及其部分、物质及其成分等;

(2) 事项——现象、事件、事态、问题等;

(3) 条件——原理、条件、目的、观点、立场、方法、步骤等;

(4) 过程——作用、运动、操作等;

(5) 属性——特性、状态、机能、用途、归属、由来等;

(6) 空间——构造、位置、环境、关系、范围等;

(7) 时间——时候、时代、阶段等;

(8) 投入——材料、输入、原因等;

(9) 产出——生成物、输出、结果、结论、效果等;

(10) 对象——上述各项都可能成为对象。

为了使文摘员有目的地、系统地进行文献分析,避免疏忽遗漏,一般都要拟定文献主题分析大纲。该书在分析了其他一些现有的组面分析表的基础上,列出了一个关于一般科学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提纲。这个大纲是:

(1) 研究课题、对象或题目;

(2) 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或技术领域;

(3) 研究的目的;

(4) 研究的着眼点或着重研究的侧面;

(5) 研究(研制)的用途;

(6) 研究的类别;

(7) 研究的方法;

(8) 所采用的设备;

(9) 得以进行研究的条件;

(10) 研究的具体结果;

(11) 研究结果所能提供的技术效果;

(12) 所论述或所研制之项目的经济方面和价值。

该书还引述了关于电工文献、医学文献、工艺流程描述文献的组面分析提纲,最后归纳为六个基本面:对象面;属性面;条件面;方法面;过程面;结果面。

有了上述组面概念和分析提纲,我们在动手分析时就有了着眼点,从而提高分析文献的目的性和条理性,不至于面对长篇大论茫然不知所措,顾此失彼;能够提高文献主题标引和文摘编写的效果,并促使文摘编写格式化、标准化。

并不是所有文献都有上述诸要素。各种文献由于其课题和论述的侧重点不同,有些要素是没有的,或者是不够突出的,但这并不影响组面分析表的应用。

2.素材抽取

写作需要准备素材,文摘亦然。通过对文献全面系统地分析以后,要把原文献中有用的材料不走样地摘出,以备写作使用。为了节约时间和使素材准确无误,一般在原文献中作各种标识记忆符号。

3.摘要编述

将已经抽取或做过标识的文献的各种要素,加以归纳综合,组成能够准确表达文献主题思想的逻辑系统,即形成摘要短文的腹稿或用文字表述的提纲。然后,根据提纲,撰写摘要短文,表述上述概念。

根据《文摘编写规则》,文摘的要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 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2) 方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艺、结构、手段、装备、程序等。

(3) 结果——实验的、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4) 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课题、假设、启发、建议、预测等。

(5) 其他——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就其见识和情报价值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

一般地说,对于报导性文摘,方法、结果、结论宜写得详细,目的和“其他”可以写得简单,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省略。对于指示性文摘“目的”宜写得详细,方法、结果、结论和“其他”可以写得简单,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省略。

摘要短文编述的基本要求是:

(1) 文摘的详简须根据一次文献的内容、类型、学科领域、信息量、篇幅、语种、获得的难易程度和实际需要确定,其中,文献内容是决定性因素。

(2) 尽可能做到正确反映文献的主题和内容,并且保证有效情报的损失达到最小值。

(3) 不作任何解释、评论和掺入编者私见,倾向性文摘也只是突出原文献的不同重点,不加评述;如发现原文献有错误,可用括号加注说明。

(4) 语义要连贯,有连续性;用第三人称叙述;一般不分段落。

(5) 文字简练,重点突出,概念表达清晰。摘要短文的长短,取决于原文献的内容、质量,也取决于文摘刊物篇幅的多少。美国《化学文摘》平均100~200字,苏联《文摘杂志》平均为1 200字符,我国文摘刊物平均每条300~700字左右。有些文摘刊物为了增强报导功能,尽可能使其代替原文献,摘要短文的字数相应拉长,如我国的《畜牧兽医文摘》等。《文摘编写规则》要求报导性文摘和报导指示性文摘一般以400字左右为宜,指示性文摘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以外的外文一次文献可适当详摘。

(6) 原文献的图、表、参考文献目录数量均应写入,文种亦应标明。

(7) 不需要编写摘要的,可写成简介;不值得写简介的,可写成注释或说明;不需要编写注释说明的,只作基本目录著录(或叫题录)。

4. 文字校正

摘要短文写成后,要进行认真的复核校正,以求文理通顺、概念清晰、内容无误、数据准确、既无重要遗漏,又无多余字句,才可最后定稿,以备印刷或输入计算机。

五、文摘编排与辅助索引

每一文献的基本著录事项和摘要短文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条文摘款目。然后用分类法、主题法或字顺法等将许多文摘款目编排起来,形成文摘刊物整体。

辅助索引是文摘刊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扩大索引途径、补充正文单一编排线索使用不便的作用。关于索引编制方法可参阅前章。文摘刊物各期的索引,附在正文之后。季度或年度索引,附在此季度或全年的最后一期。国外有此类文摘刊物,编有多年累积索引,单独出版发行。

文摘期刊究竟附多少种索引为宜,这要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来确定。《化学文摘》的辅助索引就很多,每期附有索引四种:关键词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对照索引、著者索引。其卷度索引有九种:化学物质索引、普通主题索引、著者索引、分子式索引、环系索引、杂系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对照索引、登记号索引。另外,还编有《索引指南》、《索引指南增补》、《期刊一览表》和5年或15年的累积索引等,为读者提供了较多的检索途径,检索起来是颇为便利的。

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即可编写前言、编例、目次、文献源等,然后将各部分内容组织起来,一部文摘初稿的编制工作即告结束。为了保证文摘的质量,应该作最后的核对和校阅,尽量减少错误。文摘的总校工作一般由专人负责。

六、各类文献的文摘

1. 理论性文献。一般研究可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三类。理论

性文献属于基础研究部分，一般作报导性文摘。对于数学领域的文献，要注意摘录有关数学计算方法、适用范围、推广应用前景、同其他方法的比较、误差范围等要素。对于物理领域的文献要注意摘录有关理论的适用范围、所采用的数学方法、同原有理论的联系等要素。对于化学领域的文献，要注意摘录用定量方法说明有关化合物的特征方面的信息。对于生物科学领域的文献，要注意对实验方法要明确定义、说明采用的剂量及其他实验条件。对于综述性文摘一般作指示性文摘。但要注意摘录说明所综述领域的发展前景的信息。

2. 书目文献。对于书目类文献，应明确指出内容范围、情报源类别、时间范围。一般宜作指示性文摘。

3. 对图书类文献，应注意指明内容范围(但不是抄录所有标题)。

4. 对于会议录、论文集、著作集一般宜作指示性文摘，指明内容范围，对其中某些重要的文献，可作报导性文摘。

5. 对于手册类工具书一般作指示性文摘，说明适用范围。

6. 对于研究报告类文献应区别对待。对于进展报告应做指示性文摘，对于终结报告应做报导性文摘。

7. 对于学位论文、技术性报告应做报导性文摘。

8. 对于一般学术论文、技术性报告作报导性文摘。有关介绍性文献一般作指示性文摘。

9. 对于专利文献重点要说明新颖之处、先进性、实用性。

七、文摘的文体与评价

(一) 文摘的文体

1. 文摘的字长

将文摘压缩到原文长度的 1/8，在 50% 的程度下可替代原文。若只压缩到 1/3，也约在 50% 的程度下可替代原文，信息量变化不大。根据文献类型、内容、篇幅及实际需要决定字长。

2. 名词术语选择

(1) 采用原文中的术语。若不规范或不常用的，可选正式的术语。

(2) 若为第一次使用的新术语，可采用脚注解释。

(3) 允许对相同或相近词义的词简化概括。

(4) 来源主要是原文。

3. 结构与文字

文摘要素的排列应符合逻辑，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状况。用主谓分析法得出的结构是关联结构。主要有线性结构、连续相关结构、平行结构和混合结构四种。采用下列方法使文字简明：

(1) 删除冗余的字、词、句,例如 A Study of Library Use for Teenagers 可写成“Library Use for Teenagers”。

(2) 把题名与文摘正文看成一个整体,不在正文中重复标题。在正文开头不必用“本文阐述了……”,“本文说明了……”,“本文作者认为……”之类的语句。

(3) 尽量使用简短句,避免用复合句。

(4) 措辞要明确,注意词语的单义性。

(5) 对否定句的使用要慎重,只在有重要意义时使用。

(6) 尽量采用主动语态,只在强调动作承受者时才用被动语态。

(7) 正文不必分成若干段落,只有在必要时才这样做。

(8) 应避免引用其他作者的著作,如其他人的实验数据、观点等,而只摘录该文作者自己的新观点。但当作者写作的目的即是为评论或批评某一观点或文章时,可考虑适当引用。

(9) 合理使用有关缩写词和符号。只有在本学科内已通用的词才可使用。第一次使用的新词应加解释。本学科内的非通用词,在第一次全称使用后,可以简称。一些国家的名称也可用简称,如美国而不用“美利坚合众国”。

(10) 应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计量单位。若可能导致计算错误,仍用原文中使用的单位、如尺、英尺、米、公里、千米等。

(11) 在生物、化学、物理等专业领域中不要使用商业名称代替正式的学术名称,但科普读物除外,如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12) 应尽量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的顺序编排文摘以使其具有逻辑性,若强调结果、结论,也可将其提前。

(13) 文末的辅助著录事项应十分简明,符号要符合规则,并不得使用不规范的汉字。

(14) 数学公式。有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原文中的公式。在无公式不能了解作者的原意、公式就是研究成果、引用公式可显著增加对原文的理解时,使用公式是必要的。

(15) 可使用必要的表格、图形等,使文摘内容更加简明。

(二) 文摘评价

1. 影响文摘价值的因素

(1) 文摘质量。这是影响文摘价值的最重要的因素。

(2) 原文献的性质。原文献所含的知识与信息的数量及质量对文摘有直接的影响,用不同的方式传播也有利于提高原文献的价值,例如,一篇非英语文献,用英语编写文摘,会使原文献更易于传播。

(3) 文摘的倾向性。适合读者需要的文摘,对读者具有最大的价值;读者易于接受或吸收其知识信息的文摘,对读者的价值就比较大;反之,对读者不需要

或难以接受的文摘来说,其价值就很小。

(4) 文摘的长度。文摘长短的确定既要根据文摘的类型,也要根据原文献的长短及质量。较长的文摘有利于选择较多的要点,但在阅读和编写时要占用一定的时间。

2. 文摘编写质量的评价

评价文摘质量是文摘编辑的职责。

(1) 文摘质量评价指标。评价文摘质量一般有以下指标:① 是否坚持某种文摘标准或准则;② 是否包含了重要情报而排除了不重要的情报;③ 错误率;④ 文体是否流畅、易读;⑤ 代替原文的能力;⑥ 提供标引词的能力。这些指标虽然合理,但由于是定性的,带有较多的主观成分,缺乏严密性和准确性。

(2) 文摘语义评价。文摘的语义是评价、确定文摘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方法之一。其依据是:在语义上文摘完全受制于原始文献,文摘可视为原始文献的情报模型。对文摘这种情报模型的基本要求是:① 完全相符性(adequacy),就文摘语义情报而言,得到保留的程度称为语义相符性(semantic adequacy)。② 与模拟对象的不变性(invariance),指要在编写文摘过程中进行逻辑语言处理时使原文所含的情报不变。这种在语义上变或不变的程度称为语义相当性(semantic equivalence)。

对文摘进行语义评价,就是判明它同原文的语义相符性和语义相当性。

判明文摘同原文语义相符性的惟一方法:将文摘同原文的主要内容进行对照,目的是看文摘编写过程中对原文有用情报损失或减少的程度。从理论上讲,最佳文献相对原文的损失接近于零,实际上某种程度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文摘对原文情报损失有故意的有理损失、故意的无理损失和无意的无理损失三种情况。

判明文摘同原文语义相当性主要看文摘满足用户情报需要的程度,或者说文摘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原文。主要方法是了解用户需求。一般来说,文摘越全面、越详尽,读者阅读原文的可能性越小,其语义相当性越高。若原文越难懂,获取原文越困难。读者阅读原文越困难,这时文摘的语义相当性也越高。

(3) 马西斯文摘评价法。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外对于文摘评价提出了新方法,从定性评价走向定量评价,著名的有马西斯 1972 年提出的“两步评价法”。

第一步:鉴定文摘是否符合现行的某项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并规定如下定性指标:1)最大长度;2)最小长度;3)题录格式;4)主题适应性;5)错误率;6)文体;7)句子完整性;8)结构格式;9)文摘类型;10)及时性。

第二步:确定文摘的“数据系数”(Data Coefficient,简称 DC)。她提出的计算数据系数的公式是:

$$DC = C/L$$

式中,C 是“数据保留因子”;

L 是"长度保留因子"。

$$C = 文摘中的数据总量/原文中的数据总量$$

$$L = 文摘长度/原文长度$$

如何计算数据的数量呢？马西斯定义一个数据元素等于一个概念，并用"名词－关系词－名词"这种形式表示。这样，一个简单句就相当于一个数据元素，复合句可以分解为简单句。

如何计算长度呢？文摘和原文长度是根据它们所包含的词数量来计算的。计算后，DC 值可能出现几种情形：

1）若 $DC<1$，表示该文摘不能接受；

2）若 $DC=1$，表示该文摘达到可接受的最低限度；

3）若 $DC>1$，表示该文摘可以接受；

4）DC 值越大，文摘的质量越好。

马西斯曾用此公式去评价她建立的 ADAM 系统，结果发现该文摘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平均数据系数是 1.063。这表明该系统所生产的文摘可以接受，但质量不算好。

第三节 索引编纂法

一、索引的理论基础

我国台湾地区标准将索引定义为"将各种图书及非书资料中所述之人名、地名、事物、主题或概念等，加以分析并提为款目，再依一定之方法，如笔画、字顺、年代、数字等序列之，并注明资料之出处，如页数、段落或其他符合之系统化的指引。"①

索引在本质上和书目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传递文献信息、揭示和检索文献的工具。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以文献整体为记录和检索单元，而是以文献中的个别事项和内容为记录和检索单元。索引的目的不在于是否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意象，而只起到指引某意象所在的位置，即指南、指向、示址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给索引下这样的定义：索引是记录和指引文献事项或单元知识，按一定系统组织起来的检索工具。

一部完备的索引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就不成其为索引。

1. 必须由众多索引款目组合而成。

---

① 侯汉清：《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1 页。

2. 由标目、修饰语和参照项三者组成款目。标目和参照项不可省略。

3. 款目必须按一定次序组成。

4. 必须通过一定方式显示标目之间的关系或联系,而不是简单的排列。

索引的作用,从本质上看和书目一样,所以我们才把它和书目、文摘同等看待,把索引的研究作为目录学的内容之一。但具体地说,索引的结构和功能又有其特点,所以我们又把它们区别开来。

二、索引类型

按索引被检的对象,可分为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

1. 篇目索引

它是标引图书或报刊中的论文篇目,按一定编排法组织起来的供查找篇目位置的索引。篇目索引又称"题录"或"论文索引",其功能是供人们查找某篇文章以及某一方面的文章。从检索途径看,篇目索引又分为:① 查报刊,如《全国报刊索引》;② 查史传,如《三国人名索引》;③ 查文集,如《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④ 查全集,如《斯大林全集篇名索引(第 1—13 卷)》;⑤ 查丛书,如《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书名索引"。

2. 内容索引

它是将文献中的字、词、句、人名、地名、主题等具体内容,按一定编排法组织起来的供查找具体内容位置的索引。在内容索引中主要有语词索引和主题索引。

语词索引——以书刊中字、词、句为标引对象的索引,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即书刊页码。语词索引又分为:① 以字为目的,如顾颉刚的《尚书通检》;② 以词为目的,如《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③ 以句为目的,如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

主题索引——以书刊中文献主题词为标引对象的索引。如《列宁全集索引(第 1—35 卷)》上册。

按索引语言划分,索引可分为以下几种:

1. 书刊名称索引。根据描述文献外表特征的语言(书目引证语言)而编制的供检索书名、刊名或篇名等的索引。包括书名索引、刊名索引及篇名索引。

2. 著者索引。以文献上署名的编者、译者的姓名和机关团体名称作为标识和检索文献的索引,通常有著者索引、机构索引、专利权人索引等。

3. 引文索引。从被引论文去检索引用论文的索引。

4. 等级制分类索引。按等级制分类法顺序排列的索引。

5. 字顺主题索引。将文献中的主题按字顺排列起来的索引。

6. 关键词索引。从关键词入手查找文献的索引,通常有题外关键词索引(KWOC Index)、上下文关键词索引(KWIC Index)和双重上下文关键词索引

(D-KWIC Index)等。

7. 前后关联索引(PRECIS)。将文献中作为检目词的关键词进行轮排以保留上下文原意的索引,故称"保留上下文索引"。

8. 挂接索引(Articulated Index)。又称题外关键词相关索引。

9. 概念组配索引。

10. 号码索引。包括报告号、专利号、标准号、合同号等的索引。

三、索引的结构

(一)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标目、修饰语、参照项。每一个款目分别由标目、修饰语和参照项组成。款目的例子如:

J.H. Shera

Characters of	30
Honours received	70

1. 索引标目

标目,也称索引的标题,用于控制款目在索引中的位置(对编者而言),也是检索标识(对读者而言)。标目是用来控制索引中的款目排列位置和查找人口的指南性的最佳词。若按其来源,标目可分为抽词标目,如:"有册有典"中的"典"、"册";赋词标目,如"史料与史学"可赋词为"史料学"。两种来源均可用自然词或受控词标引,但用受控词标引速度较慢,且成本会大大增加;自然词则恰恰相反。抽词应从原文抽取,但有明显错误的词、与采用的标准不符的词、前后不一致的词都不能抽为正式标目。标目采用何种形式,将决定一部索引的性质、特点和作用。这是索引中非常关键的一项。

一部人名索引只能取文献中的人名为标目,一部主题索引,只能取文献内容所论述的主题对象为标目。此外,标目还可能是篇目、地名、年号、数据、动植物名、分子式、法律案例、字、词、句等,这要视编撰目的和读者需要来确定。

索引标目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文献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篇目和作者索引一般来自文献外部特征,其他索引的标目一般取自文献的内容。《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正文标目和所附《著者姓名索引》的标目皆从文献的外部特征得来。国外编制的各种关键词索引的标目,也取自文献的题目。但语词索引、主题索引的标目则来自文献的内容。

索引款目的选择要求做到统一、完备、准确。

2. 修饰语

又叫说明项,是用来说明索引标目的信息。

说明语的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① 以文献名称(图书书名、文章篇名等)作

说明语;② 以改写或压缩的文献名称作说明语;③ 以自编的短语或短句作说明语;④ 以若干个关键词或重要的概念名称作说明语;⑤ 以有关机构的名称作说明语;⑥ 用副标目代替说明语。

编写说明语要制订一些句法规则,供标引员遵守,以保证编写说明语前后一致。例如,编写英文说明语的句法规则有:① 尽量使用标引语句中的词语;② 若标目是表示某种行为或动作涉及的对象,就以表示该行为或动作的词作说明语的导词;③ 若表示动作的词不直接作用于标目,则往后放;④ 若标目是源于一个表示动作的词,说明语就应先列出该动作所涉及的事物的名称;⑤ 说明语中保留一切必要的介词;⑥ 避免累赘和重复,删去冠词、代词、副词和动词;⑦ 说明语中并列出现的词可按字顺排列。

标目注释也是修饰标目的一种手段。

标目注释,即索引词注释,包括范围注释和含义注释两种。是直接指导读者和提醒索引员的一种有效措施。标目注释与说明语不同,说明语是索引款目中一个正式的项目或部分,而标目注释只是标目部分的附加材料。

(1) 范围注释:是指从时间、地域、学科、特征等任何一方面对标目或索引词的概念范围进行说明或限定,主要用于区分同形(音)异义词,使标目含义明确而专指。

常用的注释方法是使用带括号的限定词,并把这种限定词看做标目的一部分。如:

哺乳动物(专指陆上品种)

铜合金(以铜作主要成分的合金)

微波频率(1—300 千兆赫)

(2) 含义注释:是指从用法上或含义上对标目或索引词作出必要而简略的说明和补充,以消除标引和检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它分为指示性注释和定义性注释,前者指导人们如何使用该标目,告诉某标目下包含或不包括什么材料、标目的排序方法,或建议人们使用其他更合适的词,等等。后者是一种辞典式注释,用来解释某些疑难词或外来语。

含义注释方法可用简短文字,也可用限定词,如:

磁镜(包括最小 β 位形系统)

白化(遗传学)

十三行

注: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厅特许对外贸易的商行

说明语可以限定索引款目标目的义域,使被标引的主题更加准确,提高索引的专指度。

说明项可以使参照项的指向更为明确,提高检索命中率,减少检索次数,缩

短检索时间。

在组配式索引中,不需要编写说明项,它是靠多个主题标题的关联来提高专指度的。

在关键词索引中,也不必编写说明项,篇名中除关键词以外的其他部分,就起到了说明语的作用。

3. 参照项

索引款目中的参照项,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顺序型参照和情报型参照。前者主要指示标目所含文献信息在原文献中的位置。在篇目索引中,参照项是指论文在原文集、期刊、报纸中的卷册和刊期。

参照项号码还可以含有记忆符号。如《〈解放日报〉人名索引》中用“*”表示此文是有关此人的文章,未冠“*”的是本人写的文章。还有的索引用“B”表示图书,用“R”表示评论,等等。

参照项号码中有的还含有“上”、“中”、“下”,或“a”、“b”、“c”及“左”、“右”等,表示索引标题所在的原文献的上、下栏或左、右栏。用“14”或“③”,表示报纸的第几个版面。

许多篇目索引后所附著者索引的参照项,一般是文献的顺序号。

(二) 标目控制

标目可直接从原文中抽取也可由索引员编制。若从原文中抽取,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作者在不同地方对同一对象使用了不同的词,而导致标目不易识别或资料被分散。由索引人员编制,也有类似问题。

避免上述问题,可使用参照的方法。

1. “见”参照(see)

用于将非正式的标目引向正式标目。主要用于以下情况:

(1) 用来控制同义词的分散,将最重要、最流行的词用作标目。例:

巴人 见 鲁迅

阿司匹林 见 苯甲酸

(2) 在简称、缩略语与全称之间使用,如:IFLA 见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es。

(3) 在相邻领域之间使用。

(4) 别名与正式名称之间。

(5) 读音和写法不同的词之间。

(6) 反义词之间,例如:加密文献 见 非密文献,阻抗性 见 传导性。

(7) 上、下位类之间关系。

(8) 将特别检索词引向一般检索词,如:微积分 见 数学。

2. 参见参照(see also)

用于显示有关类目之间的标目的相关性以及类与子类之间的关系：

(1) 属种关系，将属引向种，或将种引向属，如：文摘 参见 报导性文摘；

(2)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照相机 参见 镜头；

(3) 反义词之间的关系（更普遍），如：离岸价格 参见 到岸价格；

(4)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如：娱乐 参见 电视；

(5) 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如疾病 参见 病毒。

3. 见下参照(see under)

用于属名与种名之间，将种名引向属名，如：柠檬油 见下 油。

4. 超一般参照

当同类标题很多时可采用此参照法，例如：金 见 各黄金标目。

(三) 编排体系

一部索引是由许多款目组成的，这些款目要靠编排体系组织起来，构成一个秩序井然、可供检索的有机整体。

索引的编排一般是单序的，如果需要多序排列，以扩大检索途径时，可采用辅助索引法。

索引的编排方法与书目并无不同，主要依据索引款目标目的字顺和内容来排列。

1. 字顺排列法。字顺排列又可分为形序和音序。形序排列法有笔画、部首、笔形、笔形编码、数字等排列法。音序排列法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外文字母音序、韵序等排列法。

2. 内容排列法。主要有分类法、主题法、时序和地序等排列方法。

四、索引编制程序

索引编制是一项很细致、很繁重的劳动，技术性比较强。稍有疏忽，就会错误百出，甚至重复浪费，前功尽弃。所以，编制索引时要经过周密的计划，严格按照编制程序进行工作。

1. 题目的选择和索引法的确定

编制一部索引，实际上也是一项科研活动，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选题，选什么题的问题。首先要了解科学研究的动态、文献的现状、现有索引的面貌。

确定索引题目的同时，也逐步确定了被索文献、读者对象、编撰目的，以及采用什么方法（索引语言）和取什么标题。

所有这一切确定以后，应该编写一份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作为以后的准则。总体设计的内容包括：

(1) 索引的目的：直接服务于科研，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现实生活，服务于读者的参考咨询，服务于个人学习。

(2) 索引的规模:考虑文献库的情况,收录文献的标准,相应的款目数量(考虑确定何者为标目及几种标目)。

(3) 索引的载体类型:是印刷的,还是机读的;是分类的,还是主题的。若编组配索引则要确定是先组的,还是后组的等。

(4) 索引的数量:应做哪些种类的索引。

(5) 索引排列方法:采用何种顺序编排。确定排列方法可为实际操作奠定基础,如:按主题编排,则可先标出主题号。

(6) 索引用词规范:即规定用词的来源,若为受控用词,又要考虑具体用何种词表。词表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若为自然标引,也应制定一些规则。

(7) 引用次序和标引深度、标目控制:标引中各标目的引用先后次序及标引深度,例如仅限于标题还是深入到正文。

(8) 版面设计。

2. 文献标引和索引款目的编制

进行文献标引和编制索引款目,是索引编制中最关键的一步。

文献标引,就是分析文献内容,并用索引语言来表示文献内容的某些特征的过程。美国国家标准学会1968年的标准中,给标引下过这样的定义:"分析知识记录中的情报内容并用标引系统的语言表示情报内容的过程。"从事文献标引工作的一套设备和程序(包括手工和机械化)称为标引系统。标引的结果,就是取得文献的标识。

标引工作的第一步是钩标,也就是选择文献中可供标引的概念。

这首先需要索引编者有丰富的学科知识。浮光掠影的浏览和似懂非懂的认识,都无法准确地选择文献的情报概念,获得可靠的标识,从而造成索引标目的冗杂,文献情报知识的遗漏。

在对文献进行认真分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可以进行钩标。如果是多人共事,一般由专人进行钩标工作,这样便于掌握选钩标准和标引深度。

选钩标准固然是由读者需求和被索文献的性质决定的,但也受索引编者的力量和索引编成后的篇幅、成本的限制。例如《全国报刊索引》的选钩标准就很严很紧,一张报纸、一期刊物,往往只选择为数有限的论文,否则,就要扩大篇幅,增加印刷量,提高成本。

标引的第二步是用索引语言表示选定的文献概念——事项或内容。索引的款目标目词一般都来自文献本身,个别主题索引是按标准化的主题词表标引的。

在确定款目标目的同时,要编写说明语,以限定标题的范围、意象,提高索引款目的专指度。但有许多索引将说明项省略。

上述工作一般是在被索文献原件或印刷中的文献校样的边栏空白处进行的。

标引工作实践表明，钩标选择和索引款目的编写，是标引人员智慧、能力和意志的表现，是真正的脑力劳动。有着几十年索引工作经验的 H. Borko 和 C. L. Bernier 说："定义'最佳词'或规定选择方法是困难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整个书目工作自动化进程中，标引是最难突破的一个关卡。

标引工作的第三步是著录，即记录文献标识，制作索引卡片。要求准确无误，不得遗漏。

索引款目的著录要遵守一定格式。一般索引标目置于卡片上部；说明语退一字置于卡片中部；参照项空一字记录在说明项之后。在主题索引（包括人名、地名、语词、概念等）编制时，每记录一个标识，都要查对已著录的卡片中是否已经有了同样的标目。若有，就不必另做一卡，只在原卡的标目和说明项下，添加另一个说明项和参照项就可以了。

参照项所记录的多是一些数字和事先规定的符号，一定要准确可靠。单本书只记标识所在页码和栏（上下、左右）即可，多卷书要标明卷数。若被索对象是许多种书，则要著录某书某卷某页。若为连续出版物，则要著录某刊、某卷（辑）、某期、某页。标引内容若跨两页以上，页码之间用连字符"－"表示。

五、索引的校印

索引卡片编排组织完毕，要认真核对检查一遍，尽量减少差错。

(1) 对标目重点编辑。尤其要检查标目是否准确、统一、必要。

(2) 有无抄写错误。

(3) 检查参照项，排除死参照。

(4) 有无使用同词不同义的情况。

(5) 检查标点符号。标目与地址之间有无标点，各参照项之间有无标点。组成标目的各词之间或倒置的标目之间有无标点，人名倒置时有无标点。

此时，编纂人员可以着手编写索引的前言或编例，告诉读者本索引的编撰目的、检索范围、读者对象、查阅办法等，以指导读者如何利用本索引。除此以外，还要编写目次和辅助索引。一部大部头的索引，往往又附有采用不同排列方法的、著录项目简单的索引，以扩大检索途径，提高索引的利用率。

索引的装帧设计和出版印刷工作，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对一个索引编者来说，直至索引正式出版发行，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

六、索引评价

首要的是确定索引评价的标准，不同类型的索引，其评价标准不一。以图书索引评价为例：

1. 总体评价

(1) 索引类型是否齐全、必要。

(2) 有无使用说明,是否恰当。

(3) 索引的规模,包括:标目的数量和款目的数量(一个款目可有几个标目)、索引的行数、页数。

(4) 索引标目的密度,平均一页有几个标目。

(5) 规范性:是否与有关索引标准相符,尤其是标目的选取;标目是否采用作者的用词;受控标引采用了几种词表;有无专门的术语表。

(6) 有关的错误,错误的标目或款目占其总数的比率。

2. 款目结构的评价

(1) 修饰词:是否有必要;是否正确地定义了该主题。以修饰语的数量和标目数量的比例测定。

(2) 参照项:有无错误,用有错误的参照项占其总数的比率来测定;有无死参照,即指向的参照项是不存在的,也可用占参照总数的比例来测定;有无参照项群(指一组不加区别的参照项),也可用占参照总数的比率来测定。

(3) 标目。越专指越好:是否采用了具有多义的词作标目;是否采用了读者不熟悉的缩写词作标目;是否使用了非主题的词作标目;是否遗漏了某些标目词,可用与总标目的比例测度;专指度如何。

3. 连接系统(标目控制)的评价

(1) 交叉参照:使用了哪几种参照;是否必要;是否准确。可用参照数与款目总数的比例测定。

(2) 重复款目:是否用重复款目代替了交叉参照,这是不允许的。

(3) 死交叉参照:即指向不存在的标目。

(4) 注释:有注释的标目与标目总数的比例。

(5) 倒置:是否采用了倒置形式;所占比例。

4. 排印评价

包括纸张、字体、字形、格式、价格、设计评价。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 王知津主编.现代索引文摘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 中国索引学会编.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 日本索引家协会编.索引编制工作手册.赖茂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 王熹编著.怎样写科技文摘.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6 侯汉清.索引法教程.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

7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目录学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8　(美)哈罗德·博科,查尔斯·L.贝尼埃合著.索引的概念与方法.王知津,王津生合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9　(美)哈罗德·博科,查尔斯·L.贝尼埃合著.文摘的概念与方法.赖茂生,王知津合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第六章 书目控制

第一节 书目控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一、书目控制思想的起源

关于书目控制的起源,国外有两种观点:曾担任 IFLA/UBC 负责人的多萝西·安德森说“自从出版物大量出现以来——自从印刷术真正问世——图书馆员就面临着如何控制出版物的书目控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书目工具的协调,以求提供各种问题的回答”[①],他把书目控制归纳为 15 世纪铅活字印刷术的结果。美国的韦尔施(Wellish)则认为,书目控制可追溯到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格斯纳。[②]

我国有人认为,书目控制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西方学者们把 16 世纪格斯纳的博大著录观点和近代英国人的建议作为书目控制源流进行考察,那么早在 12 世纪时,中国宋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郑樵就提出了目录应当通录古今的思想,即‘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③]乔好勤则认为,“书目控制的历史渊源很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也就有了人类对文献的书目控制,《隋书·经籍志》所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就是这个意思。”[④]针对这两种观点,彭斐章等人总结说,“在中国,书目控制的思想产生很早,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出了我国第一部官修书目《别录》,12 世纪,宋代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出了‘总天下之书为一书’、‘纪百代之有无’的主张,这是我国早期的书目控制思想。”[⑤]

认识书目控制起源的关键在于认识的角度。从活动角度看,自从有了书目也就有了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的活动,但这样与书目情报活动已无区别。因此,应当把书目控制作为一种思想即认识上的一种表达。公元 5 世纪,阮孝绪博采

---

① Davinson Donald. Bibliographic Control. 2nd ed.. London: Clive Bingley, 1981. 1

② 韦尔施著,杨廷郊译:《书目控制的控制论——文献检索系统的一种理论》,《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 年第 6 期。

③ 辜学武:《书目控制略论》,《图书情报知识》,1982 年第 1 期。

④ 乔好勤:《书目控制》,《图书与情报》,1982 年第 3 期。

⑤ 彭斐章等:《概论书目控制论》,《图书情报论坛》,1990 年第 2 期。

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撰成《七录》,他在《七录》序中说,"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愍其勤,虽复称为史记,犹有捃拾之责",表达他以司马迁为楷模从事文献记录活动,记历代图书的思想。因此,序中说"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这应该是书目控制思想的最早表达,比郑樵的认识要早600多年。

自从书目控制思想产生后,人们有各种表达试图揭示其本质,渐渐地有了认识论上的分野:

1. 理想的书目控制

格斯纳的书目控制认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方文艺复兴思潮背景,在那个能产生"巨人"的时代,他的渊博学识和广博见闻使之具备对世界学术文化进行总结的可能,他是近代植物学、动物学等许多学科的开创者,在文献目录学方面,最早提出保存世界学术文化记录的理想。格斯纳书目控制思想的进步之处,就是详细记录现实的学术著作并采用多种语言(不仅仅是分类)控制文献信息。然而,他重视现存图书,把记录范围扩大到世界的理想实现了吗?贝斯特曼说,国际参考资源的历史从格斯纳那里开始,也在那里告终,他是第一个国际书目员,也是有成功机遇的最后一个书目员。不仅他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第三部分未能出版,医学大类也不全),而且收录范围只包括当时学术交流使用的Hebrew、Latin和Greek三种语言,不是真正国际性的,就是在它规定的三种语言中,他完成的也还不到20%~25%。①

格斯纳的书目控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学者在收录文献上试图扩大范围,增加数量,实现格氏的理想,但都没有成功。直到比利时的两位律师在布鲁塞尔建立目录学研究所,才使格氏书目控制思想得到了发展。

如果说格斯纳的书目控制根植于学术文化,是个人的理想和行动,那么,奥特勒和拉封丹是从文献增长的问题出发,通过组织来达到完整记录的目的,其结果是汇集了印刷书目、书商目录和图书馆目录的资料,并产生了书目控制的语言——世界十进分类法。尽管如此,编制世界书目的计划仍未能成功。

关于文献完整记录的书目控制,这种思想涉及"人类交流的记录"和"系统编目"两个重要概念,前者规定书目控制的范围,后者是为了保证尽可能地把各种书写的知识记录形式毫无遗漏地编目和控制。从20世纪70年代的卡特瓦瑟的术语表达到IFLA将UBC作为工作中心直至UBC计划的实施,使书目控制从理想向现实转化。

2. 实用的书目控制

---

① Davinson Donald. Bibliographic Control. 2nd ed.. London: Clive Bingley, 1981. 15

谢拉和伊根在书目控制的认识上另辟道路,不是从记录而是从利用的角度实施文献信息的控制,提出书目控制是提供内容和物理的可检索手段。这在认识论上的进步有三个方面:一是格氏的书目控制认识过于理想化。1967年《图书馆趋势》把这种书目控制称之为"乌托邦式的理想"。格氏的目标在于完整地保存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这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格斯纳的实践、奥特勒和拉封丹的尝试都证明了这一点。与其将书目控制当作不可实现的远大理想,不如作为达到现实目标的过程与手段。二是"完整记录"的书目控制是难以比拟的宏大工程,个人的劳动在文献量不多的年代都无济于事,就是在国家组织或国际组织的努力下也难以完成。从技术上说,仅仅依靠手工劳动是一个巨大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为书目控制提供了先进的手段和新的环境。从方法上能快速地处理文献信息,从视角上更多地注意现实的文献。三是人类学术文化记录的保存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传递和利用。从现实上看,实用的书目控制比理想的书目控制更具意义。伊根和谢拉强调利用而不是保存,强调检索而不是记录,赋予了书目控制"文献检索"的新认识。因此,韦尔施说书目控制论是文献检索系统的一种理论。

二、书目控制的经验积累

继5世纪阮孝绪在"穷天下之遗书"思想指导下编制书目之后,针对文献增长与人们利用的矛盾,8世纪毋煚较早表达了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的重要作用,"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①]由此编制了《古今书录》。12世纪的郑樵系统表达了文献完整记录的思想,他把"会通"观点运用到书目控制,提出通录古今图书、记亡书、记图谱、以类例控制图书的思想。郑樵和阮孝绪的思想是一种书目文化观:通过历代文献记录保存学术文化。这种思想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郑樵主张"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散四百三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②]他编制《通志·艺文略》,通录古今现存与亡佚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完整地保存历史文化记录的作用。

通记图书、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书目控制思想在16世纪格斯纳那里得到了体现。早在少年时代,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威那斯的图书馆被入侵的土耳其军队抢劫焚烧的消息,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认为一个人虽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全部知识,但要把人类全部知识产物作为人类共同财富记录、保留下来是可

---

①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郑樵:《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能的。他25岁时完成的《世界书目》第一卷著录近3 000多学者约12 000种图书，就是把梦想变为现实的成果之一。[①]

承继格斯纳的事业，格特利伯·乔治、雅克·布伦特和约翰·布勒斯都进行了书目控制的尝试，但没有一个能在文献收录范围上超出西欧，1890年在苏黎克的"Coucilium Bibliographicum"把范围缩小到世界生物学和相关领域的文献也未能真正达到目的。

17—18世纪，国家传记书目兴起。1548年，编年史学者和英语剧作家贝尔完成的《著名不列颠人著作概要》，收录1 400余名作家约1万篇文献。在这部书目后，出现了皮兹的《英国著名作家》、意大利东尼的《东尼文库》、洛斯的《著名德国作家目录》。16世纪法国迪马涅和迪韦尔第两位学者都编制了《法国文库》。到17世纪，这种国家传记书目遍及英、法、德、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如1611年德劳德编的《德国图书文库》，1623年安德烈编的《比利时文库》，1672年安东尼奥编的《新时代西班牙文库》。18世纪这种书目继续发展，至19世纪才有名副其实的国家书目，如1811年法国的《法国总书目》。

19世纪20年代，在国际联盟知识分子联合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洛芬蒂认为应该从图书的利用角度编制书目以达到全部、快速地查找文献的目的。

在格斯纳编出《世界书目》的350年后，Paul Otlet和Henri La Fontaine两个律师在布鲁塞尔建立了th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e，提出编制世界书目计划，并从印刷书目、书商目录和图书馆目录中抄写了1 600万条记录资料并按分类编排，为此组织了一个国际十进分类体系，但这一计划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落空。实际上即使没有战争影响，以当时的条件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也是非常困难的。

192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成立，1935年建立统一编目规则委员会(Committee on Uniform Cataloguing Rules)。

1947年UNESCO会议提议编制"世界书目"，第二年，UNESCO又提出建立一个世界书目中心，以协调书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出版书目和联合目录。但很快就感到理论与技术的条件都不具备，实现这些计划依赖于对书目控制的研究以及国家书目控制的保障。

三、书目控制的深刻变革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玛格丽特·伊根和杰西·谢拉首次提出了"bibliographical control(书目控制)"这一新术语，在 *The Journal of Cataloguing and Classification* 杂志上发表的 *Prolegomena to Bibliographical Control* 一文中，伊

① 侯汉清：《格斯纳〈世界书目〉与格斯纳分类法》，《高校图书馆工作》，1983年第4期。

根和谢拉首先从动力学的角度对机械系统的控制元件作了描述,阐述书目控制的概念:“在力学中,控制是一种装置,通过它以最经济的方式对机器的能量加以引导以达到既定目标。类似地,书目控制是这样一些装置被用来引导人的智能以最高的速度和经济效益从所有的记录信息中提取与某一特定任务相关的部分信息……书目控制可看作是我们现代书面交流(graphic communication)系统中的一种器械”。

自书目控制术语产生以后,人们从理解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确立了概念,实现了观念的变革;60 年代广泛应用新技术,实现了手段的变革。

从理论上看,在“情报”、“控制”新概念影响下认识书目控制,开始了书目控制研究,并确立了实用的书目控制观。

1950 年 UNESCO、LC 联合在一份书目调研报告中指出:“书目控制定义是指全部掌握书目提供的书写和出版记录,以达到书目的目的,书目控制与通过书目有效检索是同义的。所以医学书目控制也就是指医学情报资料通过书目有效的检索”。1954 年,罗伯特·B. 唐斯(Robert B Downs)在《图书馆趋势》发表 *Problem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指出书目控制意即每部书和图书馆有关的其他资料现存位置的记录。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对于书目控制的讨论于 1950、1956、1963 年召开了以“书目组织”、“建立完善编目规则”、“图书馆目录:变化的范围”为主题的会议,形成了文献信息控制的“芝加哥学派”,他们把完整记录人类文献比喻成“乌托邦式的理想”,主张从现实出发解决文献信息增长与利用的矛盾。

威尔逊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了书目控制,1968 年发表《两种力量:关于书目控制的论文》对“descriptive”控制和“exploitative” 控制作了区分,认为只要有较好的控制工具,对文献主题内容的全部控制是能够并且是应该做到的。后来,韦尔施进一步明确了书目控制的划分,将关于文献的形式方面称为“descriptive”控制,关于文献的内容方面称为“exploitative”控制。

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书目控制的应用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统一的书目记录格式。20 世纪初开始出现地区性统一著录标准,如 AA code,60 年代为消除有重复和差异的各国著录条例,确立国际共同识别的控制语言的要求更加迫切,1961 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编目原则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Principles,简称 ICCP),通过了具有世界统一编目里程碑意义的“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成为后来国际编目规则在著录方面的依据。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自 1965 年开始共享编目计划,IFLA 在进行国家书目的研究时,也探讨记述编目等问题,同时为了检查巴黎原则执行的情况,并讨论未来发展,促成了 1969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编目专家会议(Interna-

tional Meeting of Cataloguing Experts，简称 IMCE)。这次会议集中探讨了书目记录的标准格式，直接影响着书目著录国际标准的产生。另一方面，书目控制以科技文献为中心，计算机应用于书目控制引起书目控制手段的革命，情报系统和情报检索广泛建立起来。埃德蒙·斯太尔斯(Edmund Stiles) 1958 年就作了计算机应用书目控制的探索，提出了计算机应用的条件有：强调书目控制两个原则目的，即情报资料的位置和查找的语言；应用机器代替简单目录；机器应用的具体情况。[①]

在实践上，书目控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一是从集中编目走向联合编目。早在 1890 年，美国史密逊研究院(Smithsonion Institute)的杰威特(Jewett)建议美国编制全国联合目录，实行集中编目以节省人力，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劳动。1893 年，美国图书馆局(Library Bureau)正式向图书馆供应目录卡片。这一业务到 1897 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接办，1901 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继承了这项工作。威尔逊公司在 1938 年开始编制卡片出售，年编目图书约 3 000 种，进行了 15 年之久。在美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也开始了集中编目工作。苏联于 1925 年开始集中编目，俄文编目最初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集中编目局进行，1927 年转由全苏图书局发行集中编目卡片。1949 年起列宁图书馆公开发行提要卡片。1965 年，UNESCO 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题为“国际目录卡片发行的现状及其展望”(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Cataloguing Cards: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的会议，充分肯定了集中编目的意义和作用，讨论解决统一著录，卡书配合的问题，并呼吁各国集中编目机构向国际发行目录卡片。当时统计，全世界约有 21 个国家的 75 个机构(不包括我国)从事集中编目工作。

在资源共享的呼声推动下，集中编目向联合编目发展。1965 年，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美国“高教法案”每年可得到联邦政府 5 000 美元的购书补助费，用以购买国外资料，这些图书馆要求国会图书馆供应这类图书资料的卡片。此外，按“发展农产品贸易和援助法”(1954 年 7 月美国政府颁布的“第 480 号公法”)规定，美国输出剩余粮食的国家可用该国货币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美国政府指定国会图书馆用这些货币在各国购买当地出版的图书，这批图书也必须及时编目，供应目录卡片。由此产生了 1965 年在集中编目基础上建立的“全国采购编目规划”(National Programme for Acquisition & Cataloguing，NPAC)，又名“合作编目规划”(Shared Cataloguing Programme)。这一规划使得国会图书馆在伦敦、威斯巴登、奥斯陆、海牙、巴黎、贝尔格莱德、佛劳伦斯、东京、维也纳等地成立了“区域合作编目局”，并在内罗毕、里约热内卢、雅加达设立了“区域采购

---

① Stiles H Edmu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ndition for Valid Application of Machines to Bibliographic Control. American Documentation，1958(1)

局"。这样,美国89个大学与国会图书馆合作得到其全套的NPAC卡片。

由于计算机编目的实现和网络的不断发展,才使合作编目更有意义。计算机联机编目系统应运而生,如1967年美国俄亥俄州54所大专院校联合创建计算机编目系统,同年华盛顿州立图书馆也开始创办自动化系统。

二是从卡片目录的普及到MARC编目成功。MARC磁带的试验开始于1961年。1965年1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提出了《标准机器可读目录款式的建议》即MARC1。1967年1月,国会图书馆宣布延长MARC试验计划,于是在MARC1的基础上提出了MARC2格式。MARC2格式适合于各种资料的书目数据交换,拥有不同计算机硬、软件的图书馆均可使用。1968年6月,MARC试验宣布结束,并推荐了MARC2格式和扩充的字符集。1969年3月,国会图书馆正式向全国发行MARC2格式的英文图书记录磁带。

四、UBC的产生与发展

1971年,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馆长卡特瓦瑟提出了"Universal Bibiographic Control"(简称UBC,译为世界书目控制或国际书目控制)的概念,这一术语是书目控制的全球性表达,标志着书目控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书目控制理论与实践全面发展,向国际化、标准化、自动化迈进。这一阶段,书目控制的发展特征是:

(一)图书馆界热衷于书目控制实践,推动理想的书目控制走向现实,全面实施UBC计划,促进资源共享

UBC产生后,很快为IFLA接受,在1973年第39届布鲁塞尔大会上,以UBC作为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最终由执行委员会将UBC列入IFLA的第一项核心计划,它标志着UBC的实践开始成为国际图书馆界的中心任务。当时的IFLA主席赫尔曼·利贝尔斯把这一计划称为"IFLA当前发展阶段的最高表现"。①

在布鲁塞尔大会召开的第二年,为实施UBC计划,IFLA成立了世界书目控制办事处(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设在英国图书馆参考部内,试图通过国际协作编制"世界书目"。办事处负责各国书目活动的协调,并具体执行国际图联UBC计划,还出版季刊《国际编目》(*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1977年12月,国际图联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世界书目控制组织业务指导委员会",制订了世界书目控制的有关方针和计划重点。

安德森论述了UBC性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将其视为一项主要的政策目标:建立一个从事书目交换管理的世界情报系统,这个系统能够采用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形式,使人们能迅速而广泛地获取世界各国所出版的图书情

① 王恭心译:《国际图联在国际图书馆界中的作用》,《图书馆论坛》,1991年第2期。

报资料"[①]。

当1973年IFLA的主席赫尔曼·利贝尔斯(Herman Liebaers)在布鲁塞尔大会上提出世界书目控制为IFLA的主要目标时，曾遭到唐纳德·厄根哈特(Donald Urgnhart)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仅有书目控制，但得不到资料原件，对学术研究仍一无益处，之后厄根哈特成为IFLA的国际外借和联合目录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在Boston Spa的国家科技外借图书馆的主任，后来该单位与国家中心图书馆 合并为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British Library Lending Division)，厄根哈特的想法和当时国家中心图书馆的馆长莫里斯·莱因(Maurice Line)不谋而合，由于他们共同的观点，促使西欧图书馆馆际互借研讨会(Western European Seminar on Library Interlending)的举行。会议建议为配合UBC计划，有必要规划一个加强各国出版物的获得及加速国际馆际合作服务的国际计划。1974年IFLA在华盛顿召开的第40届大会通过了与UBC相配合的UAP即世界资源共享计划，目标是任何人可获得任何形式任何地方出版的任何资料，促进出版物的利用。

1979年5月，执行委员会在负责人柯克加迪的领导下，决定建立计划管理委员会，以协调和管理IFLA的专业核心计划并促进这些计划与各部、组工作的联系，到1983年，IFLA理事会批准了包括核心计划的重要文件"国际图联的希望"，预示着新核心计划的产生与发展。

(二) NBC与UBC配合，国家书目大力发展

1969年，IFLA通过了"综合登记书目"计划，要求各国建立书目中心，登记本国出版物并在国际范围内交换书目情报。1977年IFLA和UNESCO在巴黎联合召开了国际国家书目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ional Bibliography)，讨论国家书目控制问题，建议制订国家书目出版标准。当时统计，已有90个国家编印了国家书目，10多个国家开始采用ISBD s，18个国家同意MARC磁带交换，26个国家成立ISBN国内中心，22个国家建立ISSN国内中心，8个国家进行在版编目。这次大会全面推动了各国缴送本制度、书目中心和国家书目标准化的发展。此后，为全面发展国家书目控制，IFLA经常讨论发展现行书目和回溯性书目、建立国家书目体系的问题。1981年在莱比锡大会上书目小组通过了《关于现行国家书目反映文献的推荐意见》。为指导现行国家书目，IFLA出版了 *Guidelines for the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gency and the National Bibliography*(1979)、*Manual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1982)。为指导回溯性国家书目，IFLA出版了 *Retrospective Bibliographic Control: the Question of Cumulative Volumes of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1985)、*Retrospective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n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1986)、*Commonwealth Retrospective National*

① 安德森:《国际书目管理的现状与展望》,《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

Bibliographies(1981)。

1974年美国成立全国书目控制协调委员会,旨在促进各类型书目的标准化,连续出版物转换计划和协作性机读目录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书目数据库,在NBC发展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书目控制受到重视。按照ICNB的建议,UNESCO和IFLA UBC Office开始发起非洲书目控制的一系列地区和分地区讨论会。首次讨论会于1978年1—2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有17个非洲国家参加,创办了非洲书目控制常务会议(African Standing Conference on Bibliographic Control,简称ASCOBIC)的会刊《非洲书志》(*Afribiblios*)。之后,1979年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召开了关于"加强对国家书目发展的重视"的讨论会。1981年在冈比亚的班珠尔召开了关于国际标准如ISBD、ISSN的修订与研究会议。1983年8月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ASCOBIC会议,旨在促成没有呈缴法的地区建立呈缴法,改进现存的呈缴法。

在ASCOBIC的推动下,非洲英语国家的国家书目发展较快,截止到1985年,在14个非洲英语国家中,建立呈缴法的有12个,有国家书目的有13个,其中,由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有6个,国家档案局编辑的有4个,年刊有7个,月刊有2个,采用AACR的有11个。[①]在描述非洲英语国家的现行国家书目之后,尼日利亚的班科尔(B. S. Bankole)建议各种语言资料和手稿应收录在国家书目中,应努力收集现在未收的各种载体资料——缩微品、磁带、唱片、电影等等,并收录在国家书目中;应努力编辑印刷型国家书目月刊;应当考虑在英语国家之间的国家书目交换等等。

(三)推进书目著录的国际标准化,ISBD形成体系

统一编目规则是国际书目控制的首要条件。继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和1969年国际编目专家会议后,20世纪70年代由工作组专门制订《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 s)规则。1971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上讨论了ISBD草案,同年ISBD(M)推荐本问世,英国、法国、德国很快将这一规则分别用于《英国国家书目》、《法国书目》和《德国书目》。在ISBD(M)成功的鼓舞下,国际图联又陆续成立了几个分则工作组,并在1971—1975年间相继推出新的ISBD。1973年第39届大会前召集了ISBD(M)修订会议,1974年出版了"标准初版"。为连续出版物编制的ISBD也于1974年出版。随着专门的ISBD增多,国际图联发现几个分则的著录内容与ISBD(M)不尽一致,为协调各个分则,于1975年10月在巴黎讨论制定一个总的标准框架,即ISBD(G)(《国际标准书

① Bankole Beatrice Solap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1985, 14(1)

目著录总则:说明本》),1976年工作组完成并交国际图联编目委员会的洛桑会议讨论,于1977年正式出版。1977年出版了为地图资料编制的ISBD和为非书资料编制的ISBD。20世纪80年代,工作组继续制订新的规则,并依据ISBD(G)进行大规模修订,终于形成了较完善的ISBD体系。

(四) CIP有效地解决出版和图书馆的书目控制

自197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制订"在版编目"(CIP)计划,许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CIP的尝试。为推广应用这一方法,IFLA和UNESCO于1982年8月在渥太华举行了国际在版编目大会(International CIP Meeting),讨论解决各国CIP著录项目不同的问题,建议采用标准格式。1983年出版了《国际在版编目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IP Meeting*)。1986年出版了《在版编目准则》(*Guidelines for CIP*)和《在版编目推荐标准:在版编目数据表和图书在版编目记录》(*Recommended Standar ds for Cataloging - in - Publication: the CIP Data Sheet and the CIP Record in the Book*)。

(五) UNIMARC的推广应用

机读编目记录交换的可能性始于196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LC MARC2 Format。70年代MARC2被ISO接受并通过为国际标准格式。与此同时,各国在LC MARC基础上建立本国机读目录,如英国的UKMARC、澳大利亚的ANB/MARC,比利时的CALCO、瑞典的LIBRIS等。但由于各国格式的差异,影响着国际资料交换,于是机读目录的网络研究引起了广泛兴趣。1972年IFLA成立项目指示符号特别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Content Designators),研制国际通用的机读格式,即UNIMARC,于1976年底完成。1977年出版了《UNIMARC:通用MARC格式》,1980年在ISBD修订后,UNIMARC也出了第二版,1980年《UNIMARC手册》问世。

UNIMARC的产生是国际书目情报交换的基础,成为各国建立自动化图书馆目录和国家书目的标准格式。一些国家开始以此为基础建立MARC系统,生产并接受UNIMARC磁带。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自1975年起为探讨机读目录网络化成立了"国际MARC网络研究筹划指导委员会"(International MARC Network Study:Steering Committee)。1983年IFLA将国际MARC纳入核心计划成立IMP(International MARC Programme)。该计划分成两部分:一是由德国Deutsche Bibliothek in Frankfurt负责MARC的应用,包括技术方面的探讨及MARC的测试;二是由大英图书馆负责MARC的修订。

(六) 联合目录的作用

1982年迈克尔·高曼提出"联机目录就是一个书目控制系统,联机目录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书目控制的范畴而深刻影响到图书馆的各个方面,从而需要重

新思考和组织我们的事业”。[①]

为推进书目控制,IFLA 通过书目控制部(Divis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提供组织保障。1970 年将统一编目规则委员会改名为编目委员会(Committee on Cataloguing),1976 年改名为编目组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ection on Cataloging)。书目委员会于 1977 年改为书目组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ection on Bibliography)。1981 年 IFLA 建立了一个独立组名为“分类与主题标引组”(Section on Classification and Subject Cataloguing)。

在书目控制实践发展的同时,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加强。1975 年,唐纳德·戴芬森(Donald Davinson)出版了《书目控制》,探讨了书目控制概念、国家和国际书目的发展史、非书资料控制等,是书目控制的一部概论性著作。1978 年,多林·M. 古德曼出版了《图书馆资料书目控制:原理和实践》,概述了书目控制在图书馆的实践包括 MARC、主题检索、分类编目等方面的内容。1980 年,杜拉林·希基(Doralyn J. Hickey)发表《理论的书目控制》一文,指出:“‘书目的’应定义为包括处理各类资料的一切手段,无论这些资料是印刷的,还是以别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控制’则用于描述一种程式,据此那些资料得到系统地处理以达到能够重新获取的目的。‘书目的’(Biliographic)与‘控制’(control)两者结合起来的涵义应是指处理各类资料的程式使之能够重新获取。在此定义下,书目控制成为信息存储与检索全过程的一个部分,专指关于资料自身信息的存储与检索”。[②]韦尔施(Wellish)对书目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1980 年提出了书目控制论,指出:“任何情报检索系统的中心部分是 BC 系统。它正像用于控制一种过程或操作的系统一样,服从控制论的基本规律。我想说明在目录系统中哪些是可以调节的,哪些是不可调节的,对它的组成及行为最终可得到什么样的控制的测度”。[③]因此,他按照控制论的原理设计了一个从 D(输入构成扰动)到 O(系统输出或目标)的开环系统模型 E(见图 6-1)。

图中,系统输出或目标为 O,系统从外部接受输入,获得输出的原料基础,但每一新的输入都构成一种扰动器而影响预期目标 O,使其发生不期望的变异。为了使系统输出保持在预期目标 O 的极限以内,系统必须设计一个控制子系统 S,由控制装置 C 和调节器 R 组成,可耦合到 E 上。S 子系统的目的是控制从 D 到 O 的不期望的变异。这一设计成为书目控制的经典模型。

---

① 高曼著,罗伟清编译:《联机目录的发展超出了书目控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7 年第 1 期。

② Hickey Doralyn J. Bibliographic Control in Theory. IFLA Journal, 1980, 16(3)

③ Wellish. The Cybernetic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Toward a Theory of Document Retrieval System. Journal of ASIS, 1980,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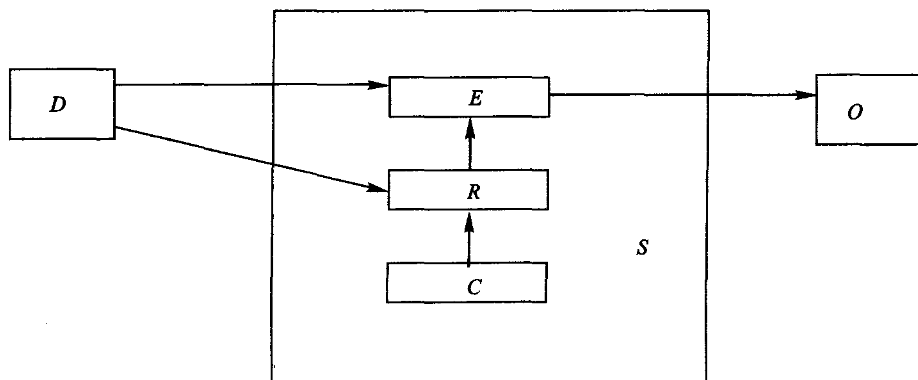


图 6－1　韦尔施开环系统模型

五、UBCIM 与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控制

1986 年 IFLA 将 UBC 和 IMP 合并为“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即 UBCIM 计划，这一合并标志着书目控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8 年，《国际编目》改名为《国际编目和书目控制》(*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改名后扩大了范围，包括 IFLA 和 UBCIM 消息与活动、国际 MARC 活动、各国书目控制的发展、关于编目、书目和分类现实问题的研究。

1990 年 3 月底，UBCIM 办事处从英国图书馆迁到法兰克福德国图书馆。前任规划负责人罗伯茨作为专业协调员进入 IFLA 总部，新任计划负责人是德国图书馆副馆长卡特·诺瓦克(Kart Nowak)，M－F 普拉萨德女士(Marie－France Plassard)同意离开 UAP 计划担任 UBCIM 的管理工作。重组后，UBCIM 的目标是：(1) 协调所有为国际书目资料的交换与控制而发展出来的系统与标准，包括支持 IFLA 的部(Divisions)与组(Sections)等单位的相关专业活动，书目格式与标准的维护，同时作为该领域的资料中心；(2) 改进 UNIMARC Format，并协调专家对 UNIMARC 的发展与维护；(3)确保有关国际书目、格式标准等计划及会议出版品的安全。

除 UBCIM 之外，UAP(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UDT (Universal Dataflow and Telecommunications)等核心计划也都致力于世界书目控制的实现。陈昭珍将 IFLA 有关世界书目控制的工作归纳为七个方面：(1) 制定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格式；(2) 推动国家书目的编辑；(3) 发展国际机读编目交换格式；(4) 款目形式的标准化；(5) 国际出版品利用计划(UAP)；(6) 国际资料流通

与通讯计划(UDT);(7) 出版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 (ICBC)。[①]

书目控制部(Divis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是 IFLA 的八个部之一,它紧密结合 UBCIM 开展工作,致力于通过书目数据的创建和交换,进行馆藏和信息的组织。该部有三个组组成:

书目组(Bibliography Section)。2002 年由原"书目组常务委员会"更名,旨在促进 UBC 计划框架内各种文献书目的发展和使用。该组负责组织一个论坛,讨论的问题有:书目的历史、范围和组织(包括国家书目和国际书目、现行书目和回溯性书目、总书目和专题书目),信息检索法研究,通过开展特别推荐活动增进用户利用书目信息。

编目组(Cataloguing Section)。2002 年由原"编目组常务委员会"更名,是编目理论、编目活动和编目标准化的国际发展中心。为了所有用户的利益,编目组分析包括书目信息和规范信息在内的各类资料与媒体编目活动的作用,规划和制定书目信息的编目规则、指南和标准,同时重视发展中的电子环境与网络环境,以促进书目信息和规范信息的世界利用与交换。

分类标引组(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Section)。旨在为分类和主题标引工具的用户和生产者提供一个论坛,其职权范围是通过建立或使用书目记录的机构,促进分类和主题标引工具的标准化和统一应用;提出和提倡有关信息主题法研究的建议;并通过公开会议和出版刊物传播研究成果。

书目控制部协调委员会负责管理书目控制部,该委员会由书目组、编目组和分类标引组三个组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和秘书组成。协调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个组的活动,联系 IFLA 专业委员会,并在 IFLA 年会期间组织一个研讨各种书目标准和项目的公开论坛。

IFLA 书目控制的各个组织在书目控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7 年编目组完成了"书目记录功能要求研究"(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RBR),这一研究阐明了书目界的概念模型,阐述了书目记录在用户工作中所履行的全部功能,并提出了一个由各国家书目机构使用的基本书目记录建议。该项目的后续研究,将评估和实施 FRBR 所提出的建议,并通过书目控制部功能要求与权威记录编号工作小组(FRANAR)把 FRBR 的模型推广到规范控制领域中。1998 年 11 月在哥本哈根举办了国家书目服务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ional Bibliographic Services, ICNBS)。2001 年,分类标引组通过与 IFLA 信息技术组以及 OCLC 合作,组织了"网络环境下主题检索"的卫星会议。

---

① 陈昭珍:《IFLA 国际书目控制工作之探讨》,《图书馆学刊》(台湾),1991 年第 7 期。

第二节　书目工作标准

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在GB3935.1《标准化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中的定义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书目工作标准化是书目控制的重要内容。1974年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最大的标准化组织,该组织的第46技术委员会(ISO/TC46)是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在书目著录、文摘索引、主题词表、出版物格式和文献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国际图联为实现UBCIM制订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则,目的在于促进各国书目情报的互换性和易识性,促进书目情报的国际交流。我国自1979年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BTS/TC4)以来,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情报与文献工作标准。此外,负责制定信息管理方面标准的相关技术委员会有: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BTS/TC28,ISO-IECJTC1)、全国文件格式及数据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BTS/TC83,ISO/TC154)、全国缩微摄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BTS86,ISO/TC171)、全国印刷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BTS/TC151,ISO/TC176)。这些组织都制订和颁布了与书目情报相关的标准。

一、文献著录与编目标准

(一) ISBD

1974年以来,国际图联对各国使用的各ISBD分册广泛征求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从而产生了1988年的最新版本,即ISBD第二版。修订后的第二版以ISBD(G)为总原则,与1974年首版相比,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写作上更为规范,真正成为一个体系。该体系由以下标准组成:

1. ISBD(G)《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1977年初版,1987年第二版,1992年修订版。该标准是制定各种ISBD的框架,其大纲明确规定了著录项目、著录单元的内容、顺序及其著录用标识符。它规定文献著录的八个项目:(1)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2) 版本说明项(Edition area)、(3) 资料(或出版物类型)专用项(Material [or type of publication] specific area)、(4) 出版发行等项(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area)、(5) 载体形态项(Physical description area)、(6) 丛编项(Series area)、(7) 附注项(Notes area)、(8)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Standard number [or alternative] and terms of availability)。

2. ISBD(M)《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专著出版物)》:1971年推荐本,1974年第一标准版,1978年第二版,1987年修订版,2001年修订版。

3. ISBD(S)《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连续出版物)》:1977 年第一标准版,1987 年第二版。

4. ISBD(CM)《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地图资料)》:1977 年第一标准版,1987 年第二版。

5. ISBD(NBM):《国际标准书目著录(非书资料)》:1977 年公布,1987 年第二版。

6. ISBD(PM)《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乐谱)》:1980 年公布,1987 年第二版,1989 年修订版,1991 年二次修订版。

7. ISBD(A)《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籍)》:用于著录 1801 年以前出版的专著,1980 年初版,1989 年修订版,1991 年二次修订版。

8. ISBD(CP)《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分析著录)》:1982 年公布。

9. ISBD(CF)《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计算机文件)》:1990 年初版。

10. ISBD(ER)《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电子资源)》:1997 年公布。

(二) AACR

1907 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主持下推出了 AACR(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即英美编目条例),但由于它与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书目著录传统有一定差别,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未能被欧洲的非英语国家所接受。为解决这一问题,1967 年 IFLA 在《国际编目会议原则声明》的基础上,制订出了新版的《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即 AACR1,这一编目条例不仅被北美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接受,也很快被北欧、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接受。

AACR2 即《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是在现代编目理论指导下紧密配合 ISBD而产生的最有影响的编目条例,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图书馆协会、不列颠图书馆、加拿大编目委员会联合提出,由戈尔曼(Michael Gorman)和温克勒(Paul W. Winkler)负责编辑,1978 年出版。

AACR2 是一部综合性的著录条例,不仅适用于普通图书,也适用于连续性出版物及各类型文献。它不仅为英语文献编目提供了标准化工具,而且为各国编目规则制定树立了典范,推动了世界编目标准化,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1986 年澳大利亚编目委员会加入了其常设委员会,1988 年出版了 AACR2 修订版。

AACR2 修订版与 AACR2 的结构基本相同,共分 19 章,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著录”,依据 ISBD 的各分则,规定了各类型文献的著录项目、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号的使用以及著录方法等。本部分有十三章如下:

第一章　著录总则(General Rules for Description);

第二章　图书、小册子、散页出版物(Books,Pamphlets and Printed Sheets);

第三章　地图资料(Cartographic Materials);

第四章　手稿(Manuscripts);

第五章　乐谱(Music);

第六章　录音资料(Sound Recordings);

第七章　影片与录像资料(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Recordings);

第八章　图示资料(Graphic Materials);

第九章　计算机文件(Computer Files);

第十章　立体及实物资料(Three - Dimensional Artefacts and Realia);

第十一章　缩微品(Microforms);

第十二章　连续性出版物(Serials);

第十三章　分析著录(Analysis)。

第二部分为“标目、统一题名与参照”,对检索点的选取、个人著者与机关团体标目、地理名称、统一题名和参照的著录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本部分共六章如下:

第二十一章　检索点的选择(Choice of Access Points);

第二十二章　人名标目(个人著者标目)(Headings for Persons);

第二十三章　地名标目(Geographic Names);

第二十四章　机关团体标目(Headings for Corporate Bodies);

第二十五章　统一题名(Uniform Titles);

第二十六章　参照(References)。

第三部分是“附录”,包括四个附录:

A. 大写规则(Capitalization);

B. 缩写规则(Abbreviations);

C. 数字使用规则(Numerals);

D. 词汇(Glossary)。

随着电子文献,特别是网上资源的不断增加,1993、1998 年对 AACR2 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订,特别是对 AACR2 的第 9、12、21 章,进行了修改和扩充。

2002 年 9 月,AACR2　2002 年修订版由美、英、加、澳等国的图书馆协会同时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于同年 12 月开始采用并实施新规则。

(三) 我国的文献著录标准

我国建国后编制了《中文图书提要铅印卡片著录条例》、《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采用段落空格的著录格式,虽然在统一中文著录上起了积极作用,但与国际编目与机读目录有较大差距。1983 年,在北京图书馆《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总则》(建议稿)的基础上,开始制订并颁发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并逐步形成了与 ISBD 相对应的体系。

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主要有:

1. 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1984.4);
2. 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1985.10);
3. GB3792.3—85《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1985.10);
4. GB3792.4—85《非书资料著录规则》(1985.10);
5. GB3792.5—85《档案著录规则》(1985.5);
6. GB3792.6—86《地图资料著录规则》(1987.1);
7. GB3792.7—87《古籍著录规则》(1987.10);
8. GB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实施日期1984.4);
9. 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1988.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标准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应根据具体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GB3792系列国家标准自1990年开始复审和修订工作,至1995年7月,《文献著录总则》、《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非书资料著录规则》、《古籍著录规则》五个标准完成了修订报批稿。①

(四)我国的文献编目规则

由于文献著录国家标准GB3792系列仅限于对文献实体的客观描述,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决款目规范化问题,在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支持与推动下,组成了以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6分委员会成员为核心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委会,于1996年完成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规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著录法,根据ISBD和GB3792系列确定的著录项目及其顺序、著录用标识符等,对我国古今14种文献类型进行客观著录的原则与方法作出统一规定。这14种文献类型是:

普通图书,指各种印刷型图书(含现代版古汉语图书);

标准文献、科技报告、学位论文,标准文献主要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部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以及关于标准的条文说明等,科技报告主要指科技成果报告,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古籍,指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并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汉字古籍;

金石拓片,包括金石(含砖、瓦、铁、木、玉、泥)拓片及临摹、双勾本影印、石印件;

地图资料,包括各种语言文字的地形图、普通地理图、自然地图、社会经济地图(人文地图)、环境地图、航空与航海用图、天体图、航空摄影图和卫星影像图、地球仪、立体图、地图集、鸟瞰图等;

乐谱,主要指各种印刷出版的现代乐谱;

---

① 赵美娣、吴蓓珠:《我国文献编目标准化的回顾与评述》,《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1999年。

录音资料,包括循环录音带、盒式录音带及唱片等各种录音制品;

影像资料,包括循环录像带、盒式录像带、开盘录像带及视盘等各种录像制品和盒式循环电影片、盒式电影片、开盘电影片及环式电影片等各种电影制品;

静画资料,包括灯条片、幻灯插片、投影片、显微标本片、立体开盘片等各种静态放映的投影制品和美术复制品、闪现卡、图表、照片、招贴画、挂图、工程图等各种图卡;

连续出版物,包括印刷型连续出版物和连续出版的录音资料、影像资料、静画资料等;

缩微资料,包括缩微卷片(microfilm)、缩微平片(microfiche)、缩微卡片(microopaque)、窗孔卡(aperture card)等;

计算机文档,指计算机操作的代码化文档(含数据和程序)。

第二部分是标目法,在文献著录的基础上,为编制书目款目而选择标目及其规范形式,并提供标目的参照关系,进行目录的规范控制。对责任者标目和题名标目的范围与数量、标目名称与确定方法、标目参照的种类与格式等都作出了规定。

在西文文献编目方面,1961 年,由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制订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西文图书编目条例,该条例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美编目体系,对一般图书的描述特别是款目标目的选择和著录作了系统的规定,被我国各类文献机构广泛采用。针对ISBD以及 AACR 根据 ISBD 的修改,我国西文编目也必须与国际接轨。因此,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6 分委员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组织有关单位共同制订《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于 1985 年 8 月问世,该条例主要参照了 AACR2,也适当考虑了我国的西编工作实际。

(五) 在版编目标准

1990 年 7 月 30 日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布了 GB12451—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1991.1)和 GB12450—90《图书书名页》(1991.1)两项国家标准,并要求从 1991 年 3 月起实施。1999 年 3 月 8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在全国出版社实施图书在版编目(CIP)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 1999 年 4 月 1 日起,在全国推广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六) 文献信息目录排序标准

为解决文献信息目录的排序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于 1983 年通过和公布了 ISO7154《书目文档规则》和 ISO/TR8393《ISO 书目编档规则技术报告》。这两项标准只解决了拉丁字母书写文字的排序问题,回避了以汉字为主的文字条目的排序问题。因此,我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1983 年在 ISO7154 的基础上,结合“七五”重点项目《汉字属性系统

(CAS)》的研究成果,编制颁布了GB/T13418《文字条目通用排序规则》,它规定了所有信息数据类文字条目的排序方法和排序规则,适用于各种用汉字和非汉字记录的名称、字词、目录、编号、代码、数字、年代等需要有序排列的印刷、电子显示信息和数据排序。

二、分类标引标准

统一图书分类法,实现分类标准化是文献分类工作的目标,但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分类法标准。我国颁布了GB/T13745《学科分类与代码》,并推荐《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作为国家标准分类法。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5分会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共同讨论定稿的《文献分类标引、规则》(报批稿)于1989年报送国家技术监督局审批,该报批稿对各种类型的文献分类标引做了专门的规定。同年,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5分会完成了《文献分类颜色标识规则》(报批稿)并作为国家标准报送国家技术监督局审批,该报批稿以组配有序的颜色体系、辅助文字及符号,表示文献的内容及类目,以加强文献表示的助记功能。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国内外在进行情报文献分类标引时,多采用三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一种或两种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法进行标引;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本国的一种通用的分类法(或本国的国家标准分类法),同时附加一种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第三种方法是使用本专业的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法最有影响的是DDC(杜威十进分类法)、LCC(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UDC(国际十进分类法)、BSO(概略分类法)。国际上通用的专业分类法主要有ICS(国际标准分类法)、IPC(国际专利分类法)、ISIC(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ISONET Classific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网络分类法)、NLM Classification(国家医学图书馆分类法)等。①

文献主题标引是使用主题检索语言,通过文献的分析而选用确切的检索标识(类号、标题词、叙词、关键词、人名、地名等),用以反映该文献内容的过程。主题标引分为受控标引与非控标引。而文献的主题标引标准有两类:一类是不用规范词表的关键词标引法或自由词标引法;另一类是用规范的语言进行的主题标引,主要分为先组式的主题标引法和后组式的主题标引法。

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ISO/TC46)制订公布了ISO 2788《单语种叙词编制规则》、ISO 5963《主题分析和选定标引词的方法》、ISO 5964《多语种叙词表编制规则》、ISO/DIS12083《电子文本的准备和标引》等后组式主题词表的国际标准。

---

① 朱南:《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为促进我国主题标引的标准化，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ISO国际标准制订出了GB/T15417《文献多语种叙词表编制规则》、GB13190《汉语叙词表编制规则》、GB3860《文献叙词标引规则》、GB15418《档案文献标引规则》等国家标准。

三、文献数据库标准

文献数据库标准化主要依赖于通用数据交换格式、文献信息数据库执行格式标准、数据单元和信息系统间的应用协议标准。

（一）通用数据交换格式

为了达到文献信息开发利用与资源共享的最终目的，必须解决不同类型格式的数据库的数据交换，国内外专家学者致力于国际通用数据交换格式标准的研究与制订。

1973年，ISO审核MARC2后，将其定为国际标准，即ISO 2709《书目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我国于1982年将其转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2901，1992年又公布了修订二版即GB2901—92《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该格式由记录头标（固定长24个字符）、目次区（可变长）、数据区（可变长）、记录分隔符四段组成。

我国其他类型文献的数据交换格式标准主要有：GB/T13726《术语与辞书条目的记录交换用磁带格式》、GB/T13968《档案交接文据格式》等。

（二）文献信息数据库执行格式标准

国际上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文献数据库执行格式标准是《UNIMARC国际机读目录格式》、《UNISIST世界科技情报系统著录参考手册》和《CCF公共交换格式》三种。UNIMARC是IFLA依据ISO 2709制定的书目记录内容标识符，要求各图书馆作为机读目录的国际交换格式。UNISIST是许多文摘索引机读使用的格式，虽然它也是依据ISO 2709制订的，但其包含的数据内容和标识符与UNIMARC不同，从而造成了图书馆与文摘索引机构之间书目数据交流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UNESCO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研制一种通用的机读目录交换格式，于1984年正式发表CCF（Common Communications Format，公共交换格式），1988年发行了CCF的新版。

在我国，1986年，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参照UNIMARC第二版编写了《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讨论稿）》（简称CNMARC）。经过试用并参照UNIMARC手册，于1991年出版了CNMARC的修订稿。1994年在对CNMARC修改的基础上，编印了《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使用手册（上、下册）》。经过修订，增加了地图、乐谱、非书资料、计算机文档及拓片等内容，定为《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于1995年4月通过鉴定评审，被确定为文化部行业标准即WH/T0503—96。该标

准由北京图书馆负责管理与维护，它是与国际标准《UNIMARC 格式》相对应的，由 10 个字段即 10 个功能块组成：

0——标识；

1——编码信息；

2——著录信息；

3——附注；

4——连续款目；

5——相关题名；

6——主题分析；

7——知识责任；

8——国际使用；

9——国内使用。

(三) 数据单元和信息系统间的应用协议标准

国际上采用信息系统间的应用协议标准主要有三类：一是书目数据元指南标准；二是信息系统的应用服务和应用协议类标准；三是计算机在情报文献工作中的应用开放系统互联(OSI)标准。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这类标准如下：

ISO/IEC7352《信息技术：数据交换中数据元分组指南》

ISO8459/1—3《书目数据元指南》(包括馆际互借、采购、情报检索三个标准)

ISO/IEC9789《信息技术：数据交换的数据元的组织与表示的导则；编码方法与原则》

ISO/DIS10160—10163《信息系统的应用服务》(包括馆际互借定义、馆际互借协议的规则、检索服务的定义、检索协议规则四个标准)

ISO/WD11109《情报文献工作计算机开放系统互联(OSI)开发协议的模型》

ISO/NP11703—11712《计算机在情报文献工作中的应用——OSI》(包括馆际互借测试、文献传递服务与协议、查询和检索测试、资源控制规范、查询与检索协议执行说明、馆际互借协议执行说明、查询检索服务、查询检索解释服务和协议、查询环境要求、存取和控制规程十个标准)。

四、文献生产与代码标准

关于图书的标准有：ISO 4《出版物题名和缩写规则》；ISO 690《文后参考文献——内容、形式与结构》；GB11668—89《图书及其他出版物的书脊规则》(1990.1)等。

关于连续出版物的标准有：ISO 30《连续出版物论文来源标识》；ISO 215《连续出版物撰稿格式》；ISO 5122《期刊中的文摘页》；ISO 7275《连续出版物题名页》；ISO 9115《连续出版物和图书投稿书目识别》；GB3179—83《科学技术期刊

编排规则》(1983.7);GB/T13417—92《科学技术期刊目次表》(1993.6)等。

关于二次文献的生产的标准有:ISO 832《书目描述与参考——典型词缩写》;ISO 999《索引编制规则》;ISO 1149《双语/多语对照辞典编辑的一般规则》;GB3468—83《检索期刊编辑总则》(1983.11);GB6447—86《文摘编写规则》(1987.6)等。

其他文献标准有:ISO 3388《专利文献目录著录》;ISO/DIS7220《标准类和类似标准类出版物》;ISO/DIS10304《文献馆藏著录规则说明》;ISO/CD10455《手稿和机读数据稿的格式》;ISO/CD10956《电子文献及其引文标准》;GB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编写格式》(1988.1);GB9704《国家机关公文格式》;GB9705《文书档案案卷格式》;GB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GB/T11617《辞书编纂符号》;GB/T11821《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2《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等。

国外文献识别代码标题主要有 ISBN、ISSN、CODEN 等。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是国际通行的图书出版物代码。1966 年 11 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图书市场调查与贸易合理化会议上提出制订国际标准书号的建议。尔后,英国福斯特根据 1966 年美国图书批发商史密斯公司和鲍克公司合作编制的统一书号设计了新型书号,即现行的 ISBN。1967 年底,英国出版者协会开始采用,后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推广使用,至 1972 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为国际标准。ISSN(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是国际通行的连续出版物代码。它以《美国国家标准识别号:连续出版物》为基础,1975 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订为国际标准。ISSN 由设在巴黎的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ISDS)国际中心统一管理。ISDS 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科学情报系统"(UNISIST)计划于 1972 年 11 月建立的。CODEN(Code Number)是一种字母与数字相结合的计算机用刊名代码。由美国布法鲁大学毕晓普 1953 年首创,用 4 位简单的字母代替每一种科技、医学期刊题名。1954 年出版了包括 3 000 种期刊代码的目录。1961 年,美国测试与材料学会(ASTM)接管了登记 CODEN 的工作,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主题领域,产生了 *CODEN for Periodical Titles*。1975 年 1 月指定 CODEN 工作转给化学文摘服务社,并成立国际 CODEN 服务社,出版 *International CODEN Directory*。CODEN 主要用于连续出版物,但一些会议或专业会议成卷的文件、专利和专利集丛也指定了 CODEN。

我国文献识别代码方面的标准有:(1) GB5795—86《中国标准书号》(1987.6);(2) GB9999—88《中国标准刊号》(1989.7);(3) 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1983.11);(4) GB7156—87《文献保密等级代码》(1987.10)。

与文献相关的代码标准有:(1) 空间—时间代码,如 GB3304—82《世界各国

和地区名称代码》(1987.1)、GB2260—8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1986.10)、GB2808—81《全数字式日期表示法》、GB2809—81《信息交换用时间表示法》、GB2810—81《信息交换用顺序日期表示法》。(2)语言—文种代码,如GB4880—85《世界语种代码》(1985.10)、GB4881—85《中国语种代码》(1985.10)。(3)人的代码,如GB2261—80《人的性别代码》(1981.7)、GB4658—84《文化程度代码》、GB4762—84《政治面貌代码》、GB4763—84《党、派代码》、GB4764—84《本人成分代码》、GB4765—84《家庭出身代码》、GB4766—84《婚姻状况代码》、GB4767—84《健康状况代码》、GB6565—86《职业分类代码》。(4)机构—行业代码,如GB4657—84《国务院各部、委、局及其他机构名称代码》、GB4754—8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五、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

关于字符集的标准有:GB1988—80《信息处理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GB2311—80《信息处理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扩充方法》、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一辅助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三辅助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五辅助集》、GB6513—86《文献书目信息交换用数字字符编码字符集》、GB13141—91《书目信息交换用希腊字母编码字符集》、GB13142—91《书目信息交换用拉丁字母扩展字符集》。

关于字符转写的标准有:GB3259—83《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GB3304—91《中国各民族名称罗马字母拼写法及代码》。

六、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

ISO积极推进信息组织标准化的工作,已制定的标准有MARC格式(ISO 2709)、SGML格式(ISO 8879)、《数据要素规范与标准》(*Spec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Elements*,ISO 11179)、《语言名称表示代码》(*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Languages*,ISO 639)和《国家名称表示代码》(*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Countries*,ISO 3166)等。SC9是ISO/TC46的分委员会,它负责发展和维护关于文献展示、识别与描述的国际标准,并不断推出关于电子文献(包括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各方面的ISO国际标准草案。ISO还成立了元数据工作组,负责元数据的标准与规范,工作范围包括元数据要素、分类设计、元数据管理与交流等。

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ANSI)下设的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从事有关元数据的命名、标识、定义、分类和注册等工作,还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座谈小组。美国网络化多媒体信息服务组织(Networked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er-

vices)负责发展通过因特网和新兴的信息基础设施提供新的多媒体程序与服务的检索与传递以及影响这些因素的标准与政策的制定。英国标准协会的向用户传递信息解决方法部负责信息与交流技术的标准化。欧盟的信息社会标准化系统(ISSS)负责所有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全面的、完整的标准化服务及产品。[①]

Z39.50 协议(Information Retrieval: Application Service Definition and Protocol Specification)即图书馆"信息检索:应用服务定义及标准说明书",是关于信息检索的 ANSI/NISO 标准和 ISO23950 标准,它属于 ISO/OSI 参考模型的应用层协议。该协议最初源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图书馆和华盛顿州图书馆之间的"系统互联项目",后来演变成 Z39.50 协议。该协议有 1988 年、1992 年、1995 年三个版本,并继续修改和补充。Z39.50 协议是一个基于客户/服务器的信息检索协议,它将对信息的检索分为两个部分——在某种标准上对信息的选取以及对该信息的检索。Z39.50 协议为这两种行为提供了标准语言,定义了若干过程和结构,可以在不同信息检索系统中建立计算机到计算机的连接,使得客户可以在服务器所提供的数据库中进行查询,通过搜索获得数据库中的记录,遍历术语列表并对结果进行排序。尽管 Z39.50 协议的开发是为了进行书目信息的交换,但实际上已成为与底层数据结构无关的高层信息检索服务中间协议。

元数据规范很多,如 DC(Dublin Core,都柏林核心)、PICS(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因特网内容选择平台)、RDF(Resources Description Frame,资源描述框架)、EAD(Encoding Archival Description,编码档案描述,一种基于 SGML 的元数据格式)、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文本输入创始计划)等。此外,还有应用于各专业领域的元数据标准,如用于政府信息定位而创建的元数据格式 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政府信息定位器服务)、用于网上生物资源描述的 NBII(Natio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全国生物信息基础结构)等。

万维网联盟(W3C)是 WWW 上最有影响的因特网标准的认定机构,在网络信息组织领域,该机构认可的网络资源描述语言为 XML,资源描述框架为 RDF,元数据标准为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日期与时间格式为 W3CDTF。国际信息与图像管理协会(AIIM)和数据交换标准协会(Data Interchange Standards Association)则分别负责图像信息、信息交换相关标准的制定。

DC 也称为都柏林核心元素集,是为描述网络资源、支持网络检索而建立的元数据格式。它起源于 1995 年 3 月 OCLC(Online Computer Center)和 NCSA (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在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市召开的元数据研讨会,当时只设定了一个包含 13 个元素的核心元素集。1996 年 9

① 黄如花:《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评价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2 年,第 116 页。

月的第三次元数据研讨会上，增加了两个元素。这样，未限定的DC形成了由15个元素组成的元素集，列表如下。

元　素	标　识	定　义
Title 题名	Title	赋予资源的名称
Creator 创作者	Creator	创建资源内容的主要责任者
Subject and keywords 主题和关键词	Subject	描述资源主题或内容的关键词、词组短语或分类号
Description 描述	Description	对资源内容的说明
Publisher 出版者	Publisher	使资源成为可获得和利用状态的责任者
Contributor 其他参与者	Contributor	对资源内容创建做出贡献的其他责任者
Date 日期	Date	与资源的创建或可获得性相关的日期
Type 类型	Type	有关资源内容的特征和类型
Format 格式	Format	资源的数据格式
Resource identifier 资源标识符	Identifier	用来标识资源的字串或数字
Source 来源	Source	资源的出处信息，而当前资源源于这一出处
Language 语种	Language	资源内容中所使用的语言
Relation 关联	Relation	该资源与相关资源的关联
Coverage 覆盖范围	Coverage	资源内容的时空特征
Rights management 权限管理	Rights	有关资源本身所有的或被赋予的权限信息

这15个元素不含子元素、命名域或其他限定词。在1997年10月的第五次元数据研讨会上，Stuart Weibel和Juha Hakal将这15个元素依据其所描述内容的类别和范围分为三组：即资源内容描述类(Title、Subject、Description、Source、Language、Relation、Coverage)；知识产权描述类(Creator、Publisher、Contributor、

Rights);外部属性描述类(Date、Type、Format、Identifier)。[①]

1998年9月,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因特网工程任务组,由网络设计人员、操作员、厂商、专家组成的民间组织)正式接受了DC这一网络资源的描述方式,将其作为一个正式标准予以发布(RFC2413)。

1999年颁布了DC1.0,2000年8月又推出了DC修饰词标准。[②] DC已成为美国国家标准Z39.80。DC的维护和发展由DCMI(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创始)组织负责。

第三节　文献范围与控制

书目控制既包括对具体文献的控制,也包括对整个文献流的控制,因此,应建立由微观控制和宏观控制组成的书目控制体系。

一、微观控制

微观控制是指从具体的文献出发,通过编目系统或检索系统对每一篇文献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控制。著录控制、描述控制、规范控制和标引控制都属于微观控制。

(一) 著录控制

著录控制依靠著录规则对文献形式进行描述。国际上的文献著录标准都是首先区分为文献类型,按类型进行描述。标准的编制体例有两种:一是在一个标准中包括总的规则和各类型文献的著录规则,如《英美编目条例》、《日本目录规则》;二是总则单独制订,并按各类型分别制订著录规则,如《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按文献类型进行描述,在国际上存在着不一致的因素:一是关于文献类型的标准,图书与连续出版物如何划分;二是制订标准的依据的变化,制订各种类型描述的标准是参照各种其他的标准,由于依据的标准在不断变化,从而造成标准之间的差异。

(二) 描述控制

描述控制是按文本进行的。文本可以是一部书或书中的一章,也可以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材料,它是组成文献的基本单元。对文本进行控制的主要方法是元数据方法。特别是对于网络文献的控制,用元数据可以描述、记录和搜寻网上的文字资料、视频、声频、多媒体资料等,即可以实行基本的描述控制,如就信息对象的识别而言,DC提供的是最为基本的描述信息,而MARC

① 刘嘉:《元数据之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78页。

② 吴建中主编:《DC元数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则提供详细级别的描述。

(三) 规范控制

规范控制的思想最早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卡特(C. A. Cutter)提出来的,他在《字典式目录规则》(1904年第四版)中指出,该表是"已用的全部名称的完整记录,注明选定的规范形式和不同形式,避免工作重复"。1922年美国的费洛斯在其著作《编目规则及图解》一书中,专门描述了规范记录的建立、规范名称形式、各种参照、根查、参考资料来源及团体机构的历史记注等,这是关于建立规范文档的较明确的最早阐述。

规范控制是通过查询规范文档来维护书目文档中标目的惟一性的过程。它具有如下功能:区分名称,按照以往的或标准的规则形成名称的正确形式;展示相互关系,形成相关名称(不同形式、新称与旧称、上属机构等);形成决策文件,通过生成规范记录,形成这种信息文件(帮助用户确定标目之间相互关系,确定书目记录中的标目)。

规范控制的基础是维护和利用规范文档,规范文档(authority file)首创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是规范记录的有序集合,也叫规范表。在机读目录中保证文档标目的一致性。规范记录用来记录下列内容:书目记录检索点的规范标目;规范标目与相关的不同标目形式之间的参照关系;选取标目,确定其参照关系的依据(如参照、参照根查等)及其他有关信息(包括建档日期、建档人姓名等)。规范标目内容包括作为书目检索点的编著者名称、统一题名、丛编题名和主题标目等。因此,规范文档又常常可分为名称规范文档、主题规范文档和丛编规范文档。名称规范文档中的名称包括:个人名称、国家名称、机关团体名称、会议名称、地理名称和统一题名。

伯格在《图书编目工作》一书中指出:规范控制工作至少包括五个综合过程:(1) 建立规范记录;(2) 将规范记录集中起来形成规范文档;(3) 将规范文档连接到书目文档上,规范文档与书目文档集中起来形成规范系统;(4) 对规范文档和规范系统进行维护;(5) 对规范文档和规范系统进行评估。

国外较早进行了规范控制的研究,并形成了国家级的规范系统和各种规范文档。IFLA的UBCIM致力于款目形式的规范。在个人著者方面,1963、1967、1977年出版了三版《个人著者》,1980年补充本包括了80个国家的个人姓名本名及引用名。在团体著者方面,IFLA编目委员会的维劳娜负责研究这一标准,1975年出版了《团体规范》,明确了团体著者与个人著者的关系及团体著者款目形式与结构,1980年出版了《团体标目形式与结构》。在统一标题的款目形式方面,1978年出版了《佚名经典著作:欧洲文学统一标目一览》。关于宗教作品的统一标题,1981年完成了《天主教拉丁语礼拜作品统一标题一览》第二版。美国国会图书馆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相继建立了主题规范和名称规范的计算机系

统,80 年代初实现了联机规范控制系统。

我国图书馆在国际规范控制的推动下,开始了中文书目规范控制的研究。1989 年,北京图书馆成立了名称规范组,编写制订“规范数据款目著录规则(草案)1990”。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参照“UNIMARC/规范格式”,结合我国规范工作的特点和需要制订“中国机读规范格式”草案。1997 年北京图书馆又编写了《中国机读规范格式使用手册》、《中文图书主题规范著录规则》、《中文图书名称规范数据款目著录规则》。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自动化规范系统,中山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集成系统也具有规范文档管理功能,CALIS 也组织编制中英文规范文档。

(四) 标引控制

对于文献内容的开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广度开发,依靠各种标引规则和分类法,主题词表等;另一方面是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度开发,依靠提要法、文摘语言等。可见,标引控制是一个重要方面。

从标引语言对书目控制的作用看,目前的标引语言对于书目控制的作用主要是确定文献的学科属性和主题范围,提供排检项。这对于组织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对于用户从学科和主题的角度检索是有益处的。但是在下列情况下,标引语言难以发挥书目控制的作用:当一个标引语言体系不断变动时,那么同一种文献的原来内容标引与后来的内容标引在类名、类号、主题词上不一致;当读者不熟悉某一标引语言时,影响着对文献内容的检索;当书目情报人员对某一标引语言发生理解错误或标引错误时,对于文献内容的揭示就出现错误;当某一标引语言的参照系统不完善或编制不科学时,对文献和内容揭示是不全面的,涉及多学科或多主题的文献可能只标引一个分类号或一个主题词。目前的标引语言和书目情报系统存在着以上的问题,因而,要发挥标引语言的书目控制作用,必须依赖于情报检索语言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文献完整记录的书目控制需要有国际统一的标引语言系统。国家书目控制和标引语言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国家书目控制要求标引语言适应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标引语言的发展必然对国家书目控制产生影响。以《英国国家书目》(BNB) 为例,BNB 的编者根据杜威法的基本性质,将已出版的组配分类表在结构和标记符号两方面引进了十进分类法,这是因为 DDC15 版(1951)作了大量的删减,16 版(1958)虽然增加了新的类目和“凤凰表”,但仍不能适应国家书目的要求。BNB 所作的改动又对 DDC17 版产生了影响。未经正式认可的 BNB 分类表对相似的复分词类目作了规定,无疑,对 17 版的修订产生了影响。

二、宏观控制

宏观控制是对文献流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分为两类。

(一) 书目情报流控制

1. 整序控制。主要是控制文献流的数量,目的在于列举文献并供读者利用。西方将这种控制称为"系统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

2. 选择控制。是根据特定的要求围绕某些学科或课题组织文献,使文献流从辐射式流动转为定向流动。文献检索的书目控制就是选择控制。选择控制的重点是对冗余文献的控制,实质是以质量为中心的控制。

(二) 书目情报源控制

1. 文献的生产控制

由于文献流中出现的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增加了文献完整书目控制和文献检索书目控制的困难,即使对文献的形式和内容作出完善的微观控制,也不能解决数量与质量不统一的问题。只有从文献的生产角度进行"源"控制,才能使文献流正常发展。文献的生产控制有以下途径:

(1) 版权控制。作者生产的作品要获得一定的质量保证才能获得版权。版权控制不仅在于承认作者的对作品的有关权力,更重要的是反映作品的质量,在大量的作品中优选出可以生产的作品,赋予代表版权的代号,经过编辑和出版者的劳动,使之成为较高质量的产品。

(2) 出版物登记。出版物的登记制度是掌握出版物的重要方法。通过登记,既可以编制国家书目,又可以进行统计分析,为出版者出版图书提供决策依据,也是掌握出版动向,进行文献生产规划的途径。为保证出版物的登记产生的呈缴本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3) CIP 控制。CIP 不仅为出版社、发行所和图书馆提供统一的编目数据,而且对于规范文献生产,加速文献报导,将文献生产与编目融为一体意义重大。

(4) 文献评论控制。由于文献生产的复杂性,文献流中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评论控制显得特别重要。书评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不仅可以发现优秀作品,向读者推荐;而且可以通过客观的分析,对一本书的价值、优劣作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能够揭露和批评有缺点和错误的图书,起到监督作品和出版质量的作用。图书评奖是一种从正面宣传优秀图书,鼓励生产精品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图书评奖既是对作品本身进行评价,也是对编辑出版印刷进行评价。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推动评奖健康发展的关键。

此外,历代禁书、辨伪也是实施文献控制的一种重要途径。编制禁毁目录、伪书目录具有存史甄别、去伪存真的控制作用。

2. 文献的传播控制

文献生产后必然传播,文献的传播形成文献流。文献流流量大,流速快,流域广,这就产生两种现象:一是大量的文献中高质量与低质量文献同在。如果就某一文献来确定其质量高低易于做到,但要在文献流中将质量高的文献与质量

低的文献区分开来非常困难。二是文献的过剩与文献的匮乏同在,一方面,文献增长的"爆炸"趋势使文献交流系统出现拥挤现象,在文献发行系统、文献流通系统都能看到拥挤的书架、书库,空间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文献生产与读者需要不能完全对应,出现了读者需要的文献缺乏的现象。文献生产中追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造成读者对文献的不满。

文献流的这两种现象给书目控制增加了压力,实施文献的传播控制包括:

(1) 选择性传播。正像文献流通系统根据需要选择文献一样,书目控制根据需要对文献进行选择性的报导,这是文献流的横向特性决定的。从横向看,文献流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对它进行完整的记录,是文献生产控制的任务,依靠国家书目系统就可以实行。而对于读者而言,特定读者所需要的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书目控制不作出选择,靠读者去选择文献是相当困难的。专题书目一般认为是某一学科的完整记录。其实,它包含着两种意义的选择,一是在巨大的文献流中选出某一学科、专题的资料,二是对于某学科的文献进行了一般性的选择,即排除那些信息和知识量过低的文献以及非学术性文献,这等于是为读者作出了初选工作,读者检索书目再作精选。推荐书目最能体现文献的选择传播,它与专题书目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为读者作初选工作,而是代替读者进行精选,它强调知识和信息量,但并不强调文献的学术价值。

(2) 最新通报。文献的最新通报是书目控制适应文献流的纵向特征采用的方法,文献流的纵向特征是: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资料。文献流始终处于更新状态。根据这一特征,书目控制只有始终报导最新的文献流,才能发挥传播作用,犹如大众传播工具报道新闻一样,没有最新报道,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力。新书通报是比较活跃的一种方式,读者了解最新的作品,查找图书馆目录系统,不如直接利用新书通报。

(3) 浓缩性传播。无论是横向对文献流的选择还是纵向对文献流的通报,都是对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作间接的评判,只有在读者再一次选择和阅读以后才能体现出书目情报的作用,因而都不是最佳的传播控制途径。将大量的文献进行浓缩产生高质量的文献提供给读者,可称为浓缩性传播,是读者最欢迎的控制方式。它不仅仅是替读者对文献流作出了质量判断和选择,而且代替了读者对文献中的知识进行加工,使读者以极少的时间获取极大的知识和信息量。

文献流质量控制是书目控制的生命线。将生产控制和传播控制两个方面归纳起来,质量控制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粗选择的质量控制,如科技书目情报的报导;第二级,精选择的质量控制,如SDI;第三级,浓缩性的质量控制,如文摘;第四级,评论性的质量控制,如书评。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等编.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 柯平著.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3 柯平编著.文献目录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4 柯平主编.文献经济学:文献,书目控制与经济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5 朱南.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 吴建中主编.DC元数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7 黄如花.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评价研究:〔博士论文〕.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2

8 彭斐章,陈传夫等. 概论书目控制论. 图书情报论坛,1990(2)

9 柯平.IFLA"国际书目控制与国际机读目录"计划的回顾与展望.大学图书馆学报,1993(3)

10 韦尔施著.书目控制的控制论——文献检索系统的一种理论.杨廷郊译.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6)

11 Davinson Donald. Bibliographic Control. 2nd ed.. London:Clive Bingley, 1981

第七章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

第一节　书目情报需求

一、书目情报概念基础

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经验的总结，又是思维的细胞，也是一切科学理论最基本的知识单元。论述任何科学原理都必须以严格确定的、统一的科学概念为基础。要研究和发展书目情报理论，要探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问题，就必须弄清有关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基本概念。

（一）书目情报

书目情报（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国内外对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作为概念，“书目情报”有自己的内涵。内涵是概念特有属性的隐含性反映，对“书目情报”概念的理解，关键在于把握它的内涵。书目情报来源于文献中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书目情报只有广泛利用才能体现其价值，只有通过传递才能发挥作用。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这里所指的文献是“将知识与信息通过记录的方式存储在一定载体上，能够传播与利用的文化符号系统”[①]。文献包括用声频、视频记录下来的一切知识材料，同时也包括按文献加工等级划分的一次、二次和三次文献。书目情报是一种依赖于文献而存在的特殊文献。

书目情报是对文献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压缩的结果，因为文献中蕴含的知识和信息是复杂的，其中有精粹的知识和信息，也有冗余的知识和信息，书目情报服务为读者提供的应当是效用信息，即去除了多余的字、词、句、段落，冗余的、重复的知识表述，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知识表述。

（二）书目情报需求

所谓书目情报需求，就是书目情报需求者（读者或用户）对所需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欲求、愿望或意向。简言之，书目情报需求是读者或读者群对知识和效用信息的一种待满足的状态。书目情报是指“用户或潜在用户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的对情报的需求”。书目情报需求是一种社会需求，是书目情报产生的根源

---

① 谢灼华等：《关于文献定义的哲学思考》，《图书情报论坛》，1993年第3期。

和动力。

（三）书目情报意识

书目情报意识是指人们对书目情报社会功能的认识程度和对获取书目情报需求的敏感度，即人们对书目情报知识和信息的敏感、捕捉、判断和吸收的自觉程度。书目情报意识是人们对书目情报需求的自我意识。

书目情报意识的强弱显示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当代人对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书目情报意识和素养。书目情报意识对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具有导向功能，包孕着社会的书目情报利用潜能。书目情报意识直接影响书目情报需求的表达和利用书目情报服务的能力。社会书目情报意识反映着社会对书目情报的接受程度。强烈的书目情报需求正是开发利用书目情报资源的强大动力，提高社会的书目情报意识，是开发利用文献信息资源，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书目情报意识对读者（用户）来说，首先表现为需求意识，读者（用户）在学习、研究、实践中遇到疑难或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利用书目情报，这就是需求意识；其次是查寻意识，当科学工作者在选择课题时，必须通过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等书目文献系统进行查新活动，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活动进行中需要查寻所需的文献信息，这就是查寻意识；再次是交流意识，书目情报只有在交流过程中才能体现其价值，读者（用户）不仅仅是书目情报的利用者，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生产的成果，借助书目文献将其纳入到书目情报系统，提供交流，因此，他们也是书目情报的生产者。

在提高个体书目情报意识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书目情报意识，建造一个良好的书目情报服务环境，提高社会利用书目情报服务的水平。

（四）书目情报需求者

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生产、学习和实践的目的而利用书目情报的个人或群体，有人称之为书目情报用户。

（五）书目情报能力

书目情报能力是指读者（用户）对书目情报所含知识、信息的识别、理解、分析、判断、综合和利用的能力。具体地说，书目情报能力就是指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加工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吸收知识信息的能力和创造新知识信息的能力。书目情报意识与书目情报能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书目情报能力的提高可以进一步强化书目情报意识，而书目情报意识又可以有效地促进书目情报能力的发展。对于同一种书目情报源的利用，由于各人的书目情报能力强弱不同，所获取知识信息的数量、质量及利用效果差别很大。

书目情报能力主要体现在：

1. 书目情报获取能力。即书目情报搜寻能力，这一方面取决于了解和掌握

各种书目情报源的程度，以保证获取知识、信息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掌握科学检索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以保证获取知识、信息的准确性、快捷性和方便性。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知识、信息掌握程度，不仅看他拥有知识数量的多寡，更要看他具备获取知识、信息能力的强弱。

2. 知识信息加工处理能力。当前，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不良信息、有害信息、非法信息、信息垃圾越来越多，信息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就需要具备对知识信息的鉴别、选择、分析和按照规范进行整序的能力。

3. 知识信息利用能力。知识信息获取和加工处理的目的在于利用。知识信息只有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在科研进程中利用知识信息进行科研选题，确立科研计划，进行科学研究，解决各种难题，最后还得利用知识信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4. 知识信息交流与创新能力。知识信息只有通过交流、传递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局限，拓展交流范围，以方便、快捷为特点的网上信息交流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六）书目情报服务

书目情报服务是开发文献信息资源，向读者（用户）传递文献信息，为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重要手段，是适应图书馆书目工作和参考咨询服务工作情报化需要而出现的，是书目情报工作为读者服务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重要环节。

书目情报服务最早称为参考工作、参考服务、参考咨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最早出现于1876年，美国的S. S. 格林（Samuel Sweet Green）在美国费城著名的图书馆员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图书馆和读者的关系》中提到，图书馆员应当亲自协助读者寻求资料，应当成为主动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社会教育工作者。这是有关对读者提供个人帮助的明确建议，是最早有关参考咨询服务主题的论文。参考工作（Reference Work）这个术语1891年首次出现在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的索引上，以后才逐渐出现独立的参考咨询服务理论。但是，关于参考咨询服务的定义，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图书馆杂志上讨论很热烈，各种说法不完全相同。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信息量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特定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日益尖锐化，书目情报服务正是运用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用户）各种各样的文献信息需求的服务活动，它包括书目情报的搜集、加工、重组、传递、开发和利用的整个过程的活动。

二、书目情报需求分析

(一) 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分析的必要性

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及其特点决定着书目情报服务的指向、服务形式和内容。书目情报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文献信息需求,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应当作为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出发点,一切为了读者是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精髓。书目情报服务应当坚持读者至上的观点,书目情报服务的任务就是使文献、知识和信息与读者(用户)的需求最恰当地、有序地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次地为读者(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书目情报需求是一种社会需求,是书目情报产生的根源和动力。书目情报是科学研究的信号,人们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愈高,书目情报的需求也愈强烈。科学工作者获取书目情报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创造,获得的成果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因此,科研工作者既是书目情报服务的对象,也是书目情报的生产者。人的书目情报需求属于高层次需求,在自我实现需求中,书目情报需求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基础、学习、工作以及承担具体任务的情况,甚至与需求者的年龄、职业、知识结构有关。高层次的需要具有长久的动力,可以长时间起激励作用。书目情报需求也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次递进的需求层次。如求知的需要(包括学习需要、增长知识和积累知识的需要)、释疑的需要(为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疑难问题的需要)、较高层次的需要(如科研攻关的需要、创造发明的需要、决策的需要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书目情报需求作为表现人的高层次需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心理需求。美国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一种对理解、组织、分析事物、使事物系统化的欲望,一种寻找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的欲望,一种价值体系的欲望。”[①]人的这种潜能是书目情报产生的心理机制。

一切为了读者,读者作为书目情报服务的对象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不仅决定着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也决定着书目情报服务的机制与模式。

开展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分析与研究是建立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需要,是提高书目情报服务工作的基础。书目情报服务体系以交流和传播书目情报为主要内容。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动态的、有效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必须以最大限度满足不断变化的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为前提,高效的书目情报服务是实现书目情报保障的前提,也是编制各类书目文献选题的依据。

---

① 弗兰克·戈布尔著:《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47 页。

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依据书目情报的使用价值而定,没有使用价值的书目情报,读者是不会对它产生需求的。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状况是研究和考察整个书目情报部门开展书目情报活动的重要依据。

书目情报意识直接影响读者(用户)的书目情报需求程度,当书目情报意识上升到理性阶段时,书目情报需求随之增加,如果书目情报意识仅停留在随机的感性认识阶段,书目情报需求就不迫切。只有当读者利用书目情报或者取得科研的重大突破,解决了某一难题,或者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判断和决策时,才会认识到书目情报的重要性,在心理上则表现为需求的迫切性,产生出强烈的书目情报需求,继而产生利用和加强书目情报能力的需求。要提高读者书目情报利用的能力,必须强化书目情报意识。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书目情报需求行为也不例外。人们在希望得到某一特定书目情报时,必然会产生某种需求,这种书目情报需求可能转变成查找书目情报的行为,直至获得和使用书目情报。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界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进行了大量调研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吉林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对图书馆8 538名读者的调查与分析”调查了读者对图书馆目录的利用情况。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的“科技人员利用文献情况的调查”中有关于书目文献利用及二次情报服务评价等项目。湖北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的“湖北省科技人员情报需求调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情报用户调研”活动等都涉及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调研。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彭斐章承担的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专项科研资助项目“图书情报需求分析与服务效率研究”,对国内 700 个单位不同层次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现状。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上述成果显示出开展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分析与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 影响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主要因素

书目情报需求是由社会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书目情报需要及书目情报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影响书目情报需求的因素很多,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因素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书目情报系统的现有能力,书目情报需求的工作性质、专业特色及研究方向,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等。但归纳起来主要因素是:社会因素、书目情报机构的因素和读者(用户)自身的因素。

1. 社会因素

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该国家和民族的书目情报需求的内容,一般来说是比较先进的。

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教育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一般特点及总的发展趋势。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好，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提高了，为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努力进取、积极探索创造了良好的、宽松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广泛吸收和有效利用书目情报资源的平台。

书目情报需求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紧密相关的。全民族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是书目情报需求者增多，书目情报需求量加大和书目情报利用率增长的关键。

处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信息量的急剧增长，读者对书目情报的需求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日益专深，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激发了人们的书目情报需求，提高了读者对书目情报需求的迫切程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信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这些都是引发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

2. 书目情报机构的因素

书目情报机构的服务能力直接影响读者对书目情报的利用。书目情报机构的设计必须坚持读者至上的理念，一切从读者着想，只有明确了这一指导思想，才能使书目情报机构的设置具有针对性、主动性、预见性和复杂性，才能给读者提供优质服务。

书目情报机构业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书目情报需求者得以信赖并经常利用书目情报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书目情报机构的物质条件是开展书目情报活动的物质保证，也是影响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重要条件。

书目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多少、业务水平的高低、文化素养的状况、书目情报意识和服务态度，都是影响书目情报需求的重要原因。书目情报机构较高的可存取性、书目情报工作人员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宽的知识面、一定的外文阅读能力、较强的书目情报意识和善于捕捉随机书目情报的能力、热情诚恳的服务态度等，都是激发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重要因素。

此外，书目情报机构的服务效果也是影响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重要因素。书目情报机构是否具备系统完备的书目参考工具，能否提供优质的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情报机构能否按照读者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决定了读者是否愿意到书目情报机构进行书目情报咨询和交流。

3. 书目情报需求者本身的因素

书目情报需求者的职业、专长、知识结构、个人爱好及兴趣、所承担的科研课题，书目情报需求者的心理活动等，均是影响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因素。如科研工作者要求提供的书目情报专指性强，并且要求某一专题的书目情报全面系统。服务行业的读者要求提供的书目情报比较具体。一般来说，不论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读者职业相同，专业性质相近，担负的任务相同，其书目情报需求的

范围和内容也大体相同。有较高知识素养或有特长的读者其书目情报需求比较专深。承担着科研课题的读者,所需书目情报的内容是随着科研进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侧重。

总之,满足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应当符合齐普夫定律即省力法则。对读者来说,获取书目情报有多种途径,读者选择最优途径;获取书目情报有多种情报源可供利用,读者选择最易获取、最方便利用、最准确可靠的书目情报源。因此,获取书目情报的手续最简便,提供书目情报的时间最快捷,利用书目情报最方便,是最大限度满足读者书目情报需求最起码的要求。

(三) 书目情报需求的层次

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书目情报需求也需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书目情报需求通常有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现实的书目情报需求,亦称为表层书目情报需求或者称显在的书目情报需求。读者(用户)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书目情报机构表达自己的需求,称为现实的书目情报需求,这种需求的特点是看得见、能被统计、被测量、被书目情报工作者所了解或掌握。另一种是潜在的书目情报需求,或称深层的书目情报需求,是一种处于书目情报需求者内心"黑箱"状态的书目情报需求,是一种看不见的心理活动。由于书目情报环境或书目情报素养不够,读者发端于内心的书目情报需求难以或未能及时表达出来,形成"潜流"状态的书目情报需求,称为潜在的书目情报需求。

在书目情报服务过程中,读者表达出来的书目情报需求和行为只占整个书目情报需求的一小部分。F.W.兰卡斯特(Lancaster)指出:书目情报机构在调查了解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状况时,切莫忽视读者的内心"黑箱"状态的书目情报需求,即那种看不见,听不着的还没有表达出来的书目情报需求;完全集中于实际工作的查问,仅接受它们的表面值,就可能只注意到大冰山的尖顶,并把这个尖顶误认为是淹没于水中的大得多的冰山整体。这充分说明将读者潜在的书目情报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书目情报需求是发展书目情报需求的关键。

(四) 网络环境下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因特网为主干的国际计算机信息网络在全球广泛地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进程。一方面,社会信息的数量和种类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而迅速成倍地增长;另一方面,读者面对分散无序、变化多端的信息海洋,无所适从,人们希望迅速、准确地获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巨大的不断增长着的知识和信息量与读者特定知识和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网络环境下的现实的基本矛盾,这就强烈地激发着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因此,认真地分析和研究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特点和规律,对于充分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优化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至关重要。

网络环境下读者书目情报需求表现为以下特点:

1. 读者书目情报意识增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促进了全球信息的高速增长和高效传播与利用,而且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充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将对信息的需求视为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第一需要。因特网提升了人作为书目情报用户的主体意识。因特网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虚拟性等特征改变着人类实践的主体、客体、手段及结果,并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大大提升了人作为书目情报用户的主体意识。由于用户的信息认知权、信息自由权的觉醒,增强了书目情报用户自觉获取知识和信息,享受书目情报服务的意识。

2. 信息消费观念深入人心。信息在消费时很大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按计划调节和统一管理的制约,缺乏消费的主动权。在网络环境下,各种书目情报机构纷纷建立,各式各样的书目情报产品竞相出现,书目情报产品具有竞争性,所有的书目情报服务机构都想尽方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主动积极地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书目情报服务。读者(用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他们对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希望以最少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和信息。读者的信息消费需求受信息量的刺激而急剧增长,这是推动书目情报服务发展的动力。

3. 读者书目情报需求呈多元化。多元的世界必然产生多元的需求,读者书目情报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多元化。社会性书目情报需求呈增长趋势,信息已经渗透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工作者、政治活动家、商人、企业家、工人、战士、农民、学生等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查寻自己所需的信息。各种社会组织、机关、团体、科研机构、学校等都必须依靠信息。这就显示出社会书目情报需求呈增长趋势。读者个体性的书目情报需求由于受其年龄、职业特点、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呈离散状态。这就是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多样性。因此,网络环境下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社会性与个体书目情报需求的离散性是同时并存的。

4. 网络环境下读者对信息精品的需求愈来愈迫切。现阶段信息网络还处在一个混乱无序状态,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序的信息空间,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因此,读者已不再单纯满足于对相关信息、信息线索、文献书目数据或信息参考数据的获取,而是更加注重获取那些隐含在书刊中的、有关某一主题的知识单元的信息,那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和深加工的信息精品。

第二节　书目情报服务

一、书目情报服务的意义

书目情报服务是充分开发文献信息资源，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一项具有较高科学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工作，是读者服务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重要环节，书目情报服务工作开展的状况，是检验读者服务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尺。科学研究的需要是推动书目情报服务活动向前发展的动力。科学研究活动一刻也离不开查阅文献信息。任何一位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他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时，首先必须对研究领域的有关文献信息全面掌握，这样才能在前人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探索。科学工作者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前人或他人进行过哪些研究，已经发表过哪些论著，当前国内外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动向怎样，哪些方面是未曾涉猎过的荒地，哪些还有开拓的空间，哪些具有持续开展研究的余地等情报，要及时掌握这些文献情报有赖于书目情报服务，有赖于书目情报工作者的帮助。科学研究的任何阶段的每一步骤都离不开查阅文献资料。历史上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经验证实，他们无一不是在查寻、搜集和利用文献资料方面下过苦功夫的。书目情报工作者通过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有关的文献信息，向科学工作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特定文献资料，使他们及时地掌握有关科研课题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书目情报服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充当读者在茫茫的文献信息海洋中的导航员。读者要从数量巨大、类型复杂、文种多样、出版分散的文献信息资源中，迅速、准确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特定文献资料，真有被文献海洋淹没之感。书目情报工作者能够引领读者在文献信息海洋中迅速、准确地获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

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网上信息资源内容丰富，学科覆盖面广，共享程度高，形式多样，增长速度异常迅猛，先进的信息技术使书目情报加工整序更加便捷和规范化，网上数据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检索途径，信息的可获得量随着网络的发展而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网上信息数量巨大而无序，更新变化速度快，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超载日趋严重，读者面对如此巨大、无序、变幻莫测的信息海洋，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书目情报工作者充当“导航员”，引导他们在网上迅速、准确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资源。

二、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

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涉及书目情报的生产、加工、传递与利用等方面。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要跟随着社会信息环境和书目情报机构功能的变化而变化。一

般说来，书目情报服务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 书目情报源建设

书目情报源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基础。在考虑书目情报源建设问题时，要根据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结合书目情报机构的任务，收藏文献信息资源的特点，编制各种类型的书目文献。不断完善馆藏文献目录体系，不断充实参考文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特别是全球网络信息服务业的迅速崛起，书目情报的生产、加工、传递和利用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得书目情报源得到延伸和扩展。互联网上存储着大量的信息资源，除纸质型信息资源，还包括声频、视频、图像、动画等多媒体信息，以及电子期刊、电子图书、书目数据库、事实数据库、数值数据库和文献数据库。此外，还有政府机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大型公司企业以及个人互联网上建立的主页发布的各种动态信息。这些信息资源使得书目情报源从以传统馆藏为主体向以网络信息资源为主体延伸和拓展，为书目情报服务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发挥其功能奠定基础。

应当指出，网络信息资源虽然非常丰富，存取十分方便快捷，但是，网络信息资源不可能取代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纸质文献以其具有可视性、便携性、阅读性及亲和力强的优势，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文献载体。古往今来，任何新型文献信息载体的出现对原来的文献信息载体不是取代，而是一种发展。网络信息资源和纸质文献信息资源共同构成现代图书馆互相调剂、相互补充的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的资源基础。

(二) 参考咨询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由两部分组成：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和网上的参考咨询服务，二者不可偏废。参考咨询服务是书目情报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直接面向读者服务的方式之一，参考咨询的本质在于咨询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交互，正如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 R. Rangnathan, 1892—1972)1961 年在其所著的《参考服务》(*Reference Service*)一书中写道："参考服务是建立读者与文献个别接触的过程。"读者提问和咨询馆员解答的工作是参考咨询服务的基本内容。一次性提问可以采取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提出对书目情报的需求。解答时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咨询单，也可以是指导读者获取书目情报途径的方法指导。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查找文献收藏处所和核对文献书目著录事项，以及人名、地名、数据、统计资料、公式、法规、条约、事件等。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上参考咨询服务提供了条件。例如，借助联机公共目录(OPAC)查寻各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并提供馆际互借；采用电子邮件(E-mail)的方式进行参考咨询，读者通过网络终端，直接将咨询问题发送至参考咨询部门

的电子信箱中;利用网上专家系统和自动化检索系统开展全天候的交互式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为读者与咨询馆员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最有效最便捷的条件,有利于随时了解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提高了读者对参考咨询服务的满意度。

(三) 书目导读服务

书目导读服务又称书目推荐服务,是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针对某一特定的读者群,或围绕某一事件、某一专题,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有选择的推荐,或者为读者导航的一种指导阅读的书目情报服务活动。指导阅读是我国书目工作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学者讲究治学之道,认为治学宜得门径,得门而入,事半功倍。今天,我们在书目情报服务活动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读者或读者群,他们不了解关于某一问题或某一学科的入门该读哪些书,不懂得读书的先后缓急,不知道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可以一般浏览,不知道自己要读的书在哪里可以找到。这就要求书目情报工作者充当读者在书林学海中的向导,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书目导读服务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就是说要指导人们学会怎样学习,因此,对书目情报服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当好读者在文献信息海洋中的导航员,引领读者如何查寻信息,怎样评价和筛选信息,怎样组织和利用信息。

(四) 开展读者书目情报教育

开展读者的书目情报教育是书目情报服务的重要内容。当前读者书目情报教育的重点是要加强读者的信息资源意识、培养读者的书目情报能力。通过书目情报教育帮助读者:了解全球网络信息资源与设备;掌握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检索方法与技巧;学会网络信息的选择、评价、利用;培养在网络环境下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吸收知识、信息的能力,利用知识、信息的能力,交流和创新知识、信息的能力。在开展读者书目情报教育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制订不同的教育计划和提出不同的目标,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尽可能采用网上培训,使读者能有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必须指出的是网上培训与传统的书目情报教育是并存的,互动互利的,不可偏废。

(五) 提高书目情报服务人员的素质

书目情报工作人员的素质关系到书目情报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提高书目情报工作人员的素质是网络环境下发展书目情报服务的需要。高素质的人员是做好书目情报服务工作的根本。书目情报服务人员应该是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人。书目情报人员只有具备了合理的知识结构,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网络信息服务意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各种书目情报需求。

三、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趋势

（一）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特征

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加快，书目情报服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明确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特征对于把握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环境突破了信息资源利用的时空局限，为实现全球范围的信息资源共享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是网络的书目情报服务与传统的书目情报服务共存互补的融合方式。这是因为，书目情报服务赖以开展工作的资源基础——情报源是文献资源实体加上网上信息资源；书目情报服务的读者既有到馆读者又有网络读者；书目情报服务方式既有传统服务方式也有现代化服务方式，如电子邮件（E-mail）、远程登录（Telnet）、Gopher、Web 等方式。这种共存互补的融合方式，使得书目情报服务在服务广度与深度方面得到提升，在服务功能方面得到拓展。

（二）建立联合协作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

为了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目情报服务的需求，为了实现书目情报资源共建共享，建立联合协作的书目情报服务体制势在必行。例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在 152 个高校成员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国内外数据库，开发了联机合作编目系统、联机公共检索（OPAC）系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统系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网络。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地区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科技大学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合作建立的网上知识导航站，是一个书目情报服务方面的协作服务网。

综上所述，在网络环境下要发展书目情报服务必须建立联合协作的书目情报服务体制，实现书目情报服务的标准化。

（三）努力提高知识与信息的组织加工水平，实现网络信息增值

为了保证网上参考咨询真正做到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的全天候服务，便于读者自行查找咨询档案，也有利于参考咨询员在解答读者提问时使用，应当建立能够检索大量咨询问题和咨询答案的知识库，所谓知识库就是将读者的咨询提问和参考咨询员回答咨询的答案，采取集中方式或累计方式建成的数据库。

重视对文献中蕴含的知识单元和信息的重组，注意三次文献产品的网上生产，向读者提供浓缩化、综合化的精品信息服务。

（四）大力开展网络信息资源的导航服务

网上信息资源增长速度迅猛，更新速度快，质量良莠不齐，超载日趋严重，整个网络信息处于无序状态。读者面对着海量的、分散的、无序的、变幻无穷的信

息，迫切地需要书目情报人员充当“导航员”，特别需要书目情报服务人员帮助他们对网上动态信息流进行过滤，引领读者在网上航行。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陈传夫．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 国家教委高教司．目录学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 柯平．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5 邓小昭．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情报资料工作，1999(2)

6 胡冉，朱瑞．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中的互动效应．情报资料工作，2003(7)

7 曾明．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图书馆论坛，2002(6)

8 初景利，孟连生．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与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2)

9 赵睿杰．虚拟参考咨询与网络资源管理．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3(2)

10 计国君．全面提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的创新体系．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4)

第八章　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

第一节　国家书目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国家书目的特点

国家书目是书目的一种类型，国家书目全面、系统地揭示与报导国家范围内一定时期的全部出版物，是文献生产状况的历史记录，《中国国家书目：1985》“前言”提出：“国家书目以全面系统揭示与报导一个国家出版的所有文献为基本特征，它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文化发展的状况。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自己的国家书目或相当于国家书目的全国性总书目，而且正不断完善其编辑出版工作，作为沟通国际书目情报，实现国际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

国家书目的宗旨简单地概括为“既总且全”，收录、揭示与报导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所有的出版物。作为国家书目的替代物，《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都是在国家登记的全国正式出版物的基础上编制而成。按规定它收集“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公开发行的各种文字出版物”，对于内部书、停售书和非正式出版物不予收录，只有1975年本(1979年出版)中，“对已停售的宣扬‘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动思想观点的图书，作为历史资料及反面教材，也予收录”。中国国家书目的收录范围还不包括专利文献、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为促进各国国家书目的建立和开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77年UNESCO和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在巴黎专门召开了国家书目国际代表大会，有力地推进了世界各国国家书目的编辑出版工作。

国家书目的特点有：

1. 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一个国家的所有出版物，实行“既总且全”的原则，尽可能的“详尽无遗”、“有出版物必录”，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文献出版方面的情况，客观上起到文化史、学术史的作用。

2. 国家书目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编制，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图书馆统计国家标准化的建议》明确规定国家图书馆是国家书目信息中心，负责出版国家书目。国家图书馆编辑国家书目有稳定的书目信息来源，具有较高的质量

保证，出版周期上具有稳定性、长期连续性、技术先进性、著录规范标准性和数据权威性等特点。

3. 收录范围以“领土－语言”为基本原则。不仅记录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出版的各种类型、语言、载体的文献，而且对本国领土以外的本国公民及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著述的文献也予以收录。

4. 按其反映文献的时间，可分为现行国家书目、回溯性国家书目。按载体形式可分为网络型、机读型、缩微型、书本型等几种主要形式。

5. 国家书目的出版、发行周期正在缩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发行年刊为主，发达国家则为月刊或周刊。由于计算机生产和电子排版，出版发行周期大大缩短，编辑形式大大丰富。如《英国国家书目》(BNB)于 1977 年采用计算机编制，到 1988 年 8 月出版2 000期后于 1989 年起同时发行印刷版、缩微版、磁带版和光盘版。《中国国家书目》的编辑出版方式，从 1988 年开始采用计算机编制，出版光盘版、累积书目光盘版等。

二、缴送本制度

国家书目的编制不但需要大量文献作基础，也需要法律作保障，具体而言就是缴送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大多数国家编制国家书目都得益于缴送本制度，按此制度获取的缴送本是国家书目的重要来源。

从英国最早开始实施出版物缴送本制度迄今已有 300 多年，清朝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可视为我国缴送本制度和出版物登记制度的雏形。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颁布了《新出图书呈缴条例》。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新出图书呈缴规程》。

我国的当代缴送本制度从 1949 年以后逐步建立，1949 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0 年 1 月制定了《征集新出图书期刊办法》，该办法虽非法律，但却为缴送本制度打下了基础。

1952 年 8 月 6 日，政务院公布《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同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制定了《征集图书期刊样本办法》。1955 年 4 月 25 日，文化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这些办法的公布实施，为版本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获得图书和杂志的保存本，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加强了缴送本制度。

1956 年 7 月，又颁布了《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的通知》。1979 年 4 月 18 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颁发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197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原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我国学位论文接受呈缴单位。同时，像专利、标准、政府文件等类型文献也有相应的保存单位。1985 年，文化部又进一

步颁布《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对缴送出版物样本作出了明确规定。1988 年 11 月 24 日,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90 年 12 月 15 日,又发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

我国缴送本制度经历多年的调整,最后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国家图书馆、国家书目中心、国家专题书目中心接受缴送出版物样本工作得到可靠的保证,也为编制国家书目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我国台湾地区缴送本制度起源于 1952 年 6 月台湾地区公布的"出版法",规定当地的各出版物均应呈缴一份给当地"中央"图书馆。

在该呈缴本制度的基础上,由该馆于 1956 年 2 月正式编制《"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年刊)。1966 年,更名为《送缴到馆书目》(周刊),1968 年,改为《新到图书目录》(半月刊)。1970 年,重新定名为《"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月刊)。

从 1964 年起,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每 5 年累积、汇编、出版一辑。《"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是控制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物的重要工具。

三、国家书目的简要回顾

(一) 国家书目的国际背景

国家图书馆不仅具有印刷、出版基础,而且都配备了先进的计算机及信息处理设施,再者,国家图书馆从事国家书目工作,是国际文献资源共享的需要。这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计划。

早在 1946 年,UNESCO 在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呼吁所有国家都编制国家书目。1950 年,它又在巴黎召开了"改进书目服务"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提议在 UNESCO 内设立一个国际书目咨询委员会,每个国家也设立一个国家书目机构。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UNESCO 和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又大力开展了书目著录标准化的工作,编制了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为国际标准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1976 年 UNESCO 又通过了《关于图书馆统计国际标准化的建设》,其中明确规定作为国家书目中心的国家图书馆应负担起编辑、出版国家书目的任务,"因为只有国家图书馆才具备编制国家书目的物质基础即文献来源基础、业务工作基础、现代技术手段基础";1977 年 9 月 UNESCO 和 IFLA 在巴黎联合召开了国家书目国际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ional Bibliographies,ICNB),探讨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改进国家书目协调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世界国家书目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为国家书目的标准提出建议书,为编制国家书目的机构商定准则以及为资源共享和国际合作提出建议等,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书目的宗旨和功能。在它们的努

力下，大多数国家编制了国家书目。

英国的《英国国家书目》、法国的《法国总书目》、德国的《德国国家书目》、美国的《累积图书目录》、日本的《纳本周报》和《全日本出版物总目录》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书目。

（二）中国的国家书目简要回顾

1.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书目

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始，中国历代有由政府主持对国家收藏的书籍进行整理后所编的官修目录，即古代国家书目，如宋王尧臣、王洙等撰《崇文总目》、明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张萱等撰《内阁藏书目录》、清《天禄琳琅书目》。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开依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经籍志）之先河；清代中叶由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真可谓集此前中国古代著作之大成，官修书目也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民国年间，未曾由政府主持编制过全国性的总书目。1935 年，《（生活）全国总书目》（平心编）和开明书店《全国出版物总目录》分别对当时的出版物进行了登记与揭示，具有一定的国家书目意义。

2. 中国现代替代国家书目作用的两部书目

《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一直被认作为中国国家书目。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该署图书期刊司负责征集图书，并从 1950 年开始将征集到的图书编成了内部参考、不对外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周新书目》。在此基础上，又编印了公开发行的《全国新书目》创刊号一期。1951 年，由该署图书馆编印了 4 期季刊本，1952 年，改为半年刊，1953 年 10 月改为《每月新书目》，同时，《每周新书目》停刊。1954 年 11 月，出版总署撤销，改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编制《全国新书目》（月刊），1958 年 8 月改旬刊，1961 年改为半月刊，1966 年 7 月自第 14 期中断，直到 1972 年才复刊，不定期，1973 年改为月刊。

1955 年 12 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全国新书目》的基础上，首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全国总书目》（1949—1954），1957 年 9 月，又出版了第二部《全国总书目》（1955）。从 1956 年起，《全国总书目》改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出版。1958 年 4 月，《全国新书目》和《翻译书目》合并。其后，除 1966—1971 年因“文革”中断外，基本上都是按年出版。

1956—1965 年十年间，报导每一年出版物的《全国总书目》基本上做到了次年出版，比较稳定。但“文革”伊始，从 1966 年到 1971 年五年多，总书目的编辑出版工作陷入停顿，1971 年出版了《1970 年全国总书目》，以后每年一部，基本恢复正常。

1996 年，《全国新书目》由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改版复刊。其中，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88·全国总书目》（中华书局，1992），正文严格按《中图法》编排，后附

外国文字图书目录、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目录、盲文书籍目录、报纸、杂志目录、丛书目录、书名索引、出版者名录等。

3. 中国现行国家书目

我国从1986年起,由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使用计算机技术编辑、出版《中国国家书目》,采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原则,并按以下几个国家标准进行文献信息处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1983)、《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1985)、《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3792.3—1985)、《非书资料著录规则》(GB3792.4—1985)。文献标引按《汉语主题词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

《中国国家书目》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正式的国家书目,以完整、准确、及时地报导一个时期的出版物为主要特征。收录的文献包括各种汉文图书、期刊、报纸、博士论文、乐谱、地图、技术标准、非书资料、少数民族语文文献、盲文读物等,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当代文献的出版概貌。该目录分正文和索引两大部分,正文为上册,索引为下册。正文包括中文及其他文字,各种文字再区分出版物类型。正文所收款目按照国家标准著录,并按《中图法》的类号编排,每条款目均包括《中图法》、《科图法》的分类号以及主题词,并尽量给予北京图书馆索书号。索引部分包括题名、著者、主题三种。

《中国国家书目》的收录范围,确定为"领土-语言"综合原则。即除收录本国领土内出版的各种语言、各种文献类型和各种载体的著作及中国与外国合作出版的各种著作外,还收录外国出版的汉语著作。此外,在各国居住的华人、华裔,有的依然用汉语写作,所出版发行的著作也被收录。其收录范围可以基本体现对我国主要出版物的完整、准确、及时的记录。

北京图书馆作为《中国国家书目》的组织管理机构,设有《中国国家书目》编辑组,1991年底,又将国家书目组、统一编目组等有关部门统一组成"中国机读目录数据中心",着力解决CNMARC发行的时效性与覆盖面问题。

《中国国家书目》的编辑出版方式,从1988年开始采用计算机编制。1991年底,北京图书馆在ACOS-630计算机上开发的"中文图书采编检索综合管理系统"投入运行,有了较好的技术支撑条件。

自《中国国家书目(1985—1987)》印刷版成功问世以后,编制出版了《中国国家书目》的90年代以来的各年度版,整理出版1988—1990年版。出版、发行的国家书目系列产品有《中国国家书目光盘》(CD-ROM),包含有1988年以来的《中国国家书目》,每半年更换一次;《中文图书机读目录》(CNMARC)。其中,即时版每半月发行一次,每次发行1~2张高密盘;回溯版包括1988—1995年度的国家书目;分类组盘可根据用户指定的类别(22大类)组盘;ISBN组盘则可根据用户提供的ISBN号组盘和检索。1995年6月出版的《中国国家书目光盘

(CD－ROM)》,数据格式为CNMARC格式,提供题名、作者、主题、关键词、分类号、出版社、题名作者汉语拼音多个检索点,可以实现多重检索。

北京图书馆还与上海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共同制作《中国国家书目回溯光盘(1975—1987)》。

《中国国家书目》的编制,标志着我国书目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中国国家书目》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国图书目录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当代外国的优良书目方法和现代化技术,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制定计划,使之成为沟通中外书目信息,实现国家书目控制(UBC)、国际资源共享(UAP)的有效手段。

我国台湾地区由“中央”图书馆于1956年2月正式编制《“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年刊)。1966年,更名为《送缴到馆书目》(周刊),1968年,改为《新到图书目录》(半月刊)。1970年,重新定名为《“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月刊)。从1964年起,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每五年累积、汇编、出版一辑。其收录范围主要包括台湾地区出版的各类文献,兼收港、澳两地出版的文献及海外华人学者赠送的学术著述;以收中文文献为主,兼收台湾地区出版的外文图书,不收地图、连环画及50页以下的小册子。它是控制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物的重要工具,编制也比较精良,可作为《中国国家书目》的补充。

4. 回溯性国家书目

1978年国家文物局根据周恩来总理“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在南京召开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通过对全国善本书普查、版本鉴定、编目著录,由顾廷龙担任主编,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是我国现存古籍较为完整的目录,分经、史、子、集、丛五部,收录全国782家图书馆、博物馆等珍藏的古籍善本共6万余种,13万部。每种古籍,均著录其书名、篇卷、行款格式、版本类型、批校情况及收藏单位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1989年出版“丛部”,1991年出版“史部”,1994年出版“子部”,1997年出版“集部”。

同类型古籍目录还有:王重民编撰《中国善本书提要》(1903—1975),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中华书局,1959),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10—198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以及内蒙古图书馆编《中国蒙文古籍总目》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80),收入3.3万余篇提要,所收篇目是《四库全书总目》的3倍。此外,还有许逸民、常振国编撰《中国历代书目丛刊》(五辑本,现代出版社,1987),所选书目,上起北宋《崇文总目》,下迄近代傅增湘撰《藏园群书题记续篇》,前后900年,系统地收录了古代官修目录及私藏目录近百种,实际上是一部我国古籍的回溯目录。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撰，是从1960年北京图书馆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开始的，1978年，正式成立《民国时期总书目》编辑组，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馆的馆藏为基础，又补之以其他图书馆馆藏，收录1911年至1949年9月各正式出版社、政府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及个人出版发行的所有图书。该目录包括语言、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法律、哲学和心理学等20个分册，共收录民国时期刊行的中文图书10万种左右，大体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图书出版情况。该目录基本按《中图法》分类，著录项目有流水号、书名、著者、出版、形态、丛书、附注等，大多有提要，并附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馆藏代号。该目录附有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及总索引。它是一部具有多重性质的大型综合目录，是一部回溯性目录和具有国家书目及联合目录性质的目录。

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几十年来承担着"编印国家书目，发行统一编目卡片，编制回溯性书目和联合目录，成为国家书目中心"的任务。随着图书馆自动化事业的发展，各项自动化编目系统软件的成熟和中文机读目录格式的完善，自1988年起，北京图书馆开始进行中国国家书目数据库的建库工作，1990年正式向国内外发行中文图书机读目录。

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是文化部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该数据库包含1949—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出版的近40万种中文图书的书目记录，与1990年正式发行的"1988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国家书目数据库"共同组成建国以来我国完整的国家书目机读数据库。

1974年，严文郁在我国台湾地区提议编纂《中国历代艺文总志》，陈立夫予以支持，并由台"中央"图书馆兼办，组织编辑委员会，以王振鹄馆长为召集人，昌彼得为总编辑，历时10年，编辑成功，于1984年起陆续出版、印行。总志分经、史、子、集四册，该总志除著录中国历代正史书志外，兼录《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通志·艺文略》、《四库未收书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贩书偶记·续编》等著名目录，以补一代史志之不足。

四、现代技术环境下国家书目编纂的原则、标准

国家书目数据库的建立，数据是基础，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部分。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制约着国家书目数据库功能的发挥。因此，不仅应该在数据库建立的起始阶段就对数据的质量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应该把数据质量控制作为一切数据库发展的长远目标。

书目数据库建立的目的之一是实现书目数据共享，标准化是实现这一共享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书目数据库质量控制的重要保证。一般地说，所要依据的标准有四个方面：

1. 著录应遵循ISBD(M)和依据ISBD制订的中国国家标准GB3792.2《普通图书著录规则》,按照《中国图书编目规则》进行数据著录。

2. 标引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简称《汉表》)、《汉语主词表》和《中国图书分类主题词表》,依据国家标准GB/T3860—1995《文献叙词标引规则》、《文献分类标引规则》进行分类和主题标引。

3. 格式遵循CNMARC格式制作机读数据。

4. 格式中使用的代码如国别代码、语种代码、文献类型代码、国内行政区划代码以及字符集等严格依据有关的国家和国际标准。

集中编目、合作编目是国家书目生产模式,需要树立科学的管理意识,制订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建立科学的质量保障制度和强有力的数据维护机构。中国高校系统CALIS联机联合编目计划以及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的实施,集中编目中心已经显现了其较强的发展优势。因此,尽快将全国集中编目中心建立起来,联合各地区中心合作建成编目网络,是实现中文书目数据标准化和图书馆自动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联合目录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联合目录概念

联合目录是为揭示和报导全国或某一地区若干图书馆所藏的全部文献或专科性、专题性部分文献而编制的目录,是反映各馆收藏特点及文献分布情况、协调资源建设、促进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

关于联合目录的编制,《美国图书馆学会词汇》是这样定义的:"一组各自独立的图书馆开展的书目原始编目协作活动,成员馆之间有义务相互提供书目记录"。它的主要形式有集中编目、合作(协作)编目、联合编目(Union Cataloguing,简称UC)、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等。

编制联合目录集中地揭示报导多个文献生产部门的文献出版、发行和多馆藏书地点及分布情况,联合目录全面报导文献情况,报导馆藏的合理分布,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上。

编制联合目录的基本意义,是充分发挥各类型图书馆的资源潜力,借助联合目录这一类型的检索工具,揭示、报导及快速传递信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服务,使书目工作成为文献资源建设与揭示协作化、科学化、网络化、现代化的重点。

1. 能集中地揭示和报导多馆藏书特点及分布情况,有利于开展馆际互借,促进书刊资料的广泛交流,充分发挥图书馆藏书的潜力,实现图书情报资料共享。

2. 免去读者分别查找各馆藏书目录的麻烦，扩大文献检索范围。

3. 免去索取文献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通过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获得文献需求的满足。

4. 借助联合目录可以协调各图书馆的书刊选购，避免重复浪费，尤其是对外文期刊的选购进行协调，可以节省外汇。

5. 联合目录是开展书目信息服务必不可少的工具。

6. 通过联合目录的编制，可以了解我国图书馆藏书分布状况，为编制回溯性国家书目奠定基础。

7. 可以提供编辑出版信息。可以帮助读者加强与图书馆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同时将促成图书馆目录事业社会化。

8. 联机目录的编辑较好地发挥了联合目录的揭示与报导文献收藏的功能。

联合目录因收录文献类型、种类、范围的不同有多种编撰出版的形式。

1. 按地区划分，有全国性、地区性、国际性三种；

2. 按收录时间划分，有回溯性(累积性)、新书通报性两种；

3. 按内容划分，有综合性、专门性、专题性三种；

4. 按出版物性质划分，有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其他各类型文献四种；

5. 按文种划分，有中文、外文两种。

收录社科、文史、古籍及有关论著的联合目录，就属于专题性联合目录。对专业读者来说，专科和专题性联合目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帮助读者查找，了解本专业文献，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本专业的发展。

联合目录在编制时，又分专题联合目录和期刊联合目录。

专题联合目录是根据实际需要，系统收录某一专业文献的联合目录。其特点是收录文献的主题明确，在收录内容上要求文献的专门化，在组织方法上要求由学有专长的人来编；具有针对性，收录的范围要求对本学科著作进行较完备系统地收录，不仅要包括本学科的重要基本著作，而且还应包括最新研究成果，对各学派不同观点的文献及有待加工的资料也不应忽视。专题联合目录的著录项目包括著者、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数或册数、附注项(包括丛书名)、收藏馆代号等，一般采用主题、分类、编年以及字顺等形式组织文献，为了更好地完整地反映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方法，对大类目进行分类，然后按照学科的各个主题来组织文献；编制辅助索引，以解决编排方式上的局限性。

期刊联合目录主要是揭示报导馆藏期刊的状况。这种联合目录具有出版周期短、刊载内容新颖、时效性强等特点。收录范围可分为两种：(1) 综合性期刊联合目录，要求收录范围要广，内容要丰富，要能较全面系统地报导期刊收藏的情况；(2) 专题性的期刊联合目录，是读者及课题研究者更加需要的目录，在选择

刊物时一定要完全符合专题的需要，这种联合目录，在形式上属于期刊，在内容上属于专题。期刊联合目录，著录刊名、刊期、出版年月、出版地、出版者、创刊年月、停刊年月、卷期、收藏单位等。期刊联合目录的编排大致有几种：(1) 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编排；(2) 按照期刊刊名字顺排列；(3) 按照学科进行分类，然后各大类期刊按刊名字顺排列；(4) 按照各种期刊创刊年月的顺序编排。

二、联合目录编撰简史

回溯联合目录发生及编制的历史，据称肇始于13世纪欧洲寺院图书馆手抄本目录《英格兰图书馆登记册》，它反映了英国138座各种手抄本的收藏地点。

1833年美国图书馆界的一次会议提出的书目中心编制目录的职能，必须是向读者指明所需图书在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其后开始付诸实践。1864年至1899年间编辑出版了125种小型联合目录。193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LC)设立了编制联合目录的工作机构——“联合目录部”，1954年成立“全国联合目录委员会”，致力于组织编辑、出版全国性联合目录。如包括500个图书馆入藏情况的大型联合目录——《1956年以前全国出版物联合目录》以及1927年创刊的《期刊联合目录》，1953年1月开始出版《新刊连续性出版物刊名目录》等。

20世纪40年代，欧洲提出建立“欧洲联合目录”的设想，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世界目录”。50年代以后，UNESCO对各国联合目录事业一直给予极大的支持。60年代，IFLA通过所属“联合目录委员会”和“国际互借委员会”对编制联合目录的有关部门组织、技术、协调及开展馆际互借等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70年代瑞典、丹麦等国，制定联合目录计划，并由各国协作编撰国际性的期刊联合目录。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开始采用计算机编制联合目录。

中国最早的联合目录是明代僧人智旭编制的《阅藏知津》48卷，《阅藏知津》在每部佛经背面都分别注明南北字样，以表明各部佛经收藏的地方。这种方法接近于联合目录，故被认作为中国古代联合目录的萌芽。1929年北平地区编制了《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为地方性联合目录，以后又相继编制了近十种联合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学术界及图书馆界的重视，1951年上海新闻图书馆编撰了《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重庆市图书馆编制了《西南图书馆馆藏化学工业书刊目录》，有38个单位参加，收录文献近2 000种，为建国后最早的联合目录；1954年，中科院图书馆编制了《全院所藏西文期刊总目》及《全院所藏地方志总目》；1956年7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会上强调了联合目录的重要作用，并对编制联合目录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发展联合目录工作的具体建议。1956年12月，原高等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也要求所属各院校图书馆加强联合工作。1958年编撰出版了《47

所高等学校图书馆馆藏外文期刊联合目录》。

1957年9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该《方案》对编制联合目录工作作了规划,其第二部分"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指出:开展联合目录工作的目的是使"书为人知"、"书为人用",策略是"分别先后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1957年,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并在武汉、沈阳、南京、天津、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哈尔滨等市建立了九个地区性的省市中心图书馆委员会。1957年11月,在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联合目录工作机构——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的任务是:(1) 调查了解全国各图书馆藏书和编目情况;(2) 制定联合目录编辑计划;(3) 起草联合目录编目条例;(4) 加强和各馆有关联合目录工作的联系,布置、检查和督促工作;(5) 综合各馆书目资料,做最后的编排、校订和出版工作。

1958年,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倡导下,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合作下,先后成立了中文、俄文、西文三个不同文种的统一编目组。1961年,统一编目组归属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统一领导,曾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等地设立发行点,试行随书配卡的方法。

1957年以后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制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等35种全国性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编制了《中国丛书综录》。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还建立了全国卡片目录中心。从1957年底到1965年10月,搜集了包括250个大中型图书馆的西文、俄文、日文近80万张图书目录卡片及30余万张中文、西文期刊目录卡片,并在此基础上,定期出版了《全国西文新书通报》。

结合各地区的藏书特点及经济建设和科研需要,由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编制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质量较高的专题联合目录。如《武汉地区钢铁图书联合目录》、《地质学图书联合目录》、《医学科学图书联合目录》、《上海市纺织印染图书联合目录》、《四川省各图书馆馆藏石油天然气书刊联合目录》、《西南地区所藏抗战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安徽省各系统图书馆中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我国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等地方性专题联合目录300多种,参加协作的图书馆达700多所。

1977年7月,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召开全国科技情报检索刊物会议,讨论了科技期刊联合目录工作问题。随后,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主持编辑了《中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1977年,北京图书馆成立了联合目录编辑组,并主持编辑

了1978年和1979年两年的《全国预订外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

1979年12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图书馆中文统一编目组编制的《中文图书印刷卡片累积联合目录》(1974—1978)分册,随后又出版了(1979—1980)分册。该目录按照中文统编卡的原著录格式著录,依据《中图法》的分类体系编排;同时,注出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六家单位的索书号,是我国联合目录事业的一项积极成果。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托北京图书馆于1980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联合目录工作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章程》及《选题计划》,并通过了《健全联合目录报导体系的初步方法》、《全国联合目录工作协调委员会组织章程》及《1980—1985年全国联合目录选题规划(草案)》;成立了全国联合目录工作协调委员会,加速实现标准化、自动化和网络化,并确定了我国联合目录的报导体系;提出中外文新书联合目录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负责编辑出版,中外文图书回溯性联合目录由全国协调委员会统筹安排,并交由有条件的图书馆组织实施;大型专题联合目录由有关专业图书馆负责编辑,全国性的期刊、报纸及会议录等联合目录,由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负责编辑。

会后,一批全国性的联合目录相继出版,如:北京图书馆联合目录组编《1962—1978年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科技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北京图书馆报刊联合目录组编《全国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1978—198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北京图书馆还编辑、出版有《西文科技会议联合目录》、《西文工业技术图书联合目录》、《西文参考工具书联合目录》等联合目录。全国联合目录组编有《19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科技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组成工作组,开展计算机编制西文图书联合目录的试验。198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成功地完成了《西文图书联合目录》(1986年第一、二期)。随后,北京图书馆编制了机读版《1979—1984年全国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

地方性的联合目录活动也颇有起色、声势较大。如《广东地区预订1983年外文原版报刊联合目录》,参加馆达314个;《福建省1980—1987年度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参加馆达437个;《内蒙古自治区预订1982年国外、港台报刊联合目录》参加馆达526个;其他单位编制的联合目录还有《甘肃省俄文期刊联合目录》、《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陕西省外文新书联合目录》等。

不久以后,相继编制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地方志8 500多种,参加此项目的有全国各省图书馆180多个,云南馆也参加并提供了318种地方志。

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又和十多个图书馆联合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由于地区性专题联合目录选题适合科研的需要，针对性强，体现了地区特色。

1997年，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正式成立并启动。其宗旨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管理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工作，实现网上编目资源共享，降低成员馆及用户的编目成本，提高编目工作质量，避免书目数据资源重复建设，通过网上信息传输，实现书目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近些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京、津、申等地出现了地方统一编目活动，并与联机联合编目、合作编目、书目中心、图书发行、随书配卡等融为一体。到2001年底，广东省分中心、中科院社科文献编目分中心、广西图书馆分中心、四川省图书馆分中心相继成立，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迅速发展并取得较好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联合目录编制工作，先后编有《台湾省馆藏朝鲜版联合目录》、《台湾省馆藏宋元版联合目录》、《台湾馆藏方志联合目录》、《台北公藏黑格尔著述及其研究批评联合目录》等。

1967年，我国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在"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委员会"的资助下，成立了"联合目录编制委员会"，并对联合目录提出了总体规划，规划由四个方面组成，即中文善本书、中文非善本线装书、中文普通图书、中文连续出版物。目前有两个组织，即"科技图书馆及资料单位馆际合作组织"、"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合作组织"，先后编制的联合目录有：《台湾公藏善本书联合目录》、《台湾公藏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联合目录》、《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图书馆科技期刊联合目录》、《台湾高校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华民国全国"图书目录》、《卡片联合目录》(科资中心)等。

三、联合目录的编制方法

联合目录是一项科学性较强的工作，因此，要求具有统一的编目条例和收录范围，而且这种统一的编目规则应具有法令性质，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同时又要求加强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协调，以避免缺门少类或浪费财力，拖延时间，影响联合目录体系的建立。

目前，我国编制联合目录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有三种：

(1) 以一馆为基础、其他馆校补汇；

(2) 各馆进行分编，一馆进行总汇；

(3) 各馆分编，集中校补。

不管是编排哪种联合目录，还是采用现代技术实施联机联合编目，最后都有汇总统编的问题。汇总统编要对目录的性质、范围、学科、收藏年限和编制体例等注意保持一致；确定采用统一的编目条例和细则，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

划,保证正常运作;一般要通过编目信息汇总、复查原书、统一校对、编制成型等几个阶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众手编目,如出一人”的目的,编制出的联合目录才称得上体例严谨、著录完备、使用方便。

概括起来说,联合目录的编制程序包括以下环节:

1. 成立工作机构

编制联合目录是一项艰巨、繁琐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因此,建立一个机构来组织负责这项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997年正式成立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管理中心设立的联合目录项目组均是作为联合目录编制的工作机构来领导、协调、管理、组织和实施相关工作。

2. 充分调研,制定联合目录编制总体规划及编制计划

(1) 充分调研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信息需求,充分调研文献收藏、专业人员素质、著录标准等与编制联合目录关系密切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定联合目录的总体规划和具体计划。

(2) 编制联合目录的总体规划。依据调查研究的结论全面考虑制订编制联合目录的总计划,作为指导编制联合目录具体计划的总原则和总依据。

CALIS制定了以建设联合目录数据库为基础,研制以联机合作编目、书目资源公共查询和馆际互借三大服务系统为主要目的的资源共享系统规划,为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书、刊及其他文献资源的网络公共查询,支持高校图书馆系统的联机合作编目,实现CALIS成员馆之间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3) 制定联合目录的编制计划。使联合目录的具体编制工作能够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是编制联合目录的具体方案。

3. 编制联合目录的具体步骤

(1) 颁布规范,实施计划。颁布规范,即由工作负责机构颁布规范,把各馆在编制联合目录中应做的具体工作布置给各馆,要把时间、内容、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交待清楚。实施计划,即组织实施编制联合目录的相关工作。

(2) 各馆分编。各馆必须责成一名或几名责任心强、熟悉本项业务、技术比较熟练的同志,按计划要求,完成本馆的工作任务。具体说就是按收书范围制作本馆的卡片,也叫样片或缴样。收书范围、卡片规格、著录项目和格式等,计划中已做了明确规定,各馆必须严格按规定制作卡片,不得擅自改动。

(3) 汇总统编。汇总统编就是把各馆送来的草片汇集起来统一校补,并按某种方法组织起来,编成一套或几套联合目录。

汇总统编大致可分汇总草片、重点复查、统一校对和组织成型等阶段。

CALIS联合目录项目组采用集中式数据库结构,由CALIS管理中心和地区中心建立八个联合目录数据库通过“增量复制”技术将八个联合目录数据库中的

书目记录保持准确同步，最大程度地保障联机编目应用和馆际互借应用在高效、便捷和实时的环境中进行。地区图书馆一般通过对本地区的联合目录数据库的检索进行联机编目或馆际互借。采用这种模式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以联机合作编目和馆际互借为目的的资源共享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其他应用如其他自建数据库、商业数据库、Internet 导航和高校系统特有的资源服务整合在一起。用户进入八个中心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查到相同的信息。

4. 联合目录的编制方法

(1) 各馆分编，集中整理。联合目录编辑工作包括目录卡片的收集和目录统编两部分。所谓各馆分编，集中整理，即事先将统一的著录标准发给各参加馆，要求各馆按标准著录入选书刊，著录完毕后，将目录复制若干份，将一份送至主编单位，其余的备用和修改，主编单位将参加馆的目录逐一核对。凡主编单位目录中已有的文献，只在主编单位目录上加注馆藏代号或索书号。若主编单位目录上无此文献，就选各参加馆目录中最全面、准确的款目排入主编单位的目录中，将其他参加馆收藏情况著录其上，待全部目录卡片集中整理，校核完毕，即可等待编排。

(2) 重点协助，检查各馆编目质量。联合目录的质量高低和协作馆编目的质量密切相关。各馆分编时，虽然规定了统一的著录准则，但由于各馆编目人员水平、能力不一样，尤其是少数馆藏量大、编制任务重、人员素质差的馆，在编目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和错误。

(3) 汇总统编。汇总统编是在各分编馆交送的目录集中后，将同一书刊的著录加以合并，缺遗的款目加以增补，保证联合目录达到全面、完整、正确、统一的要求。汇总工作包括删重、复查、核对和总编辑等步骤。

CALIS 联合目录项目组通过质量评审将成员馆进行了 A、B、C、D 四级分类，B 级以上馆才有资格将所编信息上传，C 级馆只能套录数据进行编目，项目管理组负责汇总和质量控制，保证了联合目录数据的质量水准和服务提供。

四、编制联机联合目录的实质性进展取决于 MARC 技术

编制联合目录是图书馆专业资源和服务共享思想组织结构中的一条主线，如联合采购、馆际互借、互惠借阅协议、藏书建设与利用、技术开发和利用等，都必须以联合目录为基础。

编制联机联合目录的核心是技术。尽管还未达到图书馆文献资源与技术集成化的发展水平，但信息技术已成为编制联机联合目录的必要条件。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展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灵活性，MARC 的自身发展影响着联机联合目录的发展方向。

20世纪60年代后期,MARC1开发和被接受,信息技术为联机联合目录带来了发展机遇,推动着联机联合目录工作从协作模式向联合模式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措施是制定和采用了标准、确定了联机联合目录的功能和利用了新技术。信息技术是建立在联机联合目录功能基础上的,将MARC技术摆在中心地位,正是基于数据标准化,有利于数据共享。

MARC事实上最初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信息存储与交流的组织标准。USMARC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图书馆资源委员会(CLR)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CLR认为:国会图书馆生产并发行的机读目录记录,将有助于开通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机读目录应包括全部国会图书馆现有印刷卡片上的数据,再增加一些附加信息,成为一种多用途记录;所有图书馆的机读目录必须采用USMARC格式或协议。

1965年末,CLR资助国会图书馆启动示范工程,选取了16个图书馆,包括高校、公共、中学、专业和国家图书馆。示范工程以国会图书馆创建的MARC1版为基础。试验磁带于1966年10月开始发行。MARC2系列发行于1968年,MARC2开创了不同系统和方法都可接受的运行环境,提供更广泛的共享机会。1969年3月开始投入运行,同时由MARC1发行服务部对外发行。1971年MARC2作为正式标准被接受,1973年被确定为国际标准ISO/2709。

20世纪70年代涌现了如OCLC、RLIN(研究图书馆信息网络,美国)、Utlas(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加拿大),WLN(西部图书馆网络,美国)等著名图书馆书目系统,它们都为其成员馆提供书目服务。电子数据复制和传递的便捷性,使人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服务传递,降低集中化程度。MARC记录易复制、易传递、可替代、可互换、覆盖广泛,都是卡片记录无法比拟的。向用户提供记录是非常容易做的,即使是全球也能及时做到;分析服务报告、服务管理也成为可能。

1991年2月出版的《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格式)是我国中文图书机读目录的标准格式,以此格式提供各种介质的标准书目数据,成为中国编制联机联合目录的规范。

编制联机联合目录在国外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大陆地区还是个新事物。为了保证编制联机联合目录系统的顺利运行,CALIS联机联合目录项目组首先于2000年3月推出联机合作编目示范计划,旨在检验联机编目软件的功能和联机合作编目的运行机制。27个高校图书馆参与了这次示范计划,他们根据本地的网络环境和自动化系统的特点,采用了适合本馆特点的编目模式。联机联合目录编制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采用CALIS Z39.50客户软件,用户利用CALIS Z39.50客户软件,从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下载记录,向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提交馆藏信息和上传原始编目记录,并从客户软件的临

时数据库导出书目记录的ISO2709格式,批装入本地数据库。选择此模式的大多数用户本地系统无Z39.50功能或功能机制不完善。(2)采用本地系统,用户完全通过本地系统的Z39.50功能进行联机编目的操作。采用此模式要求本地系统具有符合Z39.50标准(3.0版),与CALIS下载和上传数据兼容的Z39.50功能。(3)CALIS客户软件和本地系统并用,用户首先通过CALIS Z39.50客户软件下载CALIS联合目录数据,提交本地馆藏信息和上传原始编目记录,然后再通过本地系统的Z39.50功能捕获本馆已向CALIS提交的数据,在本地系统按本地的管理要求细化馆藏管理信息。项目组力求提高数据的共享性,数据共享可以大大提高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

第三节 图书在版编目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什么是图书在版编目

图书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简写CIP)是指在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由出版社填写一张包含各项编目元素的表格,连同该书的全份校样,或该书的书名页、前言、内容简介等样张,由集中或分散的编目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规则或条例,将标识该书的规范化书目信息提供给出版部门,以便将此书的书目数据排印在该书的书名页的背面,供图书馆、出版社、图书发行部门在编目时选用,并可同时为各类文献工作部门及用户包括书店、图书馆、信息部门、书目工作人员和读者利用。

《英汉图书馆学词典》对CIP的解释:“图书出版前,由集中编目部门根据出版商提供的校样先行编目,并把著录款式印在书名页背面。”其意是在图书出版前就编制出完整、规范和通用的目录,将国家目录、书商目录和图书馆目录统一起来。

1975年,UNESCO在关于CIP国际调查报告中指出:“CIP的目的是在有关文献被出版之前,向出版商提供编目数据,以便使这些数据可以在同时被图书馆、书商、书目编纂人和其他需要这一数据的人们所利用”。

关于图书在版编目概念的理解,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编目依据的是出版过程中的校样,是在图书的出版过程之中,即图书尚未完成印刷装订时进行的编目,所以称这项工作为图书在版编目;

由集中的或分散的编目机构依据一定的编目标准编制出正式的书目数据,并印在图书书名页的背面,以便图书与自身的书目数据一起流传;

可以在图书出版之前和出版之后形成多种多样的报导性的、检索性的和商业性的目录;

可以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建立多家联合的书目数据库,具有多方面的

效益；

图书在版编目的社会需求是与图书文献的社会传播与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图书在版编目的实行使编目工作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并为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等业务部门实现书目信息的自动化管理，为书目信息的交换与资源共享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图书在版编目特点

图书在版编目的特点是在图书的出版过程中，即图书尚未完成最后的印刷装订时，由集中的或分散的专职从事图书在版编目的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包括编目标准、分类方法和主题标引方法)对图书进行正式编目，编制出标准的书目数据，并印在图书书名页背面，从而使图书的书目数据伴随图书一起发行，为用户所利用。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有以下特点：

权威性：图书在版编目数据通过国家标准体系颁布，强制执行，在文献领域具有权威性。

准确性：数据准确是保证数据质量的关键。

统一性：分散编目，集中审核，时间跨度大，前后保持一致是保证。

严肃性：编目数据是重要的书目信息资源，是标准、规范的保证。

通用性：数据在各类图书馆、出版社、文献信息机构中可以通用。

完全性：数据元素完整，著录项目完全。

规范性：著录内容规范，著录格式标准。

三、实行图书在版编目的意义与作用

1. 统一规划，采用统一的编目规则，数据通用与权威

书目数据兼容，各种书目之间具有互换性，使得编目工作与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工作结合起来。所采用的编目数据能够为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共用，著录项目、著录项目顺序和著录用标识符号与《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规则》保持一致。图书在版编目采用了通用的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选取的编目数据具有共用性，因此，它不仅可以成为出版社、发行所和图书馆编目的统一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各种书目建立起彼此相互交换的数据，可为各编目部门直接利用，为建设包括征订书目、统一编目、联合目录、国家书目等在内的社会化书目事业奠定了基础，并为建立国家书目信息数据库，实现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管理创造了条件。

2. 规范标准，书目数据质量整体提高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是推行图书编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提高我国书目质量的重要措施。CIP数据经过权威性编目机构审定发布，其准确性和规范化是众所公认的，所以能够成为各文献收藏单位编目工作的依据。

国家标准GB12450—90《图书书名页》和GB12451—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为图书在版编目提供了完备的标准和指导性文件。

CIP著录格式规范所需的技术依据有：(1) 著录规范；(2) 主题分类规范；(3) 书名页印刷格式规范；(4) 数据库规范；(5) 机读目录格式规范等。这些规范确保了书目数据质量的整体提高。

3. 减少重复编目，编目效率大幅提高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可以减少图书馆员在编目上的重复劳动，加快编目速度，缩短到馆新书的加工时间，促进图书馆分编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可以向社会提供规范、标准、通用的书目记录，做到一次编目、多次使用；各馆统一使用通用、权威的书目数据，就为馆际的计算机联网和书目资源共享打下了基础。

4. 统一发布，有利于管理部门对出版行业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为实现国家书目控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是实现我国图书发行集中统一报导的先决条件。

图书在版编目是在图书出版之前，依据各出版社填报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单”编制的。这样就为编制全国集中统一的征订书目，疏通发行渠道创造了条件。它可以促进出版物资源共享和国际书目控制目标的实现，可以提高文献信息工作的社会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快文献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可以为出版管理部门提供准确的出版信息，由于图书在版编目是在图书正式出版前进行的，出版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掌握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及时了解出版动态，进行宏观调控，也便于出版管理部门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微观管理。

5. 信息畅通，有利于发行部门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图书影响，增加发行数量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可以使各出版社之间互通信息，及时调整出书选题计划。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后，发行部门可以用标准化的书目数据，取代以前不规范的著录。依据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建立我国的现货图书信息库，可以为用户订购图书提供便利。

随着社会信息系统的日益计算机化、网络化，在版编目对于发行部门的益处将体现得更加明显。CIP数据作为文献信息源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机读CIP数据的快速传递，在建立起广泛有效的“信息高速公路”即全面的电子通信传送网时代，ECIP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出了发展的前景。

6. 依据国际标准，有利于与国际标准接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已成为国际惯例，参照国际标准编制我国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可以加快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的步伐，为我国图书参加国际版权贸易创造条件。

四、在版编目计划的由来与发展

(一) 国外CIP计划的由来与发展

CIP由来已久，图书出版前编目的设想早在1853年就由美国的查尔斯·朱维特提出了，而作为正式建议第一次提出则是1876年美国的贾斯廷·温莎。他说，出版商应该在他们出版的书中随附一张统一尺寸的活页，上面印制有关书名等项内容的书目资料，这样做有利于编者们、图书馆和售书商们进行登记，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同年，那尔森(C. A. Nelson)提出，每一本书应另附一条款目，该款目应是一张薄纸，图书馆收到图书后，可将薄纸贴在卡片上，即可充任目录使用。

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极力主张将目录款目放在正在出版的每本书里，即在印刷图书时在书上加印编目的著录项目和图书分类号，他把这种编目方式称之为"出生前编目"(Pre-natal Cataloguing)。这是图书在版编目最早的设想。

在此以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二届年会(1877)以及当时的著名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克和杜威等人都对上述概念作了进一步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实施，但由于推行这项计划的经费问题无法落实而遭搁浅。

以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出版界较早开始随书附带书目数据，国家图书馆对该国出版的每种著作的校样进行编目，然后返回一张目录卡片给出版商，出版商订购了相应的图书卡片，随后将卡片分送给图书订购单位。

1958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农业图书馆在得到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资助后，再度开始相关工作，合作试验图书在版编目工作。这项工作称作"书源编目"(Cataloging in Source，简称"CIS")。其具体做法是出版社将正在出版的图书校样送交国会图书馆，由国会图书馆按图书校样进行集中编目，然后把编目数据交给出版商并将其印到图书的版权页上，图书馆购书后再将目录数据复印在卡片上，以检验出版前编目的可能性。

1963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书商协会通过协商决定在编目工作方面进行全面合作。这项合作称为"在版编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大意与CIS相同。当时澳大利亚采取三项措施：(1) 国家图书馆负责CIP经费；(2) 目录款目的编制必须标准化；(3) 所有澳大利亚出版商都要参加这项工作。

美国国会图书馆1968年在取得美国图书馆资源委员会、国家人文科学基金

会、全国科学基金会等单位提供资金的基础上于1971年6月20日正式开始CIP。美国国会图书馆从全国人文科学捐赠委员会和图书馆资源委员会那里得到了推行在版编目计划的经费,同时又得到了美国出版家协会的合作和支持,正式进行以“在版编目”(CIP)为名称的在版编目计划。在版编目的重点是对那些最可能为美国图书馆广泛购进的图书进行在版编目,进行在版编目的图书中最多的主题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科学、医学、历史、宗教和技术。

国会图书馆的目标是,在收到出版社样书的10天内完成在版编目工作。通常他们只需要8天就能完成,从而满足了出版社希望尽快出书的要求。在版编目的项目包括完整的叙述性著录、图书的主题分析、杜威十进法的分类号以及国会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号。

1971年苏联出版的所有图书全部印有在版编目数据,苏联CIP采用分散处理方式,即由图书馆编目员在出版社完成CIP数据,并将其报送全苏出版物登记局;列宁图书馆则以参与制订著录标准、发行编目手册和组织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技术指导。

1972年澳大利亚恢复CIP工作。继此,联邦德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于1974—1975年也都开展这项工作。法国CIP因有强有力的计算机网络,CIP数据编成仅用3天。

1982年8月,国际图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温哥华召开CIP国际会议,建议各国考虑由国家书目机构或与之相应的组织制订本国的CIP计划。1985年6月,国际图联制定了国际CIP记录的推荐格式和用于计算机处理的CIP数据工作单的推荐格式。1987年6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公布了新的图书书名页国际标准(ISO1086—87),详细规定了CIP的内容、格式以及印刷的位置。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美、澳、加、英等国的在版编目已和机读目录结合在一起。

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已与2 500多家出版商合作。80%以上的图书印有“在版编目数据”(英文为CIP Data)。由于采用计算机处理,收到校样10日内便可将CIP数据寄还出版商,同时将其输入LCMARC中。英国亦由国家图书馆——不列颠图书馆与全国70%以上出版商合作,将审定过的CIP数据一周后返回出版商,机读数据与UKMARC同时发行,待图书出版后修改成正式记录再次发行。

(二)中国图书在版编目的发展历程

1978年开始有文章介绍、研究图书在版编目。自此之后,每年都有若干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有声有色地开展了图书在版编目的相关研究活动。

1985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邀请出版界、图书馆界的有关人士,研讨在我国实施图书在版编目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实施的可行办法:① 全国成立

一个专门机构，统一负责图书CIP的工作；② 实行集中管理、分省包干的做法，各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本地区出版物的CIP；③ 每个出版社自行负责所出版图书的CIP。

由于当时已经意识到图书在版编目是一项遍及全国、跨系统和行业的事业，在经费不充分的条件下，在中国采取集中编目方式存在实际困难，曾有人主张效仿苏联所采取的分散编目方式进行试点，即从个别图书馆和就近的个别出版社的合作开始，逐步推广，最终联合成为全国的整体事业。1986年，北京图书馆与书目文献出版社、北大图书馆与北大出版社分别进行了图书CIP试验，出版了一批载有CIP数据的出版物，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工作。

1986年11月，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标准局联合召开了"实行图书在版编目工作计划方案讨论会"，研究了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和可能承担的责任。会议提出图书在版编目应由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文化部图书馆局、国家教委教材与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出版委员会等五家单位共同组建图书在版编目领导小组，由国家出版局牵头，统一领导和组织这项工作。

1987年，青海省图书馆学会与青海人民出版社联合成立了"青海省图书在版编目试验小组"，制定了《青海省图书在版编目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在1987年开展省版图书CIP的试验。

1987年7月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为首的图书在版编目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任组长。领导小组确定其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和协调几个系统的工作，主持制订和组织审查图书在版编目的技术标准，筹集工作经费，并组织具体实施。领导小组决定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技术准备，即制作图书在版编目所需的各项技术标准，第二阶段为具体贯彻实施，实施方式拟由各出版社自行编目，由各图书馆积极配合。1987年8月，图书在版编目标准起草小组成立。小组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翻译了国际图书在版编目的有关标准和文件，并做了有关研究。

起草小组于1987年10月举行工作会议，首先确定起草的指导思想，根据国务院"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世界先进标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政策"的精神，起草中凡能采用国际标准的，一律采用国际标准。根据1979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中关于"技术标准是从事生产、建设工作以及商品流通的一种共同技术依据"、"标准一经发布，就是技术法则，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的规定，在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制国家标准。其次根据国外实施CIP的实践和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CIP标准的起草原则：(1) 根据我国情况，现阶段CIP工作的对象首先是图书；(2) 该标准是为中国图书CIP的实施作为技术依据；(3) CIP标准的制定

要遵从 UNESCO 和 IFLA 1982 年联合召开的国际 CIP 会议所提出的原则要求。最后决定组成《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图书书名页》两项标准的起草小组,以图书馆界的人士为主,负责起草图书 CIP 数据标准;以出版界人士为主,负责起草图书书名页标准,着手两个标准的起草、审查及贯彻实施。

当年 12 月,起草小组完成上述两个标准征求意见稿,由新闻出版署发文向全国征求意见。

1989 年 1 月,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指出集中编目可以做到编目结果准确、一致,保证质量。具体方式是在新闻出版署下成立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从征订目录开始贯彻图书在版编目,并将数据提供给国家图书馆,最后定成国家书目。

1989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新闻出版署主持召开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图书书名页》两项国家标准的审定会,1989 年 11 月 6 日,新闻出版署召开了图书 CIP 数据实施工作会议。准备在新华书店总店成立 CIP 征订中心,把 CIP 数据征集工作和图书征订工作结合起来。CIP 领导小组于 1990 年安排了"CIP 项目软件"课题,委托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计算机室和新华书店总店电脑部、以《社目》、《科目》现有数据元素为起点,按照 CIP 数据国家标准报批稿的要求,设计可同时制作 CIP 机读数据(CNMARC 格式)和印刷报纸版目录的运行软件。

1990 年 7 月 31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图书在版编目》、《图书书名页》两项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 1991 年 3 月 1 日实施。

1990 年底,软件设计成功。从 1991 年 2 月起,用于《社目》的排版运行,效果较好。除同时可产生机读版与印刷版两种版本外,还可产生 CIP 数据的印刷格式(返回出版社作图书出版用)和报订目录(发至基层书店作订书用)。在此过程中,还设计、制作了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工作单,作为联结图书 CIP 编辑、审查过程中的凭证。这样,以计算机及相应的软件技术支持 CIP 的实现,更为 CIP 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并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91 年随着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新闻出版署发文给各出版社,部署贯彻执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国家标准、《图书书名页》国家标准。

中国 CIP 领导小组牵头单位——新闻出版署 1992 年 11 月设立新闻出版信息中心,中心的工作之一是领导组织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并确定由中国版本图书馆承办具体工作,首先在北京地区组织 10 多个出版社进行试点,委托中国版本图书馆举办首期图书 CIP 业务培训班,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出席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并于 1992 年 12 月 19 日发出《关于实施在版编目国家标准试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参加试点的出版社凡是从 1993 年 2 月 1 日起发排的图书,均应向中国版本图书馆填报"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工作单",版本图书馆根据工作单提供的有关内容,编写 CIP 的正式印刷格式退回出版社,出版社按此格式排印在书名页的背面。

1993年2月份以来,中国版本图书馆成为试点单位审核、加工并返回标准的图书在版编目中心。为扩大影响,为试点出版社作图书宣传,该馆编辑出版的《全国新书目》从1993年第6期起,陆续刊登《在版编目图书信息》,已引起广泛注意。从1995年起,全国大部分出版社都实施了在版编目计划。

我国台湾省所做的相关工作称之为"出版品预行编目"。早在1971年7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实施在版编目计划的同时,我国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就订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提前编号编目暂行办法》,择定当时较具代表性的三家出版机构——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共同商讨试行在版编目的可行性,决议于当年9月1日开始试行,即在新书出版前将其毛装本送交"中央图书馆"编目,印入定装本的版权页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开始对部分出版物进行预行编目处理,规定在书名页背面按ISBN(M)的格式排列,并冠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字样。1990年2月,台湾地区正式成立了国际标准书号中心,隶属于"国立中央图书馆"之下,于1990年7月初完成国际标准书号及在版编目自动化操作系统的测试。此外,每月定期出版《新书预报》分赠各图书馆、文化中心及出版社,有在版编目书目资料者加印分类号,提供各馆选购图书时参考。

五、CIP的著录内容与发行形式

世界各国CIP著录格式基本上都与本国的著录规则相一致,标引的分类号和主题词也采用本国使用面最广的分类表和主题词表。但具体实施方式则根据各国情况而定。大多数国家是由国家图书馆设专门机构从事具体编目工作,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也有由各出版社分别编制CIP数据,如俄罗斯。文献收藏单位根据CIP数据能够方便省事地进行编目工作,显示出集中编目的优越性。目前,发达国家的CIP数据已经不限于随书印刷发行,而且还出现在MARC磁带和光盘中,更便于文献收藏单位开展计算机编目工作。

(一) CIP数据内容

国际在版编目会议原则要求指出了在版编目数据由书目著录、书目检索、主题检索三部分组成,其中书目著录部分应遵从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CIP数据包括主要款目标目形式、正题名、责任说明、版本说明、丛编说明、附注、LC分类号、DDC分类号、ISBN号等著录内容。

国际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已经进入了标准化阶段。我国的图书在版编目标准接受了这一原则要求,确定在版编目数据的书目著录、书目检索和主题检索部分的方法均依据GB3792系列的规定,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书目著录部分遵从GB3792系列的著录规则,数据内容共分六个著录项目:题名与责任者项、版本项、出版项、丛书项、附注项及标准书号项。检索项包括主题词及分类项。不设

“载体形态项”是因为图书在校样阶段,进行书目数据的编制,还不能肯定该书的页码、装订形式以及书价等内容。

国际图联(IFLA)提出的图书在版编目标准格式中将书目著录数据分为四类:(1) 必须有,(2) 若有即取,(3) 适用即取,(4) 可以选择取舍。

中国的图书在版编目标准将在版编目的数据区分为必要数据和选择数据两种。

必要数据包括:著录部分的正书名、并列书名、第一责任者、译著的非第一责任者的译者、正丛书名、并列丛书名、ISSN、丛书编号、附属丛书名、ISBN;排检部分的正书名、第一责任者、译著的非第一责任者的译者、正丛书名、主题、分类。

选择数据包括:著录部分的副书名及说明书名文字、其他责任者、版次及其他版本形式、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丛书责任者、附属丛书编号、附注项;排检部分的副书名、其他责任者、丛书责任者、附属丛书名。

选择数据允许图书在版编目机构根据情况决定取合,以使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具有伸缩性,在著录格式及其印刷形式的规定上,称著录全部数据的类型为详细型,称只著录必要数据的类型为简略型,以适应不同的要求。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在主书名页背面的印刷格式则规定采用国际标准格式,仅有详细型和简略型两种,与卡片款目形式基本一致,但不印出卡片边界。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图书书名页》两项国家标准都是与 GB3792 系列的文献著录标准配套的。

(二) CIP 的格式

我国编制的图书书目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以分段空格形式编制的《征订书目》;以题录形式编制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按照国家标准 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的规定编制的《国家书目》和《图书馆书目》。其中,《征订书目》基本上是沿用新华书店制订的已有 30 年历史的《征订书目编撰格式》编制的,这种书目近似于《普通图书著录规则》。

标准的 CIP 格式如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书名 = 并列书名:副书名及说明文字/第一责任者;其他责任者.—版次及其他版本形式/与本版有关的著作责任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正丛书名/丛书著作责任者,ISSN;丛书编号·附属丛书名;附属丛书编号)

附注
国际标准书号(ISBN)

Ⅰ书名
Ⅱ著作责任者
Ⅲ 主题
Ⅳ分类号

其他标记

CIP数据著录格式与普通图书的著录格式相仿,非连续的著录大项,起始都应与“书名与责任者项”对齐;项目回行,按标准规定突出一格(汉字是一个,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是两个),排检项的格式虽与《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稍有差异,回行规定是一致的。

(三)著录编目工作程序

目前世界各国实施CIP的具体操作方法不尽相同,英、美等国采用依据出版商寄送新书校样进行在版编目,澳大利亚则利用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的计算机联网进行在版编目。我国CIP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国国情决定采用寄送工作单的方式。具体工作程序为:

1. 由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根据新书校样填写“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单”,然后由本社负责在版编目组织协调工作的同志,连同该书主书名页正面复印件,寄送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版编目部。

2. 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版编目部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工作单和书名页正面复印件后,根据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85)、《文献主题标引规则》(GB3860—96)和《中图法》、《汉语主题词表》进行审核、修改,并加工成CIP数据返回出版社印在主书名页背面。

3. 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编定数据返回出版社的同时,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编成书本式目录,定期送交领导机关和刊登在《全国新书目》上,提供给国内外用户使用。

六、中国图书在版编目的相关问题

1. 标准化问题

在图书在版编目的努力中,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860—83《文献主题标引规则》等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GB12450—90《图书书名页》和GB12451—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两个标准颁布后,更是扫清了障碍。新闻出版署已在1999年3月8日

发出的“关于在全国各出版社实施图书在版编目(CIP)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要求自1999年4月1日,在全国推广实施《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国家标准。《通知》强调:“国家标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12451—90)系强制标准,全国各出版社均应贯彻实施,定期自查,勿得缺漏”。

2. 实施CIP的组织与运行机制

以全国统一编目为上策,国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方式的优越性。我国现行的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具有集中与分散的双重性质,图书的有关内容特征和形态特征的信息是先由出版社的责任编审按CIP工作单的项目填写有关数据,并连同主书名页正面样式的复印件寄送给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版编目部(也称CIP中心)。由CIP中心根据《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对出版社提供的CIP数据进行审核、修改和加工成可排印的CIP数据格式,寄回出版社发排。这种实施环节由图书馆、出版社构成,一个中国版本图书馆面对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从理论上说要达到在版编目的所有目的,保证质量并使CIP数据直接用于编制预订书目、国家书目及机读目录等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现代化通信设备做保证,同时要获得出版单位的完全信任与合作,及时把有关资料提供给编目机构,编目机构也要扩大规模,以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完成著录并及时把CIP数据交给出版单位。

3. 著录中的质量问题

现在反映较多的是在版编目中数据质量的问题,CIP编目人员的业务水平、知识视野、工作责任心不够,编目人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出版社对CIP重视不够;CIP所遵循的各种标准本身存在的缺陷,著录格式和使用标识符号、正书名与丛书名混淆;著录方式概念不清,审核部门把关不严等基本问题;《图书著录规则》规定文献著录必须客观如实反映文献的内容和外表特征,即使出现错误也要照录,编目人员不能擅自更改,只能在附注项内注明解释。CIP要求严格遵守《图书著录规则》所规定的卡片著录格式的标准,丛书、多卷书著录前后不一致、关于丛书、多卷书是分散著录还是集中著录,《图书著录规则》有明确规定。

4. 执行国家标准的监管问题

(1) 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构,以致监管不力。尤其是《图书书名页》标准,基本一直处于无人监督执行的状况,长期以来形同虚设,失去了应有的法规性质。

(2) 国家标准执行过程中法律制约能力较差,“强制性执行”根本无法执行。

(3) 缺乏必要的CIP数据质量评审,CIP数据的质量始终游离于图书质量之外,致使责任编辑只关心图书上是否印有CIP数据而从不关注其质量的优劣。

全国图书在版编目管理中心主要职能之一是成为对全国图书在版编目进行

总的质量管理的机构,采取适当的手段对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实行多种审核、多重把关,并逐步建立起我国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质量检查和信息反馈制度。编目中心定期出版《图书在版编目工作简讯》,在该刊上开展交流和研讨活动,以解决图书在版编目实施中的疑难问题。对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出现差错的图书,管理中心负责通知出版社,令其在重印时予以改正。

5. 法律及行政规范管理

实施图书在版编目的配套的强制性的政策及保障,需要采取必要的法律及行政手段。例如,目前管理部门可以规定:凡出版社出版新书未按规定实行在版编目、未编制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图书不得参加各种类型的评奖活动;出版社未编印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图书达到一定数量,令其限期进行内部整顿等。

CIP管理规范工作基本完善:规范书名页排版印刷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2450—90《图书书名页》,规范CIP数据内容的有中国版本图书馆CIP部编制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工作单”,规范著录的有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普通图书著录规则》(此两项国家标准已出修订版)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规范标引的有《汉语主题词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及二者对照的《中国图书分类主题词表》,规范机读目录格式的有《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行业标准·WH/T0530—96)。

6. 队伍建设、人员培训等问题

人员素质是保证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质量的关键,编目、编辑、排印和审核等人员的素质都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为提高人员的素质,在版编目管理部门要定期举行图书在版编目培训班,对图书在版编目的有关工作人员应该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1997年国家新闻出版信息中心成立在版编目(CIP)处,全面负责我国有关CIP的组织规划、协调、审核数据库建设以及人员培训等工作。

7. ECIP的提出

面对网络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人提出了“CIP数据加工网”的设想与计划,CIP中心联想集团的合作网站也将开通,通过该网站及时、迅速地向社会发布CIP数据,ECIP也被提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蔡敏.对联机编目存在问题的探讨.图书馆论坛,2001(2)

2 方威明.我国联机编目现状述要.图书馆建设,2001(2)

3 北京图书馆《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编委会编.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4 郑志军.回溯建库的体会——兼评《中国国家书目数据库》和《中国国家

书目回溯数据库》.图书馆建设,1999(5)

5 田文清.国家书目沿革与现状分析.图书馆界,1995(1)

6 谢琴芳等.CALIS联合目录——高校书目数据共建共享的成果.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3)

7 马婕等.简论联合编目质量控制.图书馆,2001(4)

8 甘琳.中文图书数据处理规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9 张丽华.机读目录标准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图书馆建设,2001(1)

10 范亚芳,韩莉莉.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再认识.图书情报工作,2001(8)

11 刘嘉.21世纪中国编目网络之构想.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2 刘力大.网络环境中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标准化刍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5)

13 张晓林.基于Z39.50的虚拟联合目录体系概念模型.情报科学,1998(5)

14 戴龙基等.高校书目信息资源共享的整体化建设方案.图书情报工作,2000(6)

15 刘素清.虚拟联合目录与传统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的比较——对我国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模式的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4)

16 阎立中.图书在版编目——目录著录工作标准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图书馆工作,1979(4)

17 樊玉敬等.我国图书在版编目(CIP)工作研究综述.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5)

18 黄俊贵,林德海.文献编目实践与理论进展综述.见:黄俊贵,林德海主编.文献编目论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19 刘刚.略谈我国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1)

20 赵阳.我国在版编目计划的实施暨改进设想.图书情报工作,1997(7)

21 陈源蒸.推行ECIP计划,实现中文图书"自动编目".图书馆学刊,2002(1)

第九章　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

第一节　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概观

先有图书，后有书目文献。书目文献不只是图书激增和发展的产物，也是用来解决读者的特定需要与众多文献之间尖锐矛盾的重要工具。所以，自书目文献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与“利用”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目录学，尽管长期坚持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宗旨，并且也以实践表明了它决不仅仅是“网络群籍，部次甲乙”的所谓“簿录之学”，但就本质而言，目录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追踪古代图书的收藏、利用，还是考察现代信息资源的开发、服务，目录学的这一基本特征都始终没有改变。

（一）收藏、管理的需要

图书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目录学产生的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的出现，完全是为了解决由前者催生出来的相应矛盾。按照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的考证，殷商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萌芽时期。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察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它们的存放方式，以及尾部所刻的“入”、“示”字样和数码，表明了当时甲骨的入藏、陈列和参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续，“这些记号和数码”便是原始目录的重要例证。[①]西汉晚期图书散乱，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官修书目《七略》。通过《七略》这部书目体系，汉朝皇家藏书得以有序排列和管理，后人也由此得窥两千年前的藏书规模。以后历代著名的大型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修书目，抑或是史志书目，无一不是旨在反映当时藏书、管理当时藏书的直接产物。

（二）读书、治学的需要

除了旨在反映藏书、管理藏书的需要外，传统中国目录学的另一个显著功能是服务于读书治学。如果说早期目录学的功能，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和“管理”的话，那么随着图书文献的剧烈猛增和特定需求的强烈呼吁，目录学读书

①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治学这一功能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图书文献的大量增加,不仅仅为"反映"和"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更为读者的特定需求带来很大困难。书目工作是在立足解决众多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以降,由于社会矛盾更趋激烈,意识形态领域变革之风空前发展,不仅张之洞用来读古书、治旧学的《书目答问》风行一时,康有为、梁启超旨在倡导维新、宣传新学的《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更是广泛传播。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印证了书目导读的重要作用。

(三) 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整个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以往那种单纯传授知识的一次性教育已经落伍,既传授知识、又强调自学和科研能力的终身教育思想正在取而代之。在这一新的形势下,目录学的基本任务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基于网上信息的急剧增长和利用相关信息日益困难的局面,目录学与时俱进,使得网上信息二次组织工具也应运而生。通过网络目录、搜索引擎、多元搜索引擎等各种形式,目录学正在焕发青春,跻身信息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可以想见,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目录学,一定会在继承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完善适应当代需要的新机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二、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发展

书目文献是记录与传递文献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对文献进行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书目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加强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

书目文献是书目工作的结果,它是社会文献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的产物;反过来书目文献可促进文献信息的利用。通过利用文献信息,可以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书目文献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指南。我国传统目录学在注重书目文献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查检利用价值。在今天,文献信息在内容、形式、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过程的推进,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的高速增长、高效传播与利用,而且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信息产业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现代化及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

在今天,文献信息已成为亟待开发的信息资源,信息需求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第一需求。书目文献作为关于文献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

合,对信息的有效组织和控制起着关键的作用。书目文献将处于无序状态的文献信息进行揭示、组织、聚类和开发,方便了文献信息利用,使书目文献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利用包括文摘、索引、搜索引擎等在内的书目文献,使其在当代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控制、组织、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的重要功能。

(二) 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进步

书目文献是文献信息的浓缩与揭示,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我国传统目录学就把目录看作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注意利用书目文献考辨学术源流,评价图书价值,介绍版本沿革,这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今天,书目文献已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有力工具。要充分发挥书目文献在读书治学、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要通过书目文献的开发利用,推动反映优秀文化的文献信息的推广利用和普及,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网络时代书目文献要注意加强对网络文献信息的揭示、组织、推广和利用。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利用网络书目新形式加速网络文献信息的标引、揭示与传递,推进网络文献信息的利用,使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领域,切实推进我国优秀文化的复兴。当前只有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信息资源进行制作、加工、传播、转换和二次开发,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文献信息,促进文化进步与发展。如何有效地解决数字时代文献信息的揭示、报导和利用是21世纪书目文献利用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 书目文献利用与个人成材

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基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而专业人员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只有利用书目文献信息才能顺利开展工作。随着文献信息的激增,文献信息的搜集、利用和整理成为个人成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功课。传统的书目文献是读书治学的门径,新时代书目文献是科学研究的指南。凡是书目信息意识较强,利用书目文献信息能力强的人,无不事半功倍。

有效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可以较好地从事学习和科研工作,促进个人成长与成材。这在网络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信息已经渗透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学会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尤其是学会利用网络文献信息,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学会利用网络书目文献信息,学会获取更新更全的文献信息,才能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书目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待开发的资源。我们要充分认识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书目文献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中国的目录学的功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在指导读书治学以及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目录学的致用性与现代书目技术相结合，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中国当代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逻辑发展。中国传统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尤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大特色。在重视考辨学术源流的同时，为了推进文献信息的利用，传统目录学发展了一系列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如类例、解题、编次和互著、别裁、校雠等理论和方法。因此，我国传统书目文献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既能反映一代藏书之盛及学术概貌，也能服务于文献的收藏取用，让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目录学都主张致用，不过中国目录学之致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致用性体现在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虽然目的不同，但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古人很早就重视书目文献的利用，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技文化和目录学思想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封闭的自足的目录学体系逐渐解体，终于不复存在。西方文化的涌入，导致图书文献类型和内容的变化，为适应学术发展和类分图书的需要，新式分类法不断涌现；同时书目的功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不再单纯着眼于整理文献，考究学术；而是为了宣传推荐文献、指导阅读，为实现文献的价值而服务，故此目录学技术被高度重视。

从致用原则出发，书目文献利用目的大大扩展，书目文献利用将要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真正发挥书目文献的功用。书目文献利用研究也将更加面向书目工作实际，加强目录学的应用研究。比如对国家书目的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检索刊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对联合目录报导体系和计算机编制联合目录的试验与研究，对书目工作的标准化的研究，以及对学科目录工作及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等。

今天书目文献利用也将突破传统束缚，书目文献利用的对象和范围将大大扩展，从书目（即文献目录）扩展到非文献目录。其利用的对象既包括传统形式的书目，也包括非书目录（如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等）；既包括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完整的单元书目），也包括非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不完整的单

元书目,或附着于非目录文本而不能独立存在的,或处于半独立存在状态的,如书刊卷首目录、一定时间内新书销售排行榜);既包括纸品目录,如书目、报纸目录等,也包括非纸品目录,如各类型机读目录。

在网络时代,面向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利用、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是书目文献利用不能忽视的内容。随着网络文献的勃兴,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开发必将成为书目文献利用的“重中之重”。同时书目文献利用也必须关注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服务及书目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

目录学技术性与致用性是辩证统一的。书目工作发展到现在,逐步由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自动化操作是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手工操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现代机器操作,由于其“现代性”,许多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新生事物”还没能完全接受,研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加强。只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用之于书目实践,书目利用工作才能更上一层楼。

第二节　书目文献资源利用与用户

用户,或称为读者,就是书目文献资源的使用者和利用者。书目文献资源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用,用户是最好的评判者。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用户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因此,研究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改进书目文献服务的方式方法,是搞好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充分发挥书目文献效用的前提之一。

一、用户是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主体

书目文献是为了用的,用户是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主体。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还包括用户使用与掌握鉴别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用户,就有什么样的书目文献开发与利用水平。如果不考虑用户这一重要因素,就是遗忘了为谁服务的大问题。因此,用户研究也是书目信息开发与利用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网络时代,用户在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体性更为明显。首先,用户参与改变着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理念和现状。随着网络文献的大量涌现,网络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亟待加强,而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与用户息息相关。大量网络用户的使用,促使网络文献分布区域日益广泛,网络书目文献内容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其次,用户参与是书目文献利用提升质量和层次的原动力。网络书目文献的发展与用户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无论是以前的“眼球经济”论,还是今天的“内容为王”、“服务为王”的说法,都说明没有用户的积极参与和使用,网络传播者将难以实现自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网络书

目文献的利用也是如此。

用户素质是书目文献服务的外围社会环境之一。从自组织的系统观点看，用户也是书目信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户的状态将深刻影响书目文献系统的发展及其走向。这一点网络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

书目文献信息要发挥效用，除了优化信息内容和信息组织形式外，也取决于用户个人的素质状况。所以，要提高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效率，就要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对用户进行经常性书目利用教育，而且书目文献资源本身也需要用户的实践验证它的优缺点，才能改进提高。只有加强用户教育，提高书目文献利用意识和能力，并采取措施加强与用户的联系，重视用户的信息反馈，才能优化书目信息系统，也才能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书目文献信息资源。

从整体看，书目用户的情况千差万别，不一而足。用户由于信息意识、知识结构、书目使用能力的不同，利用书目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也不同。用户使用书目文献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解决工作问题，有的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有的出于娱乐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学习深造。由于书目文献利用意识和技能的落后，许多用户面对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束手无策，急需培养书目文献利用的意识和能力。

因此，培养用户、培育用户利用书目文献的能力和素质，是书目文献开发利用和服务的重要一环。现实表明，人类的信息需求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产生了新的变化；新的信息需求不断产生，将成为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动力。书目文献满足了人类信息传播效率和利用的要求，必然具有满足人类信息需求的潜力和能力。显然，满足不断产生和增长的人类信息需求，才是书目资源利用的方向。

当前，网络文献的涌现将激发人类高质量和高效率获取即时信息的信息需求，这种需求成为网络书目文献利用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对网络书目文献利用而言，要充分重视对用户市场的开发，甚至网络书目技术的开发也必须考虑网络用户的特点和需要。

我们深信，信息社会需要更有效的书目文献开发和利用，网络书目文献也将造就一批新型的忠实读者，使之成为一个群体，合乎他们的需要。网络书目服务目前最主要的不在于媒介和技术，而在于提供合乎读者需要的内容信息。为此，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需要作出坚实的努力，了解用户需求，改进书目情报服务，促进书目文献利用。

理论上，用户是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对用户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书目情报服务的效果，反过来评价和改进书目情报服务的过程、内容。用户研究也将成为书目文献利用的必要组成部分。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是以用户为基点和中心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理论体系结构从逻辑上将是不完整的。

二、用户调研与书目文献利用

用户调研是搞好书目情报服务、推进书目文献利用的前提之一。通过用户调研,能够了解用户使用书目文献的情况,分析用户利用书目文献资源的规律;同时能够听取用户对目录设置和建设的看法,从而改进书目情报服务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推进书目文献利用。

(一) 用户调研的主要内容

用户调研应集中于用户对于书目文献资源的使用方面,从中发现用户利用书目文献资源的问题,探询解决之道。国内外图书馆界、目录学界针对书目文献资源利用问题已进行多次多方面的用户调研。

用户调研首先要了解掌握用户利用书目文献的情况。书目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展,其类型模式、使用方法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了解用户利用书目文献的情况,是用户调研的首要内容。比如,读者利用机读目录的情况调研,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已进行过多次。我国也进行过相关调查。通过调研,不但可以动态把握读者利用书目文献情况的状况,还可以据此分析用户的使用心理、存在问题,为改进服务提出建议。

用户调研还应积极听取用户的意见和建议。用户作为书目文献的使用者,对于书目文献的可用性、易用性具有最直接的体验。因此,直接听取用户对于书目体系设置、检索入口、使用方法、教育培训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就可以根据用户的提议改进书目文献服务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书目服务质量。

(二) 通过用户调研改进服务,促进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通过用户调研,可以发现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需求就能为改善书目情报服务提供行动 目标、决策依据和理论基础。同时用户调研的成果,也可以优化、提升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

事实上,通过用户调研得出的结论,已极大地促进了书目情报服务的进展。比如,通过对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用户进行调研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对科技信息检索系统的建立和改进提供了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样,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用户需求的调研不仅改善了信息系统对社会科学家的服务,更由此而创建了定题情报提供(SDI)及现期目次服务(Current Awareness Services)等一系列新型服务形式。

现在书目情报服务的用户范围越来越广泛。除了各类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的教师外,进行应用研究、特别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书目文献的用户。因此,要更加重视实际工作者的需求,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用户调研,并能够对用户调研的结果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国内外都在开展。如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图书馆研究发展部(Britain

Library Research & Development,BLRD)资助了一系列用户需求与用户调查研究,对象包括工业、农业 、商业、金融、社会福利及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等社会各行各业人士。这些用户调研在了解与分析用户需求的同时,还评价了已有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进而提出了改善信息服务的方向。比如,由信息系统向社会科学实际工作者提供各种事实情报等。相对而言,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的用户调研开展得不是很充分,成果比较有限,还需要大力开展用户调研和用户分析与研究。

三、搞好用户教育和培训

用户的书目信息意识和书目文献利用能力对于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书目文献利用技能是一项实用技能,不是用户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因此,针对用户利用书目文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用户教育和培训就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书目教育和培训,用户可以提高书目文献利用技能,如书目信息的检索技能、交流技能、书目信息的使用技能。用户还可以学到书目文献知识,增强书目信息意识,养成书目信息的思维和使用习惯。因此,用户教育对于促进用户使用书目信息系统,推动用户有效开展各种信息交流活动,提高用户工作效率和水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书目教育的内容

对用户进行书目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内容有:

1. 书目评价与选择。主要介绍传统目录学的常识和图书目录的使用选择方法。包括图书分类与目录知识简介、图书及书目评价的原则和方法、怎样查找和选择合适的图书、如何阅读图书和书目的评价资料等。重点是指导用户学会自己找书、自己选书。

2. 现代书目技术培训和训练。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书目情报服务也要使用计算机网络。因此,用户教育要适当从大文献概念出发,引入多媒体阅读和网络浏览等概念,帮助用户掌握计算机书目信息检索利用和处理的一般方法。要让用户学会计算机阅读,包括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多媒体光盘以及在 Internet 网上浏览网络图书馆、通过 E-mail 交流读书心得等,让用户适应信息时代的挑战,也通过网络使他们了解世界在变化、知识在更新、信息就是创新的源泉。

3. 提供推荐书目。进行用户教育和培训,必然要涉及书目文献的介绍和使用。书目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之一就是提供推荐书目,并进行使用方法的训练和培训。推荐书目可以根据培训对象的目的进行阅读内容的指导和选择,如美国制订过《高中生必读书目》,我国一些高等学校也制订过《大学生必读书目》等,通过推荐书目的形式可以帮助他们选择阅读好书,同时提高他们的书目利用技能。

（二）书目教育的模式

书目教育以适应用户需要，符合书目利用实践需要为准。因此，书目教育要符合“精而管用”的原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教育培训方式可灵活掌握，可采取课堂讲授，也可采取实践指导方式。

我国针对学生用户尤其是大学生用户多采取课堂讲授形式进行培训，一般书目文献利用是文献检索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课堂培训的优点是系统性较强，便于系统传授书目文献利用知识。但课堂培训过于正规，接受培训人数有限，如不与实习、实践环节结合起来，可能效果不佳。课堂培训是用户教育培训的正规形式。

除课堂讲授外，问题解决的培训模式也是书目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问题解决教学模式要求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按照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进行教学，对实用性的东西十分重视，力求学不在多，学而有用。问题解决教学模式的实质是应用教育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活动。

任何技能性、实用性较强的教学课程和过程，问题解决模式都有其实际的应用价值。书目教育也不例外。书目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应用问题解决模式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具体的书目文献利用项目的教学效果比讲授书目利用的原理要生动明显得多。

问题解决模式的书目教育着眼于用户的使用，要求用户自己提出问题，自己通过书目利用解决问题。有利于用户跳出问题之外形成一般化的认识，运用发散思维进行类比、推广和引申，从而真正掌握基本的书目文献利用技能。这种教育模式也符合书目教育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原则要求，值得广泛推广。

第三节　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目的和形式

书目文献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的基本职能就是向用户提供有关文献的信息，是调整文献与利用者关系的重要工具。自从书目产生以来，人们基于各种需求和目的，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利用书目文献资源，使书目文献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目的

目录学不仅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而且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指南。在信息时代，人们只有具备深厚的目录学功底，才能更好地利用书目文献资源，在读书治学、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进步和成绩。

（一）服务于读书治学

目录学历史上就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今天，目录学成为打开人类知识

宝库的“金钥匙”。书目文献给人们翻检阅读文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在查询使用书目文献时,可以了解文献篇章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源流,以及具体的存储位置。同时,通过书目可以了解研究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这些成果在学术上的地位,作为研究借鉴。具体而言,可以利用书目完成查找文献和了解动态的任务。

1. 查找文献。当今文献浩繁,难以及时查找利用,而利用书目文献可以实现快速多途径检索。以图书馆目录为例,读者可以通过书名、著者、主题、分类等方法查阅所需文献,并可很快浏览借阅。机读目录更是方便,可以从更多检索入口进行检索,极大方便了文献利用。

2. 了解动态。随着技术的进展,现代书目不断报导各种类型、内容的文献,致力于解决文献激增与用户需要的矛盾。书目文献编辑报导的周期越来越短,可以较好地动态反映文献的状况。从事研究要了解学科动态,可以通过利用书目文献达到目的。

(二) 服务于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

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连续性和继承性。没有前人经验成果的积累,科学研究者的发明创造将难以为继。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过程中需要利用书目文献了解进展、掌握动态,使科研工作事半功倍。

1. 了解研究文化史、学术史

通过查找、利用书目文献,科研工作者可以了解文化史、学术史,把握本专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从而找到学科的突破点和前沿。传统史籍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乃至《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都可以作为了解文化史、学术史的工作和捷径。

除了常用书目、导读书目、推荐书目可供读者了解研究文化史、学术史之外,一些非正规的书目也能帮助读者了解文化史、学术史状态,如百科全书后附的专题研究书目、人物条目中的书目等都可用来研究文化史和学术史,可使读者对该学科发展有一全面了解。

2. 查找最新信息,跟踪国际前沿

当今科技发展迅猛,充分利用书目文献,及时获取最新科研信息,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多出成果。通过利用书目文献,尤其是网络书目文献,我们可以跟踪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

以我国科技开发为例,在科技开发过程中必须掌握最新科技信息,否则事倍功半。我们可通过利用专利目录等书目文献,从技术考察、论证、立项到洽谈、引进、投产和仿制、创新,进行有效地管理和调控。从而有效追赶和跟踪国外高技术的发展,缩短差距,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

从实际看,有成就的科学家,无一不注意及时、准确、广泛掌握大量的情报资

料,从中分析研究、预测方向、借鉴技术路线,选择出最佳方案。今天科学发展瞬息万变,知识老化周期越来越短,只有利用书目文献指导自己读书治学和进行科学研究,才能避免走弯路。

(三) 服务于生活需求

利用书目文献资料,可以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人们可以通过查阅书目文献,得到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1. 决策辅助

人生时刻面临着各种决策和选择的过程。在决策之前,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作到知己知彼,正确决策。通过查阅书目文献,可以获取相关信息,作为决策的辅助。比如,求职、考研等都可以查阅相关书目文献,确定未来单位的具体情况,避免决策失误。单位名录、学校名录、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等是考生了解招生规定与具体要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利用这些书目文献,用户可以作出合适的决策。

2. 解决疑难

生活中面临的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查阅书目文献获得解决。通过利用书目文献,读者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以后,可以自己找到问题解决的方法,或求助解决的方法。比如,一个购房者可以通过书目文献检索,阅读相关文献,获取有关房地产买卖、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这样他的行动就会更有方向。

我国长期以来重视科学书目服务工作,对于一般用户关心的生活需要关注不够,实际上生活信息服务也应是书目文献利用的一个重点领域。在国外,图书情报机构都要设立专门的服务部门,供用户查阅住房租赁、工作求职等方面的信息。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四) 服务于图书馆业务需要

图书馆业务工作也要利用书目文献。从图书馆内部工作来看,书目文献是有力的辅助工具。采购工作需要利用书目文献掌握国际国内文献出版动态,制定文献资源建设计划;同时书目文献也是图书馆查重的工具,可以保证文献资源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分类编目工作也需要利用书目文献查重,确定有无重号,避免同书异号或异书同号;在确定分类号后,通过书目检索可以确定书次号,使目录体系完整有序。典藏工作也需要利用书目文献,根据书目记载,将每册藏书如实反映在统计报表中,藏书的清点、调拨也需要借助图书馆目录来完成。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更是不能缺少书目文献的辅助。图书馆宣传图书、指导阅读,必须利用图书馆目录挑选合适的图书、推荐本馆藏书,还可开展新书展览、书评活动。要解答读者咨询,包括馆藏的利用、检索目录的使用方法等问题,必须利用图书馆目录。随着机读目录的使用,图书馆目录可以帮助解答读者更多问题,如本馆的复本数、借书去向、网上预约借书、网络检索咨询等。同时,书

目也是图书馆合作和协作的基础,无论传统的馆际互借还是现代的网络文献传递,只有利用书目文献才可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图书馆工作的有序开展离不开书目文献的利用。只有利用书目文献,图书馆工作才能完成自己的教育职能和情报传递职能,使各项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形式

书目文献是人们读书治学、满足自己文献信息需求的工具。随着书目文献类型的演进和发展,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综合起来,书目利用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书目文献检索

书目文献检索是书目文献利用的基本形式,因为书目就是有序组织的揭示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书目文献利用的其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奠基于书目文献检索基础上。书目文献检索,是以文献线索为检索对象的文献信息检索形式,它要使用的是书目信息系统,系统内存储的是书目、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在网络书目检索中,可以通过网络系统获取原文全文文献,检索途径和方法更加先进完备。

按照信息存储和检索手段,书目文献检索可分为手工检索、机械化检索和计算机检索。手工检索是用手翻、眼看、笔录等手段,利用印刷型检索工具查找所需书目信息的过程,是历史最悠久的信息存储和检索形式。利用卡片式或书本式目录的过程就是手工检索的过程。机械化检索是利用机械装置处理和查找书目信息的过程,如穿孔卡片检索和缩微品检索,目前已不常用。计算机检索是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和查询的检索方式。计算机检索速度快,检索途径多,可以较好地满足读者的书目信息需求,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书目文献检索方式。网络书目文献检索是计算机书目检索的新形式,它出现于计算机网络大发展的背景下,可以实现远程和跨国界检索,使读者获取书目文献信息更为方便快捷。

传统的书目文献检索途径比较少,只有文献题名、著者、分类、主题等几个入口。计算机书目检索则大大扩展了书目文献检索途径,如出版者、出版年、ISBN、文献序号(专利号、报告号)、引文等都可作为检索入口,大大便利了读者。

书目文献检索是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基础。目前还需要加强书目文献体系的易用性,不断提高图书馆员和读者用户检索书目文献的能力,更好地促进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二) 书目文献咨询

书目文献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文献咨询就是利用这把“钥匙”的

重要方法。书目文献咨询可以在书目检索的基础上直接帮助读者解决文献检索中的疑难问题,帮助读者顺利获取所需文献信息。高水准的书目文献咨询可以节省读者检索时间,提高读者检索利用书目文献的效率。同时,图书馆可以通过书目文献咨询向读者传授目录学专业知识,提高用户书目情报意识和书目检索技能,不断增强与用户的联系,促进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要高度重视书目文献咨询工作,把加强书目文献咨询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传统书目利用频率降低,机读目录和网络书目利用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不断加强网络书目文献咨询,解决读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要开展书目文献咨询,就要根据读者工作和读者需要的实际提供具体的指导;这就要接近读者,了解读者的阅读目的和阅读需求,积极开展宣传辅导和解答咨询工作。要学习掌握目录学基本知识,熟悉书目信息系统,成为书目文献检索和利用的行家里手,这样才能及时解决读者的问题。

书目文献咨询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既可以设立专门的咨询馆员,具体负责读者的书目文献咨询;也可以将书目文献咨询与文献外借结合起来,在利用书目文献的过程中掌握利用书目文献的原理和方法,使读者有更大收获。

(三) 书目文献开发

为更好发挥书目文献揭示藏书、宣传图书和辅导阅读的功能,图书馆要根据自己的任务和读者的信息需求,积极进行书目文献开发,使书目信息系统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和使用习惯,发挥更大的指引辅助作用。

书目文献开发首先要建设良好的书目文献信息系统,作好文献信息的标引和揭示。要通过对书目收录文献的著录、分类和标引,使文献的外表特征和内部特征得到充分反映,同时尽最大可能标识文献的价值所在,满足读者检索需求。要努力完善目录体系,建立主题目录,同时积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现书目文献体系机读化、网络化,为读者提供方便的服务。

在良好的文献信息揭示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书目文献信息的深度开发。书目文献开发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编制各种专题书目

专题目录面向特定读者群的需要,揭示和报导某一专门学科的图书、文献的内容、种类和特点,可具体反映这一学科出版物和书目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专题书目与普通书目相比,具有内容新颖、针对性强、结构合理、信息量大、便于读者使用等特点,可以较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图书馆可以根据馆藏和读者对象的情况编制各种专题书目,指导读者阅读和治学。

2. 建立联机书目数据库

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书目数据库产品面市,但其性能参差不齐,需要图书馆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开发，增强实际功能。比如有些光盘数据库没有收藏单位信息，就可以利用软件工具进行二次开发，使读者在获取书目文献信息的同时获知文献的收藏者，便于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有利于推进资源共享。

3. 利用书目文献扩展服务范围

在书目文献资源深度开发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书目文献开发的成果，积极拓展服务范围，实现开发效益。

要扩展书目信息服务范围，书目文献开发就要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听取用户的反馈意见，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图书馆可以拓展服务方式，利用电话、广播、网络(E-mail、BBS 等)针对具体用户的需求提供文献咨询、文献查询、文献提供等服务。利用书目文献资源开发的成果，还可以开发馆藏文献资源，比如根据图书馆目录的建设情况可以自动生成新书通报，向读者进行新书推荐等。

第四节 综合性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按照收录的文献内容特点，可以将书目分为综合性书目和专科书目。综合性书目收录内容全面系统，面向非特定的用户群体，可以实现书目文献的所有功能。综合书目包括国家书目、联合书目、书业书目和报刊目录等，一般综合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也是综合性书目。对综合性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是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利用综合性书目检索古今中外的图书文献，为读书治学、科学研究服务。

一、检索中文古籍

我国是世界上古籍存世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现存 1911 年之前的古籍约 10 万种左右。要实现对这些古籍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就要利用综合性书目检索中文古籍。

(一) 查找古籍文献存佚流传情况

在具体读书治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查找确认古籍文献存佚流传情况，可以使用史志目录。我国正史“二十五史”中多有艺文志、经籍志等史志目录，没有的一般也有补录。本来史书作者通过史志目录记录一朝藏书或一朝人著述的情况，以“纪艺文之盛”。现在它已成为书目文献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见证。今天通过史志目录等传统书目文献，可以窥见我国历史长河中浩繁典籍的兴衰存废和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源流。

除了史志目录之外，还可以利用《通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和《书目答问》等传统书目文献，获取我国历代文献流传使用、评价的信息，从而有力指

导我们的读书治学。

（二）查找现存古籍

了解古籍的存佚流传，可以从文化史或文献史的角度研究文献流通传播。而我国史志目录及公私书目著录的图书，由于流传过程中的天灾人祸，亡佚甚多，许多古籍今天已不见踪影。要利用现存古籍，首先就要查找现存古籍，对现存古籍了然于胸，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应用它们。

要查找现存古籍，可以利用《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及《书目答问》等古籍文献书目。其中尤以《四库全书总目》使用最为普遍。

《四库全书总目》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收录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中国古籍文献。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翻阅不便，后又被删节成 20 卷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通过一繁一简两种书目，我国清代中期以前存世的古籍多可以被查找到。再加上《贩书偶记》和《书目答问》等传统书目文献，可以较为全面地查找现存古籍。

（三）确认古籍版本

在读书治学过程中，经常需要确认古籍版本，这就需要利用古籍版本目录和善本书目。

常用的版本目录有《（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清莫友芝撰）。前者是一部重要的古籍版本目录，作者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收录的图书版本详加叙述，考订优劣，并补充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未收书的不同版本考订；后者收书则不限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可与前者相互参阅。

查考古籍善本，可以利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反映现存古籍善本的联合目录，是查考中国古籍善本最具权威性的参考工具书。《中国善本书提要》是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的著作，收录善本古籍 5 000 多种，考订精审，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

（四）探讨古籍真伪、禁毁和书名异同

中国古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伪书、禁毁书及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现象。要对这些现象进行辨别，可以利用相应的综合性古籍书目。

古籍的真伪辨别可以利用《古今伪书考补证》（黄云眉撰）、《伪书通考》（张心澂编）等书目。查考历代禁毁的古籍文献情况，可以利用《中国历代禁书目录》（见安平秋、章培恒主编的《中国历代禁书大观》一书）、《古今中外名书禁书大观》等书目，不仅可以查考中国禁书，还可查阅国外禁书情况。查考书名异同则可以利用《同书异名通检（增订本）》和《同名异书通检》（杜信孚等编），则古籍书名混乱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二、检索近现代中文图书

随着出版业和出版技术的发展，我国19世纪末以来出版了大量的近现代图书。要检索查阅这些图书文献，可以利用图书馆馆藏目录、国家书目、联合目录等书目检索工具。

(一) 查找建国前出版的图书

建国前出版的图书年限跨度大约为19世纪末至1949年，这是我国出版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无论印刷技术、出版行业的变化，还是图书文献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查找建国前图书，除了使用图书馆馆藏目录外，还可以使用以下综合性书目。

利用《民国时期总书目》，可以检索查阅辛亥革命至建国前的图书出版情况。该书目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12万余种，按学科分类，分册编辑出版。该书目具有回溯性国家书目的性质，是一部具有权威性、高质量的综合性书目。该书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成为查找建国前出版图书文献的必需参考书目。

除了《民国时期总书目》，还可以利用《(生活)全国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和《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二) 查找建国后出版的图书

查找建国后出版的图书，除了可以利用一些大型综合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外，要从总体上获取有关书目信息，还可以使用《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等大型综合性图书目录。

《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具有我国国家书目的性质。国家书目是一个国家全部出版物的现况与历史的记录，因此也成为检索图书文献的重要工具。

国家书目与缴送本制度的建立分不开的。建国后我国即建立了缴送本制度。《全国总书目》是一部全国性的统计登记书目，原由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中华书局出版，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编辑出版。该书目按年出版，同时具有图书年鉴的性质。由于它是根据出版单位呈缴的出版物样本编辑的，所以利用它可以比较全面地查找建国后出版的图书，了解掌握我国图书出版的情况。

《中国国家书目》是我国正式的国家书目，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中国国家书目》收录范围较广，除普通图书外，地图、乐谱、非书资料、盲文读物等也包罗在内。现在印刷版、光盘版并行。由于资料丰富、著录标准，已成为查找当代出版物的权威检索工具。

(三) 查找内部发行、最新出版及在版的图书

图书馆业务部门尤其是采访部门经常采集内部发行图书、最新出版和在版

图书,这时候就要利用一些书目文献,获取相关的文献信息。这些书目文献已成为图书馆业务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辅助资料。图书馆其他部门如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部门也要用到这些书目。

我国已出版了《全国内部发行总目(1949—1986)》,可以用来检索查阅内部发行图书的出版情况。该书可作为《全国总书目》的补充。要查找最新出版的图书,可以使用《全国新书目》,《全国新书目》现为月刊,出版信息及时,其收录范围包括了电子出版物,已成为发布、查找最新出版物的重要工具,在图书馆业务工作中得到广泛使用。要查在版图书信息,就要利用出版发布信息更为及时的《新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版)》、《新华书目报(科技新书目版)》、《新华书目报(标准新书目版)》等,它们作为新华书店编印的征订目录,以旬刊形式出版,及时预报新版、重版图书的出版情况,是图书馆采访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指南。

三、检索外文图书报刊

利用国内出版的书目文献资料,可以及时掌握我国出版物的现状和历史。而要了解掌握国外出版物的出版情况,就要使用国外出版的书目文献,无论图书馆工作还是科研工作者个人的科研需要,都可以通过利用国外书目文献获取所需文献信息。

(一) 利用国家书目和书业书目

以国家书目的形式揭示报导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出版物状况,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通例。利用国外的国家书目,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图书文献的出版动态;有的国家由于历史或文化的原因,没有国家书目,但有较为完备实用的书业书目,利用书业书目也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出版状况。

外国国家书目发展历史较长,具体体例千差万别,情况十分复杂。限于篇幅,在此重点介绍英美两国的国家书目和书业书目。

英国具有良好的国家书目编辑传统,它的缴送本制度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英国的国家书目为《英国国家书目》(*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简称BNB。它以英国图书馆书目服务部根据英国图书馆版本局收到的图书文献作为编目基础,及时报导英国和爱尔兰出版的图书和新版期刊的书目信息。BNB报导及时,著录标准,是公认的权威性国家书目检索工具。

美国至今没有正式的国家书目,只有一些重要的书业书目,可以作为查询美国出版物状况的参考工具。主要有:《累积图书索引》(*Cumulative Book Index*,简称CBI)、《美国图书出版记录》(*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简称APBR)和《在版图书目录》(*Books In Print*,简称BIP)等,这些书目以其出版的及时性、编排的科学性大大便利了读者。

此外,法国有《法国总书目》和《世界法语出版物目录》,德国有《德国国家书

目》,日本有《纳本周报》和《全日本出版物总目录》。利用这些书目文献,对于相应语言文献的收集整理是大有帮助的。目前图书馆业务工作中使用较多,但读者服务工作中利用不多,应注意在读者服务中多利用这些书目文献。

(二)利用国外的报刊目录

要了解国外期刊的出版情况,可以利用国外出版的期刊目录。期刊目录也称期刊指南,是对报刊进行书目控制和开发利用的工具。这些报刊目录,可以作为图书馆和研究人员的手册,供采购、编目、参考人员和学术研究时参考查阅。

目前国际上重要的期刊指南有《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简称 Ulrich)、《威林出版物指南》(*Willing's Press Guide*)、《标准期刊指南》(*Standard Periodicals Directory*)、《盖尔出版物和传播媒介指南》(*Gale Directo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 Media*)和《连续出版物指南》(*The Serials Directory*)等,利用这些期刊指南,可以了解、把握国外书刊的出版传播概况。目前,这些报刊目录多已有光盘电子版或网络版发行,扩大了读者使用面。

除了上面我们已经介绍的书目文献类型外,综合性书目文献还有很特殊的一类书目,就是书目之书目和工具书指南,它们是关于书目的工具书,如《书目举要》(周亮贞、李之鼎编)、《书目长编》(邵瑞彭编)等。利用这些书目文献,读者可以评价和选择书目文献,使书目利用技能更胜一筹。

第五节 专科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与综合性书目相对的,是门类各异的专科书目。从表面上看,专科书目涵盖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似乎没有综合性书目那样包罗万象,事实则不然,它所涵盖的内容不仅相当广泛,而且对文献的揭示程度往往比综合性书目更系统、更深入。所以,专科书目是书目文献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发利用一次文献必不可少的工具。

一、专科书目的产生与发展

所谓专科书目文献,就是以特定读者群的需要为服务宗旨,具体揭示和报导某一专门学科有关文献信息的书目。专科书目产生的背景,既有文献剧增、亟待梳理的因素,也有学科的细致分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要求。通过专科书目的方式,系统揭示与报导某一领域的重要文献,对推动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考察我国书目文献发展史,专科书目早于综合书目,较早产生的是军事领域的书目文献。这一特定现象有其社会背景。先秦时期的连绵战争,孕育了许多

著名军事家，也给后人留下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大批军事文献。西汉建立后，军事文献的整理首先拉开了序幕。汉高祖六年（前201），先是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至西汉中叶，经过军政杨仆的系统研究，又编制出著名的《兵录》。可见，《兵录》作为专科书目的先驱，为西汉综合书目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而西汉刘氏《七略》的产生又反过来推动了专科文献及其书目编制的发展。

古代以来，在我国书目文献领域涌现出大量综合书目的同时，反映具体领域有关信息的专科书目也陆续出现，它们涉及诸多方面，而且发展相当迅速。例如，在文学领域里，有以挚虞《文章志》、吴竞《乐府古题要解》为代表的文学文献书目；在历史文献领域里，有以商仲茂《十三代史目》、章学诚诸大师的《史籍考》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书目；在宗教文献领域里，有以僧佑《出三藏记集》、释智升《大唐开元释教录》为代表的佛经书目，以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为代表的道教文献书目。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农学文献书目、算学文献书目、地学文献书目、经学文献书目以及医学文献书目等等。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愈分愈细的需要，近现代以来甚至出现了仅仅为揭示和报导专门问题有关信息而制作的专门书目。例如丛书目录、方志目录、古籍善本目录、敦煌目录、族谱目录、小说目录、年谱目录、禁书目录等等。无论是范围较大的专科书目，还是由专科书目分化出来的专题书目，它们都是书目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们都在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常用专科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

如上所述，历经前人和当代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专科书目。各式各样的专科书目，不仅是对该学科相关文献资源的浓缩与表述，也是有效开发利用该学科相关文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我国传统文献资源中，能够长期得以有效开发利用者，首推文史两大专科领域。

（一）史学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在常用专科书目文献中，史学书目文献的开发利用是相当典型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中华民族素有研究历史文献的优良传统。早在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就编出了《史目》，开史学专科目录的先河。此后，又有杨松珍的《历代书目》，商仲茂的《十三代史目》，高似孙的《史略》等等，数量愈编愈多，规模愈编愈大，体例也愈编愈精。相比较而言，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史籍考》可说是古代的最高成就。《史籍考》鸿篇巨制，规模空前。该书目一级类为“部”，从“制书”、“纪传部”到“小说部”，共有11“部”；“部”下为“类”，大大小小共有55“类”，全书总计达到325卷之多。

在近现代以来的各专科书目中，史学书目的编制和利用仍然占据相当突出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如此。这种情形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

数量多,规模大。仅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例,不仅出现了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录》、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等各式各样的一批史学书目,而且有些书目的规模相当可观,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1981年推出《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之后,又编制了《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共收集1900年至1980年再版和新版的中国人著译的史学著作12 400多种,每种书详细著录书名、著译者姓名、出版处、出版年,并于书后附有著者索引。第二,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史学目录学著作。例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一批名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有一批目录学著作径直步入了大学讲堂。例如北京大学王重民的《历史书籍目录学》(1975年讲义)、王锦贵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都曾长期作为大学教材。

(二) 文学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纵观整个专科书目文献领域,如同史学书目文献一样,文学书目文献也长期居于显著地位。我国文学书目文献的这种局面,说到底,是由文学文献的悠久历史和长期的兴旺发达决定的。当然,尽管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像《诗经》那样将文学作品汇为总集的形式,然而,个人文学作品还没有独立成集,至于专门著录文学作品的文学目录就更不可能出现了。真正出现专门反映文学作品的文学目录是在汉代以后,因为东汉时期始有个人作品集,魏晋时期始有诗文总集。

由魏晋以后至现代,文学目录不仅愈编愈多,而且形式各种各样。其中:有专门区分古今文献的文学总目,例如问世于1930年的《中国文学精要书目》,把古代以来所有文学作品区分为11大类,以下又分26个小类;有反映诗文总集和为数惊人的作家诗文集的文学书目,前者如清代汪师韩《文选李注引群书目录》、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后者如占瑛《李太白集版本叙录》、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研究资料目录》、吴之英《陆放翁所著书版本考》、全祖望《黄宗羲著作目录》等等;有专门反映诗歌的文学书目,如松本幸男《阮籍咏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唐诗》(目录)及《全唐诗索引》;有专门反映小说的书目,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也有专门反映戏曲的书目,如钟嗣成《录鬼簿》、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还有专门反映民间文学作品的书目,例如王利器《历代笑话集题解》、郑振铎《西谛所藏弹词目录》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专科目录学是在专科书目基础上形成的新成果,也是系统开发利用该学科文献资源的一种效果更好、层次更高的组织形式。从这一点来看,文、史两个领域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郑鹤声1933年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不仅是第一部历史文献目录学,也是中国第一部专科目录学,此后的历史文献目录学可谓联

翩而至。反观同一时期的文学文献书目领域，则直至1986年秋，人们才看到首部文学专科目录学——谢灼华的《中国文学文献目录学》。

（三）其他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其他领域专科书目的编制和利用，虽然不如文、史两大领域那样广泛，但也有很大成绩。这里不能不提到农学、医学，以及马列主义经典文献诸领域。历史上的中国农学和医学都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解放后又是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所以先后涌现出不少有影响的书目成果。以农学方面为例，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中，收录了1900年到1984年我国发表和出版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和著作目录2万余条，其中许多是农业方面的；又如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农业经济文献目录》，总共收录1900年到1981年农业领域论文资料和著作篇目达14 246条。由于我国具有学习马列主义文献的广泛基础，还出现了诸如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目录》、《学习》杂志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译文简目》、北京图书馆《学习毛主席著作书目》等许多专题书目。

三、宗教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文献原本可以类比于文学、史学那样的专科领域，但基于我国目前还不很普及的实际情况（许多人对宗教文献方面的了解如同雾里观花，犹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在此将宗教文献独立于"常用专科书目文献资源"之外，而特别地列为一类。

（一）宗教与宗教文献

放眼现代世界，信奉宗教者比例之大、人数之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仅以当代"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基督教为例，"世界基督教信徒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比较保守一点的估计约为四分之一"，佛教人数相对少些，但"据1982年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计，全世界现有佛教徒295 570 780人"。① 如果把所有信教者的数字叠加起来，则数量自然更加惊人。以如此巨大之人群，假如对他们最为基本的经典文献和书目文献资源置若罔闻或一无所知，不仅有悖于社会现实，更无知于宗教的积极意义。关于宗教存在的积极意义，诚如赵朴初对佛教的有感而发：佛教文化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②

（二）佛教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

①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中国虽然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但比较而言，影响至大者非佛教莫属。佛教经典文献在我国历史上的传播，早在唐人编写的《隋书·经籍志》中已有确切记载。其中，佛经类小序记述了佛教的产生，尤其对佛经传人中国的过程和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流传述之甚详，“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之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灭。”至汉明帝时，“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云云。自东汉以后，先后出现了以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和中国僧人玄奘为代表的翻译佛教典籍的两次高潮。随着佛教经卷的大量东传和翻译，不仅出现了汇集而成的佛家大型总集《大藏经》，反映相关典籍的目录也随之产生并日益增多起来。佛经目录，亦称“经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称作“佛录”。历史上最早的经录一般以为是业已亡佚的西晋竺法护《众经目录》，也有人认为是聂道真《众经录》或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等。当前存世最古的经录，则是成书于南朝齐代的《众经别录》，现为残卷，藏于法国巴黎之敦煌文献中。

佛经目录类别甚多。比较常见的，除反映历代藏经目录外，有专记一代藏经目录者，如清张心泰《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有续补目录者，如明道开《藏佚经书标目》；有校勘目录者，如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汉译本，如清康熙时期《如来大藏经目录》。

在众多经录中，有些目录颇具代表性。简介其中三部。南朝梁代僧佑《出三藏记集》，1995 年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点校并排印，这是完好存世最早的经录。本目录 15 卷，分为缘起、名录、经序、列传四个部分，著录经书 2 162 种。隋朝法经《大隋众经目录》，凡 7 卷。该书不仅著录经书 2 257 部，而且建立起一套三类（三大类：大乘、小乘、别录）九录（九个二级类）四十二分（四十二个三级类）的简明分类体系。明朝末年智旭《阅藏知津》，对以往传统分类有所改进，以符号区别读书选择之优劣缓急，还标记藏书处所。

（三）道教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道教是我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佛教文化一样，道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家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数量浩繁的文献典籍，后人看到的《道藏》乃是道教的文献总集。在《道藏》的逐步形成中，有四位道教学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就是东晋的葛洪（283—343）、北魏的寇谦之（365—448）、南朝刘宋的陆修静（406—477）以及陆修静的再传弟子、历经宋、齐、梁三朝的陶弘景（456—536）。《道藏》之名，起始于唐朝开元年间的《开元道藏》（又名《三洞琼纲》）。自此以后，历代多有编修。

认真研究道教文献，能够加深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进一步理解，还能从中发现对现代医药学、养生学、冶炼、化学、天文学、音乐以及文学艺术诸领域颇具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要真正研究和学习道教文献典籍，了解

一些有关道教经典的书目文献是十分必要的。兹简介以下几部目录。

葛洪《遐览篇》(在《抱朴子》内篇29卷之卷十九)是目前可见最早的道经目录。该书目记录道经670卷,还附有500多卷的书名,合计1 200余卷。在这个目录里,只是通录书名及卷数,尚无分类体系。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完成于刘宋太始七年(471),这是首创分类体系的第一部道经目录。大体同一时期的孟法师在陆氏基础上更进一步,又编出《玉纬七部经书目》,于是"三洞"之外,又增加了"四辅",合称"七部"。其中"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各依十二类复分为三十六个二级类,最终形成三洞四辅三十六类的道藏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体系曾经长期流行于古代。至明代,白云霁编《道藏目录详注》,凡4卷,与《道藏目录》的部类、字号次第一样,仅在各条加撰著人,并略微附加子目、原书序文。

(四) 其他宗教文献资源

在我国流行的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中,除了以上所说佛教、道教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最初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罗马公教、正教和新教。在我国,一般把罗马公教和正教分别称作"天主教"和"东正教",习惯上则将新教称为"基督教"。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和基督教特有的经典《新约》两大部分。新教教会通用的《圣经》为66卷,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伊斯兰教,源于公元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在我国,习惯上称之为回教、天方教或清真教。伊斯兰教惟一的经典是《古兰经》,总计30卷,凡6 200余节。除了《古兰经》外,还有颇为穆斯林推崇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等诸多"圣训"。在基督教、伊斯兰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过程中,其经典文献已经形成了数量惊人的多种文本,并有相关书目文献传世。

第六节　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网络信息对目录学研究思路和书目利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目录学要与时俱进,探索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网络信息组织、管理、利用问题,如网络编目、网络检索、因特网与传统书目方法的改进等。因此,积极开展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及其应用体系的研究,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数字图书馆和实现资源共享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环境下书目文献资源利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组织形式和信息服务模式的变革,同时大大激发了读者的书目信息

需求,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模式和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与传统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相比,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具有新的特点:

第一,网络具有极为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使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范围大大扩展。网络信息类型和内容十分广泛、丰富,不仅有文本信息,还有声音、动画等多媒体信息。现在已有数千个联机数据库加入了 Internet,它们提供各类科技、学术、专利、书刊、报告等信息,资源覆盖面很大。Internet 上的报刊网络版已达万余种,许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公司企业,甚至个人纷纷发布信息,他们承担着各类网络信息的创作、编辑与传播工作。这就要求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要从以传统馆藏为主转向以网络信息资源为主,在更广阔的信息空间里利用书目文献资源。如何组织与管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目录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二,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动态的和超文本式的信息传播模式,使信息与知识的生产、加工和传播利用更为高效便利,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形式将发生变化。与传统用户相比,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信息的目的更为多样,网上教育、求医、会友、开会、炒股、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学术交流等都是利用网络信息的新形式。同时与传统书目文献资源相比,网络书目文献资源扩展了网络用户获取利用信息的地理范围,有利于他们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涌现。

网络环境下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网络具有便捷的通讯功能、强大的浏览功能、广泛的共享功能和高度的参与功能。同时,网络用户可实现与网络、与网络信息的互动,他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提供者与发送者。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使书目数据资源达到高度共享,同时极大地简化与规范了数据存取、分类、标引和检索等书目信息整序和利用过程。网络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力,检索方式多种多样,网上数据库能提供灵活多样的检索途径,用户使用更为便利。用户可以利用各种方式提交信息需求,获取文献信息,如通过电子邮件获取书目信息、通过远程登录获取各种书目文献、利用 Web 获取书目情报等等。

第三,网络环境下丰富的文献信息使用户的书目文献信息需求发生巨大变化。从文献载体看,正从传统的印刷型载体文献信息需求转向多元化信息需求;从需求范围看,从国家、地区性的书目文献需求转向全球信息需求;从所需文献信息内容看,从对简单书目信息的需求逐步转向对数字化全文信息的需求。读者需要加强自己的书目检索、查询技能,以便能够快速确定并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这就需要图书馆强化网络书目文献信息的开发,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筛选、评价和组织导航,使网络书目文献资源能够尽快得到有效利用。

因此,新时代的目录学要大力研究和开发书目信息技术,解决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揭示、报导、开发与利用问题;同时利用网络加强文献资源共享,改变不适

应现实需要的落后的服务方式，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以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

二、网络书目文献资源的类型

网络书目文献资源是指书目文献利用计算机网络作为信息发布和信息服务载体形式的新型书目文献，本质上仍然是传统书目文献在网络上的实现与扩展。网络书目文献资源是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信息系统，它的类型仍在逐渐丰富和发展之中。根据当前网络发展的现状，网络书目文献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网络图书馆目录——OPAC

OPAC是英文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的缩写，中文译名是联机公共目录，它实质上就是图书馆卡片目录的计算机化。

新一代OPAC通过互联网连接，凡互联网用户都可检索某一图书馆的OPAC资源；在任何一台联网计算机上，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Internet登录图书馆的主页，查询图书馆馆藏书目，从而大大扩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查询信息的范围。

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大多已联入Internet，并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发布了相应的OPAC。随着OPAC数据库的建设，一般图书馆OPAC的内容涵盖了图书馆大部分馆藏，包括图书、期刊、多媒体资源、教学参考书等，但一般还需要利用卡片目录，与OPAC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二) 网络联合目录

网络联合目录是传统联合目录在网络上的实现形式。网络互联互通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书目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联合目录如雨后春笋，便利了读者的检索利用。

目前Internet上比较著名的联合目录有OCLC的联合目录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目录数据库系统，包括图书、手稿、计算机数据文件、地图、计算机程序、乐谱、影片和胶片、报纸、期刊、录音资料、视频资料等各种类型的目录资料。利用该书目数据库系统可以检索世界范围内图书馆的图书和其他资料，还可以查阅资料的收藏地点。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联合目录数据库。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联合目录的服务范围，向更多的用户提供命中率高、实时性强、编目质量好的数据服务，并将根据广大用户的需求增加服务内容，开展编目业务培训、资格认证等工作，以及满足用户自己定制的各种个性化需求等。

(三) 网络书业书目

网络书业书目是传统印刷型纸质书业书目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其具体用途一如传统书业书目。无论是传统的文献采访工作，还是网上文献采访，万变不

离其宗，首先遇到的都是“书目”问题。与传统书业书目相比，网络书业书目具有无时差且安全性高、无地域限制、著录项目详细等特点，并可下载为后续工作多次利用。不但利用方便，还扩展了图书馆文献收集的范围。

网络书业书目不但可以服务于图书馆采访工作，还可服务于推荐图书、指导阅读、文献编目整序、文献咨询等多种工作。网络书业书目本身可通过相关的软件对下载后的网络书目进行重新编辑，直接将网络书目改编为新书推荐书目或转入编目数据库，大大减少了重复劳动。

目前我国网络书业书目还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大力培育市场意识和书目利用意识。我们相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书业书目将成为书目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

(四) 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

以上各种网络书目文献检索控制的对象仍然是以纸质文献为主体的传统文献。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扩展，以网页等形式存在的网络文献越来越多；为检索控制网络文献，现在已有若干类型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出现。它们是传统书目文献在网络时代和技术条件下的延伸。

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也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向之一。同其他目录一样，各类机读目录、网络目录都具有认识功能和检索功能，因而可断定它们同属目录族系。

搜索引擎就是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的一种。搜索引擎实质上是用于一个查询网站和网页的数据库，作为一个集中了千千万万个站点的地方，搜索引擎给人们搜索站点和查找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还会分门别类地把一些好的站点列出来，以方便人们查找资料。搜索引擎是网络用户发现新网站和新信息的主要手段。

此外，各类图书馆也在探索建立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的方法和途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LC)、美国图书馆学会(ALA)等都提出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整理计划，OCLC 实施了因特网编目计划 InterCat。同时，“元数据”(Metadata)已被广泛用来描述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界正密切关注元数据记录能否用于图书馆编目记录，以及这些元数据能否帮助图书馆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高效编目。这将是书目技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必能大大推进网络文献资源的利用。

三、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具体策略

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是网络条件下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动力和先导，图书馆一定要看到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发展趋势，推动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

(一) 树立新观念，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网络环境为更好地利用书目文献资源创造了条件。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文献

利用要及时转变观念，树立网络书目文献利用观念，图书馆要有较强的网络信息服务意识，积极把馆藏信息资源转化为网络资源，同时充分利用网上信息资源以及本馆的虚拟馆藏，建立本馆文献信息与网络信息资源相结合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同时，要积极研究网络条件下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从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用户需求三方面的变化入手，分析网络书目文献利用的特点，积极采取措施，优化服务，使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更上一层楼。

（二）积极利用新技术

网络为书目文献利用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一些图书馆正在利用网络扩展书目文献服务，如电子邮件、远程登录等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下作为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方式。网络使图书馆更方便地与用户沟通，可及时了解用户的书目情报需求，开展服务更省时、省力；同时也为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手段，使用户可更快更好地满足文献信息需求。所以，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以满足用户需求。

书目文献资源利用的基础是书目文献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图书馆必须积极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简化书目文献信息的搜集、加工整理、传递、开发利用的整个过程，搞好服务，促进利用。同时，加强对网络文献信息的选择评估、加工整理，深入揭示和序化整理网络信息，搞好网络知识导航工作，深化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和层次，如此必能促进网络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

（三）提升用户能力

要通过用户教育等手段提升用户利用网络书目文献资源的能力。网络环境下的用户教育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重点加强对用户的信息资源观念、网络信息查找以及网络通讯等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要使用户了解 Internet 信息资源分布情况，掌握网络信息检索方法、技巧和工具，增强用户在网络环境下获取书目文献信息的能力。

在用户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实用性，根据用户的实际计算机水平和网络知识水平多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帮助用户充分利用多种信息资源。同时，加强图书馆员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做到教学相长，通过用户教育促进服务水平的提高。我们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注意培养查询与获取文献信息的能力，只有常抓不懈，才能有所建树。

第七节　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新趋势

21 世纪已经到来。当前我国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将呈现崭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是全球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尤其是网络信息异军突起,迫切要求实现对网络信息的组织与利用;同时人们深层次的信息需求也大大增强。这就要求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书目与书目工作,必须实现自动化、数字化。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目录工作将实现自动化和网络化,对文献信息的处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大大增强,也促使目录学理论从更宽的视野展望全局,为实现理论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目录学作为致用之学,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要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真正发挥目录学的功用,使之成为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应用科学。

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冲击,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将呈现以下趋势。

1. 书目文献类型和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多彩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以及网络用户群体需求的变化,书目文献资源将会在质量和数量上实现一个大的飞跃。但不管何种方式、何种形态的书目文献资源,变化的只是信息的载体、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被某种载体以某种方式传播和阅读的信息、知识才是出版的核心内容。因此,书目文献资源的本质和职能是稳定不变的,书目文献的本质就是读者查阅文献信息的指引,其主要职能就是引导读者查到所需文献信息。

书目文献资源的类型和内容将会越来越丰富多彩。传统书目文献与新型书目文献的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书目文献资源的结构也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其结果是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选择到底利用哪种类型的书目文献。图书馆也可以根据目标用户的需求状态和需求反馈,决定利用何种书目文献形式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书目文献的利用者可以实现各取所需。

书目文献的类型更加丰富。在网络时代,为了满足人们求全、求速、求准、求易的信息需求,书目文献类型多种多样。从印刷载体上看,传统的书目文献多为纸质文献,具体的区分只有卡片式和书本式目录,书目文献的利用和传播十分不易;而现代技术的应用,书目载体可以是缩微胶片,也可以是磁盘、光盘等电子载体,还可以通过 Internet 广泛传播,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利用,便于书目文献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功能。从信息组织形式上看,传统书目文献多为原文文献的“替代品”,是原文文献的缩微,还不能替代原文文献的获取和使用;而新型电子网络书目文献不但便于读者查询、检索使用,还可以通过超级链接等方式大大方便读者对原文文献的利用。从具体形式上看,传统书目文献只有书目、文摘、索引、题录等有限的几种形式;而新型的电子网络书目文献有数据库、OPAC、搜索引擎等形式,可以实现对网络文献的检索和利用,便于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检索、

获取和利用。

书目文献的内容也大大扩展。网络的扩展使读者可以利用的内容范围得以拓展,不但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可以利用,非图书馆的馆藏也可以利用;读者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书目文献资源,还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书目文献资源。书目具体反映的文献内容也大大扩展,不但是学术文献书目信息,其他许多非学术文献书目信息诸如生活信息、社会信息也可以通过书目文献检索和控制。新型书目文献将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书目文献信息或原文文献信息。新型书目文献利用的功能将更加多样,不但是读书治学、学术研究,就是生活需要、社会观察也需要利用书目文献。除传统的科学书目外,书目文献的内容将扩展到各种非书目录,如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火车时刻表、书刊卷首目录、一定时间内新书销售排行榜、各种赛事的获奖名录、饭店的菜谱等等,都是书目文献利用的对象。它们也将是新时代目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2. 书目文献利用技术越来越发达

目录学有着致用的优良传统,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基于致用的目的,今天的目录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目录技术方法的研究,尤其是要重视研究计算机技术在书目工作中的应用和网络文献的组织传播。因为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运用于书目情报活动中,也可使服务效率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并且在理论上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对以书目数据库为主体的计算机情报检索理论的研究、借鉴与探索,必然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了满足网络用户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书目文献利用必将日趋“数字化”、“自动化”。因为目录学是人类获取知识、信息方法的科学,只要人们对知识、信息获取的冲动与需求存在,书目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就不会停止。

书目文献利用技术首先表现在编目技术方面的发展与突破。随着文献类型和形式的演进,图书馆编目技术和方法必须要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手工编目时代,要研究书目款目著录的具体问题、项目及标目选取的规则,还有图书目录的组织与排序法等等。计算机编目时代,就要研究计算机应用于图书编目之后产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促成 MARC 格式的进步,推进国际间书目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网络时代开始后,就要研究网络文献资源组织与控制检索利用等问题。通过对元数据的研究,目录学应该对网络信息组织与利用形成新的见解和新的技术。

其次,要研究书目信息产业及其技术。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录学界要注意吸收信息经济学的内容,开展对“新经济”的研究;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关注书目信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具体技术方法外,目录学专家和计算机技术人员还可合作对电子化书目工具进行研究探讨。现在英美常用的书目信息生成工具很多都

包含了目录学界苦心研究的成果。

英美近年来开发了一系列书目信息开发工具。如 EndNote,已能够自动产生书目并通过因特网获得这种网络目录。再如 TextWare,可以从大量的非标准网络文献信息尽可能简单快速地生成索引或检索信息。书目检索方面,Pro-Cite是很流行的书目信息检索软件,它检索界面友好,速度快,且能形成格式化书目,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检索和文献获取。

目前,书目文献开发和利用研究的重点已转向网络信息的组织与管理,目录学要力求占领新时代的制高点。国外尤其是英美目录学十分重视对因特网信息组织与利用的研究,这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3. 书目文献利用受用户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

网络环境下书目文献资源利用因网络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用户作为使用者,其数量和职业范围将会大大扩展。在网络时代,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电脑网络来获取信息和知识,网络信息查询和下载、网上聊天、网上娱乐正在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信息资源的日益丰富,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网上阅读和网上书写。一旦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网络读者群体,且其规模随着网络的扩展而不断增加,他们巨大的文献信息需求将为书目文献资源利用与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用户的书目文献信息需求也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读者的书目文献需求意识大大增强。读者越来越需要利用各种书目文献工具去查寻、评价与筛选信息,才能更有效地去组织、分析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其次,书目文献信息消费的观念深入人心。读者对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能以最少的时间和最小的花费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

再次,用户书目信息需求的目的和范围大大扩展。首先,与学术性书目文献信息需求相比,社会性的书目文献需求呈增长趋势。信息社会中信息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工作者、政治家、商人、企业家、农民、工人、学生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都要利用书目文献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信息需求的内容,既有对科技、经济等信息的需求,又有对生活娱乐信息的需求。所有这些信息需求,都可利用书目文献来获得。

用户利用书目文献的类型和范围也在扩大。当前网络上拥有丰富的书目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各种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电子报纸、电子期刊及各类政策法规、会议产品、广告等动态信息,已成为书目文献检索利用的重要资源类型。书目文献可以通过文本、图像、声音等形式揭示各种记载人类社会活动和科学成就的文字记录及其他多元化的文献信息类型,使读者可利用信息的形式更多,范围更大。从获取书目文献信息的范围上看,随着各国书目数据的上网运行,读者

可以通过网络利用全球的书目文献信息。

用户利用书目文献信息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信息环境及信息载体的变革直接影响着读者对书目文献的利用方式。传统的文献检索已经发展到数字检索、事实检索、全文检索、超文本检索、多媒体检索等。读者已不仅仅满足于查询到原始文献的线索,还要能够直接获取原始文献,并且能方便有效地利用检索结果。这将推进书目信息系统建设和书目情报服务的深入开展。书目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推动书目文献资源的更深度利用。同时,读者用户对深入加工的精粹信息、即时信息的要求越来越普遍,将使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发生变革。

我国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目录学传统,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目录学需要加强致用性建设,立足于全社会各种形式、各个领域和层次的书目信息活动整体,推动书目文献资源利用,深入研究和建设目录学。中国的目录学的功用经历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指导读书治学再到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的演进过程,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目录学的致用性结合现代书目技术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当代目录学要从致用化原则出发,以目录实践来标示新时期目录学的思想内涵。在网络时代,更需要面向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利用,将中国当代目录学建设成为致用科学和应用科学。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是目录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内容。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开发必将成为目录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书目工作必须开拓进取,不断推进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这样才能使宝贵的书目文献资源发挥应有的效用。

参考文献

1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朱天俊.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见: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目录学文献学论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3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编著.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4 张菊芳.深化目录工作,开发文献资源.平顶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5 李宪云.试论图书馆目录的利用和管理.濮阳教育学院学报,1997(1)

6 朱天俊主编.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

7 丘玲.论图书馆目录的利用.现代情报,2003(2)

8 朱天俊,李国新著.中文工具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9 王锦贵.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 谢灼华.中国文学文献目录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11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 彭斐章主编.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3 施素珍.浅谈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趋向.求索,2000(2)

推荐阅读书目

1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宋)郑樵.通志·校雠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著.目录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目录学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7 彭斐章,陈传夫.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 来新夏,徐建华.古典目录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11 潘树广. 古籍索引概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14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 乔好勤. 中国目录学史.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16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17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

18 (苏)科尔舒诺夫.目录学普通教程.彭斐章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19 (英)斯托克斯.目录学的功能.刘圣梅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0 倪晓建.书目工作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1 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22 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3 柯平.文献目录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24 王知津主编.现代索引文摘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5 王熹编著.怎样写科技文摘.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26 侯汉清. 索引法教程.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

27 (美)哈罗德·博科,查尔斯·L.贝尼埃合著.索引的概念与方法,王知津,王津生合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28 (美)哈罗德·博科,查尔斯·L.贝尼埃合著.文摘的概念与方法.赖茂生,王知津合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郑重声明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82086060

E - mail： dd@ hep. com. 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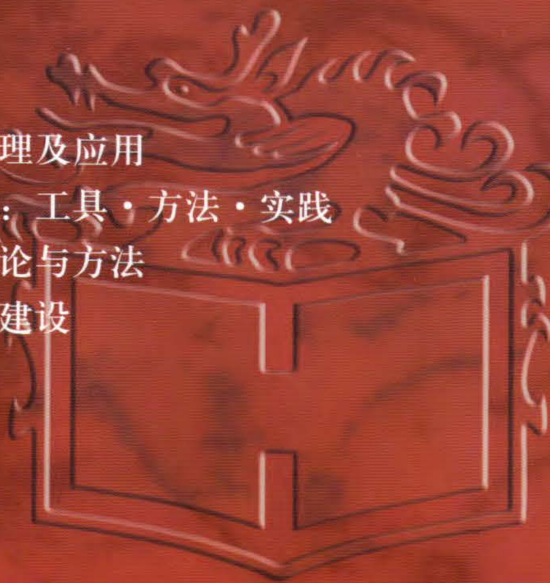
邮　　编： 100120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A Course of Bibliography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图书馆学类）



图书馆学基础	吴慰慈 主编
信息资源共享	程焕文 主编
信息描述	杨玉麟 主编
信息组织	戴维民 主编
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	李 培 主编
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方法·实践	沈固朝 主编
信息检索：理论与方法	叶 鹰 主编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	陈能华 主编
目录学教程	彭斐章 主编

ISBN 978-7-04-015344-6



定价 22.00 元